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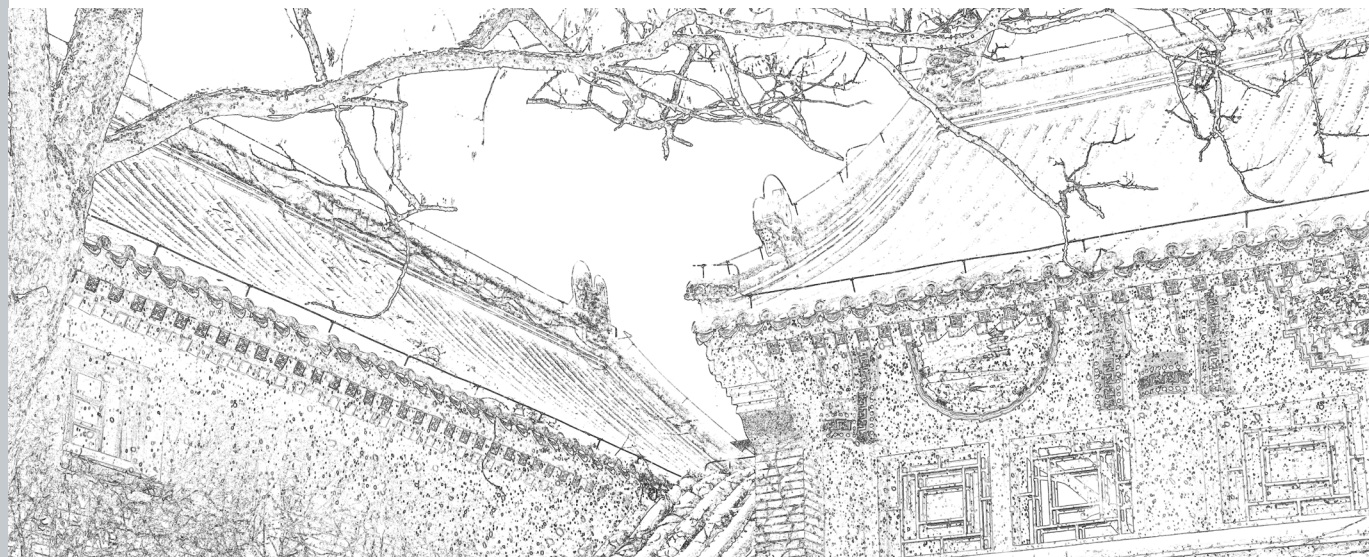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通讯

文 | 研 | 通 | 讯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2020年第1期 总第十四期

2020年第1期



总第十四期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刊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通讯》

刊期：总第十四期（2019年11月—2020年1月）

执行主编：杨弘博 韩笑

编辑：周诗雨

编务：陈天传

特邀编审：徐军

特邀摄影：刘学红等

装帧设计：杨宇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电话：010-62768010

传真：010-62768010

邮箱：ihss@pku.edu.cn

网址：<http://www.ihss.pku.edu.cn/>



微信公众号



目录

注：目录所列数字为该系列讲座序号，其他场次请见官网。

01 文研学术

（一）北大文研讲座

- [148] 于尔根·科卡 | 关于资本主义的纷争：一个历史学家的观点 02
- [149] 吴国盛 | 希腊科学精神的起源 05
- [150] 葛晓音 | 从日本吴乐“师子”和唐乐“苏莫者”看西域乐的东渡和演变 07
- [151] 景跃进 | 社会科学中的概念问题——以中国政治研究为中心的讨论 10
- [152] 周绍明 | 商业合伙关系：中国经济史为人忽略的一面 13
- [153] 王扬宗 | 中国院士制度及相关问题探讨 16
- [154] 陈来 | 王阳明的晚年思想 19
- [155] 叶少勇 | 口诵与书写——印度文化载体的流变与东传 23
- [156]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金 |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青铜铁器时代考古研究新成果 26
-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金 | 青铜时代的西西伯利亚——区域性趋势与规律性 29
-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金 | 阿尔泰山区巴兹雷克文化 32
- [157] 郑欣淼 | 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 35
- [158] 段晴 | 最后的斯基泰人——追溯于阗王国社会宗教文化变迁 40
- [159] 肖燕翼 | 古代画仿代者的揭示 47
- [160] 高彦颐 | 从景德镇工匠传说看工艺技术传承与创新 49

- [161] 薛凤 | 灾害与数字人文 52
- [162] 梁其姿 | 日常食物的价值：酱油制造与中国历史 56
- [163] 荣新江 | 丝绸之路：一个跨文明的交流系统 60
- [164] 朱诚如 | 光绪帝死因研究 64
- [165] 江晓原 | 国际著名科学期刊封神背后的商业化操作 66

（二）未名学者讲座

- [57] 张慧瑜 | 基层传播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的新闻治理经验 69
- [58] 许亮 | 工厂、家庭和资本的边陲：中国企业在非洲的社会经济学考察 74
- [59] 樊星 | 发明巴西：混血身份的构建与危机 79
- [60] 孟琢 | 礼乐传统与先秦人性论：从《乐记》“人生而静”谈起 82

（三）北大文研论坛

- [100] 司空竺、吉田豊、段晴等 | 胡语写本与文明传承 86
- [101] 马孟龙、姚乐、罗凯等 | 划而治之：对中国历代县级政区等级演变的观察 92

（四）文研汇讲

- [01] 周绍明 | 徽州祠堂与宋元时代的乡村组织 100
- [02] 景跃进 | 政体与国情：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大一统”议题 102
- [03] 田雷 | 漫长的建国时刻：如何讲述美国早期宪法史？ 105

- [04] 黄盈盈 | 跨越学科的“性”史 107
- [05] 吴雅婷 | 瞻望远方：宋人的旅行知识与新知的化成 110
- [06] 路国权 | 反思与重构：春秋史的时空结构和过程 112

（五）文研读书

- [19] 刘永华 | 传统中国的礼仪实践与社会形构——《礼仪下乡》研读会 114

（六）文研纪念

- [07] 潘光旦与中国社会学——纪念潘光旦先生诞辰 120 周年研讨会暨《潘光旦全集》启动仪式 118

（七）静园雅集

- [25] 刘涛 | 习字·学书·作书——以古代书迹、书家为例 124
- [26] T.M. 克里什那 | 音乐作为社会镜像 126
- [27] 王抒 | 将登太行——华北平原与山西高原间的古道考察 130

（八）菊生学术论坛

- [16] 议题整合与跨境对话：南宋史研究新的可能性 132

（九）多文明工作坊

- [08] 咎涛 | 奥斯曼主义的起源？对“Gülhane Hattı Hümayunu”（《玫瑰园敕令》）的翻译和释读 144

- [09] 孙飞宇 | 从灵魂到心理：关于经典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研究 146

150 静园学术

- 刘曙光 | 中国“申遗”的路径选择——从钓鱼城遗址的考古疑难说起 152

156 文研回望

- “胡语写本与文明传承”学术论坛在文研院举行 158
- “故宫与故宫学”系列学术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讲座在北大举行 160
-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维亚切斯拉夫·莫洛金访问北京大学文研院 162
- 文研院举办“潘光旦与中国社会学”——纪念潘光旦先生诞辰 120 周年研讨会暨《潘光旦全集》启动仪式 164
- 文研院与故宫博物院故宫研究院举办“故宫与故宫学的现状与未来”学术交流座谈会 165
- 文研院“文明之间”系列讲座收官 十位学者共同探讨丝绸之路沿线多种文明的交流互鉴 167
- 文研院举办第七期邀请学者总结会 169
-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一行到访文研院 171
- 邀请学者第七期项目结束 1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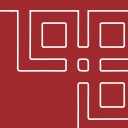
180 文研纪事



C
O
N
T
E
N
T
S



文研学术



（一）北大文研讲座

148

于尔根·科卡 | 关于资本主义的纷争：一个历史学家的观点

2019年11月4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四十八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关于资本主义的纷争：一个历史学家的观点”。柏林自由大学历史学教授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主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主持。

科卡教授从“资本主义”的概念起源引入，并指出，这个概念比它所指的历史现实要年轻得多。“资本”和“资本家”相较于“资本主义”，都显得较早且较为古老——在19世纪下半叶前，“资本主义”这个名词都未曾出现。法国社会党人路易斯布兰科（Louis Blanc）、德国社会党人威廉·利布克内特（Wilhelm Liebknecht）、英国批判帝国主义的费边主义者约翰霍布森（John A. Hobson）逐渐对资本主义做出相应的定义和讨论。时隔不久，资本主义就超出最初的批判和争论，成为社会科学的中心概念。科卡教授表示，本次讲座，他将从资本主义作为起源于批评和分析的中心概念谈起，大致描摹出其在欧洲的出现及地域的转移，并且论述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欧洲辩证地批判和相互作用。

首先，科卡教授谈到，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的后半期成为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至今已存续了一百年有余，其生发时间不一，存续形态也相异。但不论是商业的资本主义（Merchant Capitalism）形式，还是金融资本主义（Finance Capitalism）形式，亦或是工业资本主义（Industrial Capitalism）形式，这些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仍然彼此共存并相互影响。科卡教授指出，他在描绘和定义这些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时，事先对“资本主义”作出了假设——它比一般的市场经济“窄”，又比基于集体工资劳动的工业资本主义“宽”。另外，强调分权、商品化和积累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包含以下要义：个人和集体行动者拥有着处理财产权力，市场是分配和协调的主要机制，商品化以多种形式渗透到了资本主义当中，以资本为中心。

在欧洲的神学、哲学和社会理论中，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持怀疑或敌视态度的倾向在16世纪、17世纪都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普遍存在的不信任、道德排斥和知识批判并没有明显阻碍中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崛起。虽然与阿拉伯、中国和南亚等

其它地方相比较晚了一些，但商业资本主义在欧洲站稳了脚跟，商业贸易不断发展，商人和银行家成为了整个体系当中活跃的核心。中世纪的欧洲商业资本主义与其它地区（尤其是中国）相比，呈现出了两个特点：其一，商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分配领域，渗透到生产领域，商人开始通过向生产者提供原材料、下订单，有时还提供工具，对工匠和家庭手工业者施加影响；其二，这个时期出现了早期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商人们对金融业务的专业化的需求，使得银行在商人所到之国纷纷建立起来，其中一些银行还在欧洲其他国家设有分行。商人们把存入银行的钱用于投资各种各样的生意，他们还向市政府、土地和庄园发行债券，同时也为统治者提供借贷服务，以保证他们发动战争、履行礼仪义务、促进国土扩张的需要。国家的形成与金融资本主义的起源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为城市公民或商人们提供了积累政治财富、扩大政治影响力的机会。科卡教授还指出，欧洲资本主义的动态发展与其多元化的政治结构有关。这种相互竞争的、多元化的政治结构也为欧洲资本家们提供了特殊的激励、机会和影响。

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两面性。生产力增长决定性地扩大了人口快速增长的生存机会，随之也带来了新的不平等、依赖和剥削。商业和金融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结合也激发了创新，但在其中也面临着经济危机



于尔根·科卡教授

所带来的风险。资本主义的影响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论是宪政制度的建立还是公民社会的发展。

随后，科卡教授指出，启蒙运动使得知识分子们对资本主义及其声誉有了重新认识和评估。他们开始相信对于共同利益的合理追求，商业和道德并不是不可调和的两端，在某种程度上，商业有助于勤奋、坚持、正直等良好品德的发扬光大。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将有助于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之下，个人不受国家的任意干预且享有尊重和自由，国家拥有者也可以通过妥协解决冲突或战争。18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得了知识分子们的赞赏，但是，现实和“话语”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资本主义现实的深层矛盾与“双重商业”和“商业社会”的乌托邦理想化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鸿沟。

当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经济优势和经济理性充满信心时，沃纳·索巴特（Werner Sombart）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不再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进步、



道德进步和文明进步的载体。诸如韦伯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担心这个体系的僵化程度会越来越高，甚至威胁到人类的自由，迫使经济行为体按照其日益强制性的残酷竞争和增长规则运作，或者完全退出市场；而保守派和左翼人士担心资本主义是一股不可抗拒的侵蚀力量，会取代原有的习俗、传统、社会关系等；右派却同反资本主义经常与反自由主义、反犹太主义齐头并进，抨击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分配不公以及劳动场所的异化和压抑，预言资本主义将会因其内部矛盾而衰落，并会被社会主义所取代。

对资本主义褒扬的话语逐渐转成一种反思和批判。科卡教授认为，首先，“资本主义”是作为一个具有批判性和争论性概念出现的，随后它成为了一个强有力的

分析工具，帮助人们去理解过去的现象及其特点，同时解释着当下的情景。他表示，工业化之前，亚当·斯密（Adam Smith）就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机理；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逐渐凸显出自身优势，但诸如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等学者却表现出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悲观评价。过了一个世纪，资本主义带来了技术和组织上的深远创新，数字革命的发展、大众消费的扩大和分化也带来了欧洲及其他地方前所未有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剧变。剧变大部分源于欧洲，并扩散式地影响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地区，而其中最严重的影响是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使得市场与国家、经济决策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市场与政治权力的关系随着政治体制的变化而变化。另外，几十年来，苏联作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激化了对资本主义的排斥。可以说，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从未停歇，而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不平等和资源破坏等情况，周而复始地产生着破坏性影响，已然成为了过去乃至当前一个重要且备受讨论的话题。

讲座最后，科卡教授以较为乐观的态度总结道，从过去至现在，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一次又一次地使其逐步改革、逐步完善，变得或正在变得更加文明，从而更好地回应民众的需求。

（撰稿：单良）

149

吴国盛 | 希腊科学精神的起源

2019年11月7日晚，“科学·文明”系列学术讲座、“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四十九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希腊科学精神的起源”。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吴国盛主讲，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创系主任韩启德主持。三百余名师生聆听讨论，现场座无虚席。

韩启德院士首先介绍了吴国盛教授的学术背景，并认为他的演讲题目将在学术意义上开启科学与文明系列讲座。做科学史，离不开古希腊哲学。了解近代科学的发源，也只有回到古希腊。国内对古希腊科学及其精神的探讨尚在初期阶段。古希腊的神话与科学是什么关系？为什么科学从古希腊发源？吴国盛教授的演讲将为这些引人入胜的问题提供答案。

吴国盛教授对韩启德院士的邀请表示感谢，他认为“希腊科学精神的起源”是一个经典的科学史研究题目。中国人学习科学从末端开始，且是在西方现代化浪潮的推动下被迫开始的，所以科学在中国语境下具有特殊性。中国人的科学观念带有强烈的“学以致用、活学活用”的因素。也就是说，中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致用”的层面，而忽略了理解它的含义。这是我们溯源希腊科学史的重要原因。

本次讲座，吴国盛教授以“希腊科学作为自由的科学”、“自然的发现（发

明）”以及“Cosmos（宇宙）的发现（发明）”三个方面来梳理其对希腊科学史脉络的理解。

为什么说希腊科学是自由的科学呢？吴国盛教授认为，希腊科学是为了其“自身”的存在，缺乏功利和实用目的。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他们为了科学而追求科学，并不是以某种实用为目的。”因此，不能从技术的角度剖析希腊科学，它从源头上便是非技术的，甚至是无用的。吴国盛教授提到，与东方民族相比，希腊是游牧的、海洋的、商贸的民族。因此，他们的社会更关注个体、自主和自由，抛弃了知识的应用性，推崇无用的知识，从而更为专注于知识本身。第二，希腊科学不借助外界经验，纯粹依靠内在演绎来发展“自身”。变化是中国文化所“拥抱”的理念。变化中孕育着机遇，因此，变化被中国人认为是宇宙的基本形态。但希腊科学的哲学基础却是不变性。正是因为承认不变性，才有真问题，才有对恒定规律的探索可能。最后，吴国盛教授在此基础上试图对“自然”概念作语源学上的讨论。他认为，“自然”不是一个古代汉语的词汇，而是由日本翻译而来。西方的“自然”范畴也有两个内涵：一是指本性、本原；二是指自然物的集合。

第一阶段的“自然”范畴，与“physis”一词接近，强调的是自然作为本性，其含义有一个被提取的过程。如柯林伍德在《自

然的观念》里提到，“（physis）意味着某种在一件事物之内或非常密切地属于它，作为其行为之根源的东西。这是它在早期希腊作者们那里的唯一含义，并且是贯穿整个希腊文献史的标准含义”。后来亚里士多德、海德格尔所谈的“自然”均是从这一层面上出发的，与中国古代的哲学家老子所言的“道法自然”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在这里，“自然”并非名词，而是形容词。第二阶段的“自然”范畴则蜕变为“本质”。这造就了“事物”与“事物自身”的分裂，现象（多、变化）与本质（一、不变）的分裂。“自然”被缩减为仅是自然物这种特定存在者的本性，而不再是一切存在者的本性。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为“自然”范畴所做的这一规定，促成了“自然”范畴的第二次蜕变。而现代物理学则直接导致了作为受造者的自然丧失其本性。通过辨析“自然”范畴的三次蜕变，吴国盛教授指出了现代“自然”概念的混乱。

讲座第三部分关注的是，希腊科学精神包含着对宇宙的发现。宇宙论是关于宇宙的研究，但宇宙论本身存在悖论。如明代哲学家杨慎所言，“天有极乎？极之外何物也？天无极乎，凡有形必有极。”宇宙如果被认为是万物的总和，那宇宙之外是什么呢？悖论构成了科学前进的动力。接着，吴国盛教授说，希腊的科学精神与他们的宇宙观有重要的关系。希腊人相信宇宙与混沌相对，而宇宙是一个整体的、球样的东西。球的美学特质表达出了希腊人的审美理念，球形最具包容性，因而也最适合被当作宇宙的形状。宇宙的有形有极也塑造了希腊神的有形性，神与人同形



吴国盛教授

同性。同时，居于宇宙中心的事物是不运动的，因为它没有任何理由向任何一个方向进行运动。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此基础上将之发展成为地球的概念。

吴国盛教授进一步将此与希腊城邦的政治体制联系在一起。他援引法国思想家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的研究，认为希腊人的几何主义与其城邦（polis）文明密切相关。城邦意味着社会生活非神圣化和理性化的程序，公共场合的自由辩论成为城邦生活的常态。而提供自由辩论场所的广场在形态学上也符合圆的几何学，体现的是对称、均衡、平等的政治理念。可以说，希腊人的地球观念起源于他们对几何学和圆球的偏爱。

吴国盛教授总结道，希腊的科学是自由的科学。这种自由的科学是超功利的，崇尚内在演绎的。而内在性来源于事物“自己性”的发现。事物“自己性”的发现就是自然的发现。自然的发现受希腊自由的

涵养与教化的影响，希腊诸神有形的特征也与eidos（相）作为超越的自在性的领域密切相关。希腊的城邦文明促成了圆的美学偏好。吴国盛教授表示，他所谈的三个方面并非是从史学意义上来理解希腊科学史，而是试图从思想史意义上对其进行重构。

讲座结束后，吴国盛教授随后回答了听众的提问。在回应中，他再次表示，之所以在对比中西方的科学精神差异时常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是因为人性须在人群中加以理解。同时，他认为数学最能体现人的平等，希腊人对数学的偏好是其科学精神的重要特征。

评议环节，韩启德院士表示，吴国盛教授将复杂的科学史表达得通俗易懂，使听众有所收获。今天的演讲主要从三方面阐释希腊的科学精神起源，其中很关键的一点是指出了希腊科学史中“自然物与本体的分离”的阶段，同时辨析了“自然”概念在现代科学中的混乱。韩启德院士认为，我们须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所有的概念都有一个翻译的历史过程——不仅是“自然”概念，“科学”概念亦是如此。

（撰稿：孙静）

150

葛晓音 | 从日本吴乐“师子”和唐乐“苏莫者”看西域乐的东渡和演变



2019年11月13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五十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从日本吴乐‘师子’和唐乐‘苏莫者’看西域乐的东渡和演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葛晓音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玉才主持。

讲座的第一部分聚焦于日本吴乐中“师子”的传渡。公元612年，百济人味摩之来到日本，将从吴国习得的伎乐舞传至日本，又称“妓乐”、“吴乐”。这九种乐曲记载于日本最古老的综合乐书《教训抄》

中，被用于佛寺行道仪式。葛晓音教授指出，这批乐曲应来自南北朝隋代，其中部分与佛教和乐府文学密切相关。具体而言，伎乐的来源可从以下三方面考察：古代日本“吴”的具体所指；伎乐传入日本前的分类与用途；日本伎乐所使用乐器的性质。根据《日本书纪》，“吴”通常指东晋南北朝统治的地区。近年来，日本、韩国学者则对“吴”有新的解释，认为伎乐的故地“吴”是指朝鲜半岛南方的带方郡。葛晓音教授认为，南北兼取的历史地理条件使带方成

为了接受汉文化的一个特殊地区，但吴文化传入日本并非仅依靠带方，还需要经过百济和高句丽的中转，最终由百济人传入日本。至于伎乐的分类，在南北朝佛寺中，供养佛像的伎乐已成为僧俗的共同娱乐，其形式因而远不止于器乐歌呗。伎乐所使用的细腰鼓发祥于印度，六朝时传入中国。隋唐西域乐中，龟兹乐使用腰鼓最多，故很可能是日本伎乐的来源。因此，日本伎乐应是根源于印度佛教文化，同时融入了西域的各国文化，尤其是龟兹乐而形成的，并包含了中国独特的宗教性要素。

吴乐作为日本佛事活动中“行道”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包括戴着假面排列游行的舞者。因此，要判断其中的人物角色和情节，假面显得十分重要。演出中排在最先的是“师子舞”。狮子原产于西域，《汉书西域传》对其已有记载，古书中常写作“师子”。作为龟兹伎乐的一部分，“师子”流行于南北朝的宫廷、佛寺与民间，通过百济人传到日本后成为供养佛教的仪式之一，并大体上保存了舞乐的原貌。《教训抄》中，伎乐“师子”的咏词内容和《乐府诗集》卷五十一《上云乐》的老胡文康辞颇有照应之处，由此观之，味摩之从吴国学来并东渡至日本的“师子”所指应是来自天竺西域、从梁代传到陈隋的这类散乐。

讲座的第二部分，葛晓音教授讨论了“苏莫者”从西域东渡长安的过程。根据慧琳所著《一切经音义》记载可推断，唐代著名乐曲《苏莫遮》出自西域，原名为“飒磨遮（sa-mo-che）”，意为一般集会或兼具祭祀性的集会。鉴于慧琳在对“飒磨遮”

的说明中两次提及“戏”，指代有禳庆性质的公共戏乐活动，故通过印度教的祭礼活动考证“飒磨遮”种种娱乐方式的来源，有助于推进对“苏幕遮”起源的了解。

葛晓音教授指出，多种印度教祭礼中，十胜节期间祭祀Durgā女神的公众娱乐场面与“飒磨遮”较为近似。首先，《一切经音义》记载，“飒磨遮”戏“或作兽面，或象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以泥水沾洒行人”、“持羂索搭钩，捉人为戏”，其所提及的虎豹形象、洒水仪式、搭钩捉人都可在印度教女神祭中找到对应。此外，吕元泰描述“飒磨遮”提及“战争之象”、段成式描述“婆罗遮”提及“狗头猴面”，此二意象均与湿婆和女神祭关系密切。葛晓音教授推测，段成式称其为“婆罗遮”的原因，可能是“飒磨遮”与“婆罗遮”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混淆。最后，时间和寓意上，“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以此法禳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的“飒磨遮”也可和十胜节相匹配。

然而，公元七世纪的西域诸国是否已有印度教的传播呢？通过对比考古文物资料与《大唐西域记》的记载，葛晓音教授推断，在当时，虽然湿婆教作为宗教的传播情况尚待详考，但作为民俗的湿婆与女神崇拜及其娱乐活动已经传入龟兹，并经过龟兹的吸收、改造，成为了一种“禳厌”的方式。此外，传入长安后，“苏莫遮”中“持羂索搭钩，捉人为戏”的活动已经消失，但与“乞寒胡”、“浑脱”等其他戏乐存在混淆，需要加以辨析。葛晓音教授指出，“乞寒胡”是一种北周时期就已传至中原

的游戏，与“苏莫遮”并不相同；“浑脱”则是表演者表演时穿戴的动物状皮囊。根据日本《杂秘别录》记载，根相节会上，有人蒙着青蛙形状的浑脱，吹乞寒的曲子、舞“苏莫者”。可见，“苏莫遮”最初传播时，“浑脱”表演、“乞寒曲”与“苏莫者”并没有形成一种主题明确的歌舞。

讲座的第三部分聚焦于日本唐乐“苏莫者”的演变。《教训抄》中，关于“苏莫者”有三种传说。第一种传说有关于役行者，即公元7世纪末活动在葛城山的咒术者，讲述了役行者经过大峰山时吹笛而引出猿面山神的故事。平安后期到镰仓时代，日本原先的山岳信仰受到佛教天台宗、真言宗及道教的影响后，逐渐形成了以役行者为始祖的修验道。平安末期，受以比叡山为发源地的天台教团对天台守护神山王权现的信仰影响，猿信仰开始集中于比叡山麓的日吉。鉴于表明猿信仰的《耀天记》同《教训抄》的成书年代相接近，山神出现的地点“大峰山”也是修验道的主要道场，葛晓音教授推测，这一传说源于日吉的猿信仰和役行者传说在镰仓时代兴起时的自然联系，乃天台系修验者的附会。

第二种传说讲述了经过龟兹的圣德太子在马上吹尺八，引得山神喜爱而不禁起舞的故事。葛晓音教授指出，圣德太子与“苏莫者”的联系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方面，日本笛子的制法声律传自圣德太子，而传



葛晓音教授

说尺八乃猿臂骨制成而对猿有特殊感召力，因此所吹之笛被传为尺八；另一方面，传承“苏莫者”舞乐的四天王寺乃圣德太子所建，故传说将吹笛感动山神的神力赋予了圣德太子。鉴于前两种传说中的地名属于同一地区，且役行者和太子宗教背景相同，葛晓音教授推断，太子传说其实是役行者传说的翻版。

第三种传说认为，苏莫者“乃佛世界之乐曲，并非此朝发生之事实”。葛晓音教授指出，日本的“苏莫者”所供养的金刚院、中国敦煌曲中的五台山曲子“苏幕遮”均与密宗有关，其原因在于此曲最早的宗教来源。唐代密宗在日本由最澄传承，称为“台密”，最澄即日本天台宗创始人，且其修行地正是比叡山。传说中，带回苏莫者所用尺八的正是最澄的弟子圆仁。由此种种密切关系，“苏莫者”成为供养密教金刚院塔的最佳选择。此外，密教的形成与印度Siva教的Durgā女神崇拜有关，“飒磨遮”则源于印度教女神祭的仪式活动。通过对比“苏莫者”与“飒磨遮”的

情节与要素，葛晓音教授推断，“飒磨遮”传至唐朝，已经与浑脱、乞寒融合成大型的群众性娱乐活动，但遣唐的日本乐人无法将其完整带回，便只能从中选取有代表性的若干角色，并记录苏莫遮乐曲。传入日本时，“苏莫者”并非今日所见的舞台表演形态；而《教训抄》之后的古乐书所记录的、作为小型舞乐的“苏莫者”，则是结合台密系修验者的传说完成的。

讲座最后，葛晓音教授指出，无论“师子”还是“苏莫者”，对中国乐舞的影响仍在于乐府文学，而在日本则能够保留部分原貌——这一差别侧面反映了中日两国在接受外来文化方面的历史差异。

讨论环节，葛晓音教授与在场听众进行了广泛交流。就乐舞在日本的传播途径问题，葛晓音教授补充道，其传播以自上而下为主，包含以下两种渠道：百济人的传承采取民间形式，传播过程中加入了许多世俗元素；唐乐则借助宫廷传播，仅限贵族大臣表演，并且是贵族象征与基本素养。此后，随着天皇在幕府时代的衰落，唐乐逐渐传至幕府，又传至相对“殿上”而言的“地下乐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传播轨迹。

（撰稿：张雪冷）

151

景跃进 | 社会科学中的概念问题——以中国政治研究为中心的讨论

2019年11月18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五十一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社会科学中的概念问题——以中国政治研究为中心的讨论”。文研院邀请学者、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景跃进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湘林主持。

景跃进教授首先对讲座标题进行简要分析，社会科学各分支研究方法的相似性

和学科分化的现实矛盾决定了对概念进行的抽象讨论必然被置于具体的学科情境之下。景跃进教授希望以中国政治研究为出发点并进行超越，探讨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科学中的概念问题。

概念转向

景跃进教授回顾了近年来中国学界有关概念问题的重要变化。他认为，学界正



景跃进教授

在告别概念领域的“拿来主义”、“消费主义”。以陈力卫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致力于梳理概念在中日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过程。侯旭东教授、王绍光教授等学者开始反思“专制”、“威权”等西方概念的本土化问题。黄宗智教授提出“第三域”、“简约治理”等概念，说明中国学者逐渐开始对本土概念进行构建与升华。这些变化发生在不同的学科内部，却显示了国内学界的共通趋势：中国的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正进入一个反思和更新的阶段。百多年来的中西学术交流正在发生一个重要的转折。

在政治学的讨论范畴中，景跃进教授回溯了比较政治学领域中概念问题产生的背景和过程。二战后，大量新兴民族国家登上历史舞台，构成了比较政治学的新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的扩展带来了方法论的问题：将源于西方政治发展历史经验的既有学术语和概念作为研究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分析工具是否合适？

基于这一问题，学界给出了两种解决方案。一是通过生成新的抽象概念来包容新的研究对象。景跃进教授引用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对1950—1960年代比较政治学术语变化的研究，如传统的“国家”概念难以被直接应用于对非洲部落政治的研究，具有更强包容性的“政治系统”概念（political system）由此诞生。

第二种解决方案为“概念旅行”（conceptual travelling）——扩展既有概念的运用范围，将西方概念直接运用于非西方社会的经验研究中。然而，在概念旅行中同样存在概念扩展不适当、概念遭受明显扭曲的可能性。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于1970年提出，在进行概念的跨文化之旅时，要特别注意概念扩展的恰当边界。无限度地扩张会导致“概念拉伸”（Conceptual Misformation）。邹谠教授将萨托利的一般性方法论应用于中国语境，并提问：在西方社会产生的概念、命题和理论能否应用于中国？若可以，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应用于中国？

景跃进教授区分了两类比较政治学中的西方概念：其一为普遍概念，即在西方的特殊性经验事实中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概念；其二为非普遍的对立性概念，即具有地方性的知识。这一类型又可分为只反映西方社会的政治概念（如政治参与）和在研究同西方的政治制度处于相反一极的政治制度时形成的概念（即“他者”概念，如极权主义）。

于是产生了一个新问题，我们该如何理解以及处置对立性概念？不同于萨托利对此坚持的二元对立态度，邹谠从

汤森对中国政治参与的描述中发现了截然不同的解决之道。汤森认为，中西方政体间的差异并非绝对性的，如广泛宣传动员民众等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现象在西方政制中也能被发现。邹谠试图据此在对立性概念间建立一种连续谱的关系。他认为，两极对立的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在现实中往往以一种混合状态存在，而不同政体的差别仅体现在混合的不同比例上。建立以“政治卷涉”（political involvement）为代表的“穹概念”可以有效融合中西方对立性概念。邹谠用程度主义来取代传统的二分法，在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为中国政治的经验分析和理论建构提供了逻辑空间。与其同时，他也为反思西方概念提供了方法论支撑。

此外，邹谠使用程度主义方法论对“极权主义”概念进行了批判。他提出，西方常用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概念错误地把政权类型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两个方面混为一谈，导致革命以外的社会改良道路被忽视。邹谠提出用“全能主义”去刻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区分其与政权类型的区别。这一概念创新使得对中国与苏联的学术对比成为可能。有趣的是，邹谠还从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中，思考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他绘制了国家—社会关系的抽象连续体分析图表，力图找到全能主义国家逐步减少社会干预、向自由主义国家转型的道路。

新世纪中国政治的概念问题

在对比较政治学领域中概念问题的处

理经验进行回顾后，景跃进教授将讨论带回中国政治学所面临的实际概念问题。

景跃进教授从政体分类学的演化趋势角度论证“威权”并非是好的分析性概念。从古希腊延续至今的政体分类学有两个演化趋势：“政体分类的价值化”（分类标准从客观与价值的统一趋向普遍价值的收敛）与“价值标准的一元化”（政体类型从多元性趋向民主政体与非民主政体的二分对立）。在民主与威权的二分法中只有民主政体得到界定，而威权是对多种非民主政体的模糊性的笼统处理。在这一区分中，威权成为了被贴上标签的概念，难以应用于分析性研究。景跃进教授认为，民主与威权的区分与“西方和非西方”的不对等地位类似。如果想要真正了解“非西方”，不应从“西方”的否定性描述中去理解。而必须解构这一概念，从它所包含的巨大差异中分析不同区域的文化特质。同理，要真正了解中国政治也必须摆脱威权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外部价值判断，而将中国政治作为“主体”去看待。

在对“威权弹性”进行反思时，景跃进教授表示，黎安友于2003年提出的“威权弹性”在表面上是对“中国崩溃论”的挑战，实际上却是延迟版的“中国崩溃论”。黎安友认为，威权主义无法解决政权合法性的根本缺陷使其成为“无法避免的崩溃”。景跃进教授评价认为，黎安友这一观点反映出美国研究中国政治的主流论说逻辑，即从外部价值立场、根据西方自身逻辑来对中国政治走向进行判断。

至于如何在概念建构中处置价值维度与经验维度的关系，景跃进教授表示，社

会科学中的概念普遍包含不同数量的价值量。若根据价值量大小对社会科学中的概念进行排序，可以发现民主、平等、自由等术语显然居于高价值量的一端，而国家、政府、权力等词汇偏向于价值量较低的一端。景跃进教授进一步提问：在概念旅行的过程中，居于价值链条不同位置的西方概念会遭受怎样的命运？发生“概念拉伸”的概率有什么差异？概念价值含量与旅行半径存在什么关系？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景跃进教授对概念进行了极化处理。他将全部概念分为价值概念与经验概念。价值概念的旅行遭遇取决于被旅行地居民的态度——当某一价值概念被普遍接受时，经验事实便成为了被改造的目标。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经验概念在旅行过程中是否为人们所接受并不取决于居民的主观立场，而取决于经验概念与本土经验事实的契合度。在这两层意

义上，我们发现，概念的界定问题其实是一个话语战场，是政治分歧决定了在看待概念与经验世界关系时应该采取改造式还是尊重式态度。

景跃进教授提出，在这种复杂局面下，有多种方法可以达到尊重经验、平衡价值的目标：学者可以基于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来总结和提炼概念；也可以选择将中共文件中的部分概念学术化，充分利用现有的中共词汇资源。借助西方语词之壳来充实中国的经验内涵是文艺界普遍采用的方法，未来也具有可行性。在借鉴、共享术语时，可以进一步强调概念内涵的不同维度，实现同一概念下的跨文化对话。最后，景跃进教授提出，在综合中西经验和理论的基础上，从多元现代性的观点出发重构普遍性理论很有必要。

（撰稿：刘一杉）

152

周绍明 | 商业合伙关系：中国经济史为人忽略的一面

2019年11月20日上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五十二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商业合伙关系——中国经济史为人忽略的一面”。文研院邀请学者、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周绍

明（Joseph P. McDermott）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主持。

周绍明教授以休宁张氏的案例引入，揭示出家是中国的基本经济单元，而家庭

经济常有的问题是人员与资产代际传承的不稳定性、不充分的资金收入与过多的生活支出。前现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制于商业法规与银行业的不成熟，在年利率浮动于20%—30%之间的情况下，人们获得资金的代价十分高昂——这是商业发展的一大阻碍。也正因如此，大多数需要资金的商人

会绕开当铺、钱庄和高利贷，选择与亲戚、朋友合作，这种合作会进一步发展类似于现代股票投资、为赚取年利率与股息而形成的商业合作关系。

以中国徽州的商业与商人群体为研究案例，周绍明教授系统梳理商业合伙关系的发展历程，分析合伙关系的内在原理、通行细则与理解以及其中的地域差异。作为中国南方的富商集中地，徽州从12世纪起便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当地拥有广大的宗族世系。因此，大家族常会集合诸小家庭，形成家族商业组织。各阶层商人与投资人们，青睐选择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商业投资、组织经济活动。

周绍明教授重点区分宋代以降后商业合伙关系的不同形式，辨析出三种不同的商业合伙模式：康曼达（commenda）、经销（agency）与合股（joint-share）。三种合伙模式在持续时间、人数、投资规模等方面各具特征，共同整合为一套体系的体系。康曼达，即一方提供资本，另一方提供管理与劳力的模式，源起自海外经验，多应用于长途旅行；经销产生于康曼



周绍明教授

达并与其并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支出、降低风险；合股则是更加稳定、持续与共享的模式，呈现为联财合本、纠合伙伴和非联财合本而纠集同行三种样态，具有较强的风险规避性。

从宋、元行至明，伴随着商业需求的滋长，周绍明教授详细分析了三种商业合伙模式随时代推进产生的变化：明代的康曼达模式主导者从政府转向私人，以汉族取代外国人和穆斯林，更多应用于国内市场；合股模式应用于更广阔的商业活动，其合约亦更具持续性和稳定性，在此基础上，徽商可将资本延伸至更远处，建立更多的商业合伙关系。而结合当地的家族世系特征，周绍明教授进一步分析认为，家族世系为合股提供了资本、人事与管理保障，整合诸多小的力量，而家族世系的头人也会赋予他的继承者们以基于商业而构成的共享的、不可分割的责任。

以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对于公司和商业实践的分析观照中国，周绍明教授认为，在前现代中国的

语境下，家族世系在商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在应对长期关系中的债务、破产等问题时，他指出，虽然政府有时会参与这种商业合伙的投资，但大多数商业合伙关系仍缺乏政府资助、管控与专业知识。大部分案件在法庭之外解决，处于强力与暴力的潜在威胁下，因此，大部分投资者为规避风险会保持谨慎，倾向于选择相似、熟识的群体。而在资金来源上，中途退出的高成本，也使得资金在灵活运转的同时，得以保持较高的稳定性。

周绍明教授将中国明清的商业合伙实践与中国之外的一些实践案例进行比较，进一步分析此种合作关系中凸显的中国文化特质。他提出了一系列开放性的假定与命题：如国家政府在其中所起的角色，现代性语境下“公”与“私”在中国语境下的差异体现，“会”的共享概念等。周绍明教授同时关照宗教观念（如“转世化身”）与传统（如报本、尊敬先祖）对于中国商业合伙实践的影响。而综合上述分析，他表示，虽然缺少更富支持性的法律与政策环境，历史上，中国商人通常能排除万难获得商业利润，通过非财政的接触与非法律性的管理，回应当地的习惯与市场需求，进行资本的投入与积累。可以说，这种模式在中国南部社会比较普遍。

评议阶段，陆扬教授总结指出，徽商以男性为主，包容很大的群体，而这些商人们在农村生活中便已学会经营。在他看来，徽州商业合伙模式具有重视礼教和强调商业活动参与两种特性，与开罗犹太商人、元代色目人、穆斯林世界等海外经验形成共通，而本场讲座体现出的三种商业

合伙模式也各具特点、各有利弊。

提问环节，周绍明教授与在场听众就合伙人争议解决途径、赋税等细节性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他表示，在中国当时的经济环境中，合伙人间出现争议很难通过对簿公堂解决，更多依赖民间非正式的习惯性规则与实践；而在赋税层面，直至明末（即17世纪）才开始对当铺收税，且彼时税率很低。至于不同商业模式在中国的展开，周绍明教授重申，晚明时期中国商人的投资模式旨在远离市场的不稳定，寻找安稳可靠、规避风险的方式，进行更加深入的分地区历史调查——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充实其研究中对中国元素与中国特性的考量。

（撰稿：章涵青）



153

王扬宗 | 中国院士制度及相关问题探讨

2019年11月25日晚，“科学·文明”系列讲座、“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五十三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报告厅B101举行，主题为“中国院士制度及相关问题探讨”。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史系教授王扬宗主讲，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史系教授、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兼职教授张藜主持。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创系主任韩启德出席。

讲座伊始，王扬宗教授便强调了院士制度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1916年，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开始进行调查，北京大学文理分科后的首届学生毕业——这标志着中国现代科学体系的诞生。1913年，有识之士提出应仿照法兰西学院设立院士制度，虽并未成功，却标志着中国院士制度的萌芽。王扬宗教授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院士制度同中国现代科学体系几乎同时开始发展，关系十分密切。

讲座第一部分，王扬宗教授介绍了中国院士制度的前世今生。在他看来，许多人认为中国科学院是仿照苏联科学院组建的，但这个说法并不准确。苏联科学院是苏联模式的例外，全体院士大会为该院的最高决策机构。筹建中国科学院时，党和国家领导人认为，不能照搬苏联模式，需要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核心。正是由于这一关键性的区别，中国科学院在建院之初并没有建立院士制度，而是设立了学部委员制度。学部委员是一个

工作称号，承担着政策咨询、评奖、评职称等诸多职能。从党的视角来看，学部委员是党领导科学的助手。1954年，中国科学院进行了第一次学部委员选举，推选出31位数理化学部委员、57位生物学地学部委员、35位技术科学学部委员以及42位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紧接着，王扬宗教授介绍了中国院士制度的曲折筹备历程。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决定恢复学部制度。1979年，学部委员大多年事已高，没有足够的精力领导全国的科学工作，增选学部委员的工作被提上日程。1980年，学部委员增选会议召开时，仅有140位候选人获得了超过三分之二的选票。然而，至少需要增选300位学部委员才能满足各学科的需求。于是，当年修改了选举规定，获得二分之一以上选票即可当选，最终增选了283位学部委员。除了恢复学部制度，当时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人方毅、李昌等人认为，科学界应该由科学家领导，大力改革中国科学院的体制，以学术领导为主，选举院长、副院长、秘书长来领导中国科学院的实际工作。然而，这一改革并没有得以延续，在1984年左右被废除。

同期，院士制度再一次被提上议程。王扬宗教授认为，在院士制度筹备过程中，如何处理学部委员与院士的关系是最核心的问题。1980年，于光远、钱三强等人草拟了《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条例（草

案）》。该方案提出，从有名望的老科学家中遴选出有国际声望的少数著名科学家作为首批院士，院士为荣誉性质，与学部委员制度并行。然而随着院士问题在教育界征求意见，特别是在学部委员中征求意见，更多的人倾向于将所有的学部委员转为院士。卢嘉锡院长上任后决定将此问题搁置。1984年1月，学部委员被确立为科技工作的最高荣誉称号，但在中国科学院内部没有实际职权。当时，有人呼吁把学部委员全部转为院士，但考虑到早期学部委员准入门槛较低，学术水平参差不齐，胡乔木等同志坚决反对这一提议，院士制度再一次搁浅。1993年，经党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改称院士。1994年，从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学部发展而来的中国工程院也产生了首批院士。

院士制度设立之后，经历了诸多改革。第一，新增院士的门槛提高。2006年6月，两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简称）院士大会期间，两院各自修改章程，将当选院

士门槛提升为“获得赞同票不少于投票人人数的候选人，按本学部应选名额，根据得票数依次当选，满额为止”，将准入门槛提高到合理的水平。第二，提名渠道改革。2014年，两院决定取消主管部门、地方等提名遴选途径，仅保留院士提名和有关学术团体按规定程序提名两种提名途径，并于2015年开始实施。第三，增加终选机制。2013年以前，两院院士候选人的评审和选举由各学部组织院士进行，自2015年起，两院均增加了全体院士“终选”程序。第四，院士年轻化。1991年增选时，中科院提出“在增选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推荐符合条件的优秀中青年科学家”。当年新当选的学部委员平均年龄降为61岁，其中60岁以下的有111名，50岁以下的有12人，最年轻的是42岁。后来，增选实施细则进一步要求60岁（含60岁）以下的应不少于三分之一、65岁以下的候选人需要6名以上院士推荐。此举进一步鼓励院士年轻化，并限制了老年科学家的准入机会。



王扬宗教授在讲座现场

讲座第二部分，王扬宗教授讨论了院士制度相关的重要问题。第一，院士规模与院士的学术标准。王扬宗教授认为，当把学部委员和院士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称号对接起来的时候，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提升院士的准入标准；在职能转变的过程中，也没有对于有关的体制问题加以深入的考虑——这样的举措致使中国院士制度从一开始就存在院士人数过多、学术标准不高、学术权威性不足以及院士的隐形权力等问题。第二，院士的荣誉性质。在国家和社会层面来说，两院院士是全国最优秀科学家的符号，一旦荣膺，就可能赋予种种权力和义务。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下，在权力结构不够平衡和规范的科教体制里面，此举往往会赋予院士们更大的责权，从而为这种特色体制增加正当性同时使得大量资源向具有院士等头衔者倾斜集中。

第三，院士的隐性权力问题。三十多年来未能进一步理顺科教单位的权力结构，科研单位一把手的任命制没有实质性改革，相关配套制度也约束无力。事实上，这样的局面逐渐造成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不分，难以避免一把手权力垄断、以行政权力替代学术权力、破坏学术自主等弊病，从而抑制科研人员的创造活力，妨碍其追求学术卓越。第四，院士增选中的关系学。在中国人情社会，院士增选过程中私人关系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王扬宗教授通过近年来披露的档案资料，剖析了人情、权力、学术之间的复杂联系。第五，院士的国际化问题。近年来，我国两院院士中外籍院士比例有所上升，但占比依然较小。王扬宗教授认为，两院院士若能吸纳更多优秀的海外华人科学家将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在这

个方面，台湾中研院的经验值得参考。十多年前，中研院的海外院士比例在三分之二左右；近年来，虽然加大了本土化力度，海外院士比例依然维持在一半以上。王扬宗教授表示，维持较高的海外院士比例是中研院保持高学术水准的重要措施。

最后，王扬宗教授对院士制度改革谈了两点感受和建议。首先，我国科学界存在科学共同体异化、官本位等一系列问题。近些年，学术水平大幅提升，但是国际影响力依然有限。为了回应我国科学界的社会信任危机，应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完善监督机制，将隐形权力转化为显性权力，重建社会对中国科技界的信任。在改革的过程中，院士也应以更广阔的胸怀，推动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变革。院士制度将是中国建设二十一世纪科技强国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讲座结束后，就中国院士章程的法律渊源、院士制度运行过程中的监督和管理制度等问题，王扬宗教授表示，中国的院士制度具有“先做事、后完善制度”的特点。1992年，学部委员制度条例的发布成为后来院士制度的基础。然而，考虑到制定国家层面法律条例的复杂程序，相关条例在该层面没有法律地位。王扬宗教授认为，两院作为学术共同体，可自行确定规范和章程。此外，两院的法律地位也十分特殊：中国科学院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属于单位体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撰稿：魏玉槐)

154

陈来 | 王阳明的晚年思想

2019年11月28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五十四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王阳明的晚年思想”。文研院学术委员、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院长陈来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主持。

三十年前，陈来教授完成了《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这部阳明学研究的经典之作。然而之后，他却甚少涉足相关领域。朝花夕拾，陈来教授慨叹自己“不亲此道久矣”。今年五月份，第三届“阳明心学高峰论坛”于绍兴举办，期间，陈来教授获聘为稽山王阳明研究院名誉院长。借此机缘，他重谈阳明。本次文研讲座中，陈来教授便将自己近来对阳明晚年思想的一些新知、心得向在座听众分享。

陈来教授强调，王阳明的一生与“道”紧密相关：三十岁出头时，他于会稽山阳明洞筑室修道，渐明释、道二氏之非，此乃“稽山修道”；三十七岁，他被贬至贵州龙场，大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首揭“知行合一”之旨，史称“龙场悟道”；随后起复，仕宦于两京之间，与朱子学者往复辩论，总结出心学精髓所在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这两句话，可谓“两京论道”；四十五岁后，巡抚闽赣，先后平定流民、藩王叛乱，戎马途中不忘兴学教化，提出“致良知”说，是以称为“江西倡道”；晚年致仕回乡，建阳明书院于

越城（即绍兴），度过了最后六年安静的时光，乃有“越城明道”之谓。陈来教授指出，对阳明学整体发展而言，“越城明道”时期至关重要，却一直为研究者所忽视。阳明晚年思想面貌，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探讨。

关于阳明思想的晚年定论，陈来教授指出，以往主要有两种观点。阳明弟子钱德洪（号绪山）认为，阳明在江西确定的“致良知”说乃其学之最终总结。然而，另一弟子王畿（号龙溪）则主张，“天泉证道”的“四句教”方才是阳明思想的最后归宿。王阳明逝世前一年，于绍兴天泉桥上向弟子讲授“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之论，被称为“四句教”。王龙溪认为，虽然江右以后，阳明专提“致良知”，然其晚年“所操亦熟，所得亦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这正是化用了“四句教”的说法。

广义而言，“四句教”乃“致良知”的内在发展。因此，上述两个说法皆未脱离“致良知”的基本框架。陈来教授认为，除“四句教”、“致良知”之外，阳明在居越期间反复申论的“万物一体”思想，也应是晚年定论的重要内容。毫不夸张地说，“万物一体”思想的出现，令阳明对“良知”内涵的认识发生深刻变化：他对“良知”的界定更为具体、充实，不仅

改变了“良知”在孔孟儒学系统中的定位，而且让“致良知”的宗旨和实践获得新的取向。简言之，“万物一体”思想导致良知学方方面面、不容忽视的改变。接下来，陈来教授关照“万物一体”思想的来源，从这一思想与《大学》的连结、与“本心”的关系、对“良知”的影响及其实践意义等方面展开分析。



陈来教授

陈来教授指出，在先秦诸子著作中，我们便已可见“万物一体”的身影了。《庄子·齐物论》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名家的惠施也曾说：“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此外，墨家主张的“兼爱”，未尝不可以被视为“万物一体”的早期表述。就宋明理学本身而言，程颢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可谓阳明“万物一体”思想的直接源头。“同体”即“一体”。这两句话开启理学中“万物一体”思想之先河。所谓“万物一体”，指的是一个真正的仁者，要将万事万物与自身合而为一。换言之，唯有将宇宙视为自身的一部分，才可以说达到了“仁”的境界。

翻开《传习录》，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里面很少提及一向被认为是阳明晚年定论的“四句教”。根据王阳明年谱记载，他居越讲学时，“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先生临之，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可见，阳明晚年讲得更多的不是“四句教”，而是“万物一体”。然而，《大学》中实

则并无一处直接称说“万物一体”。阳明既然“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那么我们不得不追问，究竟《大学》三纲领、八条目的哪个环节被他用来与“万物一体”思想接榫呢？

答案是“亲民”。对“亲民”的不同解释，乃程朱、陆王之间的重大分歧。二程、朱子读“亲”为“新”，这种读法令“亲民”强调道德教化，倾向于士大夫通过交汇，让百姓在道德修养上不断自新。阳明则主张按本字读“亲”，这种读法更强调社会实践，倾向于士大夫通过身体力行，切实地爱民、救民。陈来教授指出，阳明之所以坚持将“亲”字读法由“新”改回本字，一个重要的动机是，唯有这么改，才能让“万物一体”思想在经典中找到落脚点。在《大学问》中，阳明确说道：

“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

“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

“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

“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

用“万物一体”解释“亲民”，这在阳明之前的说法中是没有的。晚年居越六年，阳明既无案牍之累，又无戎马之劳，居乡不居官，是他人生中极为难得的一段宁静时光，也是他的思想最圆熟、学问最深厚的阶段。此时，他将自己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上。这一选择，不能不引起我们格外的注意。

“万物一体”的提出，对阳明心学的整个思想体系而言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陈来教授认为，这推动了阳明对自己的一些观念做出新的阐释。迎面而来的问题，便是“万物一体”与“本心”之间的关系。

“本心”是阳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所谓“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指的都是“本心”。然而，居越之前，阳明并没有明确揭示其内涵。嘉靖三年，他在《答顾东桥书》中，重新阐释了“本心”概念。此时的阳明认为，“万物一体”才是“本心”，“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此乃一切心体之同然，人人皆如此。

阳明讲“本心”即“良知”。那么，“万物一体”又与“良知”有怎样的关系呢？阳明以前讲，“良知”就是“天理”，这其实是一个很笼统的界定。他在晚年给了“良知”一个更加明确的定义：“良知”就是“万物一体”。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江西倡道”和“越城明道”这两个时期，阳明对“良知”的具体解读不同。这要从阳明晚年所作的《拔本塞源论》（即《答顾东桥书》最后一部分）说起。无论是当时阳明的众弟子，还是作为后来人的我们，在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都可读出阳明那“恻然而悲、戚然而痛”之情。这种情感在他的另一封书信《答聂文蔚书》中也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即所谓的“诚爱恻怛”之情。阳明这股浓郁深情从何而来？其实就是因为他将业已将自己的思想置于“一体同物”或曰“一体之仁”的基础上。“万物一体”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切实的情感与行动。对于阳明的“一体同物”之心与“诚爱恻怛”之情，钱德洪感叹道：“此孔孟以来圣贤苦心，虽门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

“诚爱恻怛”被阳明用来联系到以“万物一体”定义“良知”的问题上。《答聂文蔚书》中有言：

“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

天地万物与个人一体，因此，生民所遭受的痛苦，便是自己的痛苦。如果没有因生民之困苦而自感疾痛，你就没有“是非之心”。这种“是非之心”，就是“良知”。表面上看，这与“江西倡道”时期对“良知”的讲法并无二致。毕竟那时，阳明已经在说“夫良知者，即所谓是非之心”。

但若仔细体味，我们会发现《答聂文蔚书》所言“是非之心”，其实相当特别。

在孟子“四端说”中，“是非之心”乃“智之端也”，属于“智”的范畴。这也是阳明在江西时期使用该词语界定“良知”时所强调的意涵，即对孰是孰非的分辨。然而，在越城时期，虽然阳明还在用“是非之心”，其内涵却悄悄发生着改变。阳明说：“盖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疾痛迫切，虽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答聂文蔚书》中的“是非之心”，与其说是作为“智之端”的“是非之心”，不如说是作为“仁之端”的“恻隐之心”。

阳明晚年所谓的“是非之心”，是“恻然而悲、戚然而痛”，也是“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这种“诚爱恻怛”，明显更接近于孟子学传统中的“恻隐之心”。所以，阳明在《答聂文蔚书》中给“良知”下了一个新定义：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

由此，陈来教授表示，在江西时代，“良知”是以狭义的“是非之心”为主，但在“万物一体”思想提出以后，“是非之心”的内涵则更多的指向作为“仁之端”的“怵惕恻隐之心”。这也可以解释为何阳明提及“万物一体”时，总是讲“一体之仁”，而非“一体之智”。

“万物一体”思想的提出，令良知学本身的概念和结构发生变化。“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成为晚年阳明对“良知”做出的新的表述、界定和把握。他在家书中便明言：

“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怛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怛之心，亦无良知可致矣。”

阳明的弟子邹守益、陈九川非常重视这一观点。邹守益强调说：“良知之诚爱恻怛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怛，亦无良知可致。”陈九川也说：“诚爱恻怛之心即是致良知，此（阳明）晚年所以告门人者……至为紧要。”总而言之，阳明的晚年思想虽然还可说是在“致良知”的大框架里面，但其内涵、结构和实践的方向却与之前相当不同。

最后，陈来教授讨论了阳明晚年思想的实践意义。他认为，居越以前，阳明思想主要是以《大学》八纲领的框架，突出对“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的哲学解释。此时阳明学的“功夫论”明显走的是“内圣”一路，强调道德修养和主体修养。然而，阳明晚年提出的“万物一体”思想，令阳明学在体系和实践两个方面均发生改变。

首先，阳明学不再是一个仅仅指向内在主体的思想体系，而是发展了其朝向宇宙、朝向人类的一面。哲学家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指出，如果人只讲自我意识、自我关怀，而忽略人与社会、自然、宇宙万物的统一性关系，那么这样的哲学就难言全面。哲学的终点不是自我，而是自我与宇宙整体融合为一。从这个角度看，阳明晚年的“万物一体”思想，便是超越了之前“心学”单向度地以自我为中心的限制，走向自我与宇宙的统一。可以说，这令王阳明的哲学境界得到提高。

其次，阳明非常强调“万物一体”的落实，即“亲民”的社会实践：通过亲民、爱民、

救民，让个人真正实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从实践哲学角度看，阳明晚期思想不再局限于理学家对个人精神境界的追求，而是强调外在的实践。当然，我们并不能认为晚年的阳明在否定自己早年的思想。毋宁说，“万物一体”是对阳明早年思想的补充和发展，使其超越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所体现的过分内在化的倾向，使阳明学体系达到了一种内在与外在的平衡。

“万物一体”思想是阳明晚年时期“良

知”说的重要内容，加强了“良知”学的外向维度，扩大了“良知”的公共性，使其成为一种社会思想，拥有推动社会实践的意义。晚年的他，不再只是单一的强调“内圣”，而是朝向“内圣”与“外王”的合一；不再只是关注“内圣”的修养，而且关注“外王”的实践。一言以蔽之，他走向了“内外合一”之道。

（撰稿：任新亚）

155

叶少勇 | 口诵与书写——印度文化载体的流变与东传



2019年11月28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五十五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口诵与书写——印度文化载体的流变与东传”。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叶少勇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张嘉妹主持。

关于“文明”的衡量标准问题，不同领域有不同的界定方法，曾有西方历史学者将文字的出现作为衡量文明的一大标准，而这一说法备受争议。在本次讲座中，叶少勇副教授围绕古代印度文字的出现和传播问题，向大家提供了一个认识古代印度文明的新角度。讲座内容按照时间线梳理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前文字时代、文字的诞生、文字的发展和东传。

一、前文字时代

现代学术界一般认为，印度文明的发端是吠陀（Veda）文明，是从西北部进入印度次大陆的雅利安人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建立的。直到公元前300年，这一源远流长的文明体系才出现文字。这意味着，过去的1200年间，吠陀文明的知识组织形式均为口耳相传。叶少勇强调，这一千多年绝非印度古代文明的黑暗期或后退期，而是印度的文化、宗教、哲学、思想从萌芽到发展壮大的时期，是印度文明基因的定型时期。一方面，祭祀文化逐渐转变为哲学内省，曾经垄断天人沟通特权的婆罗门祭祀阶层逐步转变为职业思想家；另一方面，非主流意识形态阵营对婆

罗门阶层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越发不满，各种自由思想在公元前 500 年前后涌现，出现沙门思潮。我们现在谈起古印度所津津乐道的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等教派的文献经典主体均出现在文字诞生之前，且通过人们口耳相传、背诵的方式传承，例如，“三藏法师”最初意为“熟练背诵佛教经律论三藏的法师”。

在文字诞生之前，即公元前 4 世纪前后，印度产生了精密、系统、完备的语法学——《波你尼语法》。它是人类历史上已知最早的系统语法学著作，被称为“人类智慧的伟大里程碑”。这部语法产生的目的，不是为了教不懂梵语的人学梵语，而是让已经懂梵语的人理解梵语是如何作为一个语音语法系统而运作的。在印度知识传统中，一个青年学子必然要研习《波你尼经》以及与其配套的注释体系，老师传授、学生学习的过程也都是通过口耳相传。叶少勇认为，正是这种口耳相传的知识组织形式，塑造了印度文化的特殊气质，深深印刻在古印度的文化基因之中。叶少勇指出，口耳相传使得印度人格外重视音声的精确度，他们认为语言就是音声，音声有着神秘的力量，只有准确地发出每一个音才能操控这种力量。除了对音声精确度的重视之外，口耳相传的知识组织形式对古印度文化的影响还深入到哲学层面。印度人认为，语音结构一定和另外一个存在层面的结构隐含着某种对应关系，通过特定的音声能够调动另一个层面的事物。音声对应存在，音声是“能指”，存在是“所指”。由此可见，以语言学为导向的形而上学体系，是印度哲学思想的一个突出特

征。西方哲学讨论的是意识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印度哲学讨论的是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总体而言，印度口耳相传的文化基因，对我们深入理解印度文化、思想、哲学至关重要。

二、文字的诞生

印度文字有两大起源，一个是佉卢文，另一个是婆罗米文。

佉卢文的起源需要追溯到公元前 5 世纪，印度西北部（吠陀文明的核心地带）被波斯帝国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时期。在这一时期，阿拉米人曾一直担任该王朝的书记员，负责使用阿拉米文书写行政文书。在公元前 4 世纪至 3 世纪之交（马其顿王朝统治时期），印度首次出现了一种文字——佉卢底文，简称佉卢文。这种文字所记写的语言不是梵语，而是西北印度的一种方言俗语——犍陀罗语，以其核心地带位于犍陀罗而命名。佉卢文字借用了许多阿拉米字母，且同为从右到左的书写方向。这两种书写在外观上很相似，但是细致对比会发现二者有诸多不同。首先，佉卢文字母表的排列与阿拉米文不同；其次，佉卢文和阿拉米文有不少字形同字不同音，或者同音不同字。另外，佉卢文有一项天才的创造，即标示了元音，它在阿拉米辅音的基础上添加笔划，标示了阿拉米文原本所不具备的元音。佉卢文发明后很快被社会底层所接受，用以解决一些实用问题，而社会上层对文字仍持排斥态度。

公元前 3 世纪中叶，孔雀王朝在阿育王治下开疆扩土，他也有意改变印度的文化版图，成为婆罗米文产生的可能推手。

婆罗米文不同于佉卢文或阿拉米文，它采用了希腊文的从左到右的书写方向，字形的间架结构也接近希腊字母，呈现出横平竖直的几何化形象，显得较为端庄大气。同时，婆罗米文采用了佉卢文的上下左右添加笔划的元音标记方式，还增加了一些精确区分发音的表示方法——上述举措使得这种文字适合于记录印度几乎所有的语言，包括高精度的梵语。这恰好说明发明这种文字的人精通梵语，极有可能是婆罗门的知识分子。但由于文字当时并不受主流社会的认同，因而知识分子极有可能是奉国王之命参与发明婆罗米文。然而，文字发展的过程十分漫长，且口传心授的传统从未被书写所替代。例如，在公元 7 世纪的唐代，义净去印度时看到的画面仍为：

“悉口相传授，而不书于纸叶”。

依据现存的考古证据，直到阿育王之后两三百年的贵霜王朝时期，文字的使用才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贵霜是一个多元文明交融的帝国，没有单一的意识形态，许多国王都是佛教的支持者，佛教因而也成为最早拿起书写这一武器取得成功的宗教。叶少勇认为，文字的出现和发展，不是印度的主流的婆罗门文化传统自身演化的结果，而是在不友好的甚至是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之中产生的一种异质文化。

三、文字的发展和东传

在贵霜王朝时期的西北印度，佉卢文的使用曾经非常广泛，然而到了公元 3 世纪，佉卢文突然在西北印度消失，当地的书写完全被婆罗米文所取代。随后，佉卢文沿着丝绸之路传入我国新疆，被新疆和



叶少勇副教授

田的尼雅一带沿用数个世纪之久。

有学者将佉卢文的消失归结于贵霜帝国的衰落，还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梵语正在作为印度的标准语言逐步兴起，而佉卢文因不能胜任梵语精确的发音系统在竞争中输给了婆罗米文。公元 3 世纪，印度人逐渐脱离了贵霜的外族统治，建立了笈多王朝，印度随后进入了古典文化的黄金时代。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以梵语为标准语言的婆罗门教收复了一度被佛教等沙门流派夺走的思想阵地，佛教教徒也逐渐开始将自己的经典梵语化。因此，直到阿拉伯文字到来之前，婆罗米文成为印度次大陆上唯一的书写系统。“婆罗米系文字”是对之后印度文字书写体系的统称。

经过笈多王朝的发展壮大，印度的文字完成了在本土的耕耘，开始向外传播。新疆位于丝绸之路的中段，是连接中国与印度的纽带。随着佛经的抄写，印度的字

体在这里生根发芽，几个世纪以后，丝路南道和丝路北道分别演化出“丝路南道婆罗米文”和“丝路北道婆罗米文”。我国西藏地区与印度文化的联系也很紧密，藏文字母即仿照笈多后期北印度的字体而创制，且字母表的排布也受到了梵语字母表的影响，因而藏文字母既能写藏文，也能写梵文。除此之外，流行于我国唐代的“悉昙体”、宋代的“城体字”、元代的“兰札体”梵字均属于婆罗米系文字。

印度的语音系统对其他国家和文化体系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前文所提到的那些仿照婆罗米系文字所创制的语言，其字母发音顺序、对语言的分析 and 认识也深受印度语言的影响，甚至连日语五十音图的顺序也参考了梵语字母的发音顺序。除此之外，印度语音学对中国的音韵学也有不小的影响，学界已有很多研究。

(撰稿：希琳)

156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金 |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青铜铁器时代考古研究新成果

2019年11月29日上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五十六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青铜铁器时代考古研究新成果”。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维亚切斯拉夫·莫洛金(Viacheslav I. Molodin)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林梅村教授主持，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讲师刘翔评议。

讲座开始之前，林梅村教授简要介绍了莫洛金院士的学术工作。莫洛金院士是

研究欧亚草原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考古学专家，在西西伯利亚、南西伯利亚地区发现和研究了一系列考古遗址，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该地区新石器时代到近代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内涵。林梅村教授指出，莫洛金院士的工作对我们国家的考古学研究也有重要意义。

之后，莫洛金院士介绍了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所的基本情况，诸如研究所的来历，尤其是几任研究所所长的工作。同时，他也简要介绍了研究所的组成结构及青铜器时代考古研究室的人员构成。接着，莫洛金院士展示了青铜器时

代考古研究室在俄罗斯境内和世界各地的田野考察范围。研究室的田野考察从北冰洋沿岸一直到阿尔泰山，在西伯利亚地区、蒙古国规模较大，在韩国、日本、印度、南美洲也有规模较小的考察发掘。

本场讲座，莫洛金院士详细介绍了近些年来最新发掘和研究成果，即包括在西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地区、蒙古国等地的田野考察，也涵盖最新的考古学研究成果。他还针对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方面的考古成果推荐了相关的出版专著和发表文章。

首先，莫洛金院士介绍了西西伯利亚地区的塔尔塔斯1号墓地的发掘情况。最近十多年，在这里已经发掘了大量不同时代的墓葬，也发现了一些聚落遗址和仪式性活动相关的遗迹。莫洛金院士提到，虽然发掘之前通过地球物理学的检测得到了大致的分布图，但最终还是全面细致地挖掘。尽管耗时耗力，但是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以前地球物理学没有探测到的遗存。由于发掘面积巨大，可能还需要两年时间才能完成。之后，莫洛金院士展示了一个在这里发掘的新石器时期早期遗迹。这里出土了大量石器、骨器和陶器，也发现了一些特殊的深坑，有储存鱼的功能。当代西伯利亚土著民族仍然用这种方法保存鱼。同时，考古发现这些遗迹不仅有经济功能，也有仪式性功能，因为在这里也发现了祭祀活动的遗存痕迹。

在塔尔塔斯1号墓地发现的陶器很特殊，都是平底陶器。基于这些材料，考古学家最终研究分出了巴拉巴斯石器时代文化。通过之后的发掘，在附近其他遗址也发现了该文化的材料，证实了这一文化的

真实性。之后，莫洛金院士还展示了一个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这个遗址可追溯至公元前5000-6000年，并发现一些多层次的墓葬，还出土了大量石器。同时，遗址发现一些尖底、圆底的陶器和一系列骨器、骨刀的残片。有趣的是，在欧洲西部波罗的海地区也发现完全相似的遗物。莫洛金院士认为，这种相似不是偶然的，从人类学材料能够看出，波罗的海到西伯利亚的古代人群关系密切，文化上有很多共同点。

关于阿尔泰山地区的考古成果，莫洛金院士主要介绍了乌科克高原古代文化分期问题，他认为这是21世纪初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五年之内，已经在这里发现了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遗存。从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经过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一直到蒙古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其代表性的考古材料。这一地区发现的极有价值的材料，已经能够研究形成文化分期。莫洛金院士还提到最近几年在蒙古国的阿尔泰山的研究。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大量古代动物岩画，包括猛犸象的岩画。常出现的情况还有，在早期岩画上面还覆盖有更晚近一些的岩画。莫洛金院士还介绍了在阿穆尔河(黑龙江)流域地区对中古时期早期的漠河民族文化的研究。除了聚落、繁殖，他主要研究了漠河文化的墓葬。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特洛依茨基墓地，墓葬中出土了大量典型的漠河陶器、装饰品、兵器，还有一些祭祀功能的器物。这一墓地现在还在发掘中。

由此，莫洛金院士还对塔尔塔斯地区的成果进行了补充。今年在塔尔塔斯地区发掘了青铜时代的墓葬，发现了三十多个有圆形

环沟的墓葬。这些墓葬具有西西伯利亚文化的特征。莫洛金院士提到，塔尔塔斯遗址能复原西伯利亚青铜时代文化的次序，这对整个西伯利亚地区的考古研究都很重要。同时，莫洛金院士还提到了聚落的发掘研究。在文格罗沃 2 号聚落，发现并复原了一些房屋，也发现了一些和青铜铸造技术相关的材料，能够体现出青铜铸造技术的交流。这一遗址的相关材料正在整理，将出版为一本专著。

莫洛金院士接着介绍了蒙古国的奥隆库林郭勒 10 号墓。在这里出土了一些皮袄、帽子、靴子、兵器和装饰品——材料保存得非常好，信息量非常大，所以更像民族学研究。这一发现在美国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中排名第九。最近几年，考古学家在哈萨克斯坦也发掘了祭祀活动的遗迹，出土了金子做的并镶有宝石的马具装饰，也出土了中国的钱币和波斯的银币——这些发现都定位在公元三到五世纪。莫洛金院士还提到了规模很大的诺彦乌拉墓地。该墓地对研究匈奴文化有很大帮助。虽然这些墓葬曾经被盗，但仍出土了很多来自中国和欧洲的器物以及保存比较好的纺织品。

关于在北极圈外的考古发掘，莫洛金院士介绍了沃伊卡尔城址。这一遗址刚开始发掘，所以仅仅发掘了最上面的几层。由于当地气候原因，这一遗迹中如木头、白桦树皮、纺织品等都保存得很好。这里的文化层厚度达到两米多，现在仅发掘了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金主讲

上面的文化层，所以，莫洛金院士表示，希望在更深的文化层出土更早期的丰富材料。至于在新西伯利亚州，莫洛金院士提到了乌姆列瓦要塞。这是俄罗斯族移民到西伯利亚最早的遗迹之一，已经建了遗址博物馆和遗迹公园。

上述田野考察成果之后，莫洛金院士也介绍了其他方面的考古学研究成果，且每一个方面都配套介绍了几本最新的研究成果和专著。他介绍了古代技术研究，如木头加工技术、陶器制造技术、骨器制造技术等，还有人类学研究、兵器研究、原始艺术研究，以及中古时期历史研究和西伯利亚俄罗斯族居民文化研究。莫洛金院士主要介绍了考古学的多学科研究，比如古遗传学的研究、陶器的物理化学研究等。他也强调了地球物理学、碳十四定年法、树木年轮断代等研究方法对考古发掘和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考古遗物的物理化学研究十分重要，且这种方法具有普遍性。

最后，莫洛金院士分享了研究所在考古合作、推广、普及等方面做出的努力，

比如举办学术会议、参加国际大型学术研讨会、举办展览展示研究人员的发掘成果等。他还介绍了研究所的国际合作情况。几乎每年，研究所都会进行国际联合发掘，和德国、法国、蒙古国、波兰、哈萨克斯坦、韩国、日本还有南美洲的一些国家进行积极的国际合作。此外，研究所和学校合作，为本科生提供考古实习机会，激发学生对考古学的兴趣，也帮助大学出版教材和组织开展学术活动。同时，莫洛金院士还介绍了研究所在期刊发表、编订考古教学辅导书籍、出版科普书籍、参与编写百科全书与通史等方面的工作。

讲座结束后，刘翔老师评议。他提出，莫洛金院士的工作对我国的考古学研究有重要意义。中国对俄罗斯考古学的了解来

自《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但这本书的成果仅停留在五十年代。莫洛金院士等人在考古研究所的成果对于我们研究西北地区的青铜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也对我们建立考古学文化序列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刘翔表示，研究所的工作对考古学发掘报告的编写也有很大启发——除了传统的考古学分析之外，对一些技术问题的研究也是关键所在。研究所在人类学和古 DNA 方面的研究也进行得深入透彻，DNA 的研究结果和考古发现的结果相重合，增强了考古研究的科学性。最后，刘翔提到，研究所出版科普书籍将科学性的内容传播给大众，很有意义。

（撰稿：马丽亚·艾海提）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金 | 青铜时代的西西伯利亚 ——区域性趋势与规律性



2019 年 12 月 2 日上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五十六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青铜时代的西西伯利亚——区域性趋势与规律性”。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维亚切斯拉夫·莫洛金（Viacheslav I. Molodin）主讲，北

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林梅村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魏坚评议。

莫洛金院士首先对西伯利亚地区的区域范围及自然环境进行介绍。西伯利亚是北亚地区的一片广阔地带，西起乌拉尔山脉，东至杰日尼奥夫角，北临北冰洋，西南抵哈萨克斯坦中北部山地，南至蒙古、外兴安岭，面积约 1322 万平方千米，除西

南端外，几乎全在俄罗斯境内。依据地形，西伯利亚可分为三部分：西西伯利亚平原、中西伯利亚高原、东西伯利亚山地。

莫洛金院士长期在西西伯利亚地区进行考古发掘活动，该区域西至乌拉尔山，东到叶尼塞河，北抵北冰洋，南达哈萨克草原地带，自然资源多样，考古遗存丰富。

莫洛金院士提到最早的红铜制品是在前陶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包括工具及小件装饰品。金属制造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推动了区域间资源的流动，掌握铜矿资源的人群开始同掌握其他自然资源的人群展开贸易与交流。此外，金属制品的出现与使用也促进了木、角、骨加工业的发展。

在介绍不同区域金属器起源时间的基础上，莫洛金院士对西西伯利亚青铜时代文化分期进行定义：青铜时代早期，公元前4-3千年；青铜时代中期，公元前3-2千年；青铜时代晚期-公元前2-1千年。他还提到关于西西伯利亚南部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主要人群的分布范围，结合古DNA研究，构建巴拉巴森林草原地带不同考古学文化群体基因进化树。古遗传学的研究大大拓展了考古学的研究思路，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

考古学文化的出现与自然资源关系密切，西西伯利亚从北向南依次是泰加林带、森林草原带及草原带。自然带决定了植物、动物的种类，也决定了古代人群的生产生活方式。草原地带自古至今都是非常重要的交流通道，且这种交流是双向的，既有

自西而东的交流，又有自东而西的交流。北部的森林地带古代居民则相对保守，文化交流较少。

莫洛金院士指出，俄罗斯青铜时代很多考古学文化研究不够充分，原因在于某些考古学文化只发现居址，某些考古学文化只发现墓葬，同时发现居址和墓葬的考古学文化非常少。莫洛金院士首先从西西伯利亚西边，外乌拉尔地区青铜时代早期考古学文化开始介绍，他提到现在介绍的考古学文化只是大家公认的考古学文化，实际上可能存在更多。

利普卡文化分布于外乌拉尔地区，该墓地所处自然环境较好，与冻土墓类似，有很多有机质材料保存下来。例如，该文化发现了很多木雕动物像，如鸭子和马等。该遗址文化层中还发现很多年代较早的红铜制品，证明该遗址属于早期金属时代。陶器则以尖底器和圆底器为主，陶器上还装饰戳印几何纹。

与利普卡文化相似的还有阿亚特文化，阿亚特文化与利普卡文化分布范围类似。利普卡文化不但发现居址，还发现了墓葬；该文化发现的金属器很少，大部分都是石器，与本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现石器类似，石器加工技术发达。陶器以尖底器和圆底器为主，陶器上饰三角纹、条带纹。

西西伯利亚泰加森林带早期金属时代文化共同特征如下：一，石器与新石器时代石器非常相似，包括石叶、刮削器等；二，铜器非常少见，大多是小型的装饰品；三，陶器以尖底器和圆底器为主，表面饰有戳印的几何纹。有一些考古学文化是依靠陶

器上的纹饰分出的，例如梳纹陶器共同体。

莫洛金院士提到，在西西伯利亚地区不但发现了居址，也发现有墓葬。墓葬既有单人葬，也有多人合葬，其中一座墓葬发现了16人合葬现象。

西西伯利亚的乌斯季-塔尔塔斯文化属于早期金属时代考古学文化，该文化发现以墓葬为主，既有单人葬，也有合葬。该文化墓葬中发现小件铜装饰品、大量加工精美的骨器以及木雕人面像。陶器则以平底器为主，表面上饰戳印的几何纹、波浪纹等。

大岬文化分布于鄂毕河上游，至于该文化年代和分期，尚存诸多争议。例如，巴甫洛夫教授认为，该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基留申教授则认为该文化属于早期金属时代。值得一提的是，该文化遗址并未出土任何金属器，也没有碳-14测年数据。但经过俄罗斯众多学者的论证，根据陶器、石器、骨器等，最终确认该遗址属于早期金属时代。

阿凡纳谢沃文化分布范围包括南西伯利亚及新疆地区。虽然阿凡纳谢沃文化遗址发现数量较多，发掘也很多，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阿凡纳谢沃文化早先的材料主要以墓葬为主，但目前也发现了较多遗址。丹尼索瓦洞穴非常著名，该洞穴上层属于阿凡纳谢沃文化。目前比较新的研究成果，是阿尔泰地区发现的一些岩画，可能与阿凡纳谢沃文化相关。莫洛金院士的一名博士生对一处



林梅村教授主持系列讲座

阿凡纳谢沃文化祭台进行了研究。总的来讲，阿凡纳谢沃文化的青铜器出土较多，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金银器。

谈到西西伯利亚青铜时代，那就必须提到塞伊马-图尔宾诺跨文化现象。塞伊马-图尔宾诺跨文化现象的金属制造技术创新具有跨越性，非常发达。莫洛金院士提到，中国很多学者开始关注塞伊马-图尔宾诺问题，为此他非常开心。塞伊马-图尔宾诺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包括空首斧、铜矛、铜刀。对此，莫洛金院士认为，新疆、额尔齐斯流域、西西伯利亚地区，除了出土典型的塞伊马-图尔宾诺铜器外，还有人面石杖首、短剑等器物——短剑的起源地应该在哈萨克斯坦东北部，而后向北传播。

青铜时代中期，西西伯利亚考古学文化包括塔什科沃文化、克罗哈列夫卡文化、奥迪诺文化、克罗托沃文化、叶鲁尼诺文化、萨穆西文化、奥库涅夫文化、卡拉科尔文化、切木尔切克文化等。其中奥迪诺文化、叶鲁尼诺文化、克罗托沃文化都发现了塞

伊马-图尔宾诺文化铜器，这表明这些文化铜器不但受到塞伊马-图尔宾诺影响，而且很可能掌握了塞伊马-图尔宾诺铜器铸造技术。

此外，西西伯利亚南部还分布有辛塔什塔文化、彼得罗夫卡文化、阿拉库尔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晚克罗托沃（黑湖）文化等。青铜时代晚期则包括阿特雷姆文化、切尔卡斯库里文化、苏兹贡文化、巴尔哈托沃文化、帕霍莫沃文化、伊尔敏文化、附加堆纹陶器文化、卡拉苏克文化、卢加夫文化。莫洛金院士就每个考古学文化进行简单介绍，但由于材料太过丰富，无法一一展开叙述。

评议阶段，魏坚教授表示，过去中国与俄罗斯考古学者之间交流较少，两国的学者仅对自己研究熟悉，对对方的材料则基本不了解。现在，随着两国的交流越来越多，中国学者可前往新西伯利亚参观、交流，这对于研究来讲非常有必要。关于西西伯利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国学者需要格外留意，将中国北方地区、南西伯利亚、西西伯利亚考古学材料综合梳理研

究，才能更好的解决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问题。

魏坚教授还提到最近在内蒙古发现的裕民遗址、四麻沟遗址，张家口四台遗址、兴隆遗址。这些遗址的年代，距今8400年，与距今8000年左右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老官台文化、磁山文化相比，文化面貌完全不同；与后来北上的半坡、后岗不同；与东部距今8000年的之字纹、筒形罐、三段式陶器为代表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也有所不同。这个区域很可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时间较早的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裕民遗址的发现，圜底器的出现，与中西伯利亚情况相似。阿拉善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址出土的篦点纹陶器、石叶、石核，显示了畜牧业、狩猎、农耕同时存在的现象。此外，中国的考古学者还应探讨一些理论问题，例如农耕向畜牧的转化过程。与此同时，可开拓自己的视野，多了解国外的研究动态，更好地完善自己的研究。

（撰稿：刘翔）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金 | 阿尔泰山区巴兹雷克文化



2019年12月6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五十六期第三场在北京大学

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阿尔泰山区巴兹雷克文化”。俄罗斯科学院

院士、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维亚切斯拉夫·莫洛金（Viacheslav I. Molodin）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林梅村主持，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锦绣评议。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金在文研院举办的系列讲座第三场系统讲述了阿尔泰山区的巴兹雷克文化。巴兹雷克文化是分布在萨彦-阿尔泰地区的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乌科克高原是巴兹雷克文化遗址较为集中的地区。从行政区划来看，巴兹雷克文化相关主要分布在俄罗斯阿尔泰共和国，在哈萨克斯坦东北、蒙古西北、中国新疆北部也有分布。

本场讲座，莫洛金院士首先梳理了巴兹雷克文化的发现、考古发掘及相关研究历史，随后以典型墓葬为案例，分别从墓葬形制、墓室结构、埋葬方式等角度探讨了巴兹雷克文化墓葬的典型特点，最后详细讲述了墓葬随葬品的类别、性质以及随葬品代表的文化因素。

巴兹雷克文化的发现归功于拉德洛夫院士（В.В. Радлов），他早在19世纪就对巴兹雷克文化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之后，戈列兹诺夫教授（М.П. Грязнов）发掘了巴兹雷克一号大墓。随后，鲁金科教授（С.И. Руденко）发掘了几座巴兹雷克大墓和巴沙达尔墓地（Башадар）。吉谢列夫教授（С.В. Киселев）等学者对巴兹雷克文化墓葬进行了分析研究。库巴列夫教授（В.Д. Кубарев）发现并研究了俄罗斯境内阿尔泰山南部中小型巴兹雷克墓葬。波罗西玛克教授（Н.В. Полосмак）主要发掘了乌科克高原巴兹雷

克文化墓葬。萨马舍夫教授（З. Самашев）发掘并研究了较为典型的巴兹雷克文化墓葬——别列利墓地（Берель），参与此项工作的还有法国的法兰克福院士（Henri-Paul Frankfort）。从2004年开始，莫洛金院士代表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与德国考古学院帕尔青格尔教授以及蒙古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策温道尔吉教授联合在蒙古国西北部以及乌科克高原地区探索巴兹雷克文化。初步田野调查和勘探之后，俄德蒙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的阿尔泰山地区进行了考古发掘。

巴兹雷克文化墓葬年代大致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虽然一些学者已经对该文化进行了分期研究，但是并没有形成定论。总体来看，巴兹雷克文化墓葬主体文化因素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该文化晚期阶段可能受到匈奴文化影响。有学者认为，巴兹雷克文化的终结可能和匈奴从南部北上有关，匈奴占据阿尔泰山后，巴兹雷克人群只能继续往北方迁徙，或者与匈奴同化。

从形制上看，巴兹雷克文化墓葬可以分为大型墓葬和中小型墓葬两种。虽然巴兹雷克文化墓葬人为破坏严重，但是该文化墓葬一般在地表呈现线状分布，墓葬地表有石块堆砌，墓前存在石砌祭坛遗址。巴兹雷克文化墓葬大多为竖穴土坑墓，墓坑位于中部。墓坑有木框为棺椁，木框大部分是用多条半原木和原木搭建而成，大小不一，木椁椁壁一般有榫卯结构便于上下相接。除了用多条原木搭建成木椁之外，还有用一整木劈为上下两块，中部凿空形成木棺，个别木棺表面有装饰图案：比如

巴兹雷克一号墓的木棺上饰有皮革制作的鸟形纹饰，巴沙达尔二号墓的木棺上有雕刻的老虎装饰。莫洛金院士认为，木棺椁大小可能和墓主人身份地位相关，比如一些看似属于平民的墓葬并没有使用棺椁。殉马也是巴兹雷克文化墓葬典型特征，大部分学者认可殉马数量与墓主人地位相关，即墓葬等级越高，殉葬马匹数量越多。

墓主人一般使用侧身屈肢葬，头部附近放置容器，身旁放置工具武器或装饰用品，部分墓主人身着衣物。其中上卡利金(Верх-Кальджин)二号墓地发现的墓主人内脏被取出，制作成干尸。墓主人留着红色长辫发，右肩有鹿形纹身，研究者认为该纹身图案与西伯利亚地区斯基泰动物纹相似。最初，研究者发现一部分干尸有纹身，一部分没有纹身，并对此现象进行了一些

解释。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利用红外线技术发现所有干尸都有纹身，也进一步证明了纹身是巴兹雷克文化普遍现象，包括巴兹雷克二号墓、阿克阿拉哈(Ак-Алаха)三号墓和上卡利金二号墓墓主人身上均有保存较好的纹身。

在巴兹雷克文化的墓葬中，大部分墓主人身着衣物及装饰品入葬。其中，阿克阿拉哈三号墓、上卡利金二号墓还有奥隆库林格勒(Олон-Курин-Гол)十号墓等墓葬墓主人的衣服尺寸都比较大，在衣服后部有明显突出的衣摆。研究者根据当地民族志的材料推测，这样的尾摆设计主要是在冬天寒冷的情况下方便席地而坐，充当“垫子”的功能，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样的衣摆是为方便骑马而设计。墓葬中的衣物材料都较为珍贵，有些衣服还用马的皮毛进行装饰。比如奥隆库林格勒十号墓中出土的皮袄是用紫貂皮制作而成，内部衬有羊皮。此外，部分墓葬还发现了丝绸制作的衬衣，比如阿克阿拉哈三号墓出现了妇女衬衫，前部长100厘米，背部长113厘米，宽80厘米，袖子是单独缝上去的，衬衫下部左右两边缝有下摆，成喇叭状。研究者认为，这些丝绸可能是在印度制作完成的，不过，林梅村教授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这些丝绸应为“中国制造”。阿克阿拉哈墓葬中还出土一条裙子，由三块毛料组成，长114厘米，宽超过90厘米，上部和下部使用红色的布，中间间隔以白色布料，并使用细条毛料腰带捆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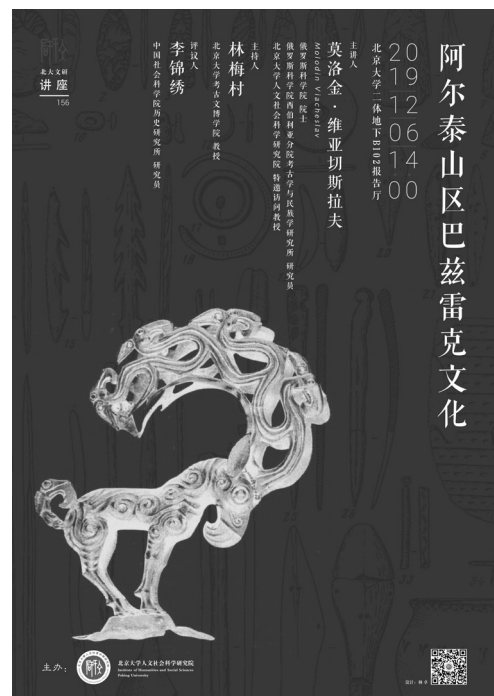
墓葬还出土有头冠，且大部分是从巴兹雷克大型墓葬中出土的。对此，研究者认为，这样的头冠代表着墓主人的社会地

位。头冠使用毛毡制作，冠体及顶部使用木、角、皮革或金属进行装饰，个别头冠使用较为复杂的木雕，雕刻以鹿、山羊等动物形象或者格里芬形象。墓葬中出土的鞋子主要是毡毛制成的靴子，部分鞋面上贴有皮质的花纹，有的在脚腕处用红色布条装饰。此外，墓葬随葬装饰品(如项圈、辫套、耳环等)，还有木梳、铜镜、银镜等生活用品出土。

巴兹雷克文化墓葬中多随葬兵器，如短剑、刀、剑套、盾牌、箭、弓等，且一般是青铜和铁制品。由于墓葬大多发现于冻土地带，在冻土层的保护之下，部分有机物的随葬物品很好地保存下来，比如与短剑配套使用的毛皮剑套、与戈共存的木柄等。其中，出土盾牌是用树枝、皮革或者直接用木头制

成。大多数的墓葬中都出土木案，有些木案上会放置羊肉，甚至保留刀刻的遗痕。墓葬中也出现了大量马具，比如马衔、马镫、马面饰、马笼头扣饰等。铁质马具较多，马具的装饰也非常精美。在巴兹雷克五号墓中出现了较为完整的马车，研究者认为，这个马车表明了巴兹雷克文化群体当时与中国的关系往来。墓葬中出土的毛毯也值得关注，根据纹饰和制造技术，研究者认为应是近东地区制作的毛毯。上述现象均表明，巴兹雷克文化群体对外交流广泛，同中国、印度、西亚等国家或区域的交流纷纷呈现在墓葬随葬品中。

(撰稿：达吾力江·叶尔哈力克)



157

郑欣淼 | 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

2019年11月29日晚，“故宫与故宫学”系列学术活动第一讲、“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五十七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原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主讲，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主持。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副院长赵国英，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叶静漪出席活动，三百余名师生到场聆听。

10月20日，北京大学与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三方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本场讲座为北京大学与故宫博物院建立学术合作机制后在校内举办的首场讲座，受到相关领域学者、师生的高度关注与热烈支持。讲座开始前，叶静漪副书记和王旭东院长先后致辞。叶静漪书记指出，双方在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深刻

的自觉、广泛的共鸣和良好的合作前景，希望双方能够抓住战略机遇，在文物研究、科学保护、文创开发等领域展开制度化、常态化的交流。王旭东院长指出，北大与故宫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当下都有着深远的合作传统。希望在“故宫与故宫学”系列讲座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北大师生能够关注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从而更好地理解文化遗产中的人文价值，真正树立文化自信，将故宫学研究推向新高度。

随后，讲座正式开始。郑欣淼研究员首先对故宫文物藏品的意义进行了说明。所谓“故宫文物”实际上指的是清宫文物，主要包括两类：其一是传统文物，如铜、瓷、书画、文玩等工艺品；其二是反映宫廷典章制度及日常文化生活、衣食住行的实用之物，如皇帝的宝座、玉玺等。故宫文物藏品的多样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古代皇室收藏文物珍品的传统，而这与王朝“奉天承运”的统治合法性密切相关。清乾隆皇帝更是将宫廷收藏推向高峰，他不仅收藏了大量珍稀工艺品，更是将其进行了全面整理和编目，形成了《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等诸多藏品名录。这实际上是在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上重新解读艺术作品，起到了知识传承的作用。总体来说，故宫文物藏品至少有几方面的意义。第一，故宫文物是中华文明的物质载体。故宫文物内容广泛，涵盖了古代文化艺术品的所有门类，完整记录了各类文物从萌生、发展到鼎盛的发展历程，是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历史长河的见证和缩影。第二，故宫文物是众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映。例如故宫所藏的金嵌珊瑚松石坛城，是顺

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顺治皇帝时所献，此次进京确立了达赖喇嘛的西藏佛教领袖地位；再如马戛尔尼访华所带的各式礼品，生动展现出18世纪欧洲与中国在物质生活、外交礼仪、文化观念等方面的鲜明分野，本次访华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和世界近代史的发展进程。郑欣淼研究员强调，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博物馆展出的藏品来自文明古国，而与本国历史文化并无必然联系；而故宫文物最大的特点在于，它们就是中华民族世代创造积累的，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高度关联，反映了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辉煌历程。

接着，郑欣淼研究员详细介绍了故宫文物南迁的经过。故宫文物南迁是故宫博物院乃至中国文博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南迁自1933年开始，以1958年最后一批文物北返为止，历经25年，迁移文物共计19492箱72包8件。然而，这一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故宫文物南迁消息初见报端时，就引发了当时社会上长达半年的争议和分歧。反对者以社会团体、文化名流为主，其意见主要有三：其一，认为大敌当前，政府首先应保护土地和人民，现在如此重视古物，不过是因为它们更加值钱罢了；其二，认为文物运出北平会加剧人们对日寇入侵的恐慌，引发社会动荡；其三，认为故宫文物与北平市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不应单独迁出。鲁迅就曾在《申报》上发表《崇实》一文，反对故宫文物南迁：“倘说，因为古物古得很，有一无二，所以是宝贝，应该赶快搬走的罢。这诚然也说得通的。但我们也没有两个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

古。”北平市自治区各公所也曾发表声明，称“故宫文物为北平生命之所系”，坚决反对故宫文物迁往他地保管。而支持者则认为，日本侵略野心不会终止，如侵略势头继续南下，则会殃及平津，因而必须未雨绸缪，采取果断措施，将文物运至安全地带。最后，仍以支持之声占据主导，故宫文物南迁才得以顺利开展。据故宫

博物院所藏文稿记载：“现在本院新库方告落成，正集中新库。择其最要数千箱，金议必要时期分别装送北平交民巷及天津、上海租界区域，暂为安顿，再策万全。”

故宫文物南迁历程跨越20余年，先后经历了南迁、西迁、东归、迁台、北返等多个阶段。其间虽时有波折，但在政府的支持和全体故宫人的共同努力下得以圆满告终。值得注意的是，由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编印的“存沪文物点查清册”，全面点查了存沪文物和留平文物，保证了故宫文物在南迁过程中得以按要求严格有序地进行。1933年2月7日，首批文物起运迁往南京朝天宫保存库。然而仅四年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在北平和上海发动“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形势日益紧张。故存放在南京库房的南迁文物又分三路避敌西迁。西迁分三路有序展开：南路自1937年8月开始运往长沙，后改迁贵阳、安顺、重庆，运送文物共计80箱，皆为南迁文物的精品，其中大部分参加过英伦中国艺术



郑欣淼院长

国际展览会；中路自1937年11月开始，经水路运往重庆，后改迁乐山，运送文物规模最大，共计9000余箱；北路自1938年2月开始，经陆路运往陕西，后向成都、峨眉转移，运送文物共计7000余箱。西迁阶段历时漫长，且自然条件相当恶劣，极大考验着故宫人的恒心与毅力。原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的作者那志良曾引用元代诗人曹伯启的一首《南乡子》，描绘西迁过程的艰辛困苦：“蜀道古来难，数日驱驰兴已阑。石栈天梯三百尺，危栏；应被旁人画里看。两握不曾干，俯瞰飞流过石滩。到晚才知身是我，平安。孤馆青灯夜更寒。”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战争环境下，故宫人坚守“人在文物在”的信条，将青春甚至一生奉献给了文物南迁的曲折历程，展现了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深刻自觉和勇敢担当，用实际行动铸成了一座捍卫人类文明的不朽丰碑。

随着战争形势的好转，故宫南迁文物终于迎来了东归复员的阶段。1946年起，

故宫文物东归正式开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先将巴县、乐山、峨眉的文物集中运往重庆，再分批运回南京。建国之后，故宫南迁文物的北返正式被提上日程，并先后于1950年、1953年和1958年分三批从南京运回北京。但目前尚有2176箱文物存于南京博物院，其中以陶瓷等大件、难于运输的文物为主。至此，故宫文物南迁过程顺利告终。

值得注意的是，在故宫文物南迁的整个过程中，故宫的决策与监督机构——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由当时社会政、商、学等各界名流组成，蔡元培、孔祥熙、朱家骅等曾历任理事会理事长。理事会兴起于抗日战争前夕，并随着战争形势的演进日益规范化、完善化，其集会次数虽然不多，但每次都能研究解决一系列现实迫切问题，

如文物运送经费、文物存藏地点、文物安全等问题。理事会还曾派人专门视察几处库房的保管情况，提出加强和改进的意见。简言之，在故宫文物向西南诸省迁运、疏散、存储和东归的过程中，故宫博物院理事会都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

郑欣淼研究员还从四个角度出发，重点阐述了故宫文物南迁的意义。首先，从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角度看，故宫文物南迁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完整保留这批文物是抗战胜利的成果，其迁移过程也赋予故宫文物特殊的价值。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极大地改变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故宫文物则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载体与见证，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根脉。在故宫文物南迁的过程中，全体故宫人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将故宫文

物与民族命运、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捍卫紧紧连在了一起，倾注了深沉的民族感情，对于抗战精神的形成和民族认同感的增强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角度看，故宫文物南迁是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一次壮举和伟大贡献。将文物转移至安全地带并非中国的独创，二战中欧美各国均试图通过这一方式保护珍稀文物和藏品。与其他欧美国家相比，故宫文物南迁具有时间上持续长、空间上涉及区域广、保护任务上数量众多、保护力量上投入巨大等四个突出特点；但在全国各界人士的共同支持下，故宫人圆满完成了较之他国更为严峻和艰难的文物保护任务，为保护本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文明遗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再次，从中国文化教育西迁的角度看，故宫文物南迁是抗战时期文化、教育西迁的组成部分，故宫文物的有效保护是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结果，培育和形成了宝贵的故宫典守精神。八年抗战旷日持久，不仅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社会经济、文化、民心等多方面的较量。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教育中心也从东南沿海向西部内陆迁移，故宫文物南迁亦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例如，1939—1946年，故宫9000余箱文物在乐山存放8年之久，其间武汉大学西迁乐山，与此同时，国学大师马一浮也在乐山乌尤寺创设复性书院。这一度成为抗战时期乐山文化教育三大盛事，三者的交流大有益于乐山的文风。再如，故宫文物南迁期间，中国文物首次赴外展览，先后参加了在英国和苏联举办的中国艺术品国际展览会，并在文物保管当地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展览、讲演，极大促进了

故宫文物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在保护国宝的实际工作中，故宫人不断发展和强化着视国宝为生命的典守精神，他们无怨无悔、忠于职守，展现出故宫人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最后，部分文物运台，客观上形成了“一个故宫、两个博物院”的局面。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解放战争的战局发生根本变化，南京国民政府准备撤离台湾，当时存于南京库房的南迁文物也有近3000箱运往台湾。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两个博物院虽然分属海峡两岸，但其联系却同根同源、难以割断。两个博物院都坚守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初心和使命，并积极倡导双方在历史渊源的基础上开展广泛的交流合作。2009年，两岸故宫博物院终于打破长达60年的阻隔，实现了正常交往。

最后，郑欣淼研究员对传承南迁精神、保护南迁遗址的现状和前景进行了展望。他指出，故宫文物南迁不仅是文博界的一段共同记忆，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我们对文物南迁的态度，就是对历史的态度。如何让这一段独特的历史从个体的记忆演变为国家、民族的记忆，从零散的记忆演变为系统的记忆，始终是故宫博物院乃至社会各界人士广泛思考的话题。近年来，故宫博物院为传承南迁精神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联合开展了“温故知新：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系列活动，带领新一代故宫人重走南迁路，考察当时的文物存放地点和原始条件，亲身感受国宝的分量与价值，强化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再如，故宫博物院研究院专门成立了



讲座现场

故宫文物南迁研究所，编排了话剧《海棠依旧》，并正在筹划拍摄纪录片《故宫文物大南迁》，试图通过多种媒介的宣传，记录故宫人守护国宝的真实故事，生动展现出一代代故宫人传承不息的典守精神和敬业奉献的崇高情操。

在讨论提问环节，郑欣淼研究员对听众的提问给予了一一回应。他指出，故宫南迁过程虽然面临相当恶劣的外部条件，但从未降低对文物保护和管理标准。文物西迁期间，故宫人还曾代管过其他省图书馆、博物馆的文物藏品，都一视同仁，尽心尽力。例如，在帮助运送国子监的10面石鼓时，由于石鼓的石皮很容易脱落，经过反复商议，他们决定先将浸湿的高丽纸覆在鼓面上，再在石鼓外侧包裹棉被、打紧麻绳，置于塞满稻草的箱中，尽一切可能确保石鼓的原貌。除运送过程外，文物在暂存地的保存和管理制度也相当严格。例如，南京朝天宫保存库采取恒温、恒湿技术，这在上世纪30年代是相当先进的；

此外，对于易受潮、变色的书画藏品，还要进行定点、定时晾晒，由军警参与站岗维护。凡此种种都说明，故宫文物南迁并不是简单的从一地到另一地的迁移，而涉及相当严密的保管制度，这背后倾注了文物保管人员的极大心血，深刻反映出故宫人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最后，邓小南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简要总结。她指出，故宫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和典范，有着极其深邃的历史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一所大学；文研院是一个平等对话、广泛交流的学术平台，担负着涵育学术、激活思想的重要使命，双方的合作可谓浑然天成。郑欣淼研究员的讲座，是文研院与故宫博物院开展学术交流和合作的一个良好开端，希望在未来的合作中，双方能继承前辈的宝贵精神传统，密切交流、通力合作、共谋发展。

（撰稿：毕悦）

158

段晴 | 最后的斯基泰人——追溯于阗王国社会宗教文化变迁

2019年12月6日晚，“文明之间”系列讲座、“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五十八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

主题为“最后的斯基泰人——追溯于阗王国社会宗教文化变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段晴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副教授萨尔吉主持。

谈起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人们似乎首先习惯想到物质文化交流，如多民族之间的贸易，或是思想文化交流。而段晴教授认为，历史上真正的交流在于族群的迁徙。中亚原粟特人居住地区的一座座空城、鄯善国领地的尼雅遗址都是族群迁徙的例证。迁徙曾是人类生活的常态。回望世界人类的历史，可以发现，迁徙范围最为广泛的族群就是中国史书所记载的塞种人和希腊历史记载中的斯基泰人——他们是一支驰骋于欧亚大陆上的草原民族，具有超强的活动能力，几乎可以出现在所有拥有丰盛水草的地方。直到公元前7到6世纪之交，米底人的兴起才阻止了其扩张进程。斯基泰人在后世逐渐淡出历史的记载，但他们创造的文明并没有消失。本次讲座，段晴教授以斯基泰人的发展为线索，以于阗语文书与出土文物为主要材料，追溯他们的文明成果与历史足迹，并勾勒于阗王国的社会、宗教与文化特点。

首先，段晴教授对“斯基泰人”与“塞人”（或“塞种人”）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进行了细致的辨析。“斯基泰人”的称谓主要来自古希腊人的记录，例如希罗多德的《历史》；而古波斯人则把希罗多德笔下的斯基泰人称作“Saka”（复数为Sakas）。1933年，德国考古学家弗里德里希·克雷夫特（Friedrich Krefter）发现的公元前6世纪大流士的奠基铭文中，有最早的关于“Saka”的记录。而根据希罗多德在《历史》中的描述可得知，古波斯人口中的“Saka”，就是古希腊人口中的Scythian，即斯基泰人。段晴教授继而指出，

中国古书记载的塞人显然与古波斯人对这一族群的称谓一致。

张广达、荣新江于1989年发表的《上古于阗的塞种居民》一文根据《汉书·西域传》中与塞人有关的记载，得出下述结论：“塞种在公元前1世纪的西域分布很广，从天山北麓的伊犁河流域、西南经帕米尔高原到克什米尔的罽宾一都是塞人的故地，而且从地理位置上看，天山、帕米尔一带的塞种应属于古波斯磨崖碑铭中的戴高尖帽塞人的范围。”至此，段晴教授进一步指出，斯基泰人是希腊人的称呼，而塞人是中国古代类似古波斯人的对斯基泰人的称呼——斯基泰人和塞人都是对属于不同部落但同宗同源的一类草原民族的称谓。在波斯波利斯遗址（Persepolis）发现的古波斯人的塞人造像中，他们往往戴尖帽子，穿着裤子或连裤袜。实际上，裤子与连裤袜正是塞人的发明。

接下来，段晴教授结合考古发现与现存于伊朗的浮雕介绍了塞人的历史分布与生活习性，并指出他们在印度西北产生的历史影响。亚历山大攻下波斯帝国之后，在锡尔河、阿姆河流域以及横跨印度库什山脉（包含阿富汗南部的地区）建立了希腊大夏王国。公元前140年之前，塞人主要分布在锡尔河以北地区，后受到大月氏的挤压，南下占领大夏。因此，在公元前2到1世纪间，包括两河流域在内的中亚地区存在着希腊人、斯基泰人、帕提亚人三种势力的角逐。这三种势力被古代印度人视作外来入侵者，对印度文明影响深远，甚至作为例词出现在语言类作品中。比如公元前150年波颠阇利（Patañjali）对

《波你尼经》进行释补所作的《大疏》，在针对原书第二章第二节第三十四条经文做注释的时候，使用了梵语复合词“aka-yavana-palhava”——三个词语分别表示塞人、希腊人与帕提亚人。在古印度人的著述中，塞人被塑造为恶势力的代表。诸如《摩诃婆罗多》、《林伽往世书》等梵语作品，将塞人描绘成贪婪、强暴、本性恶、充满毁灭之心的负面形象，其中不乏“斯基泰人必然灭亡”的预言。类似的表述甚至出现在汉译佛经中，如西晋时翻译成汉语的《阿育王传》提到佛法未来会灭迹，而起因就是三股恶势力，“一名释拘，二名阎无那，三名钵罗”，他们扰乱百姓、破坏佛法，是未来之世的“三恶王”。

这些描述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所反映的并不是塞人的实际面貌。在公元前1世纪，塞人沿着印度河北上，进入今巴基斯坦北部的犍陀罗地区，在希腊人的城邦之上建立了斯基泰人的王国。段晴教授认为，斯基泰人虽然确实在征服过程中做了诸多恶事，但他们也对历史做了有益的贡献，比如积极扶持佛教发展。另外，有历史学家认为，斯基泰人在打败希腊人之后开始大量吸收希腊文化。塞王阿泽斯一世（Azēs I）时期的朱迪亚尔（Jandial）遗址，其庙宇风格与布局体现了明显的希腊庙宇的特点。塞王也效仿希腊国王铸币，但斯基泰人的钱币在工艺水平上明显不如希腊那么精细。斯基泰人的贡献还包括一种独创的纪年方式，它长期为印度的塞种政权所使用。贵霜人占领西北印度以后，斯基泰人放弃了犍陀罗一带，在印度中部偏西地区建立了新的领地——西萨特拉普王国。



段晴教授

王国虽然是贵霜王朝之下的一个地方总督区，但实行的仍是塞人纪年法。斯基泰人的文化影响尤其体现在当时的艺术作品上。段晴教授特别提到，犍陀罗佛教造像是融合了多元文明的艺术，受到希腊、波斯、斯基泰、贵霜的多重影响。我们若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希腊与印度文化的结合，必然理解不了造像艺术背后更深一层的人文理念。白沙瓦博物馆所藏的一件斯基泰人金属制品也是体现文明交融的代表：底层的花纹是贵霜人的特色，顶层的图案则是斯基泰人特有的簷波花，人物的衣摆则明显带着希腊风格。

总的来说，斯基泰人在印度西北部发挥影响至少持续四百年。那么，活跃在印度西北地区的斯基泰人与地处丝路南道的于阗人有什么关系？研究者是如何得出于阗语就是斯基泰人的语言这一结论的？根据荣新江教授的说法，曾经在西域流行的

各种印欧语系语言都包含在胡语的范围，因此，于阗语本身属于胡语的范畴。《安禄山事迹》与《旧唐书》记载了安禄山与哥舒翰之间的一次著名的对话。在一次宴会中，安禄山主动向哥舒翰示好，对其云：“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女。尔父是突厥，母是胡，与公族类颇同，何得不相亲乎？”哥舒翰的母亲是于阗公主，安禄山的父亲是粟特人。这一则对话显示，至少在唐代，中原人眼中的粟特人和于阗人是所谓的“胡人”，他们说的语言是“胡语”，用这种语言书写的文献就是“胡语文书”。但于阗语除了是一种胡语之外，还有更特殊的身份——它是塞人的语言。段晴教授详细讲述了“发现塞语”的过程。

“发现塞语”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于阗语从发现到定名的过程。在于阗语发现之前，学者就认为分属不同部落的斯基泰人用于交流的语言一定属于印欧语系中的伊朗语支。但确认古代于阗语就是塞语，古代于阗人就是塞人，则是从事印度学研究的学者的贡献。上个世纪初，印度学家首先发现来自新疆的各种古写本中至少有三种已经消亡的语言，分别为吐鲁番库车地区出土的吐火罗语、图木舒克地区出土的据史德语、丝路南道和田地区出土的于阗语。于阗语“出世”之后，西欧的印度学学者率先对其进行解读。来自挪威的汉堡大学教授科诺（Sten Konow）最早确定所谓的于阗语实际是伊朗语支的一种。然而，于阗语在被重新认识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获得正式定名，而是被称为北方雅利安语（Nordarische）。1912年，德国学者吕德斯（Von Heinrich Lüders）最

早认定曾经在印度西北地区建立政权的塞人所说的语言，与北方雅利安语有高度的相似性，从而正式将塞语与于阗语联系在一起。吕德斯的研究是从对今巴基斯坦以及印度西北地区的一系列石刻、崖刻铭文和钱币铭文的解读开始的，他的结论主要有下述三种依据。

首先，吕德斯发现西萨特拉普王朝发行的银币上出现了“ys”的字母组合，用来表示辅音“z”。这种辅音是伊朗语才有的发音，而在于阗语文书中也存在“ys”在一起发音为“z”的现象。这说明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但并不足以证明于阗语就是塞语。随后，他发现于阗语存在大量来自印度语的词语，除了佛教用语外，还借用了许多俗语。例如，于阗语 kdana（“因为”）来自梵语 krtena；于阗语 sal ā va（“话”）来自梵语 saml ā pa。吕德斯认为，之所以产生大规模的词语借用现象，是因为这些操持所谓北方雅利安语的于阗王国居民曾经在印度生活过。此外，他又分析了大量铭文中的塞人人名，并从北方雅利安语中找到了相一致的词或语法现象。基于这三条依据，吕德斯得出了于阗语是塞语的结论。1932年，科诺的《塞语研究》（Saka Studies）正式回应了吕德斯的研究发现。他赞同吕德斯的观点，认为应当将于阗语定名为塞语。考虑到斯基泰语有多种方言，科诺教授认为，应当将其称作“于阗塞语”更为准确。这一成果具有重大意义。斯基泰人虽然曾经广泛分布在欧亚各地，但他们在历史上很少留下“只言片语”，而于阗塞语的发现将和田地区乃至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大量文献纳入了斯基泰人研究的材

料范围，使得关于这一族群宗教和文化的谜底被彻底揭开。

在回顾了这一学术发现的历程之后，段晴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对吕德斯判断进行回应。根据和田地区出土的文物和汉藏文献，她认为，古代于阆人确实可能跨越了喀喇昆仑山的山口，或者是从阿富汗南部的瓦罕走廊来到塔里木盆地。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所讲述的建国传说也证明于阆王国确实和印度有一定的关联。然后，她从文字材料和出土文物两个角度予以进一步说明。

近年新出的文字材料主要有安迪尔出土的 KI661 号佉卢文契约，它从胡语文书的角度第一次确认了于阆王国的存在；另有两件梵文契约，它们是极其罕见的以梵文写就的世俗文书，意义重大。段晴教授借此回顾了文字的发展历史，指出两地区间文字的呼应。佉卢文曾经是贵霜王朝的官方文字，公元 3 世纪随着贵霜王朝的衰落，犍陀罗地区逐渐以婆罗谜字取代佉卢文，语言从西北方言过渡到了梵语，一些原本用俗语写就的佛教文献也明显地梵语化了。而在丝路南道的绿洲，佉卢文一直被使用到 5 世纪，且直到 6 世纪中期才在罽宾上出现了最早使用婆罗谜字书写于阆文的例证——于阆王国与印度西北地区的文字发展虽然有时间差，但梵语化的趋势是相同的。

接下来，段晴教授分析了出土文物中的类似信息。第一件文物是山普拉 1 号墓（注：距新疆和田市 25 公里左右的山普拉墓葬群被认为是斯基泰人或塞人的墓葬）出土的希腊武士以及人头马毛织裤子。考

古学家发现，山普拉 1 号墓是一座容纳了 33 个成年男女骨架的集体墓葬，墓内的尸体被堆积起来，且都带有明显伤痕——只有两具完整，其余多被砍下头颅。据此，考古学家推测，毛织裤子的主人是在大规模的屠杀中死去的，且尸体的包裹可能十分匆忙，这一条包裹在腿骨上的裤子实际是临时从一幅挂毯上剪下来裁制而成的。已有考古学家指出，裤子上的希腊武士与人头马图案体现出强烈的斯基泰人风格。人首马手持一件乐器，即“萨芬克斯”（salpinx）。这一长管乐器是斯基泰人的发明。《希腊人的音乐生活》一书中特别描绘了一个吹奏萨芬克斯号的斯基泰人，其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头戴尖帽，手持吹奏的长管乐器，可与之相互印证。散落在人首马周围的花是斯基泰人特有的詹波花，这种花样多见于金属制品，如乌克兰斯基泰王大墓出土的黄金护心配饰。金黄色的詹波花在斯基泰人的文化中是所谓天雨妙华的来源，其图案代表天界，如图木舒克九间房遗址出土的天人胸前就有詹波花。段晴教授指出，古代的图像装饰往往代表着一定的意义，绝不是被随意添加的。

接着，段晴教授介绍了一系列带有格里芬图案的文物。段晴教授认为，除了詹波花，格里芬是斯基泰人用以区分天人和凡人最重要的标志。斯基泰人崇拜上天，与匈奴人一样没有地狱概念，认为人死后都会升天，因此，所有的墓葬中都要放置带有格里芬图案的物品。如著名的出土于尼雅遗址的精绝王“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臂佩，就是作为一种护身符随精绝王入葬。上面的所谓“青龙”图案，其实正是

斯基泰人的格里芬。此外，山普拉 1 号墓出土了很多“龙纹缀织绦裙”，它们也是斯基泰人的一种随葬品，其用意在于护佑死者的灵魂。由于在中国人眼中，格里芬与龙相近，因此这些绦裙上原被视作龙纹的图案实则抽象化的格里芬扑咬偶蹄兽的图案。学者们进而发现，和田出土的格里芬图案与塔吉克斯坦墓葬出土的格里芬扑咬偶蹄兽形象最接近，因此他们认为，这部分于阆人不是来自印度西北，而是因为受到塞人的挤压从瓦罕走廊来到了于阆。这些出土文物带有斯基泰人独特的文化符号，证明山普拉墓葬中掩埋的斯基泰人和于阆王室同宗同源；于阆故地的传统与斯基泰人一脉相承，延续几百年而未曾改变。从而，段晴教授从文字和实物两个方面，再次验证了吕德斯的判断，也增强了其说服力。

随后，段晴教授将主题移向古代于阆王国。首先是有关于阆国名的问题。她发现，尽管于阆人确实与塞人同宗同源，但他们似乎从不这么认为——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于阆语文书一律将于阆的国名称作“于阆国”，将国民称作“于阆人”。唯一的例外是玄奘《大唐西域记》，其中将于阆国名记载为“瞿萨旦那”，且敦煌藏经洞的一件卷子确实出现了梵语的“gaustana”与于阆国名的对应现象。她指出，一方面，这件卷子实际是一部从梵语学于阆语的教材，玄奘不仅精通梵语，且是梵语的大力倡导者，因此这一卷子极可能就是由他编写；另一方面，迄今所见的其他所有佉卢文和梵文的卷子都没有出现“瞿萨旦那”这一国名，未免不合常理。

据此，她认为，“瞿萨旦那”应是玄奘的创造，而不是真实的于阆国名。

对于于阆王国的社会特点，段晴教授指出，其最突出的一点便是人口的依附性，即人人都有归属。在中世纪，人们必须使自己隶属于一个团体才能生存，单独行走的只可能是逃犯或僧侣，而这种依附性在于阆王国表现得特别明显。随后，她以和田地区出土的于阆语、佉卢文案牍为实例来说明这一点。一件记载了伏阇信三十八年与伏阇雄十二年两份文书的于阆语案牍，其中最能反映依附性特点的信息是“住于王储领地上的俱布萨李”。它表明，于阆王子拥有自己的封地，且自行打理封地上的事务，其领地内的居民隶属于他。此外，文书中还提到一位冠有“破沙”名号的贵族。他不仅自身拥有属下，其属下也有依附者。另一件出土于尼雅 29 号遗址的佉卢文文书记载了萨迦牟云和他的恋人妙可因自由恋爱出逃，后返回鄯善故土的故事：马伊利王十三年，萨迦牟云一家被国王作为礼物送给王子功德力，王子给予萨迦牟云封地上的房产、葡萄园、耕地、牧场等，使之成为他的“家人”，与之结成了依附关系。策勒文管所收藏的一件案牍记录了若“家人”（即依附者）偷盗，则由家主做出赔偿的案例，亦是于阆社会广泛存在的依附关系的写照。

除了依附性这一社会基本特点，丰富的文书资料还反映了于阆王国自行铸造货币的经济特征与作为古代丝路交通重要中转枢纽的历史地位。在于阆文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犹太、波斯等各地来人在于阆进行贸易等各种社会活动的历史景象；来自

不同民族的人们在于阗定居，形成大大小小的聚落。比较著名的是策勒文管所藏的石汉那人托付婴儿的文书。据文书所记，公元7世纪时，一位因受到阿拉伯人侵略而往中原逃难的石汉那贵族途径于阗，将孩子托付给当地居民。该文书见证了双方所达成的抚养孩子成人、不得买卖和典押的约定，也反映了于阗社会不同族群的人们所发生的联系与交流。

至于于阗王国的宗教信仰为何？段晴教授指出，于阗王国存在一种原始的宗教信仰，这种信仰既非佛教，也非琐罗亚斯德教。据《后汉书·班超传》记载，于阗王曾遣人向汉使求马，以供祭祀。这说明，早期于阗王国确实有杀生祭祀天神的习俗，而这种习俗既非来自佛教，也不符合琐罗亚斯德教的传统。在南西伯利亚图瓦地区发现的斯基泰人大墓中，有陪葬马匹多达200匹，从中可看出古代斯基泰人的信仰与于阗人之间存在的一贯性。于阗王国的宗教实践还反映在玄奘《大唐西域记》所记载的“龙女索夫”故事中。于阗王国遭遇连年大旱，于阗王求助高僧无果，最终选择启用传统的宗教仪式“人祭”以祈雨。按照斯基泰人的风俗，祭拜自然神灵唯有用勇士或贵族的血才有效，于是一位居“萨波”（在于阗的官僚体制中，“萨波”是高官，相当于部族首领，地位仅在王之下）之官，名叫“梅里”的大臣慷慨捐躯，将自己献祭于河龙。“龙女索夫”实际是一次以龙女丧夫为托词的人祭祈雨的仪式，反映了于阗王国宗教信仰的两个特点。第一，于阗王室虽然是佛教的庇护者，但可能仍保留着自身原初的宗教信仰；第二，

斯基泰人的人祭仪式显然不同于汉文化的人祭，而是要选拔真正的贵族。

虽然斯基泰人有着特别的原始宗教信仰，但后来佛教盛行于于阗社会，于阗王国也为中原佛教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武则天时代，来到洛阳的于阗高僧实叉难陀与义净一同完成了大本《华严经》的翻译。另一位高僧提云般若，翻译了六部短篇经文，其中四部都现存于于阗语佛经中。在和田地区发现的于阗语《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经卷是建国以来出土的唯一一件首尾完整的于阗语佛经，历史上，它与一位瞿摩帝寺（于阗王国最著名的大乘佛寺）僧人的骨灰一道埋葬。于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发现的卷轴装《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公元8世纪，日本孝谦天皇也曾将刻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分藏于一百万座木塔之中以表忏悔。一部经书承载了不同时空下不同人的寄托，值得称奇。段晴教授基于这一于阗语经卷相关研究写成《于阗语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一书。

讲座最后，段晴教授简要介绍了当今于阗语和于阗史领域重要的学者与著作，并展望了于阗研究的光明前景。

（撰稿：徐铖）

159

肖燕翼 | 古代画仿代者的揭示

2019年12月11日下午，“故宫与故宫学”系列讲座、“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五十九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古代画仿代者的揭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肖燕翼主讲，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刘晨主持。

中国书画作伪，历史悠久，始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已蔚然成风，宋时形成历史上第一个作伪高潮，元代稍有衰落，至明代达到顶峰。彼时，鉴藏之风盛行，书画交易日趋繁荣，出现了“太史之字与画，母论真鼎，即其厮养厮为者，人争重值购之”的景象。本次讲座，肖燕翼教授以题跋内容与作者归属、鉴藏位置、图像所呈现的时代风格以及伪者所制造的拙目陷阱等为着力点，找出作伪者“有意为之”的破绽，对画作进行鉴定。

将诗及其他文字通过书法写到画上，是为题跋。画中题跋，伴随着中国画（尤其是文人画）的发展而发展，是中国画的有机组成部分。故宫博物院藏《春山图》卷一直被归位北宋燕肃名下，但自入藏以来，就其是否为北宋真迹，始终存在争议。《春山图》后有三十四家元明人题记，皆应为伪书。肖燕翼教授提出，署名“古相郑权”有一诗题，诗云：“流水淙淙石齿齿，满汀云气欲模糊。白漉溪上秋多少，黄叶

山中路有无。十月雨声茅屋破，三江风急野航孤。可怜失脚红尘里，空向晴窗看画图。”该诗描述了“十月雨声”、“黄叶山中”的秋景山水，是元人成廷珪的诗作。诗题为：“题玉岩上人溪山野趣图。”可见清人顾嗣立辑《元诗选·二集》，是从成廷珪《居竹轩集》中选辑而出的。这是抄袭前人诗句伪属郑权名款的一例。

画作中的人物形象设置也可作为判断画品的真伪依据。肖燕翼教授援引《九歌图》这一特殊的画作为例。《九歌图》现存四个版本：其一为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宋人《九歌图》，也称宋张敦礼画，缙本，设色画，全卷分为九段，每图后以小篆相对成的“九歌”诗词；其二为黑龙江省博物馆藏元人《九歌图》，全卷分为九段，每图前有隶书“九歌”诗词，卷前有明景昉篆书“离骚九歌图”引首，卷后有无款的书录元虞集、赵衷二题；其三为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元人《九歌图》，每图后小篆书“九歌”诗词；卷后有清中期伊念曾、费丹旭等人题；其四为浙江省博物馆藏元人《九歌图》，册装，纸本，水墨画，册九开，尤书，无款，册后有元赵衷书虞集“题九歌图”诗，以及赵衷的和诗。

上述四本《九歌图》有九段或十段图，人物内容颇有出入，其中最贴近“九歌”



肖燕翼研究馆员

诗词原意、旨趣的是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所见《九歌图》通常依“九歌”之数，分绘“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用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十图，“礼魂”一诗，太多不予表现。较为详尽地介绍、鉴考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九歌图》，是因为其他三本皆是此本的衍生作品，即各不相同的仿画本。例如，所画为十段图绘的“南本”，没有“礼魂”一章的描绘，但“波本”中本为“冠服立云中，意态庄暇”的“礼魂”人物，在“南本”中却成了“湘君”。

后人对画作仿造，也存在一些“有意为之”的拙目陷阱。在《春山图》中，画幅中下部画有许多巨石，并在巨石之上置画树木。在该图用墨笔勾勒出巨石形态外，又有淡墨晕染和一些小斧劈皴画法，不同于郭熙惯用的卷云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巨石的中间部位，有一组巨石上墨画

两棵高松和杂树，几乎处于全画的正中位置，十分醒目。如果熟悉李、郭画派，便可知，于峦石上画两三棵高松或杂树，几乎是一种典型的图式。《春山图》中的这一图式，当然也应是李、郭画派的元素，但具体画法要远远晚于宋代或是金代。

在《江山秋色图》中，画有三株树的枝干被草绿设色掩盖。这些草绿设色树不应是山坡上的设色，树长在山坡之上，是不能被绿色所掩盖的。而在竹林之间，置画一建筑，树竿绿竹本应长在建筑之外，但竹中的中部又表现为篱墙之内延伸向上。这些不合画理之处，不仅无法用透视法分析，更是常识性错误。

《饮马图》仅画一人一马，主体部分表现挣脱欲饮的一马，以白描画法加以水墨渲染而成。但是仔细观察，画法上有失偏颇。肖燕翼教授明确指出，在马胸前的肌肉，因突出其硕大，使得马颈缩短，成了“短脖马”；而在马尾部分，马尾应是脊椎尾骨的延伸，但画中马尾似乎与马臀分开，看不到尾骨相连的内在关系。画马名家任仁发的《二马图》中，肥马与此图相像。对比之下，该图的马有很多败笔，因此并非赵孟頫的亲笔。

古人作画多喜爱盖印，但《后赤壁赋图》中却缺少乾隆鉴藏玺。根据《石渠宝笈》一书《凡例》可知，凡收录该书的画作品分为上等、次等。上等作品铃加“六玺”，次等作品铃加“三玺”，以示有别。那么《后赤壁赋图》没有上等书画应铃的乾隆六玺，是否漏铃了呢？但根据相关文献可知，应是不可能的。六玺的铃加分两次进行，即先铃二玺，被评为上等书画后，又加铃四玺。

因此，不可能在两个步骤中均被漏铃。《后赤壁赋图》卷上没有乾隆印玺的讨论，已经排除了其为《石渠宝笈》著录本的可能，因此，此卷应非《石渠宝笈》一书著录的原图。

肖燕翼教授表示，书画鉴定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目前尚对此存在一些误解。艺术具有模糊性的特点，但这并不表示它是一门不准确的科学。对于当下书画鉴定研究者来说，如何认识以及怎样认识都是一门学问。肖燕翼教授根据近年来的研究实践，认为对于古代书画的鉴定至少在两

个方面依然需要重新审视。其一是迄今被认为是在中国书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名家名作，却并非是无懈可击的书画珍品；其二是一些书画家的作品的仿、代情况，迄今尚未被揭示，甚至被当作被仿书画家的典型作品。对此类揭示的鉴定研究，老一辈鉴定家均有专题讨论，体现着当代鉴定研究的重要成果和水平。同时，也昭示着后来者，类似专题研究远未完结，书画鉴定学科任重道远。

（撰稿：张若瑾）

160

高彦颐 | 从景德镇工匠传说看工艺技术传承与创新



2019年12月12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六十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从景德镇工匠传说看工艺技术传承与创新”。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历史系教高彦颐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主持。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香港大学李约瑟—毛文奇基金教授梁其姿出席并参与讨论。

讲座伊始，秦大树教授简要介绍北大在景德镇陶瓷研究上取得的进展，并指出，

现有的研究多遵循传统考古学进路。在他看来，高彦颐教授另辟蹊径，经由工匠传说思考工艺技术传承与创新，从口传历史探讨工艺技术，提供了新的视野与方法，进而促成了对于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的新认识。

高彦颐教授在其研究中，着重探讨明清社会的物质文化，关心工艺技术，进而关注制作万物的能工巧匠，并在视角上力图跳出作为历史学者的学人眼光，关注观察并试图理解手艺人自身的主观经验、

感情生活、身体感觉与社会心性。她敏锐捕捉到景德镇工匠口头传说的丰富性，侧重其中涉及的工艺技术传承与创新的方面，并配合着传世的器物，用以接近工匠的身、手、眼。在此基础上，高彦颐教授进一步放大视野，以环境生态艺术史（Eco-art history）的眼光，从博物馆学、鉴赏学对于个别精品的凝视，转向审视造物、用物的人，关注匠人与物料、物心、器物的互动关系，进而探讨“物”背后的“人”以及环境与知识文化等议题。在她看来，从景德镇的工匠传说中可以得见驱使技术革新的源动力：瓷土高岭土与釉火、工匠的血泪与欲望、手工艺的混合、刻薄的窑户老板乃至贪得无厌的官府——这些元素共同造就景德镇陶瓷业的风貌与核心地位。

景德镇“水土宜陶”，技艺不断创新，宋代的青白瓷、明代的青花以及清代的颜色釉，均是景德镇陶瓷的品牌与名片。谈及景德镇陶瓷业的规模，高彦颐教授指出，景德镇人口密集，陶瓷生产技术分工细密，每年出产大量瓷器，生产技术与管理技术长期定型发展。高彦颐教授从生产维度入手，关注造物物料与技术，认为无论是个体的具身性知识，抑或工序间专门管理的技术性团体，他们所怀有的工艺技术均值得深入探究。而景德镇所呈现的产业革命之前的手工业面貌，亦与一般认知的“工匠精神”、“精益求精”等有所区别。景德镇的工匠传说，对于专业分工与复杂的社会矛盾有深刻描写，而高彦颐教授从传说中，洞见景德镇在手工业时代所出产的产业量贩，认为这是无数无名匠人的血、汗、泪所换来的。

关注到手工艺的环境生态，高彦颐教授着重探讨物料、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在关注民间资料的过程中，她注意到当地流传至今的口头传说多歌颂人性善良、工匠勤奋向上与追求技艺的苦心；未婚女孩的爱心与牺牲推动技术革新，促成大量的技术发明；而不少传说故事也传达出一无所有的光棍一心发财、娶老婆的原始欲望。在她看来，这些传说具有很强的在地知识的特征，每个作坊都有一套世代相传的传说体系，而制瓷的原料、过程与技术要求，以及制作机制衍生出的社会矛盾，在传说中都有体现。她注意到景德镇制瓷“二元配方”的创新，即将瓷石白墩子掺进高岭土，可使得瓷胎更加轻薄。民间“双学艺”的传说中，也蕴含着新技术的产生过程，而绝技需通过具体的“人”得以延续。具体分析制瓷过程中的传说，在制瓷原料层面，瓷石白墩子由以村落为单位的技术群体专门采集，用人手切开并进行水碓，而当地瓷石资源的丰富可用黄龙白龙的传说来解释。而另一原料高岭土，亦有“白玉珠”变“白玉土”，即白花的瓷土转化为白花的银子的故事。高彦颐教授认为，从上述传说中，可见神仙、龙、凡人以及好心、善良、无私奉献均为景德镇工匠团体的宝贵资源。而谈及釉料与窑火科技，传说中童女的无私奉献可被视为技术创新的主动力量：血红色的釉彩，科学上讲是铜氧化还原的作用，在传说中则被演绎为看火师傅的女儿、童女的血滴在地上所形成的“美人祭”，而青花瓷、青花料，亦与童女殉青花关联密切。人与石、物料紧密联系，而少女们的善良、无私、牺牲，与官府的

刻薄、窑户老板的压迫形成鲜明对比。

高彦颐教授随后分析了国家权力与技术创新，着眼工匠、窑户老板与官府几大群体间的关系。口头传说反映出工匠与窑户老板之间多为反抗、罢工等对立性关系；官府对产品提出苛刻严格的技术要求，以“处死”下令压迫工匠；工匠则奉命自我牺牲，以自身的血汗，来烧制一尊尊精美绝伦的瓷器。高彦颐教授特别注意到烧制过程中的温度、接触与感知。烧窑时白热的窑火惊天动地，窑火里器物亦幻亦真，而看火师傅间接用手去摸，用陶片作为探测器得以感知。而在景德镇风火先师童宾开窑看火、以牺牲自己的肉体烧制龙缸的传说中，她亦强调对于烧制工匠的身体的关注。

景德镇的陶瓷工匠并非依靠文字来掌握釉色、看火等高端技术与相关的知识文化。在高彦颐教授看来，口头传承对于当地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技术与工匠知

识通过口头形式代际传承，形成一套不同于主流的知识体系。她认为，口头传说是工匠群体赖以传承高端技术的法宝，需要继续归纳整理。而在研究思路，高彦颐教授表示，在考据性历史研究的基础上，亦应回归到经验摸索与试验，探索民窑与官窑之间的技术交流，以及身体感知的技术交流等议题。

“只见树木，不见林”，在环境生态视角的引领下，高彦颐教授进一步关注瓷器生产过程中必需的柴、砖等消耗类物料。以柴为例，景德镇陶瓷业生产会使用特定树种的柴，勾连起特定的砍柴技术群体，而柴的使用也会影响、改变景德镇生态面貌。由此，高彦颐教授提出新的观察视角，认为需关注生产过程中被消耗的物质、“媒材”（dissolving agents and agencies），如看火师傅细腻的技巧、壮烈的牺牲与前述的烧制青花时的血，“让他们在记忆中多活一段时间”。



高彦颐教授（左）在讲座现场

在讨论环节，高彦颐教授提出三个可供讨论的角度：一为问题意识，即手工业中的“环境生态”；二为证据，即口头传说与瓷器（传世实物）的关系；三为论证方式，探索用讲述故事代替推理的陈述式叙事的呈现力度。互动环节，三位老师同在场听众深入讨论景德镇陶瓷生产过程中的“物”与“人”、文献记载与口头传说等的关系。

秦大树教授回应梁其姿教授提及的“树”的故事。他认为，不同于北方窑厂依煤、柴资源而定期转场的模式，景德镇采取高度发达的专业化生产，集中用柴，取土、备料、供柴等物料均从较远的地方转运而来，因此，在景德镇当地很难找到

关于砍柴与树的传说故事。而在文献记载与口头传说的关系上，秦大树教授表示，二者分属不同的传承机制，彼此并未交叉，而常被忽视的口头传承同样具有强大的魅力，因此在讨论景德镇时，应将文献、实物、传说等结合起来看。高彦颐教授对此进一步补充，她主张应将技术与身体知识、感观兼顾来看，在抽象的理论知识外，接近并感受作为工艺载体的工匠身体。她认为，景德镇的工艺知识依靠身体传承，因此需要依靠身边的、具象的事物进行还原与感知，而纯粹的科学家眼光则很难捕捉。

（撰稿：章涵青）

161

薛凤 | 灾害与数字人文

2019年12月17日晚，“科学·文明”系列讲座、“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六十一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灾害与数字人文”。德国柏林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所长、柏林工业大学科学技术史教授薛凤（Dagmar Schäfer）主讲，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创系主任韩启德主持。

薛凤教授对中国地方志研究兴趣浓厚，认为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保留有大量的地方志材料，内容丰富且可靠，一直受到传统中国学者的重视。但也有学者对地方志的内容存有疑虑，认为记载的内容有所偏颇。上述两种不同的观点吸引着薛凤教授对地方志进行深入研究。1924年，梁启超提出“方志学”的概念，从而确立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学研究领域。这一概念承袭

于顾炎武的做法，把属于行政管理类别的地方文献与地方志用于历史学分析。虽然梁启超创造了“方志学”这一概念，但最先采用地方志作为科学研究的资料来源并由此发展出关于气温差异与气候变迁理论的学者，则是竺可桢、蒙文通和丁文江。20世纪90年代以来，气候变化在历史学分析中逐渐被重视，研究主要集中于冷暖、干湿、灾害三个方面。中国文字记载的悠久历史，使得对历史气候记载的分析成为可能，从而在政治事件与气候变动的讨论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薛凤教授重点考察地方志在中国灾害史、气象史话语建构中的角色，继而探讨其灾害数据的来源和产生过程，以及由此引发的历史接受（historical reception）过程。在西汉以降“天人感应”的框架下，自然现象被当作“天意”的反映，与天子施政之得失相联系，因此，记录灾害成为中国历代官修史书和地方志的重要内容。在帝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中，对异常天气事件的解释和防治所起到的效果，明确地关系到统治的权威和合法性。关于这点，可以从乾隆1673年《东明县志》中的灾害记录窥见一斑。

随着历史学研究中数字方法的兴起，地方志愈发被重视，从而为证实天气变化和其他方面的问题提供了“更多的”数据。学者们相信通过收集这些“数据”，可以获得“更好的”对中国政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总体概观”。对“总体中的个案”的兴趣和注意力在于数据的收集与形成过程，通过研究它们之间的关联，以便看到这些数据相对于其“量化表现”之外的更

“质性”的特征。学者不是把地方志当作一种单纯的量化数据库，仅仅从中提取数据并简化成相同背景的数据点做量化分析，而是要把地方志当作一种“带有结构的数据库”（structural database）。当使用大数据时，学者应该清楚意识到：历史数据的每个数据点有其不同产生背景，数据间隐含的结构及关联很大程度定义了整套数据的质性意义，忽略这些关联及差异而进行量化分析，是盲目且危险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数字工具恰恰应该提供历史学者在大数据库中找到结构、关联及差异的方法，引导学者实现对文本的“深度阅读和分析”（deep reading and analysis）。

薛凤教授关注的灾害类型主要是桑蚕灾害，并以此为切入点去观察政治影响的终止。她对于东明（或者任何一个地方）不厌其烦报告灾害事件的起因和构成一场“气候灾难”的因素特别感兴趣，想结合基于地方志的大数据分析所获得的模式与关联，重新思考东明的灾难记录。但历史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此，薛凤教授对科学与历史领域在气候、灾害等方面的研究做了简要梳理。

19世纪后期开始，西方气候学家埃尔斯沃斯·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考古学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以及中国地理学家丁文江和气候学家竺可桢，有感于中国历史记载中天气情况的明显起伏，从而运用这些记载，探讨和推测气温变化、气候、移民、战争以及国家形成等诸多因素之间的关系。这些

研究者们也在方法上奠定了一种趋势：在研究中既采用科学分析也采用文本分析。

自从关于人类世争论兴起以来，经由伊懋可（Mark Elvin）的《大象的退却》这样标杆性质的研究，中国的环境研究和全球气候变化日益为人所知并获得国际关注。尽管如此，正如学者范家伟指出的那样，“科学数

据和方法”可能会使人印象深刻，但研究者们常常无法意识到历史的复杂性以及人类所起的巨大作用。学者弗朗茨·毛厄斯哈根（Franz Mauelshagen）也提醒道，在“文化气候变迁”方面，历史与科学界不应仅止于两种研究方法的对比，而更应该考虑不同时代背景下人们对气候认知的变化。

21世纪以来，学界历经多次对历史气候研究的兴趣风潮，许多科学家与历史学家都讨论过气候变迁对历史的影响，尤其是考察人类活动在其中的作用时，认为需要对历史文本的精读诠释与对科学数据量化分析互相结合。如卜正民（Timothy Brook）提出“九个灾年期”（Nine Sloughs）的论点那样，学界认为“科学数据”与“史学结论”的结合是可能的。

在薛凤教授看来，历史学与科学研究可以相互启发。科学负责“严谨”，史学贡献“细节”。一方面，历史学家（或者历史数据）在涉及到气候变迁的时间和地点方面，给了科学家很多启发。例如，地理科学家葛全胜重视悠久的文字资料传统



薛凤教授

以及人对其效应的评判。另一方面，科学也带给历史学家启发，尽管这类启发是在不同层面上。例如，历史学家卜正民在他的研究中呼吁历史学家更多地关注科学上的气候研究。

接下来，薛凤教授重点论述了地方志中的“注意力生态”（ecology of attention）。微观而言，中国史研究者喜欢地方志，因为可以从中获得关于一个地方历史状况的快照。从宏观来看，地方志涵盖的历史年份长、地域广大，把全部的地方志集合起来，就形成一个可提取各个区域乃至全中国范围的历史数据的良好来源。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分析这类数据，可以帮助历史学家了解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同类型的信息在中国的不同地方、不同朝代是如何被提及的。

历史学家狄宇宙（Nicola Di Cosmo）提醒人们注意，大数据的研究路径使历史丧失了复杂性。而薛凤教授认为，可以突破原有大数据的研究局限，采用数字人文方法（digital humanities）——不

仅仅将地方志当作一个大数据来源的语料库，而是进一步追问地方志中记录生产的认识实践。为了完成这一研究取向的转换，研究者从整体的视角来分析这些彼此关联的数据，同时结合远读与近读，从而确定地方志中有关灾害记录的标准化框架。

马克斯普郎克科学史研究所发展了一套专为数字方志打造的历史研究工具——“LoGaRT”（Local Gazetteers Research Tools），核心思想是要把全部已数字化的方志当成一个大的数据库来看待，并问出涉及到全国层面的问题。这是在数字时代下，重新诠释梁启超“方志学”的一条最可行的路径。不同朝代、地区的方志都有着某些共同的结构特征，然而，这些关联关系在其他的方志库中被忽略了。LoGaRT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允许学者们运用方志共通的结构和关联性采集、分析信息。

薛凤教授结合LoGaRT方法对地方志的分析和《东明县志》的内容，重点讲述了宋元两朝桑蚕灾害的时空差异。首先是桑蚕灾害的时间方面。在宋代，关于桑蚕灾害记录的第一次文献记录出现在962年，最后一次则出现在1191年。在北宋的230年历史中，全国范围内蚕桑灾害报告共有16次，平均每14.5年发生一次。相比之下，进入元代后的第一个桑蚕灾害报告出现在1270年，最后一次在1363年。94年中，40次桑灾被记录下来，平均每2.4年发生一次。其次有关桑蚕灾害的地域方面。宋代桑灾主要发生在黄淮地区，这些不仅是主要的产丝地，还是政治上的过渡带。在404个关于桑灾的描述中，元代占据208个，

且只集中发生在北方——虽然南方也有蚕桑业分布，但并无蚕桑灾害的记载。

LoGaRT方法不仅使读者看到了桑灾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区域内分布的差异，还引导学者进一步思考产生上述差异的原因。薛凤教授认为，历朝历代的灾害报告的搜集动作往往基于不同的动机，这些动机也反映在灾害报告数量上。在元代，政府对养蚕业进行严格的控制，其动机在于促进蚕桑生产，而非被用作论证合法性抑或“天人感应”的武器。东明的个案体现了这一点。东明地方志中的蚕桑灾害，其最初的报告动机是为了展示，而不是解释。因此，该记录的生成过程应该是元代中央政府治理文本的一部分。宋代的情况与元代不同，灾害的发生往往与人君之治理相联系，灾害记录的数量过多往往意味着人君在政治上的“失德”。因此在宋代，桑灾很少被作为独立的灾害上报，而常被当作众多灾害中的一个罗列其中。此外，在元代，绝大部分的桑灾报告分布于北方。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政府差异化的区域政策所导致的，即在北方重点是复苏既有的蚕桑业，而在南方则是推广蚕桑业新据点。

薛凤教授认为，所有这些技术手段所展示的是，地方志记录对于获知历史上人们理解自然世界的实践及其动力具有指示意义，它们代表的不仅是自然生态问题，还是政治统治的注意力问题。数据分析表明，元代桑蚕灾害记载之所以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并非单纯由于气候格外恶劣，而是因为元代官员出于务实的理由必须报告。“气候灾害”在这里变成了一种“朝廷的”气候，此时“气候灾害”可以理解为由于“注

意力生态”的变化而产生的。

讲座最后，薛凤教授总结道，地方志的个案表明，这种注意力生态的分布变成了一种可见性本体，赋予其本体以认识论的维度，凸显社会和政治在灾害资料生成过程中的影响，对于重新认识历史上的“灾害”是十分重要的。地方志这类文献的研究为历史学科提出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个案用来理解地方知识在历史中是如何被建构的，并可以继续深入挖掘这一学术范畴：在这一范畴内尤其常见的是，全球性观点与一种非特定化的、普遍的“科学”并置起来。如科学一样，地方知识是一种社会和历史的构建，值得更多的研究。第二，对地方志的研究表明，理解认知体系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那些与客观对象绑定在一起的东西，还有文本、环境或者物件。

东明的灾害是一个个案，元代的灾害是一个总体，它们本身都是信息，而知识存在于两者相互作用之中。

讨论环节，问题主要集中在地方志的特性和数据方法的使用等方面。关于地方志的特性，薛凤教授补充道，地方志内容丰富，从中可以获取很多有用的信息，是古为今用的良好资料库。但学者确实应该注意到地方志的局限，要谨慎使用。关于数据使用的问题，薛凤教授回答道，更多时候我们用大数据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去发现问题，并在其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数据库的建立可以帮助学者对整体有清晰的认识，但文本的阅读和个案的研究依然是不可缺少的。

(撰稿：刘建)

162

梁其姿 | 日常食物的价值：酱油制造与中国历史

2019年12月19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六十二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日常食物的价值：酱油制造与中国历史”。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香港大学李约瑟-毛文奇基金教授梁其姿主讲，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主持。本次讲座也是文研院首次举

办的“物质文化史的方法和实践”工作坊最后一讲。

讲座伊始，梁其姿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从医疗文化史转向物质文化史研究的缘起。这一研究项目是梁其姿教授所主持的“日常生活与近代东亚的技术”研究计划一部分，在此之前，她已经结束了一项关

于清末到民初营养健康观念的研究，而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什么是好的营养”。这是一个既关乎食物、又关乎药物的问题，二者在中国人的知识系统中其实很难区分——很多药物也是食物。因此，梁其姿教授的关注点从药物就自然延伸到了食物。至于为何选择酱油作为研究个案，梁其姿教授表示，作为一个传统的日常食品，酱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其特殊性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酱油是历史悠久的传统食品，有关酱油制造技术的文字记录在宋元时期就有；第二，酱油制造是东亚地区最早实现工业化的传统行业之一，其生产又与农业（尤其是大豆种植）关系十分密切；第三，酱油的经济文化价值随着社会变迁而改变，其旺盛的社会生命力来自它极高的可塑性与可以体现的丰富意义。因此，梁教授将酱油视作一个结合技术、社会组织、经济政治与文化因素的技术体系（technological system），希望综合科技与社会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传统上以文献分析为主的史学方法、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等不同学科开展酱油的跨学科研究。

梁其姿讲授首先回顾了中国酱油的早期历史。“酱油”的出现不晚于南宋，直到明代都是都市富裕人家的食物，一般人其实不容易吃到。南宋的《吴氏中馈录》（十三世纪）和明代《留青日札》（十六世纪）中都记载了酱油的使用，但根据内容可以推测，酱油的消费和使用并不普遍。于是，梁教授进一步从物的角度提出“酱油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就基本原料而言，制作酱油需要大豆、大麦或者小麦粉、盐和



梁其姿教授

清水。传统酱油的制造过程其实并不复杂，将大豆蒸熟以后加入面粉，在封闭的温室内进行发酵，这一过程需要加特定的麴（在传统文献里叫“黄子”）。发酵过程中还需要加盐或盐水，之后在太阳下再晒半年到一年，最后过滤酱渣，抽取酱油。然而，实际操作过程中其实有很多非文本的知识，如“何时放麴”、“何时放盐”“晒多久”等等。这时，必须依靠匠人的嗅觉、味觉等各种经验来掌控，所以过程也很复杂。但如果用今天的化学术语来解释，可以说，发酵过程就是大豆中的蛋白质被分解为氨基酸，粮食中的碳水化合物被分解为糖，而盐起到了防腐作用。

将“酱油”这个黑箱打开之后，梁其姿教授进一步搜集了酱油制造技术有关的历史文献，尤其是制麴这一关键步骤。《齐民要术》（六世纪）中已经细致地描述了麴的制造过程，而对比《天工开物》（1637

年)中的记载,我们会发现,造糍技术长久以来没有重大变化。在此基础上,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酱油在13-16世纪还只是少数人可以享用的食物,商品化程度也不高,那么它在何时以及如何成为中国人的日常食物?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梁其姿教授分别选取了《中国基本古籍库》和《中国方志库》两个全文数据库作进一步研究。以“酱油”为关键词对古籍库进行全文检索,可以发现,从宋到清末共有245条有关资料。其中,67条在清以前的古籍中,187条在清代文献中。以“酱坊(园)”为关键词对方志库进行检索的话,可以找到233条有关资料。其中,28条出现在1796-1911年出版的方志中,205条在1911-1949年出版的方志中,而这205条资料中又有109条记录源自清代的酱坊。

由此可知,第一个检索结果反映了酱油消费增长的时期集中在清代,而第二个检索结果反映了酱油生产增长时期是从清末至民初。

梁其姿教授据此将酱油成为中国人日常食物的历史分成两个主要阶段:第一段为盛清时期(18世纪中期),其次是清末民初(19-20世纪之交)。第一个阶段主要和中国大豆市场的形成有关。日本学者加藤繁指出,清政府自乾隆十四年(1749年)以后逐步开放东北黄豆输入中国各地,而江南地区在道光年间成立了很多从事大豆贸易的“豆行”。这些举措给这一地区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同治以后,酱园也成为代表性的都市景观,在北京、上海、山东济宁等地都有。这说明,至19世纪下半期,酱油开始成为城市人的日常食品。



现场气氛热烈

伴随着东亚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传统酱油这个技术体系面对空前的挑战,逐渐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此时,日本酱油快速工业化,培养出了高稳定性的糍,既缩短了发酵时间,又降低了过程风险。借助化学发酵和机械化,日本酱油产量大幅度增加,价格低于中国酱油,开始入侵中国和全球市场,其中龟甲万酱油是最早实现全球化的东亚工业化食品。清末民初的中国酱油,除了要和日本乃至欧洲的酱油竞争,还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由于糍、生产环境等问题导致品质不稳定,时间成本也很高;另一方面,清政府为了偿还庚子赔款使得盐税大幅增加,制作酱油的经济成本也变得很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国家力量开始介入酱油制造。从清光绪新法设置实业学堂,到南京民国政府成立工业实业试验,举国力量推动酱油、纺织、造纸、皮革、制陶等传统工艺“科学化”。酱油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变成现代中国人的日常食物,同时也被赋予了科学、卫生、爱国主义等价值。

讲座最后,梁其姿教授带着人类学者眼光审视了后工业化社会对于传统酱油制造历史的想象。这一技术知识体系相对独立,主要在东亚文化圈传播,因此可以通过比较日本、韩国和中国各地的酱油作坊来考察不同人群看待传统的异同。比如,日本酱园强调以木桶晒酱油,而台湾就不太强调这一点。就原料而言,台湾的酱园会强调黑豆才是“传统”大豆品种,但其实他们的黑豆主要是从加拿大、美国、巴西等国进口的。日本业界通过酱油品尝师评鉴不同酱油,进而建构了辨别风土味的

新知识。在此基础上,梁教授指出,不同地方的从业者对传统的不同理解其实都是对未来的一种想象,酱油的社会生命力之所以旺盛也是因为它可以让制造者建构出不同的想象,进而体现酱油作为一种日常食物所承载的价值。

讨论阶段,在场学员与听众就如何确定“酱油”名称、如何发明传统、制作酱油过程、酱油市场分层与大众消费的关系等等向梁教授提问。讲座最后,刘华杰教授作总结。他指出,以往的科学史研究不大研究日常生活中的物质、技术和历史的关系,更多关注的是诸如原子弹、核武器等大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酱油这样的日常物品被忽视。但如果从胡塞尔对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区分出发,日常物品其实和我们的关系更大,而科学世界是导出的、不真实的。我们每天都要和食物打交道,不大会去关注导弹、航母、芯片,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更应该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物。人文社科学者从物质文化史的角度发出自己对于物的思考和声音,与科学家通过实验研究各种物同样值得鼓励,因为,物质世界最终和我们的精神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也呼吁在场师生能够从研究选题上向我们的生活世界更靠近,共同促进北大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在对过去的探索中丰富我们对未来世界的想象。

(撰稿:徐军)



163

荣新江 | 丝绸之路：一个跨文明的交流系统



2019年12月19日晚，“文明之间”系列讲座最后一讲、“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六十三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丝绸之路：一个跨文明的交流系统”。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玉麒主持。

本次讲座是文研院推出的为期一年的“文明之间：交融与再造”系列讲座完结篇。荣新江教授以四个影响深远的文明交往事件为例证，讲述了丝绸之路作为一个“跨文明的交流系统”的重要意义。讲座伊始，荣新江教授首先强调，丝绸之路是一条贯穿欧亚大陆文明的交通道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中国》一书中，首次把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这种说法显然是考虑到汉代张骞通西域的创举，也是中国人喜闻乐道的丝绸之路。这一称谓虽主要来自中文史料，但揭示了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特性——不同文明之间交往的通道。因此，作为一个交通道路的概念，丝绸之路不是国内的交通路线，而必须是两种或两种以上文明交往的道路；从某一文明的角度来说，通过某条道路与域外其他文明交流，那这些道路就是丝绸之路。具体而言，丝绸之路是贯穿欧亚大陆的一条文明交往之道。

欧亚大陆上的文明曾经是书写世界历史的主体。在张骞时代的前后，其上分布着欧洲希腊、罗马、西亚波斯、中亚贵霜、南亚印度、东亚中国等各种文明，其中，中国文明相对比较孤立与封闭。因而，张骞通西域被称作“凿空”。但西亚与希腊、罗马，罗马与印度，中亚与西亚、印度等文明之间的交往很早就已经发生，且有时非常频繁。因此，丝绸之路也早就存在于欧亚大陆，我们对它的理解不能仅停留在李希霍芬的定义上。即使是中国与域外的交往，事实上，也并不始于张骞通西域——妇好墓出土的玉器等考古资料可以将丝绸之路的开通时间追溯到远古时代。本次讲座，荣新江教授所要突出的，便是这一条作为文明交往之道的丝绸之路如何有力地促进欧亚大陆各个文明的交流与互动。接下来，他举出丝绸之路上的四个文明交往例证阐释这一点。

第一个文明交流的例证是以琐罗亚斯德教为纽带的伊朗文明交流。发源于西亚的琐罗亚斯德教产生于公元前6、7世纪，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之一，中国称之为“祆教”。荣新江教授指出，历史上琐罗亚斯德教有两次大规模的东传，其中第一次是借助了阿契门尼德王朝的强大影响。阿契门尼德王朝在大流士一世（Darius I, BC 522-486）在位时进入鼎盛时期，据《波斯波利斯铭文》记载，“自索格底亚那之

后的西徐亚部落直到埃塞俄比亚，自印度直到吕底亚”，即今天从西北印度到地中海的广阔地域皆为其领土。伊朗帝王谷的阿契门尼德王朝大帝墓室与波斯波利斯的百柱殿，都是帝国功绩的象征，尤其是最早的朝贡图，上面描绘有尖帽塞人、巴克特里亚人、犍陀罗人，说明帝国影响已抵帕米尔高原一线。

在此背景下，考古学家已经发现许多祆教东传的历史遗迹。如从吐鲁番西面的阿拉沟发掘到的高方座承兽铜盘（应为战国到两汉时期），用于祆教祭祀，其主体的蹲兽形象多见于欧亚草原，特别是塞人的领地。又如巩乃斯河流域、北疆、俄国皆有出土的祭祀方盘，也被认为与祆教拜火有关。如今蒙古语对最高神的称呼“霍尔穆兹达”实际也是琐罗亚斯德教系统的最高神阿胡拉·马兹达的遗存，由此可见琐罗亚斯德教的传播范围之大。此外，无论是塔里木盆地出土的佛教时代的于阗语文书，还是吐鲁番发现的摩尼教、基督教的中古伊朗语文书，尽管各自使用婆罗米字母、摩尼字母且内容与教义完全属于另一种宗教，但都借用了琐罗亚斯德教的基本词汇与概念。从而，伊朗学家都认为，在这些文献出现之前，有一个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时期。荣新江教授补充说，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唐朝人将于阗、焉耆等西域国家的宗教信仰描述为“俗事天神，兼信佛法”——他们原本可能正是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

祆教的第一轮东传进入了中国的南北疆地区，而借助粟特商人力量的第二波东传，则进入了塔里木盆地乃至河西走廊。

作为中古时期强大的商业团体，粟特人原本也是琐罗亚斯德教的教徒。敦煌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312年前后）可见清晰的祆教印记：首先，信札上的人名多遵循了“某位祆教守护神的赐福/仆人”的格式；其次，妇女向祆庙寻求救助的事例说明每个聚落都配备有相应的祆教神祠。另一个明确的证据是《沙州图经》，其中记载“城东一里有祆舍一所”，这一“祆舍”的位置恰好就在沙州粟特人所聚居的从化乡的所在地。除了敦煌吐鲁番文书，荣新江教授继续引用墓葬资料来论证粟特人的祆教背景。如安伽墓墓门上方的祆教圣火图案、史君墓发现的祆教祭司、虞弘墓石椁底座正面的祆教神祇等等，这些北朝末到隋的粟特墓葬背后都有祆教教义的支撑。一方面，我们可见祆教生命力之持久；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粟特人的祆教信仰中大量出现祆神，已经有别于原始的波斯拜火，这是受希腊文明、贵霜佛教文明影响的结果，也是丝路文明交往的产物。而龙门石窟造像记中提到“香行社”的粟特商人出资营造佛像一事，可见唐代以后他们逐渐皈依了佛教。琐罗亚斯德教在中西文明中的深远影响其实是伊朗精神文明传播的一个缩影，而大同近郊发现的萨珊波斯风格的金银器皿则是西亚物质文明传播的有力证据。

荣新江教授讲述的第二个文明交流例证是希腊罗马文明的东渐。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BC 336-323）东征，重挫大流士三世，直抵西北印度。这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大事件，标志着阿契门尼德王朝的结束和亚历山大帝国的开始，同时开启了伊

朗的“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逝世之后，通过征服所建立的庞大帝国迅速分裂，取而代之的是各个希腊化王朝。在此过程中，一座座希腊式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平地而出，成为希腊文明向外的传播口。随之而来的还有大批希腊工匠。荣新江教授认为，正是这些工匠“创作”了中亚的希腊文化。如阿富汗北部出土的鎏金银盘上绘制的酒神之胜利像、和田出土的蜡染布上的丰收女神、和田出土织物上的希腊人首马身怪物神像、斯坦因在米兰发掘的有翼天使等等——这些各式物品上的元素与印记都可以用希腊的文献与神话做透彻的解释。此后，罗马与印度、贵霜的交往也将大量的罗马文化带入中亚乃至中国，贝格拉姆出土的彩绘玻璃器上的罗马贵妇收获图像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另外，考古学家在中国甘肃发现罗马银盘，其底座上写有巴克特里亚语铭文，而巴克特里亚地区也出土了类似的写有巴列维文（中古伊朗语）的银盘。可见，它们当是出自中亚的希腊、罗马工匠之手，而非产自罗马。银盘上还刻有粟特文，显示在丝绸之路这一文明交流的系统里，一件物品传递着不同文明的景况。

此外，佛教文明的传播也是丝绸之路文明交往不可忽略的大事件。荣新江教授指出，现在的佛教史很大程度上出自后世佛教徒的构建，事实上，作为第一代大法王的阿育王只是把佛教推广到今坎大哈地区。此后，亚历山大东征留下的一系列希腊化小王朝承担了部分推广佛教的任务。在第二代大法王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时期，佛教大力传播，进入塔里木盆地，与

东汉势力在这一地区的退出相互呼应。公元148年，贵霜王朝属下的安息人安世高到达洛阳，为中原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僧伽佛教。东渐之外，佛教也借助贵霜王朝与罗马商人的力量，经海、陆两途向西传播。海路传播有索科特拉岛（Socotra）的考古资料可资佐证。该岛位于亚丁湾与印度洋的交接处，岛中霍克洞（Cave Hoq）洞穴深处的壁面上有近250处铭文和刻画图案，大部分铭文用印度的婆罗米文书写，其中还有佉卢文人名，读作upal[i]sa，释为“优婆离的（Of Upali, Skt. Upāli）”，而“优婆离”正是一个佛教概念。佛教在陆路上的传播则留下了佉卢文和梵文写本，但最著名的文明交流产物还是犍陀罗美术中的佛教雕像，它们是佛教的大乘思想和希腊人体塑造艺术的结合。塑造神像是希腊工匠的一大传统，在此影响下，犍陀罗佛教造像艺术蓬勃发展，前世佛、现世佛、未来佛都有着各自的形象，包括云冈、敦煌石窟中的佛教壁画也都可觅得希腊美术的踪迹。此外还有阿富汗出土的哈达佛像，虽然全盘采用了希腊式的艺术风格，但表达着与希腊神完全不同的意义与内涵。

荣新江教授讲述的最后一个例证是以基督教为纽带的文明交流。围绕基督教传播的文明互动虽然发生年代较晚，但同样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而与丝绸之路密切相关的是与西方教会分裂的聂斯脱利派的东传。聂斯脱利派是基督教派中的一支，被视为“异端”，曾被放逐到东方，即所谓“叙利亚东方宗教”，在中国被称为“景教”。它以萨珊波斯的首都泰西封为本部向东传教，沿途在中亚碎叶城的阿克贝希

姆留下了一座较大面积的景教寺庙与许多十字架墓碑。这座寺庙的平面图与吐鲁番高昌古城的景教寺庙、伦敦大学考古队在阿拉伯半岛发现的景教寺庙的平面图完全一致，可见其寺庙建筑方式应有明确的文本依据。此外，现吐鲁番火焰山的山顶发现有一座更大规模、保存更完整的基督教教堂，其中曾保存大量叙利亚文、中古波斯文、粟特文、回鹘文的文献资料，具有珍贵的考古价值。虽然其中没有汉文文献，但高昌出土的景教壁画中身着典型唐装的人物形象，也足以说明当时很可能有汉人景教徒的存在。荣新江教授另外提到，经过近年对叙利亚文、粟特文的基督教写本的研究，学者已经发现其宗教内涵、知识体系与西亚乃至希腊的教会都有一定的关联。因此，东传的基督教可能不止聂斯脱利派一个教派，称之为叙利亚东方教会更为合适。伯希和通过考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的人名，发现它们都是经过转写的波斯文，因此，他认为长安的景教教团应以波斯人和粟特人为主。洛阳一处经幢上记录的参与大秦寺法事的人员也以安姓、康姓、米姓的粟特人居多，从而可以推知，中原地区基督教徒的主体应当来自伊朗系的民族。

荣新江教授指出，以上这些文明交流都离不开道路，即所谓的丝绸之路。而道路需要人主动地开通，包括游牧人迁徙、商人冒险、宗教人士传教、战争行军与包



荣新江教授

抄等等。但对道路开通具有最大推动力量的是帝国的扩张。诸如阿契门尼德王朝的御道、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张骞西行，秦直道、汉驿道等道路与路政建设，都和帝国的扩张密切相关。道路扩张得越远，一个文明就会不仅仅与周边文明发生碰撞，还会与更远的其他文明相遇——冲突之后就会产生融合与互动，从而推动不同文明的进步。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道路也越走越远，越走越密，它们不再只是一条条孤立的直线，而是互相形成网络。凭借道路与路网，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得以长期延续；即使有敌对政权阻碍，也可以选择网络中的其他道路，维持跨文明交流的进行。比如，罗马帝国因与帕提亚和萨珊波斯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其同印度和中亚的交往便特别倚重印度洋的海上交通。南北朝时期，河西走廊处于北魏控制之下，而南朝与西域的交往并未中断，书道博物馆所藏的梁大同元年《金刚经》就是南朝人于芮芮所写；根据吐鲁番出土的《高昌国送使文书》所记的南朝使者路线，可知南

朝与西域、北亚的交往，就是通过四川、吐谷浑的河南道而完成的。安史之乱以后，由于陆上丝绸之路被吐蕃打断，贞元年间唐朝使臣杨良瑶便选择海路出使黑衣大食，中晚唐的阿拉伯商人都经海路东来。

最后，荣新江教授强调，文明进步的关键在于不同文明的交往，文明的交往则依凭道路的开通。道路的开通与文明的进

步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它们总是相互推动着前进。随着道路结成网络，文明交往也成为一个个系统。丝绸之路便是这样一个跨文明的交流系统，欧亚大陆的各个文明在其维系之下再也不能相互脱离。

(撰稿：徐铖)

164

朱诚如 | 光绪帝死因研究

2019年12月23日下午，“故宫与故宫学”系列讲座、“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六十四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光绪帝死因研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朱诚如教授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欧阳哲生主持。

讲座伊始，朱诚如教授首先回顾了“光绪之死”研究的缘起，并由此对国家清史工程进行简要说明。国家清史工程是本世纪国家最大的文化工程。该工程起源于2001年人民大学的学术会议，由季羨林先生领衔、13名专家联名向中央领导提交建议，获得批准后于2003年1月在中南海举行开题仪式。由此，纂修大型《清史》这一项新世纪标志性的重大文化工程正式启

动。清史编纂工程从全国及海内外高等院校、科研单位调集力量，上千名专家共同参与，至今已进行十七年，形成初稿一百零六卷。



朱诚如教授主讲

随后，朱诚如教授展示了清史目录，并对各部分定义进行了大致介绍。现编清史包括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和图录五部分，具体内容和呈现形式相对于以往都有较大拓展和丰富，近代技术的发展（如纪实性绘画和摄影术）更为修史提供了新的史料，有助于“以图证史”、“以图明史”。朱诚如教授同时提到，由于清史涉及许多重大的边疆问题和民族问题，学者内部亦有众多学术争议有待处理，“关照现实”和“尊重历史”的原则之间存在张力，修史和出版工作挑战众多、任重道远。

接下来，朱诚如教授开始对“光绪之死”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分析。他列举了相关人物的照片与画像等图像资料，介绍了爱新觉罗氏和叶赫那拉氏的家族背景，包括光绪帝载湫、醇亲王奕譞、隆裕皇后以及慈禧、慈安等人的基本情况与亲属关系。他指出，在一系列婚姻关系当中，光绪帝实际陷入了慈禧太后“亲情的包围”。无嗣的同治帝载淳死后，载湫被迎入宫中即位，由两宫皇太后慈禧和慈安垂帘听政。朱诚如教授介绍，垂帘听政之时，皇帝坐前御座，皇太后坐后御榻，前后以黄纱幔相隔。此外，朱诚如教授还展示了与光绪时期戊戌变法等相关的物品和建筑遗迹。

“光绪之死”是上世纪初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光绪帝系清朝第十一个皇帝，1875年至1908年在位。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0月21日、22日，被囚禁于瀛台的光绪帝和七十四岁的慈禧太后在二十小时内相继死亡，朝廷突然失去主政者，一时朝野震动、国人惶惑，中国的历史也因此受到影响。光绪的真实死因百年

来一直众说纷纭，新修清史也将此作为重要课题加以研究。朱诚如教授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清宫档案整理和发掘工作的有序进行，许多历史学家、档案学家和医学专家围绕光绪的脉案和药方进行分析，对其健康状况进行研究，最终得出与“谋杀说”相反的结论：光绪一生身体虚弱、久病不愈，三十四年后病情加重，去世应属正常死亡。为解开“光绪之死”迷案，除档案研究外，相关单位还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使用科学仪器对光绪帝的头发、遗骨以及衣服、墓内外环境样品等进行反复检验和缜密研究，据此形成研究报告。

结合各方论点，朱诚如教授将有关光绪死因的不同解释分为三种。第一种为朝廷正式文件说法：按照当时朝廷发布的遗诏，光绪帝载湫死于久病不治，慈禧太后则属年老体衰病死。第二种为私家记载的说法，多怀疑光绪死于中毒，即由于皇帝与太后长久不合，权力之争纷繁复杂，宫廷内外久有各种传言，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时任起居注官的恽毓鼎所著《崇陵传信录》、胡思敬《国朝备乘》、德龄《瀛台泣血记》以及溥仪《我的前半生》等。朱诚如教授还引用了2005年发表的私家记载，认为两条新资料虽然言之凿凿，但同样不是直接可信的史料，只能作为一种参考。第三种说法来源于对清宫医案进行的研究，倾向于认为光绪属于正常死亡，对此前非正常死亡的诸多怀疑作出否定。

随后，朱诚如教授结合图片对光绪遗体保存、移动、发掘、收集的过程进行了介绍。1908年11月14日，38岁

的光绪帝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去世，其遗体直到1913年11月才和隆裕皇后一同葬入崇陵地宫。1938年秋，崇陵地宫曾被一伙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盗掘，棺内随葬物品基本被盗一空。1980年6月，文物部门对崇陵地宫进行保护性清理，收集剩余的遗物和尸骨，并修复帝后的棺槨，其中一部分遗物后成为探究光绪死因时使用的重要检材。

据朱诚如教授介绍，对光绪帝的死因研究工作严格按照科学规程，包括初步检验、全面查证、毒物判定、得出结论四个步骤。相关单位采用“中子活化”的方法对光绪帝的头发进行了微量元素检测，发现其中砷的含量远高于正常水平。在扩大取样范围、进行全面查证之后，检测结果揭示了砷化合物在光绪帝尸体内及周边扩散的过程，并由此得出结论：清光绪帝确系砒霜中毒死亡。朱诚如教授指出，这是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解释社会科学中历史遗留问题的尝试。

最后，朱诚如教授从光绪之死这一历

史问题出发，分享了自己的学术见解。朱诚如教授简略回顾了清朝268年间从入关、兴盛到衰亡的历史走向，援引历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的论述指出，清朝前期是中国国家统一、巩固和发展时期，也是民族大融合时期；清朝后期的衰落与历史规律有关，不能完全归咎于慈禧和光绪。朱诚如教授对比了孝庄和慈禧两位太后“内敛”、“外张”的不同策略，并表示目前仍没有慈禧谋杀光绪的关键证据。

欧阳哲生教授对讲座内容进行总结，肯定了朱诚如教授对待历史的谨慎态度。提问交流环节中，在回应“如何推断光绪之死真正凶手”这一问题时，朱诚如教授进一步分析了几位“嫌疑人”的动机和可能性。对于光绪和慈禧死后清朝失去政治重心这一结果，朱诚如教授结合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实际情况指出，二人的死亡确实给中国近代历史进程造成了一定影响。

（撰稿：陈洁樱）

165

江晓原 | 国际著名科学期刊封神背后的商业化操作

2020年1月9日晚，“科学·文明”系列讲座、“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六十五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国际著名科学期刊封神背后的商业化操作”。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江晓原主讲，北京大学医学人文



韩启德院士提问



江晓原教授主讲

学院教授张大庆主持，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出席并参与讨论。

从“影响因子游戏”起谈，江晓原教授指出，期刊的权威性与影响因子的关系十分密切，而SCI论文（引用）及期刊影响因子作为当今学界最权威的学术评估手段之一，其纯粹的商业价值与商业化性质常被忽略。在本次讲座中，江晓原教授力图解释两者背后的商业化运作机制与学术包装手法，认为影响因子游戏中存在大量可操弄的空间与利益的共谋。例如，加菲尔德（Dr. Eugene Garfield）创办的科学情报研究所（ISI）与国际著名科学期刊《自然》（Nature）之间就存在“心照不宣的共谋”，即通过影响因子公式的修改，使得诸如《自然》、《科学》（Science）等期刊的排名大幅提高。修改后沿用至今的影响因子公式，表现为一份期刊前两年发表的“源刊文本”在当年的总被引用数，除以该期刊前两年所发表的“引用项”数，

亦即该期刊当年的影响因子数值。而以国际著名科学期刊为例，实证研究发现，欧美学界普遍采用缩小分母（即引用项）和扩大分子（即源刊文本）的方式，使其影响因子数值得以上升。

把握影响因子的可操弄性这一事实后，江晓原教授进一步揭示出欧美学界提升SCI期刊影响因子的两种途径：其一为“两栖刊物”。“两栖刊物”包含学术文本与非学术文本，分别对应影响因子公式中的引用项与非引用项。而非学术文本，对于SCI论文引用与影响因子的提升具有显性与隐形这双重贡献。显性的贡献是直接的，隐性的贡献则指，学术论文如果有机会出现在知名度很高的大众传播平台上，它的SCI论文引用以及影响因子也会显著提升。江晓原教授在实证基础上对《自然》等杂志从大众科普杂志向“两栖”杂志转变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揭示出这些杂志利用“两栖化”快速提升影响因子、扩大

商业价值。第二种途径为“综述为王”。在江晓原教授看来，综述文章普遍具有相对引用优势，极端情形下，甚至有依靠单篇综述支撑整份期刊登顶的影响因子游戏。除此之外，学术文本还可选择高引作者与高引主题，并非想象中的“学术公器”。“学术公器”通常须有编委会与匿名审稿制度的支持，但《自然》等国际科学期刊则主张保持独立姿态并独立做出决策——不设立编委会，不附属任何学会与学术机构，不受制于任何单独个体持有的科学与国家偏见。而文章依据主编意向选择刊载发表。

在分析影响因子游戏与博弈的基础上，江晓原教授亦系统研究国际科学期刊出版中的“开放存取运动”，即学术论文免费阅读、在线发表、快速审稿、快速发表，并揭示开放存取期刊背后的商业利益驱动。现今，开放存取期刊正在不断增加，以致于诸如《自然》等著名国际科学期刊，在保持主刊传统“严肃”形象的同时，亦开办开放存取子刊盈利。江晓原教授揭示道，开放存取期刊对于学术生态的破坏性效应，常与“掠夺性期刊”、“不良期刊”挂钩，疯狂掠取中国的科研经费。面对中国作者向国外开放存取期刊贡献总费用的庞大规模，重视低端论文问题刻不容缓。同时，江晓原教授认为，中国期刊学术评价亦存在困境。中国引入影响因子制度有利弊两个面向。诚然，该制度为提供论文评价与管理提供了简单工具。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优秀学术资源严重外流，中国科研经费也大量流入国外无良刊物的囊中。对此，中国学界应该设法建立自己的评价标准。

交流讨论环节，韩启德院士、江晓原教授、张大庆教授与在场听众就开放存取与开源、中国期刊评价标准与本土期刊发展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江晓原教授补充认为，目前看来，形成取代SCI论文引用与影响因子的标准，仍任重而道远。与急于在外刊上发布论文相比，学者们更应铭记人民福祉，记得自己的初心。韩启德院士补充说明了“两栖期刊”与“综述”的积极影响。“两栖期刊”可使学术性文章更为公众所了解，综述亦可总结学术动向，《科学》《自然》等国际科学期刊树立起的优秀成果则有助于促进稿件质量的提升。就中国本土科学期刊发展这一话题，江晓原教授认为，中外对“学术期刊”观念存异。对此，张大庆教授则以《中华医学》杂志为例，呼唤关注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办“有态度的杂志”。

(撰稿：章涵青)



(二) 未名学者讲座

57

张慧瑜 | 基层传播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的新闻治理经验

2019年11月5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五十七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作题为“基层传播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的新闻治理经验”的演讲。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主持，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吴靖评议。

“作为文研院的名片之一，历次讲座的海报设计可谓‘独树一帜’，而这次海报中的版画也格外切题，涵盖了众多我想探讨的基本问题。”从海报谈起，主讲人张慧瑜开启了他近一年对基层传播及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研究成果分享。

这幅名为“学习”的木刻作品，由著名版画家徐匡于1960年创作，针对画面内容，张慧瑜初步提出了“谁在学习”、“在哪里学习”、“如何学习”及“为什么学习”的问题。前三个问题的答案可以透过作品直观获取：裁缝店或工厂里的数名女工、老人围绕着一位捧书诵读的女工，或听讲或沉思或讨论，作认真“学习”状。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学习的场所并非教室，而是女工们的劳作空间，可以说版画等艺



张慧瑜研究员

术作品使得工业生产场所变得可见——这也是20世纪中国文艺中的特殊经验：让工业、工厂、劳动者变得可见。在这个非教室空间中，没有专业老师，老师来自于现场工作的某位女工，教学方法采用女工领读的学习方式，这是从根据地到新中国在基层社会普遍使用的一种半工半读的知识启蒙形式，通过“读”书、“读”报，把抽象的文字有声化，使得看不懂的文字变成听得懂的声音。这在当时识字率比较低的情况下十分有效。至于在工作、生活之外为什么要学习的问题，张慧瑜联系“把

生产和学习结合起来”的说法作出解释：专业技能固然必要，培育有文化、会思考的主体亦是紧迫的时代要求。

从创作动机上，这幅“下基层”取材的版画作品无疑具备典型的示范意义，身为青年艺术家的徐匡扮演着新闻记者的职能，这一作品也拥有新闻宣传的价值；从艺术形式上看，“木刻”作为一种富于冲击力且便于制作和传播的视觉媒介，早在三十年代就为新兴木刻艺术的“导师”鲁迅所倡导，成为“物美价廉”的思想宣传武器。这部作品的标题“学习”，则是中共延续至今的社会文化经验，强调自我学习、社会教育的重要性。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当中，政治与文化是不变的主题，两者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辩证关系，张慧瑜认为可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其一，是“文化的政治化”。他指出，文化的工具化乃至文化为政治征用是二十世纪历史的常态，直至在八十年代之后文艺才变成纯艺术或者大众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文学、艺术是媒介，是政治动员和社会教育的手段，文艺参与到政治实践之中。但并非任何时代文艺都能参与政治，比如在当下文艺就很难参与政治讨论，因为政治形态也不需要文艺介入。其次，是“政治的文化化”，即政治理念需要借助文化、艺术来表达，让政治深入人心、变成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纵观上世纪的政治事件和政治革命，最后都要通过“文化革命”来实现和落实，从而改变每一个人的主体状态。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均以“文化”为名，不叫经济或社会革命。最后，二十世纪中

国政治的核心之一是“人民/群众/大众/普通人”的生成，也就是将非现代的群众社会化、主体化，使其成为理性的、现代的主体。不同于分析西方社会所采取的精英与大众的二元框架，中国的精英和大众都是二十世纪政治、革命的产物，是“新鲜事物”。尤其在战争和革命年代，对大众进行了广泛的社会教育和思想启蒙，就像版画《学习》中所呈现的那样，随时随地进行一种半正规的、自我组织化的教育。

回到讲座的主要内容，张慧瑜首先解析了“基层传播”的概念。在现有传播学的学科框架下，与基层传播比较接近的是西方传播理论中的“社区传播”。“社区”诞生于以城市文明为核心的社会文化形态，与现代“社会”、共同体、自治等概念相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了一种关于另类“社区”的想象，是一种高度自治的社会空间，用来反对自上而下的国家体制（如苏联）和高度市场垄断的企业制度（如跨国公司）。另类“社区”成为国家与资本权力之外的空间选择，与之相关的还有既非单纯追逐商业利益也不同于计划经济下的单位制的“社会企业”。社区传播的一大前提是强调自主性、社会性的社区自治，它的构造是扁平化的、去中心化的。其实，六十年代想象“互联网”就是一种理想的虚拟社区，是去等级化的、权力分散的网状结构。而“基层”的概念则有着浓厚的中国特色，在城市它指的是街道、社区、各种国有企事业单位，在乡村则是乡镇和村庄。同社区相比，基层更有组织性，也更加强调因时、因地制宜。基层传播并不拒斥与国家或政党的关联，相反，它本身正是基层组织、动员

与治理的方式，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社会革命的特征是深入基层。基层传播也与“底层研究”不同，后者关注的是公民社会、中产阶级社区之外的非法治的、非正规权力的、无政府状态下或者黑社会化的空间，底层是政治、经济、社会意义上的弱势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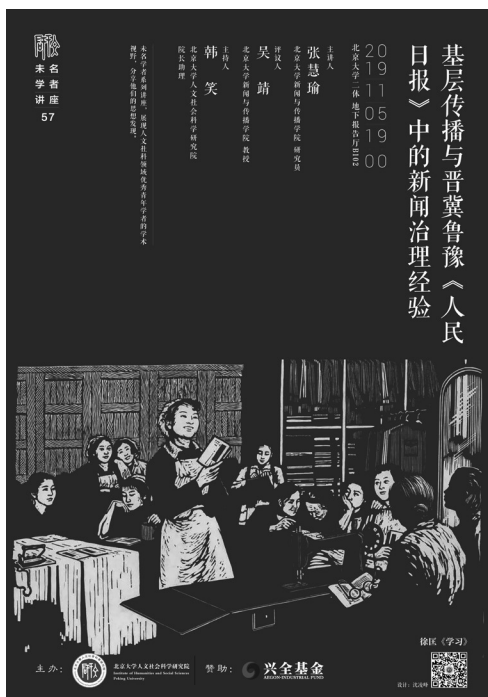
基层传播就是发生在基层空间中的交流与沟通，基层传播的过程，涵盖了三个基本要素。一是组织者，亦即基层工作者，他们可能来自政治组织，也可能来自商业化组织或社会志愿者；二是基层的主体——群众、普通人；三是基层的硬件，基础是基础设施建设，除了水电、道路外，还有上网、通讯等信息基础设施。此外，鉴于基层更有效的沟通方式是思想、精神交流，基层管理带有柔性治理的特征，如部队政委、“居委会大妈”等基层工作者常常在性格上带有“母性/女性”的特质。

中国最早开始出现“基层”的概念大约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也波及到中国乡村，带来农村的凋敝和农民的破产。由此，乡村、农村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社会关注的核心，基层也被用来描述各种政治、社会、文化整合和改造乡村的状况。相比控制大城市、东部地区的国民党力量，中共因1927年大革命失败被迫进入乡村及偏远地区，以在军阀势力薄弱的缝隙地带建立武装根据地的方式图生存、谋发展。特别是毛泽东的井冈山路线提出后，历经苏区失败、两万五千里长征以及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再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展，根据地、边区成为共产党进行政治、社会、游击战的基层空间。为了在敌占区、前线地带发展抗日根据地，

动员基层、组织基层成为共产党立足发展的根本。

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空间，根据地是一种特殊的空间地理学，是去空间化的空间和去主权化的空间。根据地有三种类型，一是处在后方的，像陕甘宁根据地；二是在前线地带，如晋察冀、晋冀鲁豫根据地；三是敌后，在敌占区建立根据地。根据地有这样几个显著特征：第一，行政区划不稳定，较之占领中心城市、铁路线的日军和国军，根据地的区域总是随着战争处于变动之中；第二，物质极端贫乏，在技术、资本双重匮乏情况下，必须通过组织基层社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和物，来实现持续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第三，根据地和根据地之间权力高度分散和地方化，和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不同。

现代“空间”，一定意义上可看作是一种主权的宣示，一种殖民主义的征服和占领，意味着确定的边界和界限。而在张慧瑜老师看来，根据地是一种去空间化的、反空间化的空间。游击战、人民战争不是占领固定的空间，而是面对强大的、现代化的军事战争，通过根据地实现敌人由强变弱、自己由弱变强的转化，也就是避敌锋芒、发挥自己的优势。所谓“地在人失，人地皆失。地失人在，人地皆得”，根据地空间具有流动性和灵活性。与此同时，根据地也是发展游击战的基础，只有军事上的游击战是无法取得胜利的，根据地的巩固需要深入基层、组织群众，依靠社会改革和文化动员。在这个过程中，以报纸为代表的基层传播媒介发挥着重要的职能。



《人民日报》的诞生地晋冀鲁豫根据地，属于华北地区，处于战争的前线地带，环境可谓一马平川，不像偏远山区容易发展根据地，所以发明了地道战等特殊的斗争形态。华北的优势是临近石家庄、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有大量知识分子、技术工人参与根据地建设，还有白求恩、林迈可等国际友人驻扎。华北根据地的特殊性要求军事斗争和政治、社会、文化建设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另外，华北的特殊性还在于，新中国的建立，主要是华北的政治、文化精英跟着党中央进了北京，包括《人民日报》在内都从地方性的报纸变成了党中央的机关报。“华北根据地的社会、政治、文化实践成为新中国的原型”，张慧瑜老师十分赞同关于华北特殊性的论断。

1946年5月15日，晋冀鲁豫机关报《人民日报》创刊，截至1948年6月14日停刊，共出版746期。此后和《晋察冀日报》合并，成为华北根据地的和党中央的机关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存在了约两年时间。借助由代办所、乡邮站、报站等组成的农村通讯网，《人民日报》深入村庄和连队，利用“读报小组”等方式“组织人民，特别是干部普遍阅读和学习人民日报”。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说道：“党报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作为地方性的党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包罗了中共在根据地的诸多基层传播实践。

第一点可概括为用基层传播手段构建基层社会的有机性。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呈现的大量内容来看，中共十分擅长就地取材，基层传播的手段多样灵活，黑板、幻灯、快板、音乐、戏剧、文学等等都是常见的传播形式。1947年4月29日的报道《前线部队的新创造——门板报》就较为详尽地对“门板报”这一新形式的制作、内容、成效进行了描述：一是“谁来写”，是“每个战士、干部”，也就是能写、会画的都要参加，群众性要强；二是“写什么”，门板报的主要内容是表扬，同时也有批评意见；三是“为谁写”，其读者和作者一样，也是连队内部的干部和士兵；四是“通过什么写”，即利用门板这种最方便得到的“平台”；五是讲究“时效性”，理论上要求每天都写；六是达到的“效果”，文中提到，“官表扬兵，兵表扬兵，兵表扬官的群众性的表扬方法，使部队换了一个样子”。

这篇报道是一篇典型的工作经验而不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和消息，它以一种特殊的“新闻”的样态将毅字部队的先进经验告知根据地的其他部队，以便相互学习、借鉴。类似服务于基层的门板报还有很多，如前沿阵地里的火线报等。

第二是改造旧形式，打造跨媒介融合平台。在根据地建设中，社会治理是关键，这就包括把现代的、启蒙的理念带入乡村，让群众接受现代观念。在1947年4月15日的报道《黎城东关骡马大会群众买了四百姓口》中，传统牲畜交易的“骡马大会”变成了具有多重社会职能的“现代展览会”。其中聚集了多种宣传手段——街壁上描画着四大家族的丑像、美军在华暴行的大漫画，墙上刷写着时事大标语，小花戏、广场剧、扭秧歌等文艺活动也融入了宣传内容。展览会本来是19世纪兴起于西方殖民主义文化的产物，被搬用至农村集市转化为卫生馆和生产馆，成为教育普通群众使其了解现代防疫知识和提高纺织技术的手段。可以说，骡马大会承担着政治动员、社会教育等职能。利用牲畜买卖的旧形式，把现代理念镶嵌到农村的日常生活中，把旧集市改造为跨媒介的、媒介融合的宣传平台。

第三，通过写稿，塑造群众主体性。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的很多稿件来自于群众通讯员，通讯员是一种实现党报群众性的重要制度。这种去职业化的新闻生产方式，不是市场化的线人提供新闻线索，而是生活在基层的群众通讯员承担着报道基层、反映基层的任务。如1946年5月17日的《〈新大众〉发行增至八千余份》

所记，“其最大特点是‘读者就是作者’、‘做什么写什么’。给杂志写稿的人有小学教员、区村干部、农村剧团团员、战斗员、勤务员、交通员、理发匠等。”“读者就是作者”、“做什么写什么”这是互联网时代的“用户生产内容”，如果换成党报传统，就是“群众办报”。与互联网平台借助用户的免费劳动力来生产内容不同，《人民日报》通过群众写稿来实现群众的主体性。不仅普通群众要写稿，而且行政干部也要写稿，比如报纸上塑造了一个典型“李文波营长”，既是一个战斗员，也是“模范通讯员”——这体现了一种“全党办报”的传统，就是人人都是宣传员，是一种“全宣传”。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有大量关于生产竞赛、节约运动、增产运动的报道以及群众运动、翻身运动等工作经验的报道，使得工作经验、地方经验和卫生、农业技术广泛传播，也表明这是一种不是“新闻”的新闻，是一种参与政治、社会和文化实践的新闻。

与资本主义的消费逻辑不同，社会主义文化强调生产和工作伦理，生产本身成为一种可见的空间，农村生产、工业生产是社会主义文化表现的重要对象。《如何组织起来解决劳力困难》《经过精确计算徐家后克服劳力困难》等报道就叙述了精确计算管理在互助组、合作化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这种生产性的文化，一方面与劳动者的主体相关，另一方面是因为生产本身带有一种对工业、现代的崇拜。这种服务于生产的传播，与美国传播学建立在现代化和发展主义基础上的发展传播学不同，是一种在地条件、技术创新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产物。比如大生产运动中，动

员妇女、孩子、老人参加纺织运动，就涉及到妇女解放、家庭与集体的关系等社会治理问题。

讲座最后，张慧瑜老师总结说，根据地新闻治理的三条关键经验是，“不是新闻的新闻”、“为了或服务于生产的传播”和“作为社会治理的传播”。在今天，通信基础设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乃至学习强国 APP 的推广，都可以被当作基层传播的新兴形态，可以看出二十世纪历史文化经验的线索。

讲座进入评议阶段。吴靖教授表示，“美国化”的主流传播学体系可以说是基于高度工业化、都市化的社会得以建立的。而在当下的中国，“传播”既是需要殷切关注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特殊的研究对象。相比于其他学科，对于格外西化、形式主义的传播学，我们有更多的中国化、本土化的经验积累。在此背景下，吴靖认为，

张慧瑜研究员对 20 世纪中国新闻治理经验的探索是值得鼓励和推进的。

吴靖进一步表示，解放区物质、科技匮乏，基础设施落后，各处都体现着前现代的社会状态，然而深入中共社会动员的机制、手段，方能感受其在战争动员、生产动员、移风易俗、知识普及过程中的先锋与前卫。诸如精确计算这样因地制宜创造出来的政治“技术”是以系统的科学知识、专业教育为前提的，这就和由上而下的、依靠传播科技的发展传播学、健康传播、科学传播等大为不同——这是一种从中国国情出发的现代化经验。追寻中共基层传播的传统，启示着对技术决定论、科技崇拜的破除。今天，我们的问题在于，有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但缺乏新的政治和社会想象。

(撰稿：周敏)

58

许亮 | 工厂、家庭和资本的边陲：中国企业在非洲的社会经济学考察

2019 年 11 月 11 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五十八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许亮作题为“工厂、

家庭和资本的边陲：中国企业在非洲的社会经济学考察”的演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亚光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潘华琼评议。

讲座伊始，许亮老师分享了自己在研究中遇到的两个插曲。首先是在研究初期接触到的当地关于中国人吃非洲人的传言。许老师解释到，这可能与八十年代后期，特别是九十年代初，出现的几次影响力很大的华人工厂负面事件有关。第二件事发生在研究逐步深入的时候。当他走访当地社区并与华人工厂的祖鲁女工深入访谈时，经常被女工们的请求介绍中国男朋友。在她们眼中，中国男人温柔顾家，是合适的丈夫和男主人选。这两个小插曲的内在矛盾是许亮老师在研究进行中一直思考的问题。

许老师接着总结了关于中非关系研究的三种类型。第一类将中国作为“帝国”。这种视角多见于西方政治家、外交官、媒体人以及不少西方学者。但是许老师认为，这种说法可能有一些偏见。因为作为“帝国”是需要满足一些条件的，比如早期的特许公司、实际的军事占领和领土管辖、大规模的官方移民以及强行的制度移植等。当前的中非关系都不具备这些特点。第二类将中国视为“发展模式”的国家。这种视角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社会经济发展成就，比如减贫经验、经济特区、农业发展模式等。林毅夫教授是这一类研究的代表性学者。这类学者认为，对非洲国家来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是最大的礼物。第三类研究视角是作为“资本”的中国。这也是许亮老师所采取的。他提到对自己研究影响很大的李静君教授所著《全球中国的幽灵：非洲的政治、劳工与外国投资》一书。这本书聚焦赞比亚，对中国国有资本与国际私营资本在操作模式等维度进行了全面比较。对中国的资本全球化进行了

解释。许亮老师把中国在非洲的资本分为三种。第一类是国有资本；第二类是草根冒险资本；第三类是中层面像的私人产业资本。

第一种资本为中非的顶层面向，即国家资本。这种资本多体现在大规模基础设施行业，比如蒙内铁路建设。

第二种资本是作为中层面向的私营产业资本，主要聚集在制造业。许亮老师在此提到了林毅夫教授的雁型发展模式理论，以及认为中国的产业升级将会释放 8500 万个制造业机会。大量的制造业有可能将向非洲转移，而这将成为当地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在此基础上，很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判断认为，非洲将会是下一个“世界工厂”。

第三种是作为底层面向的草根冒险资本。在许老师分享的照片中，有一张由《纽约客》杂志记者何伟在埃及南部拍摄的。穿着保守的当地妇女与商店的中国夫妻老板同时出现在卖情趣内衣的商店里。另有一张照片的主题是“一村一店”，即在许多南部非洲偏远村落，中国人经营的可能是村里唯一的商店。

许亮老师撰写博士论文时进行实地调研的地方是南非的新堡市，这也是本次讲座涉及的主要区域。该市拥有约 120 家中国服装工厂，这些工厂雇佣大量当地女工。其中，祖鲁女工近 2 万人，占当地总就业人口的三分之一。华人在新堡市的影响建立在两大政策背景之下。

首先是“班图斯坦”政策。南非在种族隔离制度下，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大规模强制搬迁黑人，希望他们搬离出去建立自己的国家，即“班图斯坦”。南非于

1971年通过《黑人家园法案》，给予黑人家园独立的权力。这些班图斯坦人从理论上不再是“白南非”的公民，“白南非”借此也把把贫困和发展的负担剥离出去。在该政策影响下，1960年到1983年间，350万南非黑人被强制搬迁，共建立10个“班图斯坦”。新堡是祖鲁人黑人家园于“白南非”交界的“边境”小城镇，位于“白南非”一侧。

第二个政策是“边境工业”政策。很多被强制定居的地区，由于农业发展困难，为了让黑人在经济上能够存活，种族隔离政府就开始大规模招商引资，在“白南非”和“班图斯坦”的边境地带设立劳动密集型工厂。工人们白天来到“白南非”工作，晚上回到自己的家园。华人工厂大规模进入南非源于70年代末，与这一政策密切相关。时任南非领导人博塔，鉴于当时南非在国际社会上被孤立，上台后积极寻求联盟。台湾地区是南非重要的盟友，也成为在南非投资设厂的重要经济伙伴。90年代中期，台北在比勒陀利亚办事处一项调查显示，1983年到1996年，台湾在南非投资开设的工厂数量从35增长到620家，主要集中在黑人家园地区和上述边境地区。在这个招商引资过程中，新堡市最为成功，吸引了48家台湾工厂。新堡市瞬间从一个边陲小镇变成了重要的制造业中心。

目前，在南非的华人家庭企业有三种，包括香港人/新加坡华人的出口型企业、台湾人的毛衣厂以及大陆人的CMT代工厂。许老师的关注重点在大陆人的CMT代工厂，并着重介绍了生产型夫妻和工厂母亲这两组人群。

生产型夫妻关系对于理解大陆人的代工厂及其重要。许老师研究认为，绝大部分华人代工厂都建立在特殊的两性伙伴关系上。“生产型夫妻”特指在中国国内有家室却因为生意伙伴关系在海外形成的长期稳定的伴侣关系。这种男女关系有其历史原因。早期投资的台湾工厂在去到南非时同时带去了从大陆雇佣的工厂管理人员。这类人员主要包括两类，一是修理机器的机修人员，通常是男性；二是“带线”，通常是女性。而同一个工厂的“机修”和“带线”，由于工作原因，很容易成为稳定的伙伴关系且结伴出去开设新厂。由此，工厂和家庭产生了互相建构和互相生产的双向过程。这种生产型夫妻在新堡是公开的“秘密”，比例极高，占到服装厂的六成以上。这是华人CMT代工厂主要模式，很重要一个特点是自我复制性强。

华人工厂中的另一个代表性人群就是祖鲁工厂母亲。许老师展示了两种女性形象。其一是1940年代典型的黑人母亲形象。她的丈夫、儿子在城市里的矿场工作，自己在农村的家里守候。这种形象在上世纪80年代发生了巨大变化——黑人女性的角色从原来的守望者，成为工业化进程中积极的参与者，即第二种形象。那时正好是华人工厂大举进入南非的时期，很多祖鲁女性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了华人工厂工作。

与中国的工厂女孩不同的是，南非华人工厂里的女性年龄从20多岁跨越到60多岁。很多人不是把工厂工作当作短暂的跳板，而是一辈子的职业依托。当地人称这些女工为“mama mabhodini”，意即“工厂母亲”。许老师做研究的时候，访谈了

100多位女工，并做了45个口述采访。而这45人中，只有6位已婚，绝大多数并没有成家。许老师谈及自己访谈过的典型的、以女性为联结的家庭结构：有一位母亲、一位女儿以及女儿的孩子，其中没有丈夫或者父亲的角色。这一现象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南非黑人家庭结构经历的巨大历史变迁有关，有学者称之为“黑人家庭的衰落”。现象背后的重要原因是，经济危机影响矿场和白人农场大规模机械化，大批男性失去就业机会，也失去了组建家庭的经济基础，成为社会的底层阶级，也成为不受欢迎的婚姻伴侣。很多黑人女性由此组成了以不同代际女性成员组成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中，其中一个女性在服装厂工作，领取工资；另一位女性在家里照看孩子。家庭内部女性成员的互助，成为祖鲁女工在工厂生存的基础，也完成了经济上的生产和社会的再生产进程。

总结阶段，许老师提出了自己的开放式结论。他提到，沃勒斯坦在2013年曾写过短文，认为近年来在全球出现的中国工厂预示着资本主义正在消耗世界上残留的“工业处女地”。而许老师指出，新堡市的研究表明，资本主义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也在重新塑造工厂、家庭和社区等一系列的生产和社会关系。新堡市不是边缘，而是资本主义新的延伸。新的工厂生产模式和家庭组织模式在重新定义什么是资本的边陲。许老师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许亮助理教授

边陲首先具有地理的属性，但是也意指许老师研究的群体在全球生产链上的属性。华人企业和祖鲁女工，他们都不是全球资本主义行业的规则制定者，而是在大资本不愿意进入的地方努力生存。祖鲁女工作为黑人和女性，可被视为全球劳工金字塔中最后进入的人。许老师解释了自己使用边陲一词的原因。许老师不认同中心和边缘不可逾越的二元结构——边陲恰恰是中心深刻变革的写照，在边陲观察到的现象体现了中心的巨大变革。边陲还有守护的意思。在没有撕破传统家庭和婚姻的最后面纱之前，努力保留传统家庭和婚姻的最后尊严。边陲的第二层含义是眺望。资本的边陲，也在眺望、联结，或预示着远方和未来。这里催生着新的资本、家庭和工厂的形态。在新堡市，撕裂的家庭也是最具资本主义意味的家庭，撕裂的家庭形态为工业化提供了资本家（企业主）和廉价劳工。

接下来，许亮老师强调中非交往的历史性意义。中非关系在资本主义历史中有

深刻意义。资本主义会持续扩张，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它去向何方——是那些在重要节点上的历史事件，决定了其扩张的方向。中非关系是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极具意义的事件。50年后，我们或许才会认识到其重要性可以比肩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国的改革开放、冷战的终结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从非洲角度看中非关系也是史无前例的，不仅体现在经济体量，还有资本的多面向性和复杂性。有史以来，非洲国家第一次同时接受来自同一个国家不同面向的资本。这将会带来非常深刻的变革。

谈及全球化与全球中国，许老师表示，中非关系不仅仅是中非或者亚非的叙事，实际上更是全球资本主义变迁的历史节点，是有关资本和文化这些要素相互建构的叙事。叙事不仅关乎中国实力的扩张，同时映照出所处时代的复杂性以及可能的危机。

最后，许老师谈及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照片。工厂女工在吃饭的时候跳舞。舞蹈主题是“婚礼游行”，有一位女性女扮男装，扮演夫妻。讽刺的是，演绎舞蹈的场所正是撕裂家庭的工业资本的场所，演绎的则是一段关于婚姻和家庭的舞蹈。

评议阶段，潘华琼副教授首先做了两点历史背景的补充。其一，南非的经济衰退以及由此导致的南非家庭破裂与1976年发生的索韦托惨案密切相关。惨案过后，整个世界对南非实施了非常严厉的制裁。在这种背景下，南非政府谋出路，开拓新的路径，因此才会出台新的地方政策。其二，1982年，南非白人统治阶层内部分裂为温和派和激进派，温和派成立了包括亚洲人

议员的国会。这种温和开放的政治变化使得诸如“向东看”等政策成为可能。正是这样的政策鼓舞了赴台招商引资和港台企业家去南非开工厂的机会。随后，潘华琼教授提问道，生产型夫妻和工厂母亲这两组人群及两个家庭间是否有融合发展和对话的可能？

许老师表示，华人与女工并不是没有互动。他进而将华人工厂主分为三种类型，交易型老板、文化和信仰的积极传播者以及法理型的导师。交易型老板开设工厂和零售店，通过工作或生产交易与工人进行互动。文化和信仰的积极传播者在最早期阶段是台湾工厂主，推崇佛教信仰，甚至定期携工人去台湾进行宗教之旅。也就是说，他们与工人有文化上的互动。第三种为法理型的导师。一些华人工厂由于利润微薄，难以负担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工资，因此指导工人创立自己的合作社。华人公司负责接单，而生产部门却是这些合作社。合作社的工资不受劳工法律要求，相当于公司做成了两个“壳”，让工人自己决定工资，并引领或者指导当地黑人自我创业，试图帮助当地黑人在具体的生产环节实现自主式发展和经济自立。

(撰稿：邹雨君)

59

樊星 | 发明巴西：混血身份的构建与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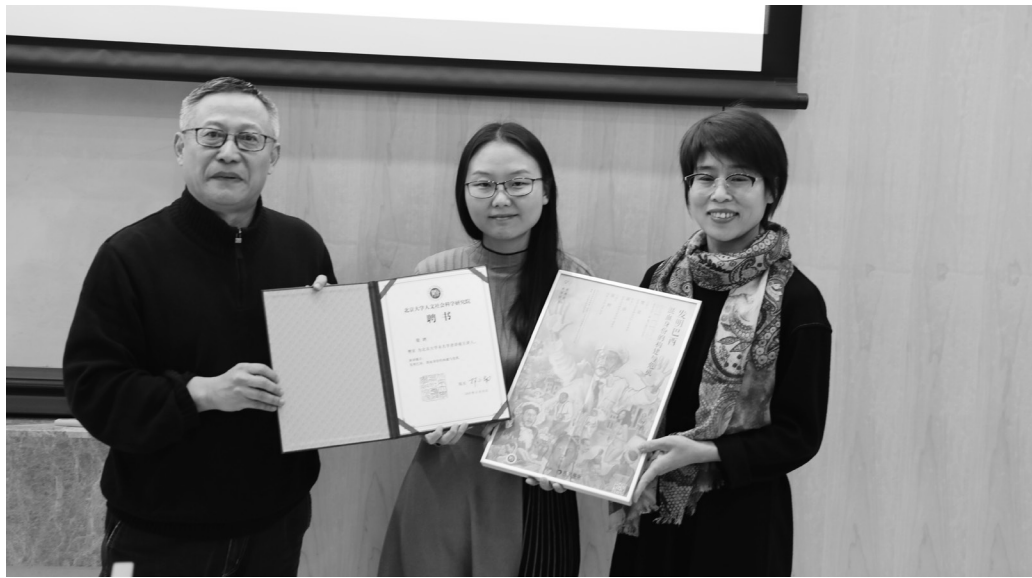
2019年11月19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五十九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樊星作题为“发明巴西：混血身份的构建与危机”的演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辉主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郭洁评议。

讲座伊始，樊星助理教授指出，混血身份是巴西研究的重要切入点。无论是最为“脸谱化”的巴西文化形象，还是深入了解巴西文化与社会，都难以避免地会触及巴西的混血特征。然而，近二十年间，巴西频发平权运动，其中印第安聚居地保护问题悬而未决，巴西黑人觉醒日立法姗姗来迟，同样晚近的高校种族配额政策也持续面临热议。种种事实表明，巴西种族冲突依然存在，“混血种族”图景仍不能免于质疑。

在探讨巴西当前种族问题之前，樊星助理教授首先回溯了巴西混血身份的构建过程。在世界范围内，巴西实行奴隶制的时间跨度都相当长，其间引入的黑人人口也特别多，欧洲移民与之相比反而较少。因此，巴西的种族构成与国家问题始终联系紧密，如何在多种族构成的现实条件下建立起统一的民族身份，长久以来都是巴西知识分子讨论的重要主题。

从1822年独立到20世纪初期，巴西部分知识分子将多种族构成视为国家建设的障碍，就此主要提出了三种不同主张。尼纳·胡德里格斯(Nina Rodrigues)恐怕是最为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者之一，在《人类种族与巴西刑法责任》(1894)中，他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采取分离政策或采取不同法令的主张。在巨著《腹地》(1902)中，尤克里德斯·库尼亚(Euclides da Cunha)则首先承认了巴西的混血特征，同时指出各个族群间仍有区别，其中腹地人将承载巴西未来的希望。希尔维奥·罗梅罗(Silvio Romero)等人则提出影响更为深远的“漂白”主张，该主张同样以混血特征为前提，但更加信任欧洲移民，提倡引入更多欧洲人以实现整体改良。

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将解决种族问题视为民族意识建设的前提，也有学者强调国家建设才对民族建设起决定性作用。阿尔贝托·托雷斯(Alberto Torres)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在《国家特质、意识与认知》(1912)中提出，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民由单一种族构成，这一点并未影响国家的组成。曼努埃尔·邦芬(Manuel Bomfim)或许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唯一能够站在平权立场上讨论种族问题的知识分子，他对巴西民族前景估计十分乐观，同时还认为种族问题对民族发展没有决定性影响。



文研院工作委员张辉（左）为樊星助理教授（中）颁发聘书

值得注意的是，至此仍未出现巴西得益于非洲文化的提法。直到20世纪三十年代，尤其是二战之后，随着欧洲种族主义和种族决定论的衰退，世界范围内发生广泛的思想转向，混血特征才开始被视为巴西的文化优势。吉尔贝托·弗雷雷（Gilberto Freyre）为这一时期贡献出代表性作品《华屋与棚户》（1933）。该书基于作者在美国进行人类学研究田野经验的启发，揭示出“黑人和混血儿的真正价值”。借助对巴西黑人的内部分类，吉尔贝托·弗雷雷讲述巴西家庭中黑人文化如何“浸染”白人孩童，从而打破了传统上对黑人的偏见，也肯定了黑人在巴西社会中做出积极贡献的可能。与此同时，整个巴西文化界都在建设这种文化图景，政治力量也积极地参与其中。因此，无论是在巴西当时的文学艺术创作还是大众传媒

中，推崇巴西混血身份者都不罕见。甚至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巴西的混血优势观念也得到空前强化。无论是生于葡萄牙的白人演员卡门·米兰达（Carmen Miranda）以扮演巴伊亚混血女郎形象闻名于北美，还是若热·亚马多（Jorge Amado）的《加布里埃拉》在美国大受欢迎，以上种种反映出认同巴西混血身份的世界潮流。

然而，巴西种族和谐的乌托邦在赚足赞誉的同时，也走向了自身的破灭。1952年，《反种族主义宣言》发表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拨款开展巴西社会实地调查，种族和谐的社会神话在现实观察中并未得到印证。此后，巴西知识界涌现出大量有关种族和谐神话的论述。弗洛雷斯坦·费尔南德斯（Florestan Fernandes）的《阶级社会中黑人的融入》（1965）可以视为

第一部系统地驳斥种族民主神话的著作，从阶级角度论述了巴西种族民主的不可能。当时巴西确实没有种族隔离政策，重视肤色而非血统、以“贫富”论“黑白”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在同样的事实基础上却生发出两条迥然不同的讨论逻辑。弗洛雷斯坦·费尔南德斯等人认为，不存在政策层面上的种族隔离，反而意味着黑人事实上被迫失去了身份，而对肤色的重视中包含着黑人、混血儿自我“漂白”的倾向，以“贫富”论“黑白”更是无法阻止有色人种“自我归罪”的倾向。若热·亚马多的《奇迹之篷》（1969）则代表着另一种理解，认为现实其实能够促进种族融合，巴西没有严格的种族划分，所有既存的种族问题都来源于阶级问题。由此，两种主张各自提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法——前者诉诸多元文化理想，后者则以建立混血文化为出路。

事实上，巴西的种族身份流动性很大，混血特征的表面之下潜藏着很多问题。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平权运动，正是对这些潜在问题的回应。1995年出版的达西·里贝罗（Darcy Ribeiro）著作《巴西人民》，2001年德班反种族主义世界会议上巴西的宣言，以及卡本热莱·穆南加（Kabengele Munanga）的《再议巴西种族混融》，都显示出了当下巴西种族问题的重要性。

最后，樊星助理教授借助三对概念，重申了本次讲座的基本观点。首先，并不存在生理意义上的种族，但社会意义上种族主义的存在不可否认。种族身份因此具有流动性，巴西黑人运动也不仅是黑人的运动，种族和阶级问题在其中

难以分离。另外，时至今日，巴西已经成为混血社会，混血的进程也无人能够阻止，问题仅仅在于是否需要建立同一的混血文化，或者说如何在混血社会中建立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

评议阶段，郭洁副教授结合西语美洲历史，肯定了巴西种族问题论争的特殊性，也指出了比较视野下种族问题的普遍性。墨西哥土著主义话语的兴起、西语美洲种族问题中政治话语的介入以及种族民主神话构建的现象，都显示出西语美洲与巴西在种族问题上的共性。樊星助理教授的回答肯定了采取比较视野的必要性，同时补充了构成巴西种族问题特殊性的其他历史原因。进入巴西的黑人移民远多于白人移民，且初期葡萄牙女性极少，使得无论是



家庭生活还是社会管理中，白人都无法完全占据重要位置，黑人和混血儿因此获得了一定的上升通道。巴西社会对学历的重视，更是保留了一些阶级流动性，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巴西平权运动的组织动机。最后，樊星助理教授表示，虽然巴西仍面临

着各种现实问题，但巴西历史始终是在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中发展的，混血乌托邦破灭之后再次提出的种族议题，相信也将帮助巴西建立更好的社会。

(撰稿：卢正琦)

60

孟琢 | 礼乐传统与先秦人性论：从《乐记》“人生而静”谈起

2019年11月26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六十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孟琢作题为“礼乐传统与先秦人性论——从《乐记》‘人生而静’谈起”的演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吴国武评议。

讲座伊始，孟琢副教授介绍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方法。他从《乐记》谈起，采用训诂的方法，从小学出发，进而从训诂通向义理。《礼记·乐记》中有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孟琢副教授指出，这句话涉及到对性的界定，对物和知的探讨，也涉及关键性的天理命题，有一

种义理的浓缩之感。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命题，在思想史上已经得到了丰富的探讨。但是，将其作为先秦思想进行研究，我们仍然需要对其进行一个基本的界定。

首先，孟琢副教授分析了学界现有的对《乐记》作者及其时代的讨论。总体上，学界较为广泛认可的有公孙尼子说、河间献王说和综合著作说。孟琢副教授认为，可以基本论定《乐记》与公孙尼子密不可分——即使并不完全是其原作。但沈约一说“《乐记》取自公孙尼子”，因此，这一年代界定成为后续讨论的基础。

接着，孟琢副教授探讨了“人生而静”与儒家心性论的关系。宋明以来，有关心性论的探讨受“人生而静”影响很大，成为关键性的思想渊源之一。周敦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思想家都对这句话进行过阐发

探讨。周敦颐曾指出“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黄干围绕人生而静，将其界定为天理和一种体现为个人生命中的礼仪。但是，“人生而静”在思想史上也存在一些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其指涉的是黄老之学而非儒家——这一争议则涉及思想的纯粹性问题。

在此基础上，孟琢副教授从四个方面对“人生而静”的现存研究进行初步归纳。宋明清三代的儒者对此皆有深入探讨，“人生而静”已经成为思想史上的核心命题，而在讨论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不同文本之间的内在关联。同时，“人生而静”需要与儒家经典中的“民受天地之中”“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进行贯通理解；另一方面，“人生而静”围绕着“性-理”“本体-境界”“先天-后天”等问题展开，其争议焦点则在于，这一表述是否属于正统的儒家思想，核心问题在于对“静”的不同理解。

围绕“什么是静”这一问题，孟琢副教授指出，“静”是先天的，和“礼”密不可分，在个体生命的意义上是浑然、完整、清静无污染的。另一方面，“静”也是不动，有时被阐释为“寂然”。正是对寂然一词的不同阐释带来了“人生而静”是不是儒学正统的辩论。

近现代学界对“人生而静”的关注点也有所不同。唐君毅等学者强调在具体生命中体现的天理，指出“人生而静”虽然没说人性是善的，但是显然不是恶的，是一种人性原始的静的状态。这一论说也成为宋代学者阐释性善论的重要依据。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人生而静”源自禅宗或庄子，这种用清静无为的本心来解释人性的方法并不与儒家相符。孟琢副教授梳理了此前相关讨论的关键之处，即“人生而静”到底是否属于儒家的思想范畴？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



讲座现场

先澄清，如何理解先秦文献中“静”的意涵。

孟琢副教授从《说文解字》入手，用训诂的方式考察“静”的词源与含义。《说文》用審字解释静，審又归部于采，因而首先需要考察采的含义。采指动物的足印。许慎认为，动物的足印和文字的规律相似，能够起到区别和辨析的作用。因而无论是審还是采，都具有“清晰分辨”的内涵，指一种清晰详辨的了解与认知，体现出事物之间的区分与秩序。因而，審的特点是清晰详辨的分别。

另一方面，从部首上看，静又和青有关联。在青字的释义中，许慎强调了五行之下颜色的有序生成机制。与之相关的词语“靓妆”也强调各种颜色要搭配得当，粉白黛黑，不同的颜色分布疏密有章，才是干净得体。相应的，人心审度得宜，做事得体有序也是静。因此，运动的人也能体现出静，只要在运动中达到一种协调的状态，静就涵盖了动。

孟琢副教授接下来探讨了静与动的关系：一方面，静止和运动是相对的关系；另一方面，静动之分也在于有序和混乱的状态之分。如果只是一个安静的状态，那么，静指向的只是个体层面，但实际上，静在总体上指向的是多元关系的协调有序。孟琢副教授从词源互证和先秦文献的文本中进一步说明，静的词义内涵指的是沉潜、低调、和谐；合理得宜，合适协调；同时与礼密不可分。

总体来看，“静”的词义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静不是虚无的，而是有内容的，建立在多元的关系之上；静和动、乱相对，是安定的而不是躁动的，是有序的而不是混乱的，因而运动状态也能体现出静；静和礼密不可分，礼是静的有序性的根源。孟琢副教授将静的特点归纳为关系的有序性和多元



孟琢副教授

存在之间的清晰秩序。

随后，孟琢副教授探讨了乐和静的关系，立足《乐记》的文本本身，通过几组概念之间的关系论证静的内涵。第一组概念是“声—音—乐”。孟琢副教授指出，“人生而静，感于外物之后而动，形于声”。声是自发的，声和事物相对应发生不同的变化，当它符合了某种规律得到制约后就变成了协调有节奏的音。在《说文解字》中同样也是这样，有礼节的规范才是音。许慎认为，音从言，言下有甘，其中含一，一则表示了道理和其中的节制。乐的特点则是天地之间根本性的协和，是协调之后的不乱动的状态。乐是对于随着情所产生的声的协调，乐能够协调的根源是其来自于人的生命的内在，即来自于性。

而在人的内在层面上，中出和外作是对应的，具有内在的性的依据，由此引出了第二组概念：乐—性—中。乐有内在的静所以才能展示为外在的和。孟琢副教授引用了欧阳衲人的说法，将《乐记》与孟子的人之四

端结合来看，德就是仁义礼智四端，在《乐记》中则被表述为性之端。把握了乐的道理，才能得礼乐之道。因而性之端就是礼乐，是有序协调的文明形态，是理解性的起点。礼乐是一种协调、规范、秩序，和人生而静的状态又是内在统一的。

其后，孟琢副教授聚焦“人生而静”与《中庸》中“已发未发”的关系。天地之中的性很容易动和丧失，因此就需要有礼仪来定命，百姓法效的是礼，这也奠定了先秦思想中“信—中—礼”的基本框架。在《中庸》中，与未发相对的是中、静，发则代表人感于物后情的发作，从而带来不同的声音，即喜怒哀乐之心。《说文解字》的训诂过程中，和来自于得失之中，是多元要素的调和。已发的东西则需要进入协调和规范之中，即“发而中节”。因此，静和未发而中是对应的，动则需要通过发而中节的方式，进行相应的协调和规范。

在这一基础上，孟琢副教授指出，“人生而静”是一种先天的、内在秩序性。静不是虚无，不是寂然无物，而是内在的有序体现出的安定。静更是一种内心的有序与协调，是喜怒哀乐原初未发时的协调秩序。在发之前，人性之中有喜怒哀乐的种子，它处在潜藏而协调的“中”的状态。孟琢副教授认为，这种人性论是礼的内在化。为什么只有人类能建立礼乐文明？这个问题的解答，指向了人的独得之处——内在的中和，也就是心灵本质的秩序性。

评议环节，吴国武教授对孟琢副教授的发言作了梳理和总结，指出其背后的思考角度值得学界深思。吴国武老师对发言中的几点印象深刻。首先，发言的问题明确，能够

以小见大地进行长远的研究思考。吴国武教授结合自己上课时有关宋代对礼乐的讨论，对“人生而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吴国武教授强调，宋代对于“人生而静”的讨论与先秦的论述和汉唐的著述有所区别，其背后的问题线索较为繁杂，孟琢延续了清人对人性论的讨论方法，由“静”延伸出的对同源的其他字进行训诂来讨论，这种方法是很有价值的。吴国武教授同时指出，孟琢引用的材料中较少涉及出土文献，还需要再进一步探讨；同时，对“静”的讨论和道家与《乐记》的关系也值得进一步探究。作为回应，孟琢副教授表示，相关出土文献在这一议题上上没有提供足够多关键性的证据，因而没有作为重点进行论述，将在后续的研究中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充。

提问环节，孟琢副教授与现场观众就礼乐文明、血气心知、礼法和礼乐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李猛教授也就静与礼乐的关系提出相关问题，孟琢副教授则从端的角度进行阐释。他表示，德是性之端，礼乐有德讲的是德的实现，将先天和后天区分开，也和孟子的思路形成一种关联。

（撰稿：刘诗予）



（三）北大文研论坛

100

司空竺、吉田豊、段晴等 | 胡语写本与文明传承



2019年11月5日至6日，由文研院、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一百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胡语写本与文明传承”。来自荷兰莱顿大学、日本京都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英国伦敦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北京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内外著名高校和研究所的数十位学者围绕开放语文学、粟特文碑刻文本、楼兰语假说、于阗语与希腊语关联性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讲座专场

本次论坛议程有三。第一场为“讲座专场”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王邦维教授主持，荷兰莱顿大学区域研究院教授司空竺（Jonathan Silk）、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语言学系所教授吉田豊主讲。首先，王邦维教授对该次论坛的主题和缘起进行了介绍，并对两位主讲人的论题进行了说明。

司空竺教授首先就“原文本缺席的校勘：佛经，犹太传统文本批评，以及数字化人文项目——‘开放语文学’”这一主

题展开了讲述。他指出当前留存下来的民间故事、犹太文学和佛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缺少一个原始文本（Ur-text），缺少最为原始的文献以使我们理解这类文本的最初性质。而对包括佛教经典在内的文本进行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理解文本，既要理解文本作者的意图，也应当理解不同读者对作者的意图的解释。在缺少原始文本的情况下，如何理解后建的不同版本就成为了研究者需要重视的问题。

司空竺教授认为，人们阅读任何东西时，都会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数量的编辑，例如当抄写一些被认为是错误的表达之时，编辑者自然会代之以自认为正确的表达。在这种必然存在的谬误之下，有必要建立一种文本之间的关系网。例如印度文本研究的资料来源包括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发现的梵文手稿，它们通常有多个中文译本，以及藏文译本，有时还有一些其他语言材料。每一个汉藏译本都面临着各自的文本历史问题，有些翻译可能是“词干污染”的结果，这使得追踪文本的谱系相当困难。

在此基础上司空竺教授提出了文本的“多观形式、宏观形式和微观形式”的划

分，将不同材料视为统一整体的一部分，以用于说明一个正在进行的文本创作的世界。以Kāśyapaparivart为例，司空竺教授展示了其中原始的词组、共同的公式、共同的叙述，以及不同文本之间的微观差异，用可视化的方法展示了文本的层次划分。Kāśyapaparivart存在梵文文本、两个藏文译本、五个完整的中文译本、一篇现存的藏文和中文评论以及大量的引文。其中有时不同版本之间的措辞并不完全相同，有些版本存在较大差异，有些材料则只出自一个来源。通过归纳能够构建出文本流动的关系网。

然而，由于宗教经典数量庞大，很难为每一份文本手工建立一种文本关系网，因此司空竺教授正在努力促成建立“开放语文学”电子项目，通过该项目可以对各种语言，不必面对自动翻译算法在确定英语句子与汉语句子的等价性时所面临的问题。为此需要校准藏文和中文的源代码，开发新的算法，考虑语言流动的细节并扩展语料库，最终使整个汉语和藏语佛教规范语料库保持一致。目前该项目的源代码在网上已经免费提供，并通过网站：openphilology.eu发布。该项目的目标是允许用户从不同的角度、使用不同的参数访问文本，用户可以检索文本的不同语言和时代的版本，而使用该系统的人并不需要软件方面的专门知识。

最后，司空竺教授指出，“开放语文学”项目始于这样一种信念：应该通过创造一个环境，在该环境中尽我们所能让所有人都可以访问和使用过去的文献。在这个环境中，文本的流动性以一种每个用户都可以控制的方式留存。



司空竺教授作主题演讲

第二场讲座，关于“九姓回鹘可汗碑粟特语铭文新解”是吉田豊教授多年来潜心研究的最新成果。吉田豊教授指出在东亚，特别是在中国文化强烈影响的地区，都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粟特语石刻或石碑——这是由于刻制石碑的传统在中国早已出现。而在这些粟特语铭文中，九姓回鹘可汗碑铭文在语言和承载的历史信息上都独树一帜，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吉田豊教授首先对九姓回鹘可汗碑进行了介绍。该碑刻铭文有三种语言，即古突厥语、粟特语和汉语。古突厥语的刻字已经严重损坏，只有一些小片段幸存下来，但其他两个文字版本至今留存。研究表明，这一碑文是9世纪时期为了纪念第八代畏兀儿可汗及其前人的军事成就，以及他们对摩尼教的接受和支持。该文献无疑可以作为畏兀儿草原帝国（Uighur Steppe Empire）历史和中国及中亚摩尼教研究的重要来源之一。九姓回鹘可汗碑发现于蒙

古共和国鄂尔浑河左岸，距离现代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以西约 380 公里，该地是 8 世纪下半叶到 9 世纪上半叶畏兀儿草原帝国首都的遗址。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欧洲和日本的几支探险队访问了遗址，发掘了大约 30 块刻有铭文的碎片。

吉田豊教授随后介绍了粟特铭文碎片所处的位置，以及粟特文本的语言和手迹。摩尼教和基督教的粟特语文献大多是在 10 世纪写成的，因此只有研究该铭文，才能清楚地了解 9 世纪初的粟特语和文字。该碑文中所见的粟特文是精心书写的草书，且有许多异于其他文本的写作特征。而从该铭文中能够看出其对 10 世纪后期畏兀儿语的显著影响。吉田豊教授分别展示了铭文中每一行的文字，并对其进行了解读，对其最新的解读能够解决过去存在的诸种争议，并更加符合上下文的意义和字母的痕迹。

吉田豊教授随后讲述了三种不同文本之间的关系。其中突厥语版本和粟特文本是相互依存的，而汉语版本则遵循自己悠

久的碑铭书写传统，独立于其他两个版本。这一事实很可能表明，在畏兀儿草原帝国的宫廷中，有粟特人和中原人两个文人群体。吉田豊教授着重强调了不同文本中“天可汗”（Tian Kehan、Tängri Qaghan）的记述及其不同含义，认为辨别出文中记述的“天可汗”究竟是畏兀儿草原帝国的第七可汗还是第八可汗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吉田豊教授根据文字表述和功绩记载更倾向于认为“天可汗”是指第七可汗。

最后，吉田豊教授综述了自己即将出版的“九姓回鹘可汗碑粟特语铭文”研究成果。该成果一方面对原有的文本研究进行了修订，另一方面在“天可汗”的身份问题、摩尼教传入畏兀儿草原帝国问题、阿拔斯帝国和畏兀儿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

楼兰论坛

5 日下午，议程进入论坛第二场，主题为“楼兰论坛”。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

究人员胡兴军作主题报告，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作主持。荷兰莱顿大学学者贝明（Michaël Peyrot）、尼尔斯·舒本（Niels Schouben），德国慕尼黑大学学者斯特凡·鲍姆斯（Stefan Baums）以及日本京都大学准教授荻原裕敏、庆昭蓉五位学者作专题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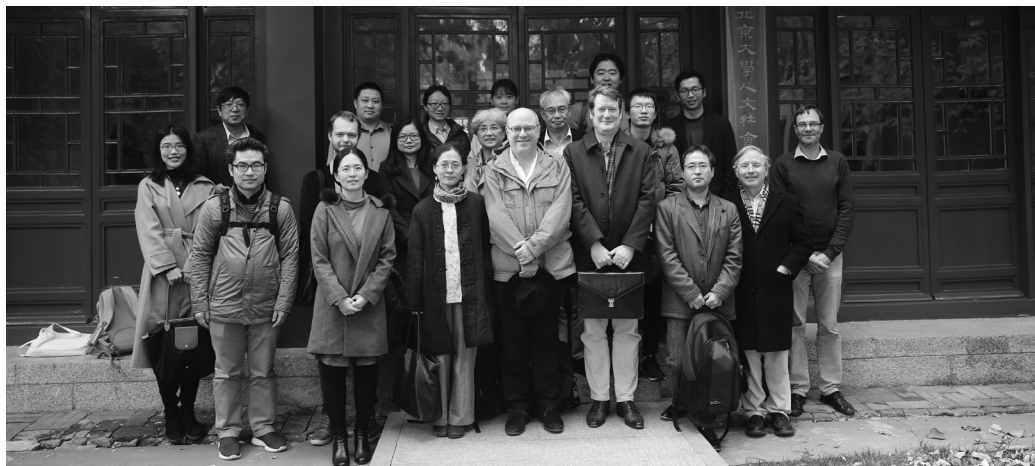
论坛伊始，胡兴军老师作了题为“孔雀河流域考古发现——楼兰母亲河的记忆”的报告。首先，他简要介绍了楼兰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以及考古调查的历史。楼兰一词始见于汉文文献《史记·匈奴列传》所载的，公元前 176 年匈奴冒顿单于给汉文帝刘恒的信。在中国古代历史及中亚文明史上，楼兰既是一个政治名词，即西域三十六国之中的楼兰国；也是一个地理概念，位于如今塔里木盆地东部的罗布泊洼地附近。地处温带大陆性气候区，楼兰干旱少雨，盛行东北季风，典型地貌为沙漠和根据风向形成的东北—西南走向的雅丹地貌。楼兰地区的考古发现开始于 19 世纪末期，一些外国探险家在此进行探险活动，其中较有名的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与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楼兰地区的考古工作开始于 1949 年，七十年来取得了许多重大考古发现，尤其是近年来，于 2008 年发现了小河西北古城，2017 年发现了咸水泉古城。同时，胡兴军老师领导的团队也在孔雀河烽燧群采集了大量文书，目前还在进行发掘工作。

接下来，胡兴军老师以孔雀河流域为中心，结合实地考古发掘经历，分别对小河墓地、咸水泉古城遗址、营盘墓地、孔雀河烽燧群遗址的发掘情况和考古遗存进行了详

细介绍。在介绍小河墓地概况和木棺形制时，胡兴军老师从地面上所立木柱和木棺形态，如男根立木和女根立木，向大家揭示了小河墓地所蕴含的浓郁的生殖崇拜观念。同时，小河墓地由于独特的气候环境，保存了大量的有机质文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在 2003 年发掘出的一具女性干尸，别名“小河公主”，目前正在北京大学塞克勒博物馆展览。通过对小河古墓沟遗址的墓地和随葬物品的分析，胡兴军老师也指出随葬品具有选择性，很多生活中的实用品如陶器和大型青铜工具等并不作为冥器随葬。

关于 2017 年新发现的咸水泉古城，胡兴军老师通过系统考察古城的地理位置、本体形制、构筑方式以及地表遗物、周围墓葬分布情况，推测咸水泉古城应为公元前 77 年前楼兰国都城楼兰城，而斯文·赫定所发现的楼兰古城（LA 古城），当是楼兰国更名为鄯善国后迁都所建的扞泥城。此外，胡兴军老师还为大家介绍了营盘墓地的形制情况，与 2016 年底在孔雀河烽燧群遗址发掘的大量唐朝时期的木简和纸质文书。这批木简和纸质文书内容丰富，对深入认识唐朝在西部地区的军政管理具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论坛随后进入专题讨论环节，来自莱顿大学的贝明先生首先围绕德国已故吐火罗语专家克劳斯·施密特（Klaus T. Schmidt）关于楼兰语的假说进行了发言。施密特通过研究在楼兰出土的部分佉卢语文本，提出了存在丙种吐火罗语即楼兰语的假说。对此，贝明等学者于今年的 9 月 15-16 日在莱顿大学组织了工作坊，以深入讨论施密特假说的合理性。通过对于施密特



与会学者合影

所采用的原始文本和翻译本进行的细致分析，学者们认为施密特假说中所讨论的文本和吐火罗语没有明显的关系，且施密特对几个关键词的读法存在着问题。之后的几位学者也基于他们在莱顿大学工作坊的研究讨论进行了发言，为大家带来了该领域内的前沿学术成果。来自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印欧语系专家斯特凡·鲍姆斯先生就双字体的 < 无罪赞 > 残片展示了自己的研究发现。而庆昭蓉女士以“所谓‘龟兹-佉卢文’的各种变体”为主题发言，针对施密特命名的 10 号文本和其对关键词的理解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她认为施密特讨论的这条题记实际是印度语，并且看起来与楼兰没有关系。来自日本京都大学的荻原裕敏先生围绕庆昭蓉女士讨论的内容，进一步为大家介绍了克孜尔第 211 窟吐火罗语 B 韵文题记。最后，来自荷兰莱顿大学的尼尔斯·舒本就“施密特的楼兰语假说：通向新阐释的工作进展”对莱顿大学工作坊的讨论结果进行了总结和展望。通过工作坊的讨论，学者们认为施密特的楼兰语假说是不令人信服的，他的解读还需要进一步的修订；但同时，施密特的假说也具有着纪念性，引导了通向新阐释的工作开展，学者们在未来还将就这一方向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于阗语论坛

6 日上午，“于阗语论坛”举行。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英国学术院院士辛威廉 (Sims-Williams)，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张湛，南方科技大学助理教授钱艾琳，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范晶晶，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向筱路，北京大

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袁勇作主题报告。论坛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段晴主持。

论坛伊始，辛威廉院士带来第一场报告，题为“早期于阗语的 u，-u 和 -ū”。辛威廉运用大量的文本例句，分析了于阗语中元音 u 的用法和含义。元音 u 在三种不同情况下语义各有区别，首先可以作连接词，意同“和 (and)”，-u 其它元音结合在一起组成词缀时也具有此含义。其次，在第二人称复数的语境下，-ū 可以用作句子成分中的属格-语格、宾格、工具性夺格 (离格)，通常指向对话的接收者；辛威廉结合现有于阗语文本中的例句，对第二人称单复数情况下 -ū 的用法进行了辨析，并与古伊朗语进行了对比。第三种情况是用作表示强调的助词，含义同英文中的“so”等。其后，辛威廉比较了于阗语中部分单词含有 -u 后缀与不含 -u 后缀的意义区别，并与粟特语 (sogdian) 和大夏语 (bactrian) 进行了横向对比。

独立学者张湛博士带来第二场报告，题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于阗语世俗文书概览”。张湛向与会学者展示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的部分于阗语手稿，详细介绍了馆内现存手稿的情况。于阗语手稿按照语言、时间等特点分为五组进行馆藏，张湛重点介绍了其中的三份世俗文书，对文书内容进行了解读，并探讨了不同文书之间可能存在的内部联系。在对现存馆藏进行概述后，张湛还提出，于阗语的电子数据资源仍然有着很大的空缺，把现有的文稿存入统一的数据库中是很有必要的，因此有意向开始建立一个于阗语数据库。这一提议得到了其他与会学者的热烈响应。

接着，南方科技大学助理教授钱艾琳作题为“于阗的黑貂皮——公元 790 年的一件阿拉伯语文书 (国图藏)”的报告。钱艾琳对一则阿拉伯语语手稿中的五行文书进行了解读，指出文书手稿的右半部分有一定程度的缺失，并围绕其中出现的黑貂皮意象展开了介绍。钱艾琳指出，早在公元 775-785 年左右的两则文书中，黑貂皮就已经有迹可循，在一些文书中还提及中国产的黑貂皮质量上乘，但具体史实已经难以考证。钱艾琳结合荣新江教授《记唐贞元初年杨良瑶的聘使大食》中对于杨良瑶的聘使大食的论述，分析了于阗与黑貂皮有关的贸易事实。但是，由于该阿拉伯语手稿中仍有多处细节有待澄清，于阗的黑貂皮及其相关贸易仍然有待进一步探究。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范晶晶在接下来的报告中介绍了人民大学博物馆藏一件于阗语文书。通过对文书的梳理，范晶晶指出文书前两行介绍了接收该命令的对象，但文书中仍然存在一些尚不明确含义的于阗语词汇。范晶晶以其中的具体单词为例，结合文本上下文和其他文献进行考察，提出了一些可能的解释。段晴教授对该文书的内容进行了补充，指出其大意实际上反映了该时期于阗政权交替的有关内容。其他与会学者就文本内容的细节和可能的词汇解释进行了讨论和溯源。

其后，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向筱路作了题为“于阗国名对音补论”的报告。向筱路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引入，指出玄奘用唐代的语言记述了于阗语正式名称的由来和其他民族对于阗语的称呼，从而在语音层面对现有的于阗语研究进行

一定程度的补充。向筱路从不同方面对于阗国名的翻译进行了考证，指出于阗作为“yutian”的翻译可能与匈奴的语言、玄奘记述的涣那 (huanna) 等均有关联，现在学界对于阗国名的翻译在语音学层面上仍然有待澄清。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袁勇介绍了来自古代于阗的一叶梵语佛经，是最新发现的《诸法最上王经》的唯一梵语片段。他探讨了这一文本的内容、来源和可能的背景，并结合《历代三宝记》进行了文本分析。

论坛最后，段晴教授作发言报告，题为“于阗语中的希腊词”。段晴教授认为，应在更加广泛的语境背景下进行于阗语词的研究，在考古文物已经证明有希腊文化存在的前提下，于阗语汇中必然应有希腊语词的存在。她以 Medusa 等词和一些于阗织物上出现的希腊神像为例，探讨了于阗语词汇中的希腊语词。其后，段晴教授和其他与会学者就一些于阗语和希腊语的合成词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本次论坛为相关领域学者提供了跨学科的国际交流平台。文研院将继续发挥平台优势，围绕“文明：中华与世界”这一核心议题继续联动相关机构，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将上述议题推展到新的面向。

(撰稿：孙晓斌、王泽萍、刘诗予)



101

马孟龙、姚乐、罗凯等 | 划等而治：对中国历代县级政区等级演变的观察

2019年11月23日，“北大文研论坛”第一百零一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划等而治：对中国历代县级政区等级演变的观察”。本次论坛由文研院筹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所的十余位学者出席并参与讨论。

上午场

文研院邀请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马孟龙首先就本次论坛作主旨说明。直到今天，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之一的行政区划制度仍然在中国的地域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县制等级问题在以往研究中并未得到充分关注。本次论坛试图揭示县级政区制度在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的发展流变的特点，讨论历代政区地域治理的基本原则和共性。

马孟龙老师以“从张家山汉简《秩律》看秦汉县邑等级变迁以及郡治县的等级”为题作了本次论坛的第一场报告。秦汉历史地理是历史研究中关注较少的话题，这与秦汉史资料缺乏有关。以往的研究常常把秦汉某一个时段的制度当作整个朝代的定制。近年来，简帛文献的出土使得谈论

前辈学者无法讨论的问题成为可能。传世文献对秦汉县邑等级的记录主要体现在《汉书·百官公卿表》和《续汉书·百官志》中，汉代县的长官分为令、长两级，县令的秩级在六百石以上，县长的秩级为三百石和四百石。这一结论可以和上个世纪90年代发现的西汉后期汉成帝元延年间的尹湾汉牒《东海郡吏员簿》所记载的东海郡县级政区的秩级分布相印证。由于《百官公卿表》强调这是秦制，以往认为这是秦到汉一以贯之的制度。然而，新的出土文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明显的时代断面。2001年公布的张家山247号汉墓《二年律令·秩律》完整载录了西汉初年朝廷直辖的县级政区长官的秩级。西汉初年，县的秩级基本集中在六百石以上，而在西汉末年的尹湾汉牒中，三分之二的县的秩级都在六百石以下，这是一个十分显著的差别。

汉代县级政区分为县、道、邑和侯国。《秩律》所记载的五百石的县级政区都是“道”、三百石的两个地名都是陵园奉邑，所以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们都不是县，而是道和邑。在《秩律》中，“道”是很明确的，但“邑”却未被标明。马孟龙老师通过细致的讨论，将邑从县中分辨出来，长陵和安陵是皇帝的陵园奉邑，酆和沛是皇帝的汤沐邑，城父和鄗是皇太后的汤沐邑。通过讨论，可以发现西汉初年县级政区等级的特点：县和汤沐邑



马孟龙、姚乐、罗凯作主题报告

的秩级全部在六百石以上，长官皆为令；道级别偏低，长官有令、长之别；皇帝亲属陵园奉邑级别最低。

通过比较西汉初年县级政区的分布面貌与传世文献的记载，可以讨论秦到西汉县级政区的变化。李昭君和邹水杰推测秦县秩级不低于六百石，长官全部为令。根据之前的讨论，直到吕后初年，西汉县的秩级都在六百石以上，并不存在县长。这改变了我们对《百官公卿表》的认识，其中记载的秦制是不可信的。目前缺乏秦道秩级的资料，但或许我们可以通过《秩律》中西汉道的秩级逆推秦道的秩级。在《秩律》中，秦道到了西汉时都属于六百石级，可以推测的是，在秦代并不存在五百石的道，秦道的所有长官都是令；五百石的道是在西汉初年设置的。《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记载“（惠帝三年）蜀湔氐反，击之”，这很有可能是湔氐道设置的原因，西汉在平定湔氐之后在此设“道”。关于邑的变化，秦朝贵族的汤沐邑以县改置，秦代县的秩级皆不低于六百石，邑也如此。秦代皇帝陵邑秩千石，皇帝亲属陵邑秩六百石，西汉初年出现以乡为皇帝亲

属陵邑的做法，奉邑在二百石乡基础上增秩一级为三百石。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县长出现的时间。根据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楚国县邑印章，封泥不见“长”，可以推测景帝三年时无县长；而在长沙漆器中发现长沙定王四年出现了充长、辰阳长，可见景帝五年时有县长。马孟龙老师认为，景帝三年七国之乱平定后，朝廷收夺大量王国属县，出现了细分县等的需求，部分县从六百石降为五百石。武帝时期废除了三百石侯国，改置为同秩级县，出现三百石的秩级县。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陈侃理对此作了评议。以前秦汉被看作一体，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时代断裂，看到非常大的变化。秦汉历史地理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补充、甚至颠覆了过去的一般性认识。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分配在中央和地方层面发生的变化、中央集权的加强、郡的作用强化、县的等级降低。

随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姚乐以“‘二品佳邑’与‘县制七班’——品位制度下两晋南朝的诸县分等”为题作了报告。魏晋职官人事制度

相较秦汉的一个变化，是将官位和人才高低优劣的等差以品阶的形式标示出来。在这个品位制度发展成熟的时代，县的第等亦不再满足于大、小县的划分，而出现了用品、阶标示第等的现象。不过，魏晋南北朝时依然存在非品位化的第等表述，《晋书·职官志》将县笼统分为大、次、小三等：

“县大者置令，小者置长。”（《晋书·职官志》）

“县千户以上，州郡治五百户以上，皆为令；不满此为长。”（《北堂书钞》引《晋令》）

魏晋以来，官分九品。在《通典》所载的晋官品令中，县官分在六、七、八三品：

第六品：诸县、署令秩千石者；

第七品：诸县、署令秩六百石者；

第八品：诸县令、长、相。

刘宋承袭晋制，根据《宋书》记载，“县令千石至六百石，长五百石”，六百石、七品已是县令的最低秩级与官品，那么，如何理解八品县令呢？姚乐老师表示，八品县令就是《晋令》所说的，县不满千户，却因身为州郡治所而特许号称县令的县官。因所在县的财力不足，这些县令的秩、品都低于正常县令一等。齐、梁两代，官品令未传世，到了陈代，县官官品已大不同于晋、宋。建康县令秩千石，居第七品；五千户以上县令、相，秩亦千石，居第八品；五千户以下县令、相，秩六百石，居第九品。与晋、宋相比，陈代的县官品级降低了一到两品，首都县的县令被单独列为一品，并且不见秩五百石以下的县长，

严耕望推断已无县长之制。在晋代，与县的第等相关的品位不止官品一种，《晋书》中的一条史料引起了学者的注意：

简文（司马昱）有命用秣陵令曲安远补句容令，……（吏部尚书）（王）彪之执不从，曰：“秣陵令三品县耳，殿下昔用安远，谈者纷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岂可处卜术之人无才用者邪！”

县令在晋代官品中为六、七品，而此处出现了“三品县”的概念。祝总斌、阎步克将今本《晋书》的“三品佳邑”修正为“二品佳邑”。阎步克认为“二品佳邑”、“三品县”中的“二品”、“三品”对应的是任职者的中正品。也就是说，句容、秣陵两县县令，在东晋分别任用资品为第二品、第三品的人，而不用曲安远这种“无乡邑品第”之人。同时，阎步克在《太平御览》中也发现了“四品县”的材料。

黄恭《广记》曰：南吴甫举茂才，累年不迁。甫有老母，年九十有余，乃上书自乞减品为四百石长，庶得其俸以养母。诏听除补南阳新蔡长。遂以甫为准，率减交趾茂才皆为四品也。

吴甫的材料显示，东晋时期，资品四品之县对应官品八品县长。阎步克因此推想有如下的对应关系：

二品县 = 六品县令县一大县

三品县 = 七品县令县一次县

四品县 = 八品县长县一小县

上述推论比较可靠，但仍然有两个问

题需要回答。第一，为何没有一品县？姚乐老师认为二品是皇族以外人士的实际最高多品，而皇族的起家官都比县令要高。第二，为何没有五品及以下县？姚乐老师认为，县官为司民之官，不应该任用中人（资品五品 = 人才中中）以下的人。

刘宋时代取消了小县，“二品县可置一尉而已，余悉停省”（《御览》），“宋太祖元嘉十五年，县小者又省之”（《宋书》）。姚乐老师表示，全体次县和部分小县县官的资品在晋宋之际的上升，是资品体系上品泛滥的结果。东晋以来，政治投机客通过伪造和篡改档案，从而伪冒贵族的行为愈演愈烈，“谱牒讹误，诈伪多绪，……冒袭良家，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为雅士”，其直接结果是二品、三品的上品人群不断增加，长官名号也需随之作出调整。

南朝梁、陈两代，推行与官品制度平行互补的官班制度。梁武帝天监七年（508年），吏部尚书徐勉将内职分为流内十八班和流外七班，又称二品以上十八班，和不登二品七班。根据“县制七班”（《隋书·百官志》）和“大县六班，小县两转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妄载。”（《隋书·食货志》），姚乐老师认为，萧梁县官对应的最低资品是三品，四品县已确定不存在。

内职班阶	县之资品	县之规模
六班	二品	大县 次县
五班		
四班		
三班		
二班		
一班	三品	小县
流外七班		
流外六班		

然而，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姚乐老师以建康令为例分析了史传记载的复杂情况，解释了高阶低就的现象，并为“就低不就高”仍不能解释的现象提出了猜想。

评议环节，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顾江龙认为这一报告基本梳理了两晋南北朝的资料，从品位制度的视角关注县的第等是理解皇权等问题很有启发的视角。同时，官品、资品和官班在概念上还要进一步区分。

接下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罗凯以“官品与俸秩：考察唐代县之第等的不同视角”为题作了报告。唐前期与隋朝一样，严格按照官品高低安排县的第等。但从唐玄宗开元初期开始，县的第等逐渐发生了变化。

关于唐代县的第等问题，一直以来都认为存在着“赤畿望紧上中下”的分级，但是对“赤畿望紧上中下”的具体理解却有所不同。唐代陆贽《翰苑集》称“今县邑有七等之邑”（卷二十一《论朝官阙员及刺史等改转伦序状》），宋代谢维新将唐代县的第等分为“赤”、“畿”、“望”、“紧”、“上”、“中”、“中下”和“下”（《合璧事类·县官门》），王应麟《小学绀珠》将县邑分为“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卷二《地理类》），《册府元龟》记载“唐制有赤县、畿县、望县、紧县、上县、中县、中下县、下县之差”。综观史籍记载，罗凯认为唐前期县有六等，分别为京、畿、上、中、中下、下，其县令的官品分别为正五品上、正六品上、从六品上、正七品上、从七品上和从七品下。

关于俸秩与唐后期的第等问题，罗凯老师认为，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官员的俸禄与官品是直接挂钩的，同品月俸相同，而大历年间的制俸却存在等差，可见大历十二年的制俸已经突破了“官品本位”。罗凯老师继而表示，唐后期的俸禄已经远远超出了俸禄本身，上升到官僚体系的重新构建问题上。

通过进一步分析历史文献材料，罗凯老师指出，唐玄宗开元四年，增望、紧二等，但仍然属于上等县一级，是上等县中的细分。唐肃宗时期增设诸府，并且提升了京兆、河南府部分县的地位，于是有了次赤、次畿县。于是，唐后期县的第等达到十等之多，但后出现的四等县均没有独自の官品，其主要功能可能是为官员迁转提供阶梯。如果以户口为标准，唐代的县其实只有上、中、中下、下四等。如果以官员的俸料钱为标准，则唐县前期只有三等，后期很可能是四等或者五等。

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郎洁在报告后进行了评议，认为报告涉及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县的等级的差异影响了行政区划的空间布局问题，从而影响帝国的运行。郎洁老师认为，唐中期的六级、唐末的十级这种推断和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有问题。县的等级没有十分珍贵的断面，县的政治、军事等功能也需要纳入考虑范围；不同史料所描述的十等是综合之后的结果。

下午场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齐子通老师以“唐宋县级制度变迁”为题发言。首先，齐子通老师探讨了唐代县等划

分方式。文献所见最早的“赤县”指代中国，至南北朝时也指代中国，但开始衍生出新的内涵，具有某些“华夏正统”的意味和色彩。唐代赤县产生的时间至迟为七世纪八十年代（628—686），乃是最高县级，指代都城。齐子通老师认为，这是对南朝“赤县”含义的继承和延伸的结果。齐子通老师总结了唐代划分县级的两大标准：按照户口划分为上县、中县、中下县；按照地望划分为赤县、畿县、望县、紧县、次赤、次畿。县令官品以地望为重，户口划分标准又似乎被纳入地望体系之下。这种划分乃是受到了南朝与北朝因素的双重影响，从而形成了唐代县级分类双轨制的交叉与统一。

接下来，齐子通老师指出，随着时间的流逝，次赤次畿大量出现。唐代皇陵属县的县级划分，在次赤县产生后，由赤县变成次赤县。这主要是因为皇陵属县的泛滥与相较于同为赤县的长安县在经济政治上的名实不符。这种变化直接影响了五代和北宋的皇陵属县等级。齐子通老师表示，五代时期的县级，基本沿袭唐代，但次赤、次畿县占据了原来望县、紧县的位置，后者被挤占成按照户口划分的等级。

这种变化为北宋继承，只是提高了其户口数额标准。虽然北宋强调每三年核定户口以定县级，但实际上按照“户口”划分县级存在严重的滞后性和长期固化，不过也从反面折射出赤县、次赤、畿县、次畿等按照“地望”划分的县级在宋代的重要性。对宋代县级划分“地望”而言，主要与更高一级的行政区有关，因为其上一级行政区的地位往往直接影响县级的等级。

这也提醒我们，不应该孤立地就县级而论县级，而应该考虑到上一级政区如府的影响。有宋一朝在最开始时，根据府的地位而严整地划分了属县的等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严格的划分逐渐被打破，随着北宋末年次府增多，次府属县县级不断下降。由上可见，唐宋县级制度一脉相承，高度关联，且一直影响到金元时期。

中国人民大学张亦冰老师对齐子通老师的报告进行了评议。张老师认为，齐子通老师对“赤县”的讨论所引用的文本性质相差较大，在论证上可能存在缺环。张亦冰老师补充了两个“赤县”出现的更早的例证，唐赤县出现的时间或许可以再上推。张老师认可“上中下县”的划分方法来自北魏的判断，但是认为其中论证环节还可商榷。随后，在齐子通老师报告的基础上，张老师进一步讨论了按照地望、户数划分县级对于北宋行政管理、财政制度、官员俸禄可能造成的影响，认为北宋县等划分可能与户数的关联更为密切。

中山大学历史系（珠海）副教授李大海以“从‘总管兼府尹’论元代诸路的第等问题”为题进行报告。李大海老师首先讨论了金元时期路府州县的第等及其特点。第一，以往认为府再分九等可能有问题，《金史·职官志》记载，诸府尹皆正三品。总管府路作为高层政区不分等。第二，诸京（都）本质是路，各留守司及中枢所在的府，是否可以称“京府”似存疑。《金史》中的京府，多与节镇连用，应是诸京与诸府的合称。第三，总管府本质上是路的行政机构，并非行政区划层面的府。散府是与总管府相对的概念。第四，金元州县第等呈现化繁为简的历史发

展特点，多以户口多寡为准；南北州县分途划分第等，虽与纳入版图的时间先后有关，但本质反映了平均状态下南北方人口分布的强烈差异；州县之间可以通过升格第等而实现政区类型的转变，进一步加速了州成为县级政区的历史步伐，明清时期实现了“州县”并称的局面。总而言之，金代府的分等只有上中下三等，并不存在京府、总管府和散府。同样的问题，金代州的第等可能也值得辨正。

接下来，李大海老师以诸路“总管兼府尹”为例，讨论了职官与第等之间的关系。前人如张金铨先生等都曾看到过元人中带有“总管兼府尹”职衔的现象，但一般只说这是中原之制，而且也没有提及该称与路第等之间的关系。一般只说路的长官除达鲁花赤以外，只有总管，并不提及总管和总管兼府尹之间差别。陈广恩先生曾将府尹理解为王府府尹，王颀先生以此证明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府”仍然存在，但是如果元代的路下有府，府在哪里？何时又消失呢？李大海老师认为，金元之际，宋金之际，宋金延续的在路下设置的首府（本府），随着首府知府的取消，彻底消失，这是元代各路直接领县的直接原因。既然如此，府尹一称也应无处依归。府尹也不能解释为总管府府尹，因为只有上路才带府尹衔，下路总管不带府尹衔，但总管府仍在。府尹本身也有历史延续性。由此，李大海老师推测，府尹在元代只能是上路总管职衔所带的一种虚指称谓，其来历应当与近代诸总管府的首府有关。最后，李大海老师指出，经过金元之际的长期战乱，元朝北方政治中心的地理变迁及其内在连续性，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赵现海进行评议。赵现海老师指出，中国文明的特点在于疆域的辽阔性。之所以能够长期实现这一点，是因为在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上是相当成功的，虽然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是依然在不断调整完善。“总管兼府尹”事实上意味着军政合一的系统，相较于宋代繁复的地方分权，体现了北方民族对整个王朝统治特点。明代继承金元的系统，整个地方系统相对简明，这可能是北方民族对于中华民族行政区划发展的贡献。中国制度的核心在于，如何在有限的行政资源条件下，掌控广疆域的国家。这也就要求建立强大的京畿地区，以应对地方上可能的叛乱。赵现海老师提出了“差序疆域”的概念以解释这一现象，即用较少的资源控制庞大国家的结果。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胡恒带来本次论坛最后一场报告：“冲疲繁难：清代县级政区分等、官员选任与升迁调动”。胡恒老师指出，清朝一向被认为是地方治理取得较大成绩的王朝之一，它以一个极小规模的官僚机构管理了广阔的地域与众多的人口。由此，清朝在地方治理时面临两对主要矛盾：第一，官员数量不足，必须尽量把“好钢用在刀刃上”；第二，吏部铨选，带有很强的随机性，无法保证官员与任职地域的匹配；督抚更了解官员的素质，但官员选任又不可权操于下，需要皇帝与吏部掌控，必须在两者之间建立一套合理的分权机制。由此，清朝建立了一套以“冲繁疲难”四字并对应“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的办法来保证中央吏部与地方督抚之间的权力分配。即根据冲

（交通）、繁（政务）、疲（赋税）、难（治安）四个维度对地方政治进行判定，兼四字者为最要缺、三字为要缺、两字为中缺、一字或无字为简缺。中缺简缺归吏部，最要缺主要由督抚与皇帝掌控。这一制度始自雍正六年广西布政使金鉉的奏请，经雍正、乾隆初年的调整，最终确定下来。

以档案、实录、地方志、吏部资料、《缙绅录》数据库、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新修《清史·地理志》等作为数据基础，胡恒老师将“冲繁疲难”的空间分布给予可视化表达，并将其与官缺制度联系起来，在反映了政治地理空间结构的某些侧面的同时，亦反映了中央与地方督抚控制地方的利益争夺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划分关系。其中，“冲”字的州县分布与驿路走向若合符节；政府眼中，江南一代的政务特别繁忙；“疲”字州县包括江南重赋区、直隶身向南、甘肃、奉天以及福建沿海及广州府一带；考虑到民风民俗，“难”字州县涉及范围最广，尤其分布在在各省份的交界处。

胡恒老师指出，在将各州县以“冲繁疲难”进行评级后，清政府在此基础上安排了官员选任，维持了吏部与地方督抚之间的巧妙平衡。在府级官员的选拔上，皇帝权力最大，地方督抚与吏部大致平衡；而县级官员的选拔上，吏部的权力要远大于地方督抚。无论对于府级政区或县级政区，缺分中的特例集中在要缺和最要缺上，主要是按照正常的第等对应缺分低于实际缺分——这是因为地方督抚为扩大用人权而有意擢升某些不符合条件的府州县，使得督抚可以调补的缺分。而在“冲繁疲难”标准不足的情况下，清朝通过特定的制度

设计有意识地提高府县的缺分等级，以便使得最干练的官吏调到最难以治理的府县去任职。胡恒老师强调，这些地区多分布于边疆地区，鲜明地体现出在大一统的整体格局下，国家治理体系中极为注重内地与边疆区域之间官僚资源的均衡，这与今天将援疆、援藏经历作为提拔任用的重要标准的道理是一致的。

接下来，胡恒老师分析了缺分的空间差异。厅级单位最要缺和要缺合计超过80%，配备了超常规的官僚资源；县和散州中缺和简缺的比例之和超过了最要缺和要缺之和，是吏部铨选初任官员最重要的历练之地。其中缺分的空间分布尤其反应了地理与政治之间的反差。经济发达的州县都会等缺分等级往往不高；反而是州县边界以及边疆地区，政治等级很高，如广东、福建、浙江中高等级的州县都在沿海。清朝政府尤其在族群交界地带配备了年富力强的干将。

胡恒老师指出，追求“人地相宜”是清朝地方选官的核心理念。总体来看，清朝官员的进士比例上升，举人比例有所下降，但是二者之和的比例较稳定，监生与进士举人构成了清朝官员组成的三驾马车。胡恒老师特别指出，我们需要重新考虑晚清捐纳对于不同层次官员的影响。胡恒老师发现，嘉庆以后，进士担任府州县正印官数量急剧增加，从而保证了进士在候补官员中的优先顺序，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捐纳对州县正印官选任的影响。在要缺与最要缺任职对于官员有多方面的利处，繁缺州县配备的属官数量多，官僚资源丰富，在这些地方任职的官员往往有更好的职业发展前景。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毛亦可进行评议。毛亦可老师指出，尽管没有形成成熟的制度，但冲繁疲难的说法在明代就已经出现了，并以赋税来定义“繁缺”“简缺”，可以探索二者之中是否存在继承关系。随后，毛亦可老师补充了清代初期的省份等级划定情况，认为当时的情况与后来成熟的制度设计有很大的区别。毛亦可老师认为，在考虑官员考核与缺等的关系时，是否还需要考虑具体的考核细节。胡恒老师对此回应指出，目前的数据运算忽略了很多亲属、人事、网络的复杂关联，这些关系其实可以用数据做出进一步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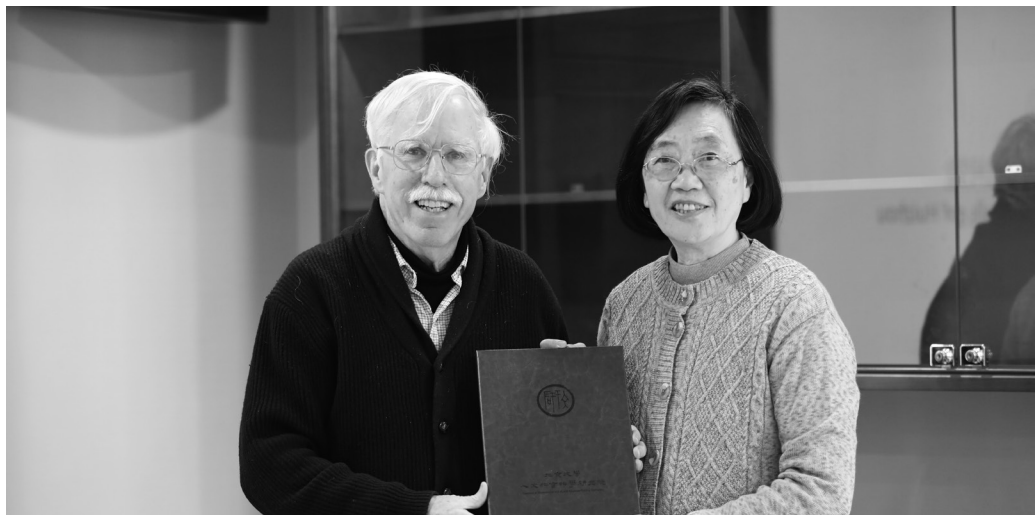
（撰稿：孟来燕、王诗瑜）



（四）文研汇讲

01

周绍明 | 徽州祠堂与宋元时代的乡村组织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为周绍明教授（左）颁发聘书

2019年11月5日下午，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九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教授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徽州祠堂”。第七期邀请学者李开元、景跃进、李放春、吴雅婷、黄盈盈、田雷、姜南、肖铁、叶晔、姚达兑、周月峰、路国权，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本次报告围绕周绍明教授最新著作《华南新乡村秩序的形成（卷2）：1500-1720年徽州的商人、宗族和商业组织》中关于徽州祠堂的研究展开。以往，关于祠堂的研究主要将祠堂作为崇敬祖先的场所及社交等公共活动的中心，探讨礼仪、宴会、处罚、谈论族事等功能。周教授则将目光投向祠堂与商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首先，周绍明教授介绍了祠堂和其他徽州地区社会组织的关系。他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家族经历了从大家到宗族、义

庄再到祠堂的演变历程。除了祠堂，社、佛寺和道观、民间宗教庙等社会组织也在南方地区的农村发挥重要的作用，共同构成了“四重奏”。周绍明教授指出，从南宋到明代中期的三百五十年间，祠堂的势力在逐渐扩大，而其他社会组织的势力则呈现下趋势。这一变化和国家政策调整不无关系——国家曾对佛寺和道观等宗教组织支持态度，而后则转向更加严格的限制政策。

接下来，周绍明教授论述了祠堂兴起的原因。一方面，法律方面障碍的移除，为兴建祠堂提供了正当性。汉代以后，除了皇族和高官，法律禁止人们供奉四代以上的先祖，也不允许平民供奉始祖。1536年，嘉靖皇帝的首辅夏言力推改革，允许平民供奉始祖。另一方面，即使在法律改革之前，徽州民间的祠堂数量也呈现出上升趋势。1500年到1800年间，徽州地区的祠堂数量增加了6000个。那么，人们为什么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建造祠堂？周绍明教授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宗族成员希望通过为祖先在祠堂设立神主牌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其二，通过设立新的崇敬对象，宗族首领可以在宗族内重新调整权力和仪式关系（ritual relations）；其三，尽管这可能不是人们最初的意图，祠堂可以设立建设基金并将向外贷款，而祠堂成员可以分享利息。

紧接着，周绍明教授讨论了祠堂建设过程的经济问题。虽然可通过使用旧房屋、建设较小的祠堂等方式来降低修建成本，修建祠堂依然需要一笔数目不小的资金。晚明时期，建造费最高可达4577两，而清

代徽州地区最高的造价达40000两之多。那么，如何收集这笔资本就成为重要的问题。除了大盐商、恩人的捐赠，祠堂也需要族人捐献。周绍明教授指出，在族人中劝捐是不容易的。面对捐献，族人有四种回应：第一种是绝对否定的态度；第二种是愿意参加钱会（credit association），让祠堂管理人收集利率以增加祠堂建设的资本；第三种是持观望态度，希望调整祠堂的人堂费；第四种是先否定后同意的态度。周绍明教授以呈坎罗氏东舒公祠堂的修建为例说明了第四种情况。根据《庙事志》（c.1620）记载，修建祠堂的计划最初失败了。1540年左右，仅有约10%的人愿意捐献。但在1610年左右，这一数据达到了80%。周绍明教授认为，涨幅的原因有很多，如主要反对派去世、进入费减少、增加了为女性使用的祠堂等。

然而，在祠堂修建完成之后，仍存在一些资金问题，如祠堂财产不多、修理费很高、地租收入不高等。也就是说，祠堂在建成后需要更多的资金来源。周绍明教授介绍了几种解决办法。第一，族人们需要在订婚、男丁出生、科举考试等重要日子向祠堂捐一笔钱。第二，族人会为了其祖先的神主牌向祠堂捐赠。根据《礼记》的规定，神主牌留在祠堂的时间不能超过四代。当然，也存在一些例外——高官及宗族的恩人、贤人的神主牌可以长期停留在祠堂。如果后人以神主牌主人的名义捐献，也可以为祖先的神主牌获得永久居住权。第三，祠堂也扮演着“原型银行”（proto-banks）的角色，通过借贷获得利率。在休宁县，祠堂设立了钱会，允许

族外的人借贷祠堂的资本并收取 30% 的年利率。借贷人也需要把水田地契约留在祠堂典当铺子作为担保品。当祠堂向宗族内人借贷时，年利率一般要低一些，约 12% 左右。那么，族人在借贷祠堂资本之后，怎么使用呢？一般来说，他们会用这些钱来履行家庭对宗族的义务，归还欠款，借贷给宗族外的人，或投资给宗族人进行商业活动（commercial partnership）。

接下来，周绍明教授介绍了日本佛教寺的情况。日本的江户时代前期佛教寺跟明朝以前的中国佛教寺相似，都有典当铺子，且江户幕府也向佛教寺供给修理费。1729 年以后，江户幕府改变政策，让佛教寺自己承担修理费，但帮助佛教寺收集典当铺子客人的欠款。政策改变后，支付率上升，利率下降，存款账户增多，佛教寺的借贷数目也随之增加。周绍明教授认为，在日本佛教寺的案例中，决定性的政策不

是“世俗化”（secularization）或“机关自立”（institutional autonomy），而是借出机构和政府机关之间的信用关系。

最后，周绍明教授对以上内容进行总结。他指出，自己的研究聚焦于资本在徽州农村的流动。他认为，徽州农民在离开家乡前往江南的城市以前，已经有了市场管理经验且了解市场原则，并非是无知的农民。此外，明代中期以后，华南地区的农村祠堂承担了金融和商业方面的功能，祠堂成员可通过祠堂钱会进行投资并获得利润。当然，这样的祠堂的借出资本不大，主要帮助小本生意，其提供的金融服务也不多。周绍明教授最后表示，徽州祠堂并不是特例——明代的苏州府洞庭山、清末广东省等地都有类似的组织，相关研究对研究华南地区农村秩序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

（撰稿：魏玉槐）

02

景跃进 | 政体与国情：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大一统”议题

2019 年 11 月 12 日下午，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景跃进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政体与国情：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大一统’议

题”。第七期邀请学者周绍明（McDermott Joseph）、李开元、李放春、吴雅婷、黄盈盈、田雷、姜南、彭春凌、叶晔、姚达兑、周月峰、路国权，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近年来，美国新清史研究在国内学界引发的争议从史学溢出到其他学科，政治学可谓首当其冲。撇开政治因素的考量，就学术研究而言，新清史的最大挑战在于将国内学者视为天经地义的前提进行“问题化”，迫使我们回到元点，来思考“何以中国”/“何谓中国”这类基础性的问题。应当说，最近数年来

历史学家、哲学家和考古学者对此给出了很好的回答。相比之下，来自政治学界的回应似乎非常之弱。

景跃进老师认为，对于政治学研究来说，“何为中国”这个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拓展政治学的研究视野，超越传统的制度主义思维。一般而言，政治学研究可以区分为五个层面，分别为政治共同体（国家与民族）、政体、政府、领导人、公共政策。其中，政治共同体和政体可以看作是“高政治”（High Politics）；政府、领导人和公共政策属于低政治范畴（Low Politics）。中国政治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政体及以下的层面。这种学术实践一方面呼应了国内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与比较政治学关于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有关。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主导范式，制度主义将政治共同体视为一个稳定的外变量。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将政治共同体带进来”便是克服此一局限的一种努力。



景跃进教授

再者，如何处置大一统遗产，这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特有的议题。如果说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主要是从实地发掘、历史文献和大一统传统来回答“何谓中国”的问题，那么在此基础上，政治学研究者主要面对的是“何将中国”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早在十九世纪已生发。具体而言，它包含了两个要素（子题）：

第一，如何将大一统帝国疆域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领土？

按学界的通常说法，民族国家是传统帝国的天然解剂——奥斯曼帝国的命运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比较幸运的是，在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冲击后，清朝版图相对完整地转化为中华民国的领土（除外蒙独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界开始肯定清朝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清帝退位诏书的政治价值。

第二，如何维系国家主权完整和领土统一，避免国家分裂？

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中国历史上存在两种不同形态的大一统：一种是以农业

文明为基色的秦汉大一统，一种是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相交融的元清大一统。近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是在第二种大一统形态的基础上进行的。它既为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奠定了辽阔的版图和发展空间，与此同时，也带来了特定的边疆问题（涉及少数民族与宗教）。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各种分离和分裂势力存在的条件下，维护国家领土完整、防止国家分裂便成为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

可以说，历史上中国成功地应对来自民族国家的冲击，避免了奥斯曼帝国的命运；也可以说，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成功地应对来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冲击，避免了前苏联和南斯拉夫政权崩溃、国家分裂的命运；但是在成功经历了两次浪潮的冲击之后，作为大一统历史传承者的当代中国，依然难免“高枕之忧”。

最后是政治学研究议题的再设置问题。对此，景跃进老师认为，“将政治共同体带进来”会引发政治学研究格局的调整和重组，这一变化会涉及政治价值的议题。诸如，作为领土完整的大一统是不是一种价值？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它在价值王国中居于什么样的位序？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不需付出成本就可以得到或实现的价值，我们愿意为大一统传统的维系支付什么样的成本？这一变化也涉及经验研究的领域，在此，必须考虑制度匹配的问题。有学者将中国的国家建设形容为“老区改造”而不是“新区开发”。所谓“老

区改造”意味着存在许多选择的约束性条件。在中国语境下，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基于现实的考量，大一统格局的形成、维系和发展都与集权体制相关（注意，在学理上应将集权体制与专制体制区分开来。专制体制是集权体制的一种极端形式，但不能由此说集权体制就是专制体制）。这似乎暗示着大一统格局与西式政体之间的逻辑张力甚或不兼容。

基于上述分析，景跃进老师最后表示，在“自由与秩序（权威）”、“公平与效率”等平衡式子外，中国政治发展和中国政治学研究还不得不考量“大一统与政制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撰稿：景跃进）

03

田雷 | 漫长的建国时刻：如何讲述美国早期宪法史？

2019年11月18日下午，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11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漫长的建国时刻——如何讲述美国早期宪法史？”。第七期邀请学者周绍明（McDermott Joseph）、李开元、景跃进、李放春、吴雅婷、黄盈盈、姜南、彭春凌、叶晔、姚达兑、周月峰、路国权，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田雷老师首先简要介绍了美国宪法研究在国内的现状，并交待了近年来转入美国早期宪法史研究背后的问题意识。在法学院内部，主流的美国宪法研究是以美国最高法院为中心的，关注的焦点在于司法审查制度，由此决定了研究素材集中于大法官在宪法案件中的判词，任务是用某种“教义学”的方法阐释这些判例。这种类型的研究背后隐藏着一种“拿来主义”的问题意识，研究者未能追踪美国宪法秩序的来龙去脉，时间遭到压缩，历史进程被简化为“自古以来”。正是不满于这一“法学”的路径，田雷老师尝试进入“历史”，回到美国立宪的源头，聚焦美国早期宪法史，即美国内战前的宪法发展。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他形成了“漫长的建国时刻”这个概念，以此来表述美国早期宪法史的框架结构。

整个报告分三部分展开，田雷老师将“漫长的建国时刻”这一概念进行三分，先后介绍了“漫长的”、“建国”和“时刻”三个子概念。

第一部分聚焦“漫长的”一词。美国早期宪法史，在断代上指的是从建国到重建的这段历史，也即通常所说的“内战前”时代。强调“漫长的”，首先是为了检讨费城奇迹说——费城会议虽然伟大，且构成美国立宪政治的一个原点，但美国宪法秩序绝不是毕其功于费城一役的。按照田雷老师的讲述，所谓“漫长”，上起1776年（《独立宣言》），下至1863年（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由此计算，早期宪法史也就是美国建国“八十七年以来”的历史进程。进入这个历史阶段，我们可以把这87年划分为三代：第一代是亲历革命的建国兄弟们；第二代是生而为美国人的第一代，是田雷老师口中所说的“星条旗下的蛋”；第三代则是林肯这一代。三代人在宪法舞台上前后相继，“漫长的”也意味着早期宪法史是连贯成一体，因此研究者必须要有某种整体史观的视野，在做具体的研究时处理好整体和局部之间的关系，不能用“树木”来遮蔽“森林”。

接下来，田雷老师探讨“建国”一词。可以说，让这“漫长的”87年连续而成一贯的，根本在于“建国”。根据田雷老师的理解，美国的1787年宪法制定于一个生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为田雷教授（左）颁发聘书

死存亡之“夏”，革命者深知北美诸邦当年面临着“Join or Die”的抉择，也就是说，地缘政治决定了它们必须联合起来。而美国的制宪大业，关键就在于“合众为一”，如《联邦党人文集》所言，要让新世界避免旧大陆陷入列国格局的命运。但这部宪法的起草，既不是在自然状态下商讨社会契约，也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做最美的画。历史地看，这部宪法诞生于妥协，其内部充满着妥协，也就决定了制宪建国的不彻底性。“合众”虽已完成，但聚合而成的“一”到底如何解释，这在林肯之前的宪法斗争中始终是高度不确定的。

简言之，合众为一，但并未“定于一”。正是由于这个“一”的不确定，导致了贯穿早期宪法史的路线之争——国家主义和州权主义在建国宪法的框架内“相爱相杀”，斗而不破，慢慢形成了以斗争求团结的宪法文化。也是基于这种宪法格

局，美国政治斗争往往以“妥协”收场，所以才有了我们在此历史阶段见到的一系列妥协，杰出的第二代政治家亨利·克莱（Henry Clay）就有“伟大的妥协者”之称。林肯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的政治成长，其背景就在于前述的宪法文化。他在1861年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引发了一连串的宪法事件：南方脱离、内战、联邦胜利、林肯牺牲、三条修正案写入宪法、通过“再造共和”实现“自由新生”以及“全民政府的永世长存”……尤其是第十四修正案的增补，实现了对建国宪法解释的“定于一”，在此意义上，林肯也是漫长建国时刻的历史终结者。

报告最后部分关注“时刻”的含义。所谓宪法时刻，按照耶鲁大学阿克曼教授的说法，就是国家危亡、人民登场、制宪权启动、政治的根本规则发生剧烈变动的历史周期。在美国宪法史上，先后出现过

建国、重建和新政三次宪法时刻。根据阿克曼的叙事，早期宪法史的结构就是从建国到重建，其间贯穿着一种“转型”的逻辑。但在将两阶段转换为“三代”叙事之后，我们可以发现早期宪法史的连续性所在。特别是转型叙事中被遗忘的第二代，其实在这段历史中承担着继往开来的角色。在建国者逝去之后，面对着他们遗留下来的宪法，第二代援引建国者的意图解决政治斗争的自觉行动，才是美国立宪政治得以成功的历史经验。

报告最后，田雷老师简要陈述了他对立宪政治的理论认知。首先，宪法乃是政治生活的根本规则，没有宪法，也就无所

谓连续性的政治；其次，立宪政治，在于要用制宪者的“先定承诺”去约束子孙后代的政治决策；再次，任何一个长期存续的政治共同体，都有其宪政，也即基于根本法的政治；最后，宪政的生成，关键在于建构起宪法作为根本法和高级法的政治心理结构。在此意义上，立宪政治是保守主义的——它发生在革命之后，意在保守革命者的政治遗产，既不改旗易帜，又能与时俱进，实现不变和变的平衡，建构起一种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政治秩序。

（撰稿：田雷）

04

黄盈盈 | 跨越学科的“性”史



2019年11月26日下午，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12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副教授黄盈盈作主题报告，题目为“跨越学科的‘性’史”。第七期邀请学者李开元、景跃进、吴雅婷、李放春、田雷、姜南、肖铁、彭春凌、叶晔、周月峰、路国权，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黄盈盈老师首先对讲题进行界定，即希望在近现代学科发展的意义上梳理“性”的历史，并带着自己的学术经历展开思考与提问。在强调了性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以及学科之外性话语的重要性之余，她指出性研究的三个突出特点：议题的高度道德化、对话的多主体性以及研究的切身性。报告简要辨析了性与性别不同以及概念的翻译，随之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西方性学”的百



黄盈盈副教授

年简史及其与当下中国的连接；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性研究；三，历史与中西视域下性知识图景中所“缺失”的板块与可能的“拼接”（重新认识）。

报告第一部分，黄盈盈以人带史，从几位重要的性学家入手，概览了19世纪以来西方性学从强调科学主义的sexology到强调社会人文特点的sexuality这一研究历程。自1886年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克拉夫特-埃宾撰写《性的心理病：临床-法医学研究》开始，性就被作为一个独立现象从生殖医学中剥离出来。此后的近百年间，伴随着很强的优生学特点，霭理士、弗洛伊德、赫希菲尔德、赖希、桑格、金西、马斯特斯约翰逊等人通过精神分析、问卷调查、实验等方法陆续繁荣了性科学时代。而性的科学主义随后受到社会文化以及历史建构范式的挑战——后两者的主要

推动力来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人类学跨文化研究与社会史中的性记录、60年代以来的女权主义与同性恋运动以及80-90年代兴起的酷儿理论。福柯、卢宾、威克斯等人则是重新思考“性”的重要人物。不可忽视的是，自80年代以来，艾滋病的横空降世再次搅动了性研究的生态，带来了性知识的再度医学化。

黄盈盈老师进一步指出，以上这一部从欧洲到美国的性学简史在20世纪初、20世纪80年代这两个时间点通过翻译以及学者间的交流与中国的知识界发生关联并影响至今，但缺乏足够的反思与拓展。而近现代西方社会所流行的“压抑-解放”“正常-异常”二元思维，即便早已受到了福柯等学者的消解，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去甚远，却依然在当下大众的观念中留有很深的印迹。

在简要提及20世纪初张竞生、潘光旦、高罗佩等人的著述之后，报告会进入到第二个主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性研究。期间，刘达临、潘绥铭、李银河等性社会学家的著述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黄盈盈老师基于自己的认识与观察，将这四十年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80-90年代初，在经历过文革时期性的高度政治化特点之后，性科学知识的译介与性医学、性教育的兴起掀起了一股性学热；二，90年代至2010年左右，性研究迎来了短暂的黄金期，触及历史文化、不同人群的社会调查、法律探讨等内容；三，2010年以来，“扫黄”、反性大妈、新女权、LGBTQ、性教育与性咨询等不同力量型塑了一种更

为复杂的性话语生态，也凸显了多重政治性的特点。

除了艾滋病带来的再度“医学化”与“道德恐慌”，黄盈盈老师批判地指出，近年来，传统、西方、进步、保守这些政治话语在公开争论中进一步彰显；性的议题，在当下以更加（多重）政治化、更加聚焦却也更为窄化以及（很可能）更加西化的面貌出现在国内外的舞台上——“我们依然尚未进入历史文化的宝藏，可是离丰富的生活常识与实践和广袤的地面却渐行渐远”。黄盈盈老师不无忧心地反思，我们不仅做不到“历史有关”，对当下经验生活世界的好奇、耐心与切身的行动力也正在逐步消失；各类话语（包括法律政策）与人们生活实践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在一个科技发展迅猛的时代，在一个混杂不同人群、虚拟与赛博格（cyborg）在内的多重世界里，有效的对话变得越来越困难。

报告第三部分，黄盈盈老师结合自己的教学、办会与研究体会谈到，就性领域而言，个人境遇（包括代际更替与知识局限）、学术体制、社会与政治背景乃至更大的世界变动格局前所未有地聚集于当下的思考与实践，带来更多的复杂性及困境。她开始对提问本身进行提问：我们如何思考那些尚未进入性话语的生活实践与经验？如何更好地扎根于中国历史、民间社会、生活百态来提出当下的“性”问题？在充斥着多重性与世界性的当下，如何“接地气”地思考中国经验并提出更具穿透力也更具普遍意义的问题？而这种提问与回应能更

好地理解当下、理解世界、理解人，以及理解自身，而这种理解也可以进一步延伸至积极的实践。

报告结束后，与会老师就“性”的跨学科性质以及不同文本（社会调查、文学本文、法律文本、历史文本、考古器物等）的特点与可能的“拼接”展开了讨论，并就推动性变迁的社会力量、当下性研究的困境以及所处的经济与政治背景（包括性研究与商业文化之间的关联）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撰稿：黄盈盈）



05

吴雅婷 | 瞻望远方：宋人的旅行知识与新知的化成



2019年12月3日下午，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13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吴雅婷作主题报告，题目为“瞻望远方：宋人的旅行知识与新知的化成”。第七期邀请学者周绍明（McDermott Joseph）、李开元、景跃进、李放春、黄盈盈、姜南、肖铁、彭春凌、叶晔、姚达兑、周月峰、路国权，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并参与讨论。

吴雅婷老师首先说明本研究的问题意识在于希望了解促成宋人展开旅行的条件，而且特别着重“知识”于此间扮演的角色。因此，本次报告由两项子议题组成：一是宋元旅行实用知识的探索与思索，即讨论帮助完成旅行的知识；二则进入新知识形成的层次，以山的阅读与旅行为例，讨论宋人空间认识的取径与内涵。她期待这些讨论能有益于以“移动”的视野了解传统中国的样貌与质性。

吴老师先借着介绍明代中晚期流传的《天下水陆路程》、《士商类要》等旅行手册回溯投向宋元之时的情况，展开对宋元旅行实用知识的呈现。随后，吴老师向大家介绍《事林广记》这部由南宋晚期福建人陈元靓编纂的日用类书。这是商业取向的出版品，流传版本复杂，其中，日本

元禄十二年（1699）京都所刻之元代泰定（1324-1328）本可见到近似于“旅行须知”的内容。吴老师指出，该书所载录详细的舆图、道里计程，以及“到京须知”的性质，促使我们考虑其实用性。另外，这个版本的《事林广记》“庚集”有“旅行杂记门”，内载“出陆”、“束装”、“雇夫”、“舟行”等十四条。由“雇夫以少壮熟事为尚”、“如刀剑之类又当随身，庶亦可以待暴”等提点式的内容看来，“旅行杂记门”可能出自一份内容较现存更多的旅行须知。而由遣词与所指的社会情境看来，“旅行杂记门”的内容有可能是南宋中后期的文本。

“旅行杂记门”第一条“出陆”所谓的“出陆须择吉日”，提示了择吉实为宋人出行的前提。另一部元代的日用类书《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于“仕宦门”之下便收录好几种针对远行的择吉避凶之法。其中，如“行船避忌安济法”、“许真君传龙神行度风暴诀”等数种是舟行专用。可以看到，当时人们以诸神的出行、相会，解释风、浪、云、雨等自然界的天候水相，提升自身远行的安全。

接着，吴老师提到，在当时出版的诸医书中，亦可见宋人对于旅途中人身安全的重视。成于北宋哲宗的医书《旅舍备要方》，是一本罕见的旅行专用医书。该书的自序明确地说明了此书编撰的目的是为

旅程应急，不过条目分类却仍与一般医学的脉络关系密切。泛观宋元其他医方书，一些针对远行的方剂也散见于各科。虽然旅行并未在医学领域显现出立论或处置明确的独立性，但医方流传的次管道却让我们对这类生活知识的传播管道有更多理解。

报告会第二部分，是关于宋人“山”的“阅读”行为与空间认识取径。吴老师首先说明，讨论乃将“阅读”视为一组促成知识建构之行为，且使其升华为分析概念；并透过旅行的实践观察人们的异地体验，找到宋人建立外在世界认识的途径。从《太平御览·地部·叙山》对东汉末魏初刘熙《释名》的引用，可以看到传统中国“山”之指涉的丰富性。

至于历史情境的论述，吴老师主要着重在三种情况。她先是以“九华山”为例，由文字的书写、刊刻、流播、重写与阅读，可以见到旅人如何形成对此山的先行认识。这些认识往往具有强烈的特征印象，这些认识和印象一方面趋使人入山，也令旅人初临此山却带着故旧感。循着北宋人对九华山关注的痕迹，吴老师也留意到收藏、赏玩假山的文化。假山的赏玩被她视为另一类读山的文本。人们读取假山的姿态与细节以了解山，于是，假山成为引领人们进入山境的媒介之一。第三种则是从山所具有的“远观”特质论说。实质上的举动或于室内悬挂山图观看，或于户外兴建“看山亭”，以登览的方式遥望远山。虽然后



吴雅婷副教授

两者观看的山有真假之别，却可以看到宋人刻意融混二者，以提高认识外物的意境。最后，吴老师借着四明楼氏家族数代约百年间跨越南北宋的嵩山经验故事，综合性地呈现出“山”的认识与相关文化如何以各种形式的媒介，穿越时间和空间，与故人、故地、故国山川连结。

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就日用类书所载录的行前须知讨论了当时旅行活动的进行和做为基础的社会环境。另外，大家也关心这些旅行知识的读者与实用性之间的关联。关于山的认识，有老师询问所选个案的缘由，也有老师从交通途径——如山行、水路——所带来的视觉景观特质讨论。除了论题内的讨论，学者们亦宏观地关切理学家于这些认识论间扮演的角色，以及今日报告议题的宋代的特质。

（撰稿：吴雅婷）



06

路国权 | 反思与重构：春秋史的时空结构和过程

2019年12月10日下午，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四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路国权作主题报告，题为“反思与重构：春秋史的时空结构和过程”。第七期邀请学者周绍明（McDermott Joseph）、李开元、景跃进、李放春、吴雅婷、黄盈盈、田雷、姜南、肖铁、彭春凌、叶晔、周月峰，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路国权副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从事这项研究的缘起、主旨与思想转进的过程。在北大求学和写作博士论文期间，他开始接触到东周历史和考古研究中存在的两大聚讼已久的问题：一是春秋和战国的分界，二是春秋内部的分期和分界。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考古学界陈平、刘绪、刘彬徽等学者不约而同地指出，东周考古研究中时间标尺混乱，给比较研究带来诸多不便和麻烦，呼吁建立一个统一的东周考古分期标准。路国权副教授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东周青铜容器谱系研究》中，提出了新的东周青铜器分期断代体系。但是当运用新体系在考古学界开展学术对话时，他遇到很多障碍和阻力。路国权副教授自嘲“人微言轻”，观点未受重视，却也被激起深入探究的勇气。



路国权副教授

本次报告，前半部分主要围绕文献史学界关于春秋时期的研究展开。经梳理发现，文献史学对春秋史有二分、三分、四分、五分、七分等五种不同观点，其中四分出现最早、拥趸最多，是主流观点。但是，一方面由于1940年代钱穆《国史大纲》、黎东方《（部定大学用书）中国历史通论（春秋战国篇）》等教科书明确使用春秋史三期分法并说明年代框架，易于接受；另一方面，由于梁启超、顾颉刚、张荫麟等著名学者将公元前770—前723年不称为春秋时期，将公元前722—前481（或前473、前482）年称为春秋并分为三

期——上述种种客观上助攻春秋史三期分观念进一步扩大。两项叠加致使人们形成史学界“习惯”将春秋划分为三期的错误观念，掩盖了四期分主流观点。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大学生在1949年进入考古领域后，将“三期分”非主流观点引入到考古学中，形成思维定式，这是东周青铜器和考古分期断代中，学者们大多将春秋分为三期的历史背景和根源症结。在辨析文献史料的基础上，路国权副教授提出了春秋史四期分的新体系和特征。

报告的后半部分转入考古学界关于春秋的分期断代研究。由于陶器缺乏纪年，东周考古学文化分期断代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青铜器的分期断代研究。以往青铜器分期断代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一，套用文献史学中春秋史的某种分期断代框架；二，将东周六等分为六期；三，先选定春秋和战国的分界，以之作为终点做加法，按照一百年一期的标准分期和断代；四，以公元前770年作为起点做减法，按照一百年一期的标准分期和断代；五，先选定春秋和战国的分界，将春秋和战国分别三等分为三期；六，先选定春秋和战国的分界，再依据历史事件或王公纪年来确定内部的分界；七，先选定终点，按照六十年一期的标准分期；八，以青铜器研究本身为主，同时参考文献记载的历史形势。

路国权副教授认为，历史和青铜器的演化从来不是匀速发展变化的，“等分”观念没有科学根据和历史依据，从根本上不能成立。另外，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一般公认为春秋时期是变化最快的时代，这在青铜器上应该也有反映。西周

青铜器普遍接受陈梦家三期分，“三个分期，各占八、九十年”。如果以100年一期的标准划分春秋青铜器，那么春秋青铜器及历史的变化反而不及西周快，与一般历史常识相违背。路国权副教授表示为，按照人为主观设定的标准搭建时间框架，然后在框架中放置青铜器的方法，非“量体裁衣”，面对具体材料时难免“削足适履”。这在方法论层面存在巨大瑕疵。正确的方法应该建立在青铜器本身研究的基础上，同时参考其存在背景即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将考古学年代学研究方法与文献史学历史背景分析方法结合起来。

最后，路国权副教授特别指出，苏秉琦《洛阳中州路（西工段）》、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运用考古学自身研究方法都将东周考古材料划分为七期（其中春秋分四期），但是在与文献史学僭居“主流”地位的春秋史三期分法进行整合时，不得不“削足适履”，被迫调整为六期。文献史学的长处在于记录重大历史事件，而考古学的长处则在于将物质文化资料转化为史料，并透过物质文化史料观察到历史事件背后的结构、阶段以及发展过程，并考察文化格局和宏观体系的调整与变化。在与文献史学研究成果进行整合时，考古学者需要拥有足够的学科自信。

（撰稿：路国权）



（五）文研读书

19

刘永华 | 传统中国的礼仪实践与社会形构——《礼仪下乡》研读会

2019年11月10日下午，“北大文研读书”第十九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传统中国的礼仪实践与社会形构——《礼仪下乡》研读会”。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永华作引言，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应星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陈进国，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赵丙祥，文研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出席并参与讨论。

本次研读会的文本为刘永华教授所著《礼仪下乡：明代以降闽西四保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以下简称《礼仪下乡》）。刘永华，福建上杭人，199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学系，2003年获得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系哲学博士学位。刘永华教授主要从事明代以降社会文化史、社会经济史研究，尤其致力于明清乡村礼仪、乡民生活世界、跨地域流动、文本流通与读写能力、时空范畴等问题的研究。《礼仪下乡》探讨的是明清时期儒教礼仪进入乡村，融入乡民仪式生活的社会文化史过程。古人常说“礼不下庶人”，礼仪本为社会上层人士的身份标识，与乡民生活保持着一定的

距离。但中唐以后，社会秩序发生剧烈变化，上层社会的态度有所松动，开始为庶民制礼。以经世济民为使命的士大夫，甚至也致力于改革祭祖礼仪，通过推行乡约推广祀典神明等方式，在乡村民众中推广儒教礼仪，从而开启“礼下庶人”的进程。刘永华教授透过挖掘这一过程，推进了对中国古代朝廷和士大夫礼仪制度嬗变的研究，也为理解明清乡村社会文化转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有助于人们深化对明清社会文化变迁的认识，更好地理解传统乡村礼仪遗产的时代意义。

首先，刘永华教授对本书的研究概况做了简要介绍。本书建立在刘永华教授本人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主要采取田野调查的研究方式，研究的主题为“礼仪”。明清时期的“礼仪”涉及一个重要的转变，即从“命令论”转变为“气质论”，成为改变人的气质的重要元素，被赋予前所未有的重要性。目前史学界对于礼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礼制史、礼教思想史、礼仪的社会史三个维度。其中，礼制史研究主要关注制度的变化，对制度产生的社会影响讨论较少；礼教思想史更关注思想过程的



应星教授主持



刘永华教授作引言

演进，对其社会影响的探讨也有所欠缺。刘永华教授的研究在二者的基础上推进，更关注礼仪对社会的影响，但与礼仪的社会史研究也有一定的区别。在本书中，作者采用微观尺度进行研究，以几个村落（约几十个村庄）为主要考察对象——闽西四保就是这样一个区域范围较小的社会单元。刘永华教授指出，本书的研究思路和采取的研究方法基于自己在博士阶段接受的学术训练。在博士时期，作者主要接受来自区域社会史和宗教研究两个方面的思维训练。前者强调对仪式的社会层面的研究，探讨仪式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宗教研究——尤其是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宗教研究——是欧美国家独有的研究方式，对这一领域的学者来说，研究的重点不是历史过程，而是仪式如何被建构和传承。因此，宗教研究学者会关心有怎样的社会群体来传承礼仪、礼仪的具体步骤以及每个步骤背后涉及的深层思想，最后通过比较不同地区、

不同时代的仪式结构，建立起仪式在传承上的关联，也能发现其中发生的变化。以上两种学术思维训练给作者获取田野信息和文本信息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然而，在将研究内容表述为规范的文本时，刘永华教授曾面临很大的困难。作者的学科本位是历史学，历史学强调对过程的认知，规范的历史学研究文本注重对不同时期时代性的提炼并将其进行比较。但是在田野调查中，研究者看到的经验事实较为复杂，很难把一个现象套用在单一的线性脉络中，经验事实若被强行套用将会沦为“边角料”。刘永华教授认为，田野调查中的历史学研究者要尊重经验事实本身，不能强行把事实套用在历史学的研究规范中。如何直面经验事实、如何更有效地整合经验事实是当今历史学研究者需要思考和讨论的问题。因此，本书并未呈现一个清晰的、单线的时代脉络，而是发散到了不同的脉络中进行研究。

接下来，陈进国研究员对本书进行简要评论。他坦言，作为一名宗教学研究，自己与刘永华教授面临着相似的难题，即上文提到的历史脉络呈现与个案研究之间的矛盾问题。而本书给史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精致的个案，值得大家精读。正如葛兆光教授曾说的：“要透过周边看中国”，本书从特殊的文化媒人群体入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明清思想史和社会变迁的新视角。礼仪关系到整个社会秩序的建构。作者直接面对仪式这一思想史留下的遗产，关注它如何通过礼生、道士等礼仪专家之手有效地落实到乡民生活中，并透过四保这一微观案例，闽西社会变迁的路径跃然纸上。陈进国研究员表示，晚清到民国时期的闽西社会变化也很有趣，未来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本书背后有个理想的假设，即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性质是怎样的。虽然作者没有明确的回答，但我们在阅读完毕后大概能够感受到那是一个深受礼教思想影响的社会。综上所述，本书的研究堪称一个典范。但是，作者对民间道士、巫师所提供的仪式结构的反思还略显不足，若稍做补充将对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理解闽西社会变迁。

随后，赵丙祥教授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提出对本书的理解。他认为，在区域研究的视角下，刘永华教授所研究的闽西地区要被纳入整个东南沿海区域考虑才能对其社会性质作出界定，而由于本研究区域选择的微观性，对其社会性质作出判断有一定的难度。本书让我们深刻地了解到，社区繁华已成为阶级变化的形式，其中礼生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作者很好地运

用了弗里德曼提出的结构情境理论（即社会结构是灵活的，并非一成不变，是根据特定的社会情境产生的）。例如，书中提到的大小宗族的关系问题，与制度史的研究结果大相径庭，却与当地特殊的社会背景有密切联系。在这一层面上，我们可以说，“礼仪下乡”既是成功的也是失败的，因为许多官方的礼仪制度一到地方层面就受宗族关系的影响被当地老百姓篡改了——其实礼仪下乡也是一个礼仪本土化的过程。值得一提的是，风水问题在本书中由于篇幅限制未能展开讨论，但它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重点。风水文化源于江西，后因赣闽结合而传入闽西，这就是到了后期很多礼生也兼任阴阳生的原因。不仅如此，风水文化也逐渐和宋明理学结合成为理法派，蕴含很强的道德元素，发挥对百姓行为的规范作用。

渠敬东教授接下来发言。他认为，不管是横向的跨区域角度还是纵向的宗族迭代角度，礼生对礼仪下乡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本书或许试图在与两个对象对话，分别是费孝通先生和华南学派。费孝通先生曾提出过绅权问题，但并未就地方绅权如何构建一个地方社会作出回答。刘永华教授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一问题。华南学派认为广域的福建地区是一个仪式社会，但并未顾及到仪式是有“核心”的。仪式的“核心”在于能在地方形成一个主导性的机制。在本书中，礼生是一个发动的机制，是王朝国家系统的终端。从社会分析角度来说，礼生连接国家和地方社会，是构建地方社会的枢纽。在这一点上，作者试图在回答华南学派忽略的问题，在理

论上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本书有几个重要的问题可以继续深入讨论：第一，闽粤地区的宗族关系与宗族结构下的个体关系问题，是否越是传统文化发达的地方，个体的生命越能得到尊重？第二，礼生在仪式联盟中发挥怎样的作用？第三，国家力量是否会以不同的面目渗透到乡民的礼仪制度中？第四，当国家思想转化为地方思想时，士大夫阶层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第五，是否存在一个与宗教无关的超越性哲学主导着仪式的建构？地方社会是由不同维度彼此交错搭建的，本书从礼生的角度开出许多面向，值得学者不断研究，取得更高的理论建树。

接下来，应星教授发表观点。他指出，闽西地区对形成共产党的革命思路有重要影响。对革命史研究学者来说，如果缺乏对地域社会的研究基础，那么他的研究是单薄的。支撑革命者的文化群体以及他所受的地域社会的影响，都是促成革命发生的要素。应星教授认为，本书在时间和地理问题上还有讨论的空间。在礼仪下乡的漫长过程中，是否存在重要的时间节点？例如，1865年太平军被镇压构成中国社会的一个时间节点，节点前后存在根本的差别。在地理上，四保地区属于文化边缘地带，“礼仪下乡”有无特殊的政治意味？这些都是值得再思考的问题。

最后，刘永华教授作出简要回应。他认为，许多历史研究过分强调乡村礼仪与王朝礼仪的关系，这会遮蔽一些重要的维度。例如，明代礼仪下乡之前，以法师为核心的礼仪群体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社会现象为礼仪下乡提供了铺垫。另外，礼

生并非一种职业，而是“绅”的基本面向。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王朝国家的文化象征，是地方的代言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地域社会的出现是国家刺激的结果，不能说国家是构建社会最重要的动力。提问环节，刘永华教授与在场师生就相关问题作了进一步交流，共同加深对礼仪下乡与社会转型的理解。

（撰稿：希琳）



(六) 文研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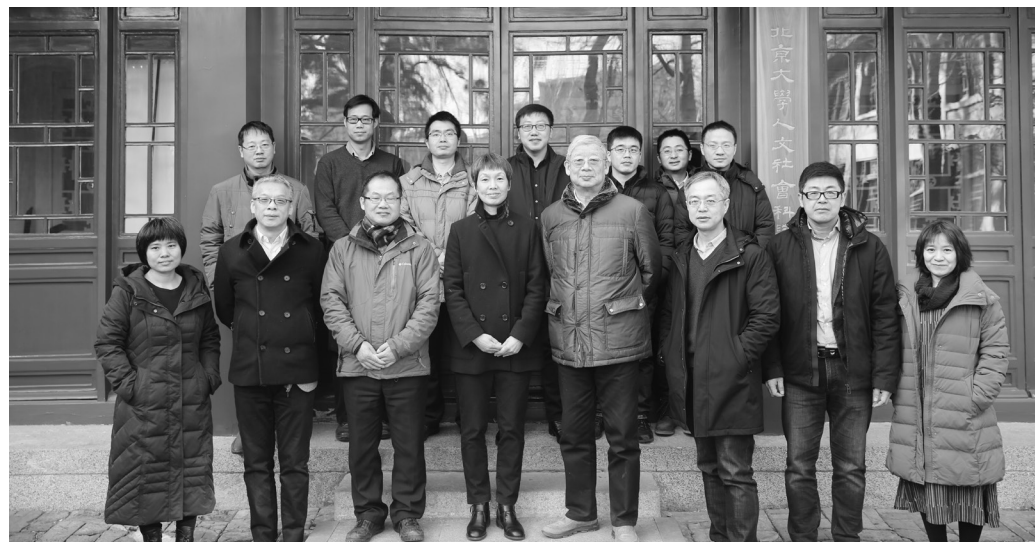
07

潘光旦与中国社会学——纪念潘光旦先生诞辰 120 周年研讨会暨《潘光旦全集》启动仪式

2019 年 12 月 7 日，由文研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商务印书馆联合举办的“北大文研纪念”第七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潘光旦与中国社会学——纪念潘光旦先生诞辰 120 周年研讨会暨《潘光旦全集》启动仪式”。

在群星璀璨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潘光旦先生是最富人文关怀、最具士人风

骨的学者之一。在社会学、民族学、优生学、教育学等方面，潘光旦先生均留下了丰厚的理论遗产，“中和位育”、“自明自强”等理念在中国现代教育领域回响至今。先生的学术领域涉猎广博，为人的厚度亦令后人高山仰止。值此潘光旦先生诞辰 120 周年之际，文研院特举办本次纪念研讨会，在百年后的今天重新研读先生的学术著作，讨论先生的深厚思想。来自北京大学、人



与会学者合影

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商务印书馆的十余位知名学者及百余位听众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开幕式

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主任李霞主持开幕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张静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马戎教授、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陈小文先生先后致辞。

张静教授首先在开幕式上致辞。潘光旦先生一生致力于社会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思想遗产尤以民族精神、文化传承、优生教育最为鲜明。在环境的不断变化中，潘光旦先生对时事坚持己见，极为可贵。上世纪 80 年代，潘光旦先生的两名女儿潘乃谷、潘乃穆先生也为北大社会学的重建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去年开始，在商务印书馆的支持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筹划再编“百年中国社会学经典文献”，同时准备启动潘光旦全集的再编工作。张静教授表示，北大社会学不是单纯地往前奔，而是双向运动——既向前寻，又往后看。借此努力，北大社会学始终致力于接续历史的继往开来，推动社会学在中国的全面发展。

渠敬东教授的致辞聚焦于潘光旦先生人格的典范意义。在纪念潘光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中，费孝通先生写道，推己及人的“己”是一切行为的基础，看待自己的方式则是最大的学问。渠敬东教授指出，费孝通先生对“己”的诠释正是理解潘光旦先生“中和位育”思想的关键，即从他人、从自己和他人的关联中，甚至

在天地世界中寻得自己。通过这种方式，才可能形成人的厚度，进而为学术带来温度和情感。因此，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无论对学者还是对教育而言，最重要的都是树立人生的典范。前进的基础是传承与追溯，而传承离不开敬畏和亲切，这正是文研纪念这一活动的重要意义。

陈小文先生在致辞中谈到，作为潘光旦先生的大学同学，闻一多先生受到潘先生深刻影响，采用性心理学的视角研究《楚辞》——两人的思想渊源可见一斑。而商务印书馆和潘光旦先生的结缘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早期，潘先生的弟弟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研究员、英文秘书的时候起。从 1937 年起，商务印书馆即开始出版潘光旦先生的译作，此后的数十年里，《性心理学》、《人类的由来》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著作《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之望族》则收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现今，《潘光旦全集》的启动是商务印书馆“大师和大师”文集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潘先生等学术大师的文集是商务印书馆责无旁贷的任务。

在致辞中，马戎教授首先回忆了为整理出版 14 卷本的《潘光旦全集》尽心尽力、鞠躬尽瘁的潘乃穆老师。随后，马戎教授指出，潘光旦先生的一生是“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最好体现。对于中央马列恩斯编译局翻译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在当时定于一尊的主调下，潘先生提出争议，作出了自己的译本；而对民间的草莽、农夫，潘先生的看待标准则是人品而非社会地位，贯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路与方式。因此，在中国社会

与学术界均走到关键点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向潘先生一代学贯中西的学人汲取经验、作出思考。

发布与启动

研讨会第二单元为“发布与启动”环节，商务印书馆副编审白中林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主任李霞做发言。

周飞舟教授首先为新书《潘光旦社会学文选》作发布引言。他指出，潘光旦先生社会学思想的核心“位育论”包含了三部分内容，即“天人之际”、“人伦之际”及人化的社会学。“天人之际”即潘先生所强调的新人文史观，强调性与养的平衡关系。性所指代的是 nature，养则指 nurture，潘先生采用《论语》中“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和《孟子》中“苟得其养，无物不长”，与传统儒学的平衡、协调思想相印证，反对文化及环境决定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两种“执一”，讨论在遗传和教育这两端的作用下如何塑造好人的问题。然而，怎样对“优”进行界定呢？这便是社会学的思考领域，即第二部分“人伦之际”关心的内容。潘先生认为，优生学之优、人之优均来自“本”与“宗”，而对此二者进行推广的机制则是家庭与人伦。以通性（即“心之所同然”）和个性（即“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为依据，潘先生形成了位育论中“位”的框架。而第三部分即讨论个人在其中如何“育”的问题，其主要观念是“昌公道、励自强”，即对应“自明、自强”或“知、行”，前者属于自我认识，后者则是自我控制。潘先生所讲自

由教育之真理，正在于知行合一。最后，周飞舟教授指出，潘光旦先生思想体系中一以贯之的“中和位育”精神之关键在于传统儒学的核心观念“致中和”，而实现中和位育的重点在于推己及人的“己”，在于存养与省察，由此方能“尽人之性，尽万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

随后，李霞主任为《潘光旦全集》作启动发言。李霞主任介绍道，北京大学出版社当年出版的14卷本《潘光旦全集》具有重要意义，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研究者陆续发掘出的新文献已经具有超过原文集三分之一的容量，因而为《潘光旦全集》的重新编纂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商务印书馆学术出版除了关注学术前沿外，还在学术译介和学术整理两方面均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面+线”框架。“面”即对各个学者代表作进行横向整理，如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当代学术著作集要；“线”即以学术大家、名家为核心的纵深整理。李霞表示，希望学术界能在这次《潘光旦全集》的编纂中通力合作，使其成为能够传下去的经典和学术界的基本文献。

研讨对谈

研讨对谈环节由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赵立玮、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讲师陆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飞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刘亚秋做主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吕文浩、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凌鹏、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闻翔进行评议。

赵立玮研究员首先以“潘光旦的‘汇’与帕森斯的‘convergence’”为题进行报告。作为社会学史上的综合性大家，帕森斯与潘光旦属于同时代人，且均具备生物学视角。赵立玮指出，帕森斯在其学术生涯早期对西方思想传统中的主要脉络以意志论为基础进行了中和，其“convergence”概念和潘光旦先生所讲的“派”与“汇”相呼应，且二人在基本观点上都强调思想传统与资源的融会贯通。帕森斯着力于以行动为核心发展理论，虽然其一般行动理论已扩展至宇宙论的程度，但由其晚期关于制度化个体主义的论述可以看出，帕森斯理论的落脚点仍在于“人”。潘先生同样强调以“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新人文思想的脉络不仅包含中国传统思想，也涉及西方理论，并致力于以其理论框架分析中国现实问题。赵立玮认为，除分析潘光旦先生与儒家社会思想的关联外，对潘先生与西方社会学相关脉络的关联进行整理，可以进一步丰富关于潘先生理论的研究与理解。

陆远老师随后发言，主题为“鼎革之际的情势与选择——潘光旦与20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学界”。20世纪中叶，参与公共事务的职业社会学者并不多，而尤以潘光旦、吴景超、费孝通三位先生为代表。陆远指出，这三位学者在1947年6月至7月间交往甚密，但对中国社会变迁大势的判断则并不相同。例如，对潘光旦先生1947年4月25日的日记和费孝通先生同期发表的文章进行比较后，陆远发现，虽然二者均认为五四运动是不足的，但对其归因不同。潘先生强调对中国近代以来的



激进传统进行全面反思，而费先生的思想则开始体现左倾倾向。此外，不同于当时成为社会学国家话语代表人物的陈达、孙本文，潘光旦、吴景超和费孝通三位先生从40年代中期开始就刻意和政治保持距离，守持学术基础，走另一条路径。因此，社会学家的学术角色导致了其在学术场域中的不同位置和学术取向，并因而导致其身份、影响力乃至学科发展的差异。最后，陆远指出，社会学学科在20世纪的困境根源在于中国社会变迁所选择的道路本身，同时，其学科内部的多歧性对于当下的学科反思则具有重要意义。

接下来，孙飞宇副教授以“关于自恋的现代性研究：以潘光旦的‘冯小青研究’为起点”为题展开报告。潘光旦先生的冯

小青研究首先以《冯小青考》的形态呈现于1922年，并于1927年得到进一步补充。孙飞宇指出，潘先生该研究的初衷一方面在于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对女性“不谅解”的态度，另一方面在于女性不知如何解脱这一事实。因此，改造社会的两性观乃当务之急。潘先生在冯小青研究中最重要思想资源来自英文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即第21讲“力比多的发展与性的组织”。据此，潘先生指出如下四点：第一，冯小青的症状为“影恋”，属于精神分析中神经官能症的表现，即成人后力比多向早期同性恋阶段和自恋阶段的回流；第二，冯小青对自己的自恋不无认识，但并不够深；第三，冯小青自恋症状的病源在于家世、成长与婚姻；第四，冯小青在婚姻中受到重大打击而导致力比多回流至母恋阶段，因此，其与杨夫人的关系形似同性恋，而实即婴儿期母恋的外在表达。此外，孙飞宇从潘先生关于冯小青研究的余论中发现，潘先生的研究旨趣在于以现代视角理解女性，进而理解与女性相关的社会问题。同时，潘先生在讨论婚姻问题时指出，当时流行的自由恋爱实质是返回童年，因此无法承担中国人的现代人格；而婚姻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自由，还需要个人主体性的完全建构。因此，孙飞宇认为，潘先生“冯小青研究”的关键意义在于对社会学视角和精神分析理论这两项全新事物的运用。延续这一思路，后续研究可以在以冯小青为代表的历史人物与文本研究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自恋研究方面进一步深入。

刘亚秋副主任带来了题为“‘自明’与‘自觉’：社会科学中的主体形象——

以潘光旦《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为起点”的报告。刘亚秋指出，潘光旦先生在新人文史观所展现的“人”的形象不仅受到生物遗传因素影响，而且受到文化遗业、平生遭际的作用，尤其体现为潘先生社会理论中的“自觉”概念。在潘先生对小青之死及其自觉程度的分析中，“自觉”包含了“自明”、“自觉”、“自制”三个维度。潘先生认为，小青关于自己的精神状态有所察觉，但由于其“旧日之瓜葛未清”，且缺乏适当的亲人和朋辈，因而并未完全“自明”，“自觉”则更为有限，最终追寻历史上具备高贵品格的“美人”而去，香消玉殒。而如何实现自明、自觉乃至自制呢？潘先生认为，关键环节在于“去蔽”，而这需要调节社会关系、发展“为己”的教育以培养个人裁节的能力，使之“学为好人”，实现与社会的平衡发展。刘亚秋认为，潘先生的人化社会学可以去科学之“蔽”、重新关注整全的人，而将潘先生的社会理想及与之相关的学科建设思想纳入当下中国社会学的建设中，正有助于“人的科学”的实现。

评议环节，吕文浩副研究员对先前报告的四篇文章作出了点评。吕文浩指出，潘光旦先生1935年接受采访时曾表示，社会学人的学科基础应力求宽广雄厚，这一观点与帕森斯有呼应之处，印证了赵立玮研究员的观点。对于陆远的报告，吕文浩点评道，在1947年的比较中，潘先生部分采用日记作为资料，费孝通先生则采用公开发表的文章，其区别仍有待商榷。对于孙飞宇的报告，吕文浩补充道，潘先生的冯小青研究不但具备理论创新，而且文献

考证也很扎实。此外，关于刘亚秋副主任的研究，吕文浩认为，潘先生在冯小青研究中所探讨的“自觉”和后来谈的“自明、自强”存在一定差异，“自明”偏重于客观品性与理性上的自我认识。三者的连贯之处则在于潘先生研究中对于生物、心理因素的持久重视。

随后，凌鹏老师回应了刘亚秋副主任对其文章的评论。凌鹏指出，他文章中的“香草美人”恰恰是对冯小青自明、自觉的一种阻碍，而导致冯小青未能实现自明、自觉的因素则与孙飞宇副教授的报告相呼应。孙飞宇在报告中指出，潘光旦先生认为冯小青的力比多出现了回流。凌鹏进一步追问，其流向又是怎样的呢？这一流向是否会受到潘先生人文史观中所提及的“生物、际遇、文化遗业”因素的影响？凌鹏认为，对这一回流形态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是理解精神分析的重要部分。

闻翔副教授指出，同今天的常见误解不同，潘光旦先生对美国社会学传统并非没有关注。潘先生不但在国内首开对波兰尼《大转型》的讨论，而且同帕森斯颇有共鸣。1945年至1946年，潘先生阅读哈佛大学课程方案后感叹，帕森斯在哈佛将社会学系改为社会关系系的努力，与自己在清华主持的改革是相似的，二人的关联由此可见一斑。此外，对于陆远的报告，闻翔回应道，一方面，陈达的学术不但包括人口学，而且涵盖劳工研究、移民研究、口述史及民族志等多种面向与方法，因此不仅仅是一名技术专家；另一方面，潘光旦先生与陈达先生的思想的确存在张力，但并非国家化与民间化的区别。作为清华

大学社会学的前后两任掌门，二人之间的关系更多是相互欣赏、相互激励的。

本次纪念会的最后为自由讨论环节，马戎教授指出，在士大夫传统机制被根本改变的背景下，随着中国社会走到关键转折点，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下的身份与地位值得认真反思。在今天重新回顾潘先生等知识分子在当年如何思考、如何保持自己的人格，对我们这一代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渠敬东教授作总结发言。他表示，社会学从诞生之初，就致力于建立整全的学说，而反对人为设置学科边界。在学者意义上，潘光旦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士人。士人首先讲求的是做人，并且要把他的学问同完整通联的人格世界联系在一起。士人所关切的正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与民族、边疆与九州均被容纳其中。因此，超越愈发狭隘的学科笼槛、秉承“在天地之间”的士人传统与胸怀，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学尤其应该思考的问题。

（撰稿：张雪冷）



(七) 静园雅集

25

刘涛 | 习字·学书·作书——以古代书迹、书家为例



刘涛副教授

刘涛老师以《书法学徒记》为基础，围绕“字如何才是写好”的学书疑惑，以“习书、学书和作书”为主题，通过对古代书迹和记载的研读，探讨书法艺术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段落。

书法的创作，一支笔一页纸就可以完成，但书法艺术的学习，却足以贯穿人的一生。学书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书法是一门终身研究的技法。讲座伊始，刘涛老师首先对“书无百日工”的说法给予肯定。唐朝书家徐浩首先提出“书无百日工”的说法，批评书法速成说是“悠悠之谈”。书法作为美化文字的书写技艺，练就基本功需要十多年功夫，绝非三年五载就能速成。清朝书家杨宾也言：“百艺率三年可成，独书用毕生之力”。

书写的功夫，一是用笔，二是结字。在典籍中，习字、学书、作书常被不加区分地混用，刘涛老师则认为它们是书法学习由浅入深的不同阶段。刘涛老师首先针对“习书”和“学书”两个阶段的差异进行分析。《张家山汉墓竹简·史律》传达出三个主要信息。第一是入学年龄，“史、卜子年十七岁学。史、卜、祝学童学三岁”，

2019年11月20日下午，“静园雅集”第二十五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习字·学书·作书——以古代书迹、书家为例”。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刘涛主讲，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石主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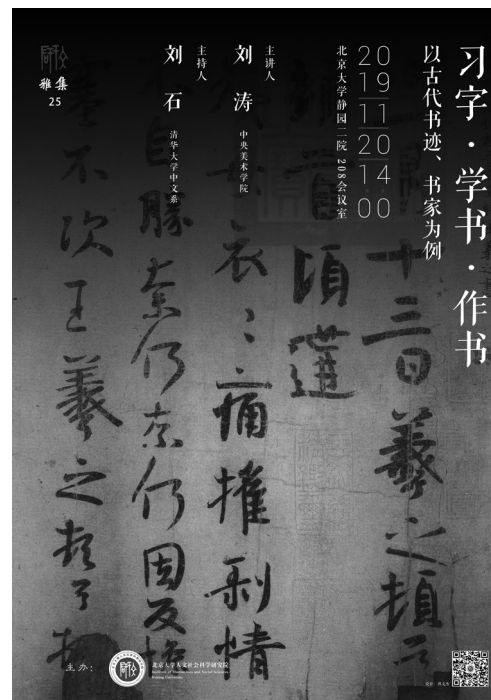
古人自童年开始读书，毛笔字的学习是每日都必须进行的功课。书法作为文史学习的一种爱好，从习字、学书直到作书，始于童年，经历少年，跨进青年，直至老年。书法艺术的学习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付出十几、二十几年的功夫。在本次讲座中，

学史的史学童入学年龄通常在十七岁，学三年，仍称“学童”；第二是考试科目，“学俱将诣大史、大卜、大祝，郡史学童诣其守，皆会八月朔日试之”，识读《史籀篇》，能够诵五千字以上的史学童可以为吏；第三则是录取标准，“有(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其八体课大史，大史诵课，取最一人以为其县令史，殿者勿以为史。三岁一并课，取最一人以为尚书卒史”，学三年后，经过两门考试，第一名是县令史，最后一名不得为吏。《史律》中规定的学童入学年龄，暗示了学习不同阶段。学史的“史学童”在十七岁之前不是白丁，具有基本的识读文字、书写文字的能力，相当于初学的“习字”阶段。入学后学习“八体”的过程，是“学书”阶段。通过学童书写能力参差不齐的结果看，书写的过程往往比识读的过程难度更大，周期更长。

不仅是史学童，在书家中亦是如此。王羲之虽未留下个人叙述，但是从相关文献记载中可以发现，王羲之童年随卫夫人习字。十六岁转师叔父王廙学书，至二十二岁，不及庾翼、郗愔。三十多岁才得到首肯。而文征明幼时“拙于书”，“书法不及人，遂刻意临学”。董其昌少时知其书法不佳，在《画禅室随笔》中也强调了“吾学书在十七岁时”。当代书法家启功，六岁入家塾，十一岁见《多宝塔》略识笔趣，二十岁得赵《胆巴碑》习之略久，其后杂临碑帖。作书阶段，其实仍在“学而时习之”。唐朝书家徐浩说，书法“宜白首攻之”；南宋陆游晚年退居家乡，《冬日》诗曰：“午窗弄笔临唐帖，夜几研朱勘楚辞”；晚明书家董其昌说：“吾乡陆官詹（陆深），

以书名家。虽率尔作应酬字，俱不苟且，曰‘即此便是学字，何得放过’”；王铎自道：“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学书过程的线索，学书是一个练习过程，并不是速成的百日工，习字阶段作为书写训练的基础阶段尤为重要。

刘涛老师指出习字阶段的目标，主要是训练基本的用笔方法，学会按笔顺构建汉字框架，把字写得端正。习字阶段自古相传的学习方法主要有两种方式：“临”与“摹”。临主要是对帖移写，摹则是用纸覆于帖上影写。从发生的角度看，临是早于摹的。临与摹两种方法各有长短，临写多得古人笔意（笔势），易失古人位置（结构）；摹写易得古人位置，多失古人笔意。习字阶段始于幼童，初识文字，习字进展慢，



因此要从描红字—写影本—摹帖—临帖逐步进展，提高学童的习字效率，所以将摹的方法细化为循序渐进的三个步骤。刘涛老师表示了对当下书写情况的担忧，在古代，最初的审美训练从习字开始，习字是学会基本的书写功能的基础，也是基本的审美训练。而当下，电脑的普及导致了书写动作的取消，手写汉字的协调性逐渐减弱，导致手与汉字的联系逐渐瓦解，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现象。

“学书”作为习字阶段的一个跃进，是练字的成长壮大期。一般人大约在17岁后转入学书阶段，这个阶段，已有习字阶段打下的基础，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训练日渐深入，控制力由弱转强，视野逐渐开阔，认知力不断提升，因而进步显著。从学书到作书的转变，是“破茧成蝶”的华丽转身。仍以王羲之为例，他十六岁学书，用时十余年，三十岁才得到首肯，四十岁之后写出新妍的“今体”书法。从习书到作

书的三段功夫，初段要专一，次段要扩大，三段要脱化，唯此才能从笔底进出天机，臻于不缚不脱之境。古人实用书写的基本能力，大抵在“习字”、“学书”两个阶段筑基，30岁左右才学有所成，转入自运的作书阶段，王羲之、颜真卿、米芾莫不如此。通过对颜真卿、米芾等大家的古迹研习，刘涛老师指出，书写动作决定形态，根据古人的字帖学习笔法，完成结构的完整。书迹是书写动作的记录，书写动作含有用笔技法，或者说，用笔的技法由书写动作来实现。临摹古人法帖，是追踪古人书写动作的便捷之法。由摹写名迹的形态追踪古人的书写动作，由书写动作学习动态的笔法。

本场雅集的最后，刘涛老师通过现场创作，与在场师生就书法的临摹、创作进行交流。

(撰稿：张若瑾)

26

T.M. 克里什那 | 音乐作为社会镜像

2019年11月27日晚上，“静园雅集”第二十六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音乐作为社会镜像”。印度音乐家、作家T.M. 克里什那(T.M. Krishna)主讲，北京

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赵悠主持，北京外国语学院亚非学院周欣老师参与讨论。

赵悠老师首先为大家介绍这位远道而来的音乐家：克里什那不仅是南印度古典音乐



T.M. 克里什那



赵悠助理教授主持

界最当红的演唱家之一，同时还是一名优秀的作家。由他所撰写的《南方音乐：卡纳提克史话》一书，不仅详细介绍了南方音乐的基本理论常识，还涵盖了许多印度的历史、文化、社会知识。与克里什那先生共同参加此次活动的还有他的学生，一位学习南方音乐15载的年轻演奏家。

克里什那由家乡社会背景开启本场讲座。他来自主讲泰米尔语的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所演奏的卡纳提克音乐(Carnatic Music)是一种拥有二百五十年历史的音乐形式。卡纳提克音乐最重要的三位演奏者生活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这段时期，他们是：提雅卡拉伽(Thyagaraja, 1767-1847)、穆图斯瓦米·迪克西塔(Muthuswami Dikshitar, 1776-1835)、萨马·沙斯塔里(Syama Shastri, 1762-1827)。值得一提的是，三人都出生于泰米尔纳德邦最为富饶的坦贾武尔区(Thanjavur)。12世纪时，该地区共经历三个王朝。到14世纪，毗奢耶

那伽罗帝国(Vijayanagara Empire)建立，并控制了泰米尔纳德邦偏北部的地区。这个主要讲泰卢固语的王朝在该区域拥有重大的文化影响力，成功抵御了波斯和伊斯兰的入侵，至于该地区传统的泰米尔语，则在这一时期内居于次要地位。16世纪末，毗奢耶那伽罗帝国覆灭，伴随着泰卢固人的向南逃窜，泰卢固语与泰米尔语共同在坦贾武尔区保留了下来，并成为该地区的“高文化”(high culture)。

就是这一时期，作为一种“高文化”，卡纳提克音乐产生并发展壮大。所谓“高文化”，并不只是由地理位置决定的，还与这种音乐的演奏者和受众群体密切相关。在任何社会，“高文化”都与语言、种族、宗教、性别等因素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而在印度的社会背景下，卡纳提克音乐之所以被界定为一种“高文化”，则是由其传统的种姓制度造就的。种姓制度将人们严格地划分进不同等级，社会身份固定，难以实现跨层级的流动。一方面，对于低种姓人群的污名



化始终存在；另一方面，最高种姓“婆罗门”掌控文化与宗教方面的权力，有权界定何为“纯洁”与“正统”——音乐也被这一部分人所掌控和垄断。到20世纪，卡纳提克音乐逐渐被三类人所占据：一是最高种姓的婆罗门，他们是卡纳提克音乐及其理论的主要书写者；二是维拉拉尔种姓人群（Vellalar），他们最早从事耕种和灌溉方面的工作，随着社会地位上升，自称“音乐的灌溉者”；三是在寺庙周边从事歌舞表演的女性。第三类人是卡纳提克音乐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却又常常遭到高种姓男性的侵犯，直到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达到顶峰时，“庙妓”的恶习才终于遭到废除。总之，种姓制度对于理解卡纳提克音乐的排他性质是十分关键的，因为从本质上看，音乐类型始终关乎人们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取向。

接着，克里什那回顾了自身的心路历程。作为一名高种姓、会说英语的男性，他坦言，自己从六岁开始学习卡纳提克音乐起就占据了极大的优势。然而，转变似乎是从内在的、个人的层面开始发生的。克里什那逐渐向这种传统的音乐形式提出了质疑：卡纳提克音乐作为一种历史悠久、高深莫测的“高文化”音乐，它的美感究竟在哪里？或许，卡纳提克音乐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谎言；又或许，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音乐自身，而在于演奏者和听众——卡纳提克音乐只是一种为他们营造身份优越感的假象。

音乐最神奇的魔力就在于不可触碰性，人们通过亲身体验获得内在感触。然而，这种“不可触摸性”却也造就了音乐的问题及其丑陋的一面：聆听音乐的体验往往过于精神化，而难以为大众所理解。音乐的宏伟深厚总能催人泪下，但与此同时，总还有人被排除在这种深刻的音乐体验之外。一方面，音乐的演奏场所决定了它的主要受众群体，那些喜欢听卡纳提克音乐的人通常来自高种姓社区，听众往往决定了音乐家们该说什么和该唱什么；而另一方面，音乐也构成了特定人群的一种宗教式的体验。宗教是卡纳提克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种姓人群相信这种宗教背后的道德与文化正统性，因此，卡纳提克音乐对于他们来说不只是一种抽象的艺术，而更是一种强化身份认同的重要仪式。至此，克里什那意识到，音乐本身往往受到社会、经济、政治与现实的影响。但是，等级性不应当成为卡纳提克音乐最明显的标识。音乐需要被质疑，而音乐家们也始终需要保有自我质疑的精神。克里什那所要面对的问题逐渐明晰：如何做一名反对种姓制度

的婆罗门？如何利用卡纳提克音乐本身来颠覆其背后所隐含的等级逻辑？

由此，克里什那开始了一次全新的创作尝试。创作起源于对其家乡钦奈地区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音乐由“poromboke”一词展开。在钦奈，这是一个俚语，指不值一提的、无用的人。这种用法的起源与英国殖民历史有关，那些得不到钱的土地被认为是无用之地，从而逐渐引申出了“别人不在乎的人”的用法。然而，“poromboke”其实还有着另一层含义，在英文中指“众生”（commons）。森林、湖泊、川流，都属于众生，而非某一个人的所有物。总之，以这样一个似乎带有侮辱性质的词语来开启一首卡纳提克歌曲，对于克里什那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而对于卡纳提克音乐语言的高种族性来说，使用这种露宿街头者的语言则似乎意味着某种颠覆。克里什那还为听众现场演奏了这首歌曲中的一个段落，歌词的主要含义大致是，“‘Commons’不属于你，不属于我，而属于大地”。总之，在这一次特别的实践中，克里什那进一步发掘了卡纳提克歌曲的叙事潜力。

更进一步地，他开始思考，如果在卡纳提克音乐的传统演奏场所表演这类歌曲，结果会怎样？反响是两极分化的：年轻人感到十分兴奋，而其他群体则表现出了不满和愤怒。克里什那进一步认识到，艺术并不是生活的必需，对于很多人来说实际上是一种奢侈。对于音乐家来说，外在的社会、政治环境则规定了什么样的演奏是被允许的，什么是不被允许的。克里什那转而思考，能否在街头演奏卡纳提克音乐？然而，对于街头的听众来说，卡纳提克可并不是什么高雅的

音乐，不过是一种噪音。克里什那发现了这项工作内在的困难性。音乐审美的背后通常蕴藏着一种坚固的意图，包含着社会身份和社会等级方面的规定。他指出，政治音乐和宗教音乐都旨在让人们臣服于一位领袖或神灵，而那些关切社会的音乐则往往由被边缘的人群创造的。而这也启示他反思纯粹技术性层面的知识，而更多关注那些书本之外的、鲜活的经验，并聆听社会的声音。

周欣老师就音乐与社会语境、对卡纳提克音乐的阐释等问题与克里什那展开讨论。相似的情境似乎同样在印度以外的土地上演。克里什那强调，人们应该从文化层面上与种姓制度展开对峙。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讨厌卡纳提克音乐，问题的关键在于赋予他们接触和进入的机会。克里什那也坦言，自己正在进行的是一项艰难的事业。文化的改变永远是缓慢的，但这也是实现彻底变革的唯一机会。因此，我们必须永远保持乐观，保有希望。同时，克里什那也提到了当前印度年轻人对于这一进程的关注。在私下的接触和交流中，他们逐渐了解和关注到了种姓制度的问题，甚至意识到可以对其提出质疑。同过去相比，这无疑是一种可喜的进步。

最后，周欣老师选取了克里什那在《南方音乐：卡纳提克史话》第一章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次活动的结语“艺术是被拥抱的自由、美、狂热和宣泄”，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平等地与艺术相拥。

（撰稿：朱睿吟）



27

王抒 | 将登太行——华北平原与山西高原间的古道考察

2019年12月6日下午，“静园雅集”第二十七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将登太行——华北平原与山西高原间的古道考察”。博物馆策展人、古道旅行爱好者王抒主讲，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主持。

在高速时代回眸古道、重走古道”。韩笑老师在介绍主讲人的古道旅行时提

到，在如今的高速时代，王抒力图以步行的方式重回古代，其探寻之路，深受导师罗新教授的影响。罗新教授在其著作《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中，记录了很多历史文献、乃至游记、考察行纪常常被忽略的角度，包含着行走中人的状态，情绪，并时时关注历史中平民百姓的生存生活状态。王抒的太行探寻，也力图从微观视角审视行路中的风土人情。

在北大历史系读书时，王抒开始走入太行山。在跟随导师罗新教授进行历史地理考察时，王抒初步领略了“将登太行雪满山”的壮阔。而太行山作为华北平原与山西高原间的天然屏障，由于河流切割，形成很多陡峭山谷，构成自古以来的天然孔道与重要关隘。这些通道中，最著名的



王抒主讲

是“太行八陁”。对“太行八陁”的记载最早出现在东晋末年郭缘生的《述征记》中，并在20世纪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中得到系统阐释。上述记载，为王抒的探寻提供了宝贵的基础性资料。

行旅太行，王抒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考察太行八陁，详细向在场听众介绍了各陁途径地区、战略意义与特别之处：如太行陁可被看作古代中国的中轴线，白陁是最险峻、亦是保存最完好的古道，井陁是最繁忙的古道，而飞狐陁是最壮美的古道等。在长达二十年的太行山考察、旅行经历中，王抒详细地探索了“太行八陁”的道路走向与不同时代的地缘政治意义，沿途的关口设置，以及古建筑、石窟、碑刻等地面文化遗存。天井关、娘子关、倒马关，关

王庙、阁院寺、云台石刻，一处处古迹映于眼前，而在分享沿途的所见所闻时，王抒认为即便走到分岔路，“走错路也是意义的一部分”。在古道考察的过程中，他不断与自己对话，思考关口、古建筑的意义，并仔细凝视碑刻上的文字，试图还原文字背后的历史场景。

从宏观视角审视太行八陁，王抒以“北魏太武帝东巡碑”为例，分析古陁中蕴藏的政治风云。北魏太延元年（公元435年），太武帝拓跋焘从都城平城出发，翻越太行山去河北平原巡游。究其东巡目的，一方面在于维稳，另一方面亦力图面对社会转型为制度改革做准备。而在回程路上，路过河北易县徐水河谷猫儿岩村时，太武帝张弓射箭，三军欢腾，震撼山谷。地方官诚惶诚恐，在徐水河谷立了三块碑以纪念这一神迹。寻找古碑定立的痕迹，时隔千年踏足同样的土地，王抒仍会感受到当时的政治宣誓与时代掀起的层层波澜。

“历史是一面多棱镜”。不愿屈从于“宏大视角”的一面之词，主讲人王抒另辟蹊径，从微观视角切入太行八陁。在地面上的人文遗迹与路上大人物的行踪之外，王抒将更多的笔墨与精力聚焦普通人——环视长城南北，在与“人”相遇的生动故事中，思考普通人的流动性与边境的游动性。行走在古陁之上，王抒力图寻找着宏大叙事中被遗忘的“沉默的大多数”。“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我们的记忆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在他看来，古道考察，意味着自由行走于大地上的权利与幻觉。

韩笑老师将王抒的行旅历程总结为“在古道上发现历史”，认为行走是一种对于历史的

诠释过程。与会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孙明教授同样以“游道”一词高度评价王抒的古道考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孙明教授认为，“游”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具有其自身的特色，蕴含丰富的文化体验。在他看来，跳出“摇椅上的历史学家”的框架，深入实地行走，有助于了解和体会特定情境中的人的状态，拓展为“沉默的大多数”发声的机会，留下资料层叠积累，进而踏出更加坚实的足迹。

提问环节，主讲人与在场听众围绕行前准备、行走见闻等进行深入交流，而王抒在交流中，进一步补充了其对之前古道考察的反思与思考。在之前的旅程中，与当地接触较少的他，在面对诸如“边界之争”、界碑订立时的边界碰撞与生活感受之类的小事时得以从微观的角度深入求索。王抒期待着此后能有更长的时段行旅考察，从而收获更多的资料、体验与故事。

（撰稿：章涵青）



（八）菊生学术论坛

16

议题整合与跨域对话：南宋史研究新的可能性



2019年11月2日至3日，“菊生学术论坛”第十六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议题整合与跨域对话：南宋史研究新的可能性”。本次论坛由文研院、商务印书馆共同主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博物馆、台湾“中研院”、长庚大学、成功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日本神户女学院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学习院大学等学术机构的三十余位学者出席并参与讨论。

本次论坛由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长庚大学原讲座教授黄宽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召集，主要围绕制度沿革与继承创新、地方人物与社会样态、碑铭文本与时空背景三个议题展开讨论。

第一场：制度沿革与继承创新

第一场讨论以“制度沿革与继承创新”为主题，首先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虞云国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引言，与谈人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华瑞、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教授平田茂树。

虞云国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绍兴体制与转向内在”，试图回应刘子健教授提出的“中国转向内在”与寺地遵教授提出的“绍兴和议体制”等议题。虞云国认为，北宋中期虽然出现过“良性政体”，但实际上并没有跳出君主专制的框架，并且是昙花一现的。王安石变法时期的特殊相权以及宋徽宗时期的君相关系，使得宰相由官僚组织代言人逐渐变为皇权代理人，这是南宋绍兴以后权相泛滥之权舆。

虞云国谈到，目前学术界影响较大的唐宋变革论与宋元明变革说所包含的时间框架，正好可以在两宋之际交汇，这也是他为什么如此关注刘子健、寺地遵提出的关于两宋之间的变革的学说。他认为，绍兴和议的意义远远超越了政治与外交，不妨称之为“绍兴体制”，这是南宋君臣在内外困局的压力下追求效率与独断的自觉选择。他认为“绍兴体制”有三大要件：军队必须姓赵、以专断维护独裁、权相。这一体制深深影响了宋孝宗及其后的南宋各代，尤其对精英阶层与精英文化的影响最大。

虞云国最后提出关于“南宋八百年”的假想，即以“绍兴体制”为代表的所谓“南

宋模式”是否影响了元明清时代，这种影响能到什么程度？

刘志伟教授的发言着眼于贯通。他提出，目前财政史研究均以断代为时限，但是基层税收、财政制度等并非以断代为时限，这经常导致研究南宋和明代财政的学者各说各话，似乎南宋与明代的财政制度毫无关系。因此，他向在座的宋史学者提出疑问，明代财政实践中的许多问题，是否也可以在南宋的财政实践中找到。刘志伟认为，南宋与明代的许多财政实践都有着相同的变化趋势。明代宣德、正统以后的许多财政制度改革并不完全是体制的创新，而是向南宋财政制度发展轨道的回归。

与谈人李华瑞教授发言的主题是反思。他提出，南宋史研究者应该跳出南宋史，将视野投向更长远历史阶段与更广阔的历史空间。他认为，从总体上看，由唐至明的制度发展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从唐经辽、西夏而入金元，再到明代；另一条是从唐经五代至北宋，再由南宋发展到明代江南。这两条线索影响下的历史，在研究中不宜混为一谈。具体到南宋史研究，他认为应该重视中西交通史议题的开拓，有助于对南宋史整体的认识。最后，他对流行的“宋代近世说”与“宋代文化造极说”进行了反思。

与谈人平田茂树教授介绍了自己进行“政治空间”议题的研究心得。针对前几位学者的发言，他提出，应该重视南宋人对于北宋的认识，以及南宋人怎么看两宋之间的变革。

接下来，论坛进入讨论环节，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主持，发言的学者包括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家齐、北京大学历

史学系教授张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邱靖嘉，以及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讲师丁亮。

第一位与谈人曹家齐教授阐述了他关于南宋制度史研究取向的几点思考。曹家齐教授首先谈到了对南宋制度史的综合性问题。对从事制度史研究的学者而言，如果缺乏对制度的整体性认识，而仅仅站在特定角度，并从自身比较熟悉的领域出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南宋整体制度所做出的评价难免流于片面。其次，学者们还应对制度内容进行追根究底式的理解和把握。在曹家齐教授看来，“理解”制度内容还可以细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扫除文献中关于制度的“沙粒”，即是提醒学者们在阅读文献材料的过程中，应当对相关术语、概念等内容加深理解，从而尽可能消除研究方面的障碍，拓展自身对制度的认知。其二则是对制度内容的进一步追问。

之后，曹家齐教授就南宋中枢体制“三省合一”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纵观整个两宋时期行政体制的变化，南宋中枢体制“三省合一”的地位和意义足以与元丰改制相提并论。他说，如果站在南宋的立场上，对隋唐以降三省制的运行轨迹和终结问题进行观察，就会发现三省制的实际运行时间极为短暂。而这一点恰恰是研究南宋中枢体制“三省合一”问题时需要注意和反思的。

第二位与谈人张帆教授以“元灭南宋再探：综合过程的考察”为主题，从另一角度透视宋元政权更迭之际值得研究者们思考的现象。其一，元征服南宋过程之顺利，甚至出乎元统治者的预料，更与“书传三千年，未有如此者”的重大变局形成强烈反差。在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发言

张帆教授看来，造成这一反差的原因或许在于南宋与蒙元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战争已经使南宋臣民对政权的覆灭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其二，由宋入元的南宋士大夫阶层，无论选择入仕或是退隐，几乎全然采取较为平静的态度接受了朝代鼎革的变局。即便是观察那些寄寓了亡国哀思的诗文，也不难发现作者基本上是站在王朝兴亡而非民族大义的角度上来进行写作的，文天祥的作品也不例外。其三，元朝制度在南方的推行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包括赋税制度在内的部分制度在向南方推行的过程中经历了因地制宜的调整，但是大部分制度仍是由北方“照搬”至南方并得到强制推行，其中就包括钞法和诸色户计等。然而这些在理论逻辑上与民生休戚相关乃至可能引起较大波动的举措，史料对其影响的记载却似乎着墨不多。总体而言，元对南宋的战争以及战后政权的过渡没有遭遇大的挑战，其原因需要更为深入的研究。

紧接着发言的与谈人邱靖嘉副教授从辽金史研究出发，探讨了将宋史和辽金史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的可能性。当下，宋史研究学者与辽金史研究学者之间互不了解，存在比较明显的隔阂。但是，在涉及南北关系以及南北政权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交流问题时，南北贯通的意识和全局观念尤为重要。在邱靖嘉看来，辽、金王朝对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模式多有沿袭。如果将辽金政治制度与唐宋相联系，并将具备可比性的部分纳入宋史研究的视野，那么对于双方都大有裨益：一方面可以大大深化辽金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深度；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宋史研究提供新的议题。

最后一位发言的是丁亮博士，他发言的主题为“明代徭役体系的双向流动与财政里甲的调整”。虽然主要着眼于明代财政史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但他所思考的有关“宋元明三代的制度在运行原理方面是否具有关联性”的问题，则发人深省。丁亮博士首先厘清了明初财政体系设立的基本原理，即租庸调和两税在“赋役财政”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并由此引出另一个问题——“赋役财政”的出现是否是对宋元两代财政体制的弊病进行反思的结果。另一方面，明代财政体制建立的基础是里甲制下的“配户当差”。可以肯定的是，这种“配户当差”与元代的诸色户计密切相关，而里甲制度则大抵与宋、金、元的“里社”制度存在着某种联系。他认为，明代财政体制呈现出一种排斥自主流动性的特征，而这种特征的出现应当与对前代经验有选择地吸收有关，特别是在审编户基方面，明初对前代户税体制的继承尤为明显。

在丁亮看来，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物流的运行方式与北宋王安石变法之前的情况十分类似，二者都属于基于财政的物流方式。但宋明之间也存在着些许不同，主要表现在明代物资流动过程中呈现出的分散性和小规模性，以及处在“贡赋财政体系”下的地方政府主要是征发徭役进行物资运输的。

总的来说，徭役、市场、货币等因素究竟在明代经济流通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仍值得研究者重新思考。而这种运行原理和分析思路与宋史研究成果在具体层面上有哪些可以类比之处，以及在此基础上相互借鉴、彼此助益的方法，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自由讨论环节，日本学习院大学教授王瑞来首先就虞云国教授的发言提出了疑问，即“南宋政治能否概括为‘绍兴体制’”。王瑞来教授认为，宋高宗与追随他的臣僚所采取的举措，其出发点一是在于维持政权的存续，二是在于争取正统地位，而非完全是对政治体制的强调，因此“绍兴体制”这一提法仍有待商榷。

虞云国教授也对此做出了两点回应：第一，通贯性的理论概括是冒险之举，也难以面面俱到；第二，将“绍兴体制”与“南宋八百年”两个概念相结合的目的，其实是在于强调中枢权力结构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都会对历史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影响。

第二场：地方人物与社会样态

11月2日下午，第二场论坛开启，主题为“地方人物与社会样态”。引言人为台湾长庚大学原讲座教授黄宽重、中国人民大

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与谈人有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鲁西奇、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高柯立、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林岩、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博士候选人童永昌。

黄宽重教授作了题为“从刘宰对京口人物与社会的书写看南宋基层社会”的引言。黄宽重指出，我们需要对南宋史作更深一层的反思，尤其是我们对基层人物的研究不足，而基层人物对于构建基层社会的面貌有其作用。南宋史料的特点，使得我们可能更丰富这一时期的底层人物的形象。他选择了刘宰这个出身在基层社会并长期处于南宋的“非核心区域”——镇江——的人物做研究，从他面向基层社会的书写上可以看到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的力量不完全来自官方与精英阶层。

刘宰一方面与朝廷要员保持着联系，并通过向上反映地方舆情，促进了本地赋役的减免。另一方面，他在镇江当地积极推动社仓建设、桥梁建造、赈灾等事业，这些事业的推动反映出基层社会乡土力量的凝聚，即自己的乡土由自己来救。刘宰在当地三次赈灾，是通过仿效佛教的方式从当地获得赈灾捐款。除此之外，他还通过平反陈东，揭示乡里意识及知识在南宋的意义。黄宽重还指出，基层社会研究相关材料比较零碎，这是一大弱点，为克服这一弱点，需要通过长时间的研究，建立材料的时代背景与时空环境之间明确的联系，这样在谈论的时候就会比较有基础，并需要群体研究。

包伟民教授带来了题为“走近沉默的大多数——从陆游的乡村社会说起”的引言。

陆游留下的诗文篇章丰富，所写日常生活详尽，使得我们可能从陆游出发认识南宋的乡村，认识南宋基层社会的“沉默的大多数”。陆游作为个案，有以下意义：一，他是南宋浙东乡村中一个中上水准乡居士大夫的生活范本；二，可反映士人在乡村社会角色的某些侧面；三，由陆游所感知与描述的江南农村社会的其他一些生活场景，如乡民们的居处、生计、贸易状况，等等。

包伟民教授以陆游诗中提及的小麦种植与麦食情况为例，展示了其诗对学术界极受关注的稻麦复种制的“具像化”的表现及其意义。稻麦复种制在宋代是否普遍，在学术史是有争议的。而从陆游诗作来看，至少在他生活的时代，麦作对于浙东山地地区农村经济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诗人口中麦作的种植地域也很清晰：大多种在坡地。不过，细心体会诗人的咏吟之作，似乎也透露出某些信息，平原水田也是有麦作的。从饮食来看，麦食在浙东地区已经相当普遍了，“村店卖荞面”，为社会各阶层人们所接受，并非局限于西北流寓之人”。据此，包伟民认为南方地区麦作的推广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当地人口自然增长所带来的对粮产需求的扩大，以往研究中可能过分强调了西北流寓人口的影响。其次，包伟民还就“碎片化”史料的意义、明清文献的潜力，以及历史研究走向基层的多样可能性及议题整合的可能性进行了延伸思考。

赵世瑜教授与谈的主题为“从历史人类学思考宋史的三个进路”。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的理念和方法能否为历史学研究者所参考？赵世瑜认为，有三条进路可以尝试——一、区域研究为长时段研究开辟了道路，区

域社会史的研究是不用朝代作限定的，它只划分阶段，有些社会结构的形成完全可以从宋代讲起。二、从人出发，格尔兹称人类学家不是“研究村落”而是“在村落里研究”，把村落换成人，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从现实的人出发研究历史。如唐代道士叶法善，非道教研究者一般不牵涉到他，但浙南很多地方自称是他的后代，这就不仅仅是一个道教的事，而是一个社会的事了。三、以今测古，如苏州地区水域被开发成陆地的过程，往往要从宋代民间在这里的开发和定居说起。

鲁西奇教授讨论的主题为“金朝的华北与南宋的江南：区域比较的视野与贯通北南的可能”。他指出，在史家眼中，“南宋”自然是相对于“北宋”而言的。但在宋金、宋蒙对峙格局下，“南宋”之“南”，却是因为金与蒙古之“北”，此其一。

其二，治南宋史，亦多着意于南宋对于北宋的沿续与变革，即将南宋置入于“宋史”的系统内进行考察；而对于南宋君臣士民而言，更重要的关切是据有北方的金国，以及在对峙格局下的“生存”与“适应”，故而南宋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诸多变化，乃是因应于与金国对峙这一政治现实而做出的。

其三，南宋社会经济的变化，大致是继承中唐以来一系列变化的脉络；但很难确定它开启了元明清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在元明清的发展历程中，“南宋”的脉络或者只是一条线索，甚或为一较弱线索。他提出，金元时代北方地区社会的变化，与南宋以降南方地方社会的变化，是否具有某些一致性？它们在元代的情形如何？

高柯立教授与谈的主题是“南宋地方社会中的官府、豪强和富户”。高柯立指出，

以往学界对于宋代社会阶级结构有很多研究，但对于地主和国家关系的关注较少。但从史料提示我们，在南宋时期，地主和国家的关系，尤其是豪强和官府之间的对抗性关系特别突出。这种现象为什么出现在南宋，是否具有时代性，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他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南宋地方社会的复杂样貌。地方之上始终有朝廷和监司存在，它们与地方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平江府的学田案中可看到史弥远的身影，朱熹按劾唐仲友事件中可看到宰相王淮的存在。越诉不断发生，也是朝廷与地方发生关联的途径。地方社会也不是铁板一块，州、县官府之间、官与吏、知州与通判之间存在着冲突和矛盾。地主阶级中也存在着差异和矛盾：豪强（官户、吏户）与富户之间的诉讼。

第二，官府与豪强/富户的合作或对抗。事实上，地方势力若与官府采取合作的态度，往往会被称为长者；而若把持县政或武断乡曲，就会被称为豪强，受到抨击。第三，国家与社会的视角：时代性与地域性。近年来学界日渐重视宋代地方社会中国家的影响力，这使我们需要进一步从国家与社会视角来审视南宋地方社会的变化。

林岩教授带来题为“文学如何呈现历：南宋退居士大夫与浙东乡村社会一些尝试性的研究路径”的报告。他提出了尝试新的研究路径的三个话题。第一为“退居型士大夫”的提出。退居型士大夫往往有全国性的声望、较高的文化素养与重要影响力，不同于乡绅，也不完全等于“地方精英”——地方精英范畴太广，而这些士大夫在乡间仍有“东山再起”、影响朝政的机会。由“退居士大夫”

这个概念的提出，我们可以讨论这些人物退居后的家居生活与交际网络。

第二为陆游诗歌里的浙东风情画地域视角下的南宋乡村社会研究。可作“文学文本的人类学解读”，例如利用陆游完整的诗作，可重建当地的市场、气象情况，作一个乡村社会的整体史的图景建构。第三为晚年陆游的社会角色政治与文艺视野中的退居士大夫。从诗中可看到家庭生计、租佃关系、陆游社会关系、陆游作为诗坛领袖的存在等内容。

童永昌博士发言的主题为“以地方社会为整合单元：溧阳县献地案的几点观察”。我们对地方社会的了解，往往受到书写者的套路修辞的影响，奏议、方志、笔记、墓志、家谱等材料都有其固有的书写格套，即使是文集中的诗文，也大量存在修辞上的套路，文人书写乡村，往往着重于描述农人的淳朴和辛勤劳作，而忽视乡村生活的其他方面，如基层社会中的暴力冲突，就几乎无法在文集中反映出来。

基层社会包含了复杂的空间，人在不同的空间生活，其经济条件、自然环境、与人来往机会、能够动用的资源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如果用大数据来看宋人书信的通信对象，很多其实往往是住在设有驿站的城市附近的，相对于直接住在乡村中的人，他们能够取得的有关乡村的信息是很有限的。

就基层社会的形象而言，民间形象的全面而真实的面貌与士人的描述往往会存在很大差异。乡间大概没有什么文人雅士的聚会，而是存在着众多如赛神会这样的宗教活动，这些活动的性质，以及时人在其中的情绪与心态，与文人描述出来的乡村社会往往会有

很大的不同。另外，宋代的乡村一样充满着暴力，这从司法材料里面可以看到，因而实际上在地方社会的具体形象的展示，往往很难描述。

自由讨论阶段，与会学者们还就陆游在地方社会书写中蕴含的多面性的价值趋向、国家通过制度对地方社会的控制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第三场：碑铭文本与时空背景

11月3日上午，论坛进入第三场主题讨论环节，即“碑铭文本与时空背景”。

第一位引言人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他指出，墓志碑刻有田野实物、博物馆实物、拓本、录文四种形态，文本以外的物质性信息，主要指墓地的田野状态。北宋中期墓志铭和神道碑在文本内容和形式上开始趋同。清代金石著录的“墓志铭”，实际上就是竖立于地面的墓表，而非埋藏地下，功能是壮观瞻，而非文本阅读。今日考古出土的，多是圹志。由于人死后有葬期限制，孝子贤孙为尽快将先祖入土，便简要撰写圹志，只是为了“千岁之下，陵谷变迁，仁人君子，幸而掩之”，即用于辨识。同一人的圹志和其文集集中的墓志，体例详略差别很大。这是因为“葬日薄，（孝子）未暇乞铭于当世立言君子，姑叙梗概，以纳诸圹”的缘故，这些话既是圹志末尾的套话，也是实情。

南方地区流行夫妻“异穴合葬”，墓室以墓壁隔开，圹志或随葬于墓内，或字口朝下，覆盖于墓顶，没有一定之规，但夫妻墓志不会混淆。中原地区则流行土洞墓，斜坡墓道，或竖穴墓道，地下单墓室或多墓室。

这种情况下，要么同时完成合葬，要么打开墓穴安葬后葬者，这就增加了辨析墓主身份的难度。多边形穹顶仿木构的单室墓，夫妻多人甚至多代人“同穴合葬”，按辈分尊卑排列，苏轼的“夫妇死有先后，葬后死之人时，如见先死之人尸首腐败，恐伤孝子之心”的感慨，是有感而发。安置后稍有扰动，则考古发掘时就很难厘清所有墓主身份。有些墓室排列十分自由随意，如吕祖谦墓，他安排前后两任妻子非常随意，自己也葬于两妻左侧，这样的考古信息尚未进入史学家视野。

墓志，在家族墓地中有其固定的位次。墓志一旦脱离现场，则失去了大半史料价值。家族墓地的排布，提供了重大信息，而一旦转化为拓本或录文而没有及时记录考古现场信息，则位置、昭穆排布原则等信息就永久失去了。家族墓地的发掘，墓志在原先墓地的分布形态，价值不在文本价值之下。

第二位引言人是台湾成功大学教授刘静贞，她首先提示我们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即如何认识一个时代。既有知识和时代印象、社会映像，对认清一个时代是促进还是阻碍？而作为史料的墓志能提供一个时代新的面向，其中虽然存在很多虚构乃至程序化的内容，但仍能揭示宋人思想文化的信息。

在性别议题上，刘静贞提出应探究性別的意涵。引入性别研究的意义何在，究竟是妇女史、性别史还是女性史？研究对象与分析工具，是人还是性别？她提出，性别研究既是生命史，也是生活史。妇女研究，研究的是人；而性别研究，研究的是概念。把人当作分析工具时，既关注到性别，也关注到人。最后，刘静贞提出拼贴“碎片”的可能性。她指出，摸到片段之后，如何去“表达—聆听—



与会学者合影

理解—组合”，将之置于结构性位置之中，是学人可以努力的方向。把握唐宋元明的时代性，要注意到宋人在继承文明上接回古典的努力。

与谈环节，第一位发言的是慈溪市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厉祖浩。他首先向与会师生介绍了宁波碑志情况，指出从唐到宋元，砖石墓志230种，未公开的有四五十种。唐五代砖石墓志较少，只有58种，砖志占一半左右。由于砖志文字极易刷掉，因此实际数量要更多。北宋1060年前极少，而南宋以后的则较多。瓷墓志出土地域范围很小，其葬地大多集中在余姚上林、梅川、龙泉乡和慈溪鸣鹤乡，这一区域是唐宋时期的越窑中心产地，部分瓷墓志主人即为瓷业匠人，甚至有监窑官，记载了当地乡里村保的情况。

接着，他提出了墓志整理应遵循的原则。墓志整理，提供的是尽量信息完整的档案，

而不是单纯的墓志文本。因此应遵循原志优先、拓本次之、文献录文再次的原则。应尽量不以个人观点作取舍，不作精选或选集。尽可能记录墓志的相关信息，包括出土时间、地点，流传、收藏情况，质地、形制、装饰、尺寸、行款、字体。释文要做到文本完整、释读准确。

第二位与谈人是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王瑞来。他指出，需要注意墓主家人和墓志撰写者意见的不同，而墓志虚美隐恶的体例其实具有思想史意义。过去我们只关注墓志的史料信息，但两位考古界学者则启发了我们要注意其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墓志本身即展现了一个历史。大数据时代，面对纷杂的史料，单纯考证的含金量已大大减少，思考的力量非常重要。谁都可以熟练处理史料，但一个好的研究者一定能从文字中体会到思想的力量。回到现场非常重要，但任何人都无

法脱离今天的认识框架，需要怀有现代的情怀和省思。

接下来发言的是日本神户女学院大学准教授小林隆道，他讨论的主题是碑铭文本与时空背景。他首先指出，应探讨历史信息的重层性，历史信息在史料上被写，史料的物质载体也包含历史信息。接着，他提出“视觉”信息的重要性。碑铭文本文字并不是抽象的信息，而是带着“书体”的具体存在。他介绍先前考察金代赐额敕牒的时候，努力从其“书体”抽出历史信息，复原其官卖制度全貌。他又以《洪福禅院牒》为例，指出第一行是“尚书礼部牒洪福禅院”，第二行是“尚书礼部牒”。在录文上看到其部份，两行“尚书礼部牒”只是相同的历史信息。但从拓片看，会发现两个“尚书礼部牒”的书体不同，可以理解两个“尚书礼部牒”是不同的历史信息。

之后发言的是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副研究员周曲洋。他指出，正如邓小南教授所言，“材料”与“议题”是历史学家需尽心处理的对象。扩展南宋史研究，石刻与族谱、宋元与明清、国家与社会等议题，在族谱资料的牵动下，具有进一步对话的可能性。

他举例介绍今年黄忠鑫先生在上海图书馆藏清宣统三年《富溪程氏祖训家规封邱渊源合编》中发现南宋宝庆元年的户帖抄件，这是目前学界发现的第一件宋代户籍赋役文书，对推进相关研究具有较大意义。阿风、张国旺先生在明隆庆二年《瑯溪金氏族谱》中发现5件南宋公文书抄件，其中一通咸淳六年的印纸批书恰可与此前出土的《武义徐谓礼文书》相互发明。

族谱除了可以为南宋史的研究提供资料外，其自身也是可以挖掘的议题。族谱对世系群的发展和结构具有影响，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史书，汉唐以前族谱主要是世家大族的世系谱，宋到明清族谱的兴起有其实际应用的背景。宋代的小宗族谱有其实际意义，如科举提供家状，这部分内容很难靠口传延续下来，这在宋代读书人中应是必备的。很多人拿到告身，就会立一个户头，在赋役上得到优免。为整治泛滥问题，需要官户提供本族族谱。如《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收录的举子家状，不只在应举时必须提供，在荫补、铨选等场合也多有应用，内容均包含曾祖以下的出仕情况，其中出现以高祖立户的情况，可能与官户免役相关联。

自由讨论环节，与会学者首先围绕碑刻填讳的细节问题展开讨论，如填讳人为谁、填讳在丧礼流程中的位置、填讳是否具有礼仪性等。其后，高柯立就小林隆道对公文文体的叙述提出不同意见，指出公文可能是印刷的，庙碑上重出的文字则可能是庙自己刻上去的。小林隆道回应指出，金与宋存在差异，金朝是官卖牒，提前准备好敕牒；宋代则并非印刷。

林岩就性别议题进行阐发，指出研究墓志中对女性的地位想象很低，但实际情况是上层女性既有名还有字，甚至强调比夫君有才华，这一现象要注意。面对女性墓志时，可以考察其知识女性的面向。研究宋代女性，不能整体化看待，应区分层次。刘静贞指出，一些上层人物对于女性墓志铭是存在反对态度的，在注意事实的同时，应观察观念的发展趋向。

自由讨论

11月3日下午的自由讨论环节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家齐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主持。

第一场讨论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易素梅首先发言。易素梅认为，明清史研究者在本次学术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对宋史研究者具有极为深远的启发意义，能够促使宋史研究者进一步反思和自问。例如刘志伟教授所提出的“宋代差役的货币化与明代的异同”问题，可以引导宋史研究者深入思考宋代货币化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与市场化的意义。

关于刘志伟教授提出的问题，周曲洋分享了自己的理解。明代施行一条鞭法，就此由实物财政转向纳银代役。这一转变看似是由明代中后期商业发展所带来的，但刘志伟教授却认为这恰恰是白银作为价值尺度的意义为明代政府所认识并试图用以解决赋役承担的公平问题的结果。相对应的，北宋王安石变法也有类似之处。虽然免役钱最终没有完全用于差遣民户，但它所呈现出的进步意义不可小觑：免役钱的缴纳，扩大了役法的覆盖范围，进而使负担更趋于平均。而后，包伟民教授对周曲洋的发言进行了补充。对宋代而言，统一的价值体系的缺乏、混乱的货币发行和流通体系、不同地区间差异和隔阂的存在，使得政府无法实现对差役负担的全国性核算，同时也面临着将差役折算为货币的种种阻碍。不可否认的是，南宋后期在某些区域内确出现了将免役钱摊入田亩之中的现象，但这一做法并未推广至全国。当下利用宋代残存的史料，与明清两代的地

方志中保留的部分材料加以拼凑，或许能够大体描绘出南宋后期的相关状况。

赵冬梅教授则针对郑嘉励研究员谈到的与墓志相关的问题提出了三点疑问。第一，通过观察司马光在墓志写作方面的经历，可以发现司马光本人追求的是一种“极简主义”的碑志写作，即直书墓主的姓名、家世、官衔、子嗣等基本信息，而不再着意于对墓主的吹捧。而南宋时期的扩志无论是在行文，还是在形式方面，都与司马光推崇的“极简主义”十分接近。这种充满了“极简主义”意味的扩志，是否与南宋时期对葬期的限制有关，而这其中是否又隐含着葬俗的变化？第二，北宋前期在墓志与墓碑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区分。通常情况下，墓碑立于地面，墓志埋于地下。而南宋时期则出现了大量立于地上的墓志。这种转变是否与国家控制相关？第三，北宋仁宗至神宗时期，出现了许多达官显宦的子孙纷纷向朝廷申报，请求为下葬多年的先人立碑的现象，即“远年立碑”。而这种现象与南宋时期的“远年立志”是否存在着某种相似性？

郑嘉励研究员对此做出了简要的回应。关于葬期问题，郑嘉励研究员解释说，南宋时期葬期限限制所约束的群体主要是皇室成员和上层士大夫集团，而非平民。此外，墓志由埋于地面向立于地上的转变，不能用制度或者国家控制等观点进行笼统地解释，而是应考虑到其与宋代社会整体世俗化之间的联系。

而后，林岩教授以南宋中后期退居士大夫群体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为话题，阐发了对南宋史研究的思考。他指出，在分析研

究南宋地方社会时，应在层级性的视角下对其进行观察。比如通过研究退居士大夫与地方豪强、富户之间的势力对比，可以进一步探讨退居士大夫与地方豪强、富户乃至胥吏之间构成的权力共生关系问题。

南宋史研究历来重视史料，在理论层面上则常常借用明清史研究的框架和概念。然而后两者是否适用于南宋时期，却值得思考。林岩教授提醒，在这一对接过程中应当注意到南宋史与明清史的差异。

与会者就“为何要称这一群体为‘退居士大夫’”以及“南宋退居士大夫与官户在特权和影响方面有何异同”进行发问。林岩教授回应说，宋代士大夫远离庙堂之后的生活状态与唐代士大夫阶层的隐居存在较大差别，而“退居”二字在宋代的使用也非常频繁，因此林岩教授在这一群体的称谓方面选择了“退”，而不是“隐”。

针对南宋士人群体的形成问题，黄宽重教授认为，在南宋以后士人群体才取得了主流地位，而士人社会的形成则是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善、教育的普及、经济的发展与印刷术的进步这四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南宋时期的士人主要分化为两个群体，一种是入仕后经历不断升迁直至成为高层士大夫，另一类是入仕后无法得到升迁的机会，因而始终徘徊在官僚集团的底层士大夫。前者与地方社会发生关系的契机又可细分为被贬回乡与退休归隐两个类型。被贬回乡的士人仍旧保持了一定的名望，因而几乎不会受到政治形势变动的影响，同时还能在地方社会扮演重要的角色；退休归隐的士人发挥他们的“余温”，也成为了构建地方势力和社会文化的重要力量。

而对于在地方待阙或因政治变动回归乡里的士人来说，由于抱着被再度起用的希望，所以在地方社会发挥的作用并不那么明显，也不会对乡里进行长远的、大规模的经营。黄宽重教授认为研究者们应该多多关注宋代出现的大批“流浪型士人”。这些“流浪型士人”大多由于屡试不中而无法获得入仕为官的机会，因此只好选择利用所学知识转而从事占卜、教育等行业。他们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同时与中高层士大夫集团存在广泛的交往，在从业的过程中不断走向专业。这类特殊的群体固然远离政治，但也在各自专业领域内开辟了一方生存的天地。

王瑞来教授从“宋元变革论”的角度表达了对南宋地方士人群体的认识。从真宗时期开始，科举考试的规模不断扩大，由此形成了士大夫政治和“新士族”。到了南宋时期，“新士族”这一概念所涵盖的范围有了进一步扩大，甚至有某些隐居不仕者的家族也被称为“士族”。基于此，学者们应当准确把握南宋时期地方社会对“士族”和士人群体的界定。

第二场讨论中，学者们主要就南宋的“士人社会”及墓志铭材料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虞云国教授将林岩教授提出的“退居型士大夫”与王瑞来教授提出的“新士族”联系起来，认为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探讨南宋的“士人社会”。他接着提出一个想法，这个“士人社会”的议题能否与明清时期的“乡绅”议题相接驳，或者产生一些联系。平田茂树教授接着提出，在界定、区分士人身份时，必须考虑同时存在法律规定的身份与社会生活中的实际身份的区别。

高柯立副教授就“退居型士大夫”的概念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所谓的“退居型士大夫”并没有突出的群体特点，难以聚焦成为特定的研究模型。其次，高柯立强调地方社会的复杂性，对南宋“士人社会”的提法也表示不能认同。鲁西奇教授接着指出，如果要考察南宋是否存在“士人社会”，应该从地方社会上所谓的“士人”群体的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即其权力的来源、身份的获取方式及掌握资源的情况。而赵冬梅教授则提醒称，很多情况下断代视野与研究可以帮助提出问题，却不能帮助解决问题。

平田茂树教授指出，士人的意识很多情况下集中体现在其墓志铭的撰写之中，并就墓志铭的研究状况向刘静贞教授提问。刘静贞教授呼吁大家将目光投向墓志铭研究。她接着指出，在研究中不能只使用墓志铭这一种单一材料，还应该关注书写者写作的其他文本，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书写者的意识。黄宽重教授认为，透过墓志书写，可以看出写作者的社会关怀与人际网络。他以刘宰为案例，分析其同学、家族、乡里等关怀对其墓志书写的影响。

王瑞来教授最后说道，研究者在阅读墓志材料时会带着一种期待，期待着能得到新的材料，但其实我们对传世文献的利用还远远不足，因此，他呼吁大家在关注出土文献的同时，不能忽视传世文献的重要性。

总结致辞

自由讨论环节后，三位召集人分别致辞。包伟民教授认为，这次会议的特点是学科交叉与跨域对话，会议开拓了许多新的议题，但是新知主要并不体现在具体议题上，而是

体现在思维方式上。在这次会议中，他获得了三个启发：第一是研究视野应该从单线观察取向转变为多线观察取向，关注制度表象与实质之间的联系和差异；第二是明清两代的历史研究会与宋史研究产生巨大的冲击，呼吁大家跳出就宋代论宋代的局限，将视野放大，关注后代历史；第三是应该通过多种途径与方法整合议题。

黄宽重教授指出，以往的研究在谈论变革、转折等问题时，往往忽视南宋历史，这是因为曾经研究南宋历史存在许多困难，现在这些困难已经被逐步解决，因此他呼吁年轻学者关注南宋史。在研究视野上，他认为研究南宋史的关怀与期待必须超越南宋，在研究资料上，他认为不能使用单一材料，要大力开拓文集，尤其是文集中由各种不同文体所呈现的材料。

邓小南教授指出，本次会议经过充分的对话，就议题进行了聚焦和延展，整合出了一系列多元的议题，这些议题提供了许多挑战性的思考，希望各位同仁在提出问题的基础上，以问题为导向，跨越断代和领域的局限，做出更好的研究成果。

（撰稿：郭洋辰、吴同、胡文杰、相璇
校对：郭洋辰）



（九）多文明工作坊

08

咎涛 | 奥斯曼主义的起源? ——对“Gülhane Hattı Hümayunu”(《玫瑰园敕令》)的翻译和释读

2019年11月23日下午,“多文明研究”工作坊第四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该期工作坊分为两个话题:“奥斯曼主义的起源?——对“Gülhane Hattı Hümayunu”(《玫瑰园敕令》)的翻译和释读”,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咎涛主讲;“从灵魂到心理:关于经典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研究”,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飞宇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范晶晶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陈侃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张嘉妹、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贾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王洪喆、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赵悠出席并参与讨论。

讲座伊始,咎涛老师就“奥斯曼主义的起源?——对“Gülhane Hattı Hümayunu”(《玫瑰园敕令》)的翻译和释读”这一主题展开讲述。他首先介绍了奥斯曼主义的起源以及《玫瑰园敕令》颁布的背景。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奥斯曼帝国出现了稍早的近代政治,东西方思想开始产生碰撞。然而,在1839年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登基之前,学习西方基本上限于军事与器物层面,而较少涉及制度方面。真正对奥斯曼帝

国形成刺激的来自帝国内部,尤其是埃及叛乱带来的挑战。穆罕默德·阿里建立起其在埃及的统治后,依靠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经济,并逐渐获得了一定的独立地位。奥斯曼帝国感受到了来自埃及的巨大威胁,亦发现了其改革与发展的巨大进步。在《玫瑰园敕令》颁布之前,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想平定埃及未果,郁郁而终。

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新思想逐渐对奥斯曼帝国形成了冲击。为了得到英国支持,伊斯坦布尔给予英国很高地位,其使臣在伊斯坦布尔的地位甚高。

在这种背景下,《玫瑰园敕令》颁布。起草者穆斯塔法·莱施特担任过驻英、驻法大使,不仅从小受传统宗教教育,还精通法语和英语,而这在当时的土耳其大臣中并不多见。《玫瑰园敕令》颁布时,公布了法文和奥斯曼文两个官方版本。

1876年,土耳其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回顾历史之时,人们将《玫瑰园敕令》视为改革的起点,并赋予其为后人所知之名。尽管这一文本备受历史学者重视,但很多研究者其实并未参阅过奥斯曼文的原版。现在多被人引用的英文译本,其实产生于19世纪

后期,也是直接从法文本翻译而来的,承袭了法文本中不同于奥斯曼文本的地方,因此,英文和法文版本几乎可以视为同一个版本。

咎涛老师此次报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比较《玫瑰园敕令》的法/英文本和奥斯曼文本的区别。奥斯曼文本中含有大量传统词汇,而在对一些关键概念的表述中,法文本与奥斯曼版本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奥斯曼文指的是1928年土耳其文字改革之前的文字,是一种书面语,含有大量来自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外来词,后来也逐渐有一些西方词汇进来。1940年和1957年,两位土耳其学者分别使用拉丁字母对奥斯曼文原版进行过转写。此外,日本学者也有对该敕令的部分翻译,或结合土耳其文的研究对敕令的内容进行了概述,并将一些关键的词汇如“国家”、“国民”等从奥斯曼文译成了日文汉字,对本研究有一定的帮助。

随后,咎涛老师就不同文本中出现的多个例子进行了汉译,并做了具体的比较和阐发。比如,他提到,奥斯曼帝国的自称是“Devlet-i aliyye”,直译就是“伟大国家”,引申或许可以译为“天朝上国”,而法文版本中直接用的是“la monarchie ottomane”或“l’empire ottoman”。法文中用“Les principes glorieux du Coran et les lois de l’empire”对应奥斯曼文中的“ahkam-i celile-i Kur’aniyye”(《古兰经》的真主之言)和“kavânni şer’iyye”(简单说就是符合“伊斯兰教法”的各种法律),而有时,法文中又用“lois”指代“kavânni şer’iyye”。如果只读西文的话,奥斯曼语境中的“法律”之复杂性和特殊性就不易感受到。



咎涛副教授

再如奥斯曼文中的“millet”,咎涛老师指出,“millet”本有宗教共同体的含义,但在原文中已经大致有了现代“nation”的意思,日本学者已经将其翻译为“国民”,法文本中是“frères”(英文本是“brothers”)。这应该是反映了从“millet”向“nation”的过渡。

咎涛老师列举了在多处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别。从中可以看出,在法文和英文版本中,出现了大量现代词汇,与奥斯曼原文中的传统词汇形成鲜明对比。可以说,文献所承载的不仅是革新和宪章这种后世的解释,还包括时代的历史细节。在近代转型时期,思想表现在词汇上的差别是比较明显的。通过比较英、法文和奥斯曼原文的这种差别,我们可以看出从传统时代走过来的思想和制度痕迹。这种对原文的细读和不同版本的比较是非常有必要的。

随后,工作坊进入讨论环节。陈侃理老师首先对法文本作者的身份和法文本与奥斯曼文差异形成的原因提出问题。咎涛老师回应认为,目前对法文本作者的确切身份,

知道他是奥斯曼帝国驻法大使，法文本应当经过他手，因此，奥斯曼文和法文几乎是一个作者，只是针对的对象有所不同。为了让外国使臣能够理解和接受这一敕令，结合西方受众的特点，其与奥斯曼原文的差异是可以理解的。包括强调拿破仑以后在西方世界影响较大的“帝国”概念。尽管奥斯曼文的版本中并没有这一概念，但在法文本中，凡是提到天朝、政府、国家等概念时，经常以“帝国”指代。

范晶晶老师指出，由于奥斯曼文本和法文本面对的人群不同，法文本所面对的是外国使臣，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法文本或许是为了给外国的使者塑造一个开明帝国形象，展示出一种理想的君主化形象。咎涛老师肯定了这一点，同时还与范晶晶老师就《玫瑰园敕令》采用法文而非英文这一历史问题进行了探讨。

孙飞宇老师则就不同翻译背后呈现出的主张或观念所形成的张力进行问题。对此，咎涛老师回应，奥斯曼文本的原文中并不存在很多后世学者所强调的明确的现代主张，所要表现的恰恰是伊斯兰的正义，而在法文

本中则呈现出了一个力求迈向现代的国家的理想。奥斯曼文版是宗教语言包装下的模糊的现代，而法文本中过滤掉了其中的很多宗教因素。但哪一个更真实呢？学界其实到目前还是有争议的，咎涛老师认为奥斯曼文的版本更真实，法文版更可能是一种“外宣”作品，到那个时候为止，奥斯曼帝国改革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他们自身。但即便如此，在宣读敕令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反叛的声音，认为其偏离了正道，即要使非穆斯林和穆斯林适用于同样的法律。

张嘉妹老师从巴基斯坦语的角度对本次报告中的关键词翻译进行补充，并围绕着“millet”、“Ülke”“vatan”等词在巴基斯坦语与奥斯曼语中的含义进行比较与阐述。同时，她也就奥斯曼帝国在制度上的建树问题与主讲人进行探讨。

赵悠老师与王洪喆老师分别就法语“Frère”、奥斯曼语“millet”与英语“brother”等词的翻译问题及奥斯曼语到现代土耳其语的转化与后期转写问题与主讲人进行了讨论。

(撰稿：钱婧)

个部分，一个是弗洛伊德本人用德语写作的原著；而在全世界范围内更为知名且影响力更大的，则是由詹姆斯·斯特拉齐（James Strachey）和弗洛伊德小女儿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共同编辑且主要由斯特拉齐夫妇所翻译的《弗洛伊德心理学作品全集标准版》（*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英文标准版的出版和德文文集的出版在时间上叠合，在英文世界中，标准版是最权威、最具影响力的版本，成为了精神分析研究的经典。

孙飞宇老师以弗洛伊德寄给其美国英译者的一张明信片为切入点展开讨论。这张明信片写于1909年，也就是弗洛伊德从美国克拉克大学访问回到维也纳之时。弗洛伊德在明信片中隐约指责了英译者不懂相关主题的语言，也并不了解这一领域。1909年是弗洛伊德人生的转折点。在此前十年，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在欧洲遭受大量批评，却发现自己在美国受到热烈的欢迎。

英文标准版译文集所发生变化的实质特征是文本的理性化，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概念的理性化，在美国学者贝特海姆看来，该英文版误译的核心在于标准版译文集中将原著中的德语“灵魂”（Seele）一词翻译为了英文中的“心灵”（mind）。这一翻译将弗洛伊德的思想机械化，也抽离了原著中“灵魂”这一概念的深度意涵。翻译的过程体现了将弗洛伊德的工作科学化的努力，但其文本并非纯粹意义上的科学研究，而是扎根于欧洲文学史的作品。

第二是译文的理性化，英译本对弗洛伊德的写作艺术有了一定的清除。英译本去掉了弗洛伊德原文中丰富的地方性经验、德国

文化传统、犹太人传统以及与现实的关联。孙飞宇老师以《凯瑟琳娜》为例进行阐述。在对这一案例的翻译中，斯特拉齐将患病的女孩卡萨琳娜在与弗洛伊德的交谈中所发出的两次惊叹“Jesses”，分别翻译成为了“Heavens”与“Goodness”。这一翻译上的变化取消了这一感叹在凯瑟琳娜无意识中的重要意义以及对于精神分析研究的重要性。另外，由于原文是弗洛伊德根据自己的记忆所完成的，所以，对这一词语的考证也是理解弗洛伊德的重要线索。

第三是系统的语法修正，斯特拉齐在翻译多拉的两个梦时将原文中的现在时改成了过去进行时。在弗洛伊德的工作中，现在时态是最能充分表达、传递梦之内涵的时态，而英文中的过去时则体现了医疗诊所报告的行文风格。弗洛伊德本人的写作极具文学化色彩，但英文版在时态上的改变则将弗洛伊德的写作工作客观化、医学化和科学化。

随后，孙飞宇老师就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进行了探讨。首先是作者本人的主张，译者斯特拉齐夫妇是弗洛伊德最得意的弟子恩斯特·琼斯（Ernst Jones）的弟子，在标准版一文集中所采用的核心概念翻译大部分来自琼斯的工作。斯特拉齐在标准版译文第一卷的前言中明确表示了翻译科学化的主张，弗洛伊德本人对此也是知情的。而根据弗洛伊德的主张，在翻译中这一科学化的处理方式也有其道理。弗洛伊德在未发表作品《科学心理学大纲》中罗列了庞大的自然科学术语，以量化的方式进行研究，体现了其曾将“自然科学”视为精神分析的属性。但这仅仅是弗洛伊德对于精神分析属性所作界定的一个方面。对于作品的错误翻译是弗洛伊德

09

孙飞宇 | 从灵魂到心理：关于经典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研究

孙飞宇老师就“从灵魂到心理：关于经典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研究”这一主题进行

讲述，讨论弗洛伊德作品英译过程中发生的异化。弗洛伊德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分成两



孙飞宇副教授

对于精神分析最大的担忧。他最担心的是，精神分析在未得到充分理解的情况下就被广泛接受了——尤其是在美国，这一担忧最典型地体现在明信片上。

其次是实践的理性化与“业余精神分析”问题。美国译者从 1895 年开始翻译介绍弗洛伊德的作品，自此，精神分析在美国的实践发展非常迅猛。但是，此时的精神分析在美国已经变成了精神医学和神经领域的分支科学，对此，弗洛伊德非常反感。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学界发生巨大冲突的原因是其中体现了重大的问题，且必须加以回复，即什么人可以从事精神分析以及应该以何种形式进行精神分析？1926 年，弗洛伊德撰写了《业余精神分析》一书。“业余”，指的是不具备行医资格的人。该著作回应的主要问题是，不具备行医资格的人是否可以从事精神分析。1925 年，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制定了一个新制度，要求美国的精神分析师必须具备医学学位。弗洛伊德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弗洛伊德认为，在精神分析过程中所需要的

知识体系，即文明史、神话学、宗教心理学、文学等，与医学院的教育相去甚远。精神分析的唯一主题是人类灵魂的进程，而弗洛伊德同样是希望通过官能症这一“非正常”的现象来思考“正常”人的灵魂机制。

随后，孙飞宇老师对弗洛伊德反对英译本科学化翻译这一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弗洛伊德反对理性化、科学化文本的重要原因在于英译本中所代表的科学态度意味着医生和患者之间“移情”现象的真正消失。移情既是精神分析的发现，也是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精神分析的起源之初，移情是他从安娜·O 这一案例中所获得的最大的启发之一。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英译本对于精神分析文本的处理意味着移情的消失，而选择成为一种纯粹的现代科学文本。对于弗洛伊德而言，这样一种英文文本和与之相关的职业化的精神分析实践，完全改变了精神分析。

最后，孙飞宇老师围绕“英译本代表了什么”这一问题进行讨论。《释梦》一书的结尾，是弗洛伊德那句著名的判断“Die Traumdeutung aber ist die Via regia zur Kenntnis des Unbewußtenim Seelenleben”。在琼斯的翻译中，原文中的拉丁词语“Via Regia”并没有被保留，而是被翻译成了“royal road”。“Via Regia”的概念在弗洛伊德有着明显基于欧洲历史与弗洛伊德生命史的自我认同意义，但在英译本的改动下，这一概念与弗洛伊德本人的历史与主体性就没有关系了。弗洛伊德往往会在某些概念极为挑战世人道德感或者对他自己产生挑战的时候，使用拉丁文。英译本上述这种做法可以使得精神分析的文本在产生疏离感的同时，较易为大众所接受。

孙飞宇老师指出，正如在弗洛伊德那里，梦在欲望和现实之间建立了一个安全空间，英译本也成为了弗洛伊德的梦。

标准英译本已经成为了一种有待于理解的时代现象，与 20 世纪美国变迁有着重要的联系。在当时，精神分析理论为了进入美国，必须被纳入职业系统；而在知识传播路径上，为了使之具有普适性，也须进行一定意义上的变形。在此背景下，英译本更像是德文本删减版。通过分析二者之间的差异，德文的原意更加清晰。1937 年，行至暮年的弗洛伊德在《可终结的和不可终结的分析》中谈到了英译本篡改德文原意的事实，这也是弗洛伊德所有作品中最接近这一问题的文章。尽管在 20 世纪早期，英译本最重要的目标是使精神分析变成心理学与医学的一部分，那么，这一努力最终失败。

讨论环节，王洪喆老师引申出了美式公共关系之父爱德华·伯尼斯（Edward L. Bernays）的话题。伯尼斯自称是弗洛伊德的外甥，一战之后，他最早将精神分析引入了美国的现代营销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就是 1929 年美国烟草公司（American Tobacco Company）在大萧条的背景下，为了打破女性香烟禁忌，扩大市场，伯尼斯采纳了弗洛伊德的早期译者、精神分析师布里尔（A.A. Brill）的建议，将女性解放与吸烟建立关联，策划了纽约复活节的“自由火炬游行”（Torch of Freedom），并取得重大成功。伯尼斯和布里尔将精神分析理论运用于商业活动，在伯尼斯的自述中有更明确的政治和社会野心，他认为大萧条带来了社会混乱和消费不足，解决社会不稳定的方法之一是通过消费释放和接合社会诉求，这

改变了原来大宗消费品营销只注重实用性的历史，启动了消费社会的进程及其批判。结合孙老师的梳理，有趣的是，在一战到二战的时间里，精神分析师的职业化与政治化产生了关联。如何理解弗洛伊德的英译在这段历史中的位置？在这一时期，美国知识分子与社会之间的关联更为复杂，而二战之后，随着心理学的进一步职业化，这种有机性反而消失了。

孙飞宇老师对此进行回应。二战后，美国代表性的社会学家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将弗洛伊德的知识当作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在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时，成为社会运动的推手。正因为此，社会学在美国受到了大量来自市场和政府的强有力批判，社会学的领域收缩到了科学研究的领域，并与社会建立了清晰的界限。运用数理方法进行研究逐渐成为美国社会学研究的主流，随后，社会学研究逐渐变成了科学文本的写作。

贾妍老师围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与巴比伦的问题、基于德文文本的弗洛伊德研究和基于英文文本的弗洛伊德研究之间的差异问题与相互影响问题同主讲人进行探讨。范晶晶老师则就美国借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将催眠作为治疗手段的问题向主讲人进行提问。

最后，与会者还就弗洛伊德的《摩西与一神教》、弗洛伊德与文明研究者、弗洛伊德研究在当代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本次工作坊在热烈的讨论中落下帷幕。

（撰稿：钱婧）





静园学术

刘曙光 | 中国“申遗”的路径选择 ——从钓鱼城遗址的考古疑难说起

2019年11月29日下午，“中国‘申遗’的路径选择——从钓鱼城遗址的考古疑难说起”主题讲座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原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刘曙光教授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郭卫东主持。

讲座伊始，刘曙光教授即表示，了解世界遗产对当下文化建设、文化领域的决策和思考具有重要意义。他首先分析了世界遗产的定义，以及这一概念诞生的背景和过程。“世界遗产”立足于全世界、全人类，要求保护珍贵的、面临威胁、可能消失的文化和自然财产。刘曙光教授援引于1972年通过、并于1975年正式生效的《世界遗产公约》，介绍了世界遗产的官方解释。世界遗产包括三层含义：其一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全人类罕见的、不可替代的文化和自然财产；其二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和自然景观；其三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经过法定程序申报和审议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

随后，刘曙光教授举例说明了世界遗产的类型。世界遗产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混合遗产。其中，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古迹、建筑群、遗址，以及作为特殊类型的文化景观；自然遗产包括自然面貌、动物和植物栖息地、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定



刘曙光教授主讲

的自然区；混合遗产指自然与文化的双重遗产。从历史、艺术、美学、人类学等不同角度看，这些遗产都具有某一方面的突出价值。

通过回顾自1972年起的历代世界遗产名录，刘曙光教授指出，早期确定的世界遗产在地域分布上存在失衡现象，主要集中于美洲、非洲和欧洲，其标准以欧美为中心设计。他简要分析了世界遗产中的特殊案例戈雷岛，指出它作为黑奴贸易的中转站，在人类历史中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据2019年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范围内世界遗产共有1121处，包括文化遗产

869处，自然遗产213处，混合遗产39处，数量大大超出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预期。刘曙光教授认为，遗产类型的分布并不均衡，文化遗产在其中起着引领作用。接下来，刘曙光教授深入分析了不同地区的文化遗产以怎样的方式统一在“突出普遍价值”这一概念之下。为衡量世界遗产是否具备普遍价值，世界遗产委员会确立了一系列标准，其中六条与文化遗产相关。刘曙光教授对“突出普遍价值”的定义进行了简要介绍，表示这些标准最早是根据欧洲的文物保护理念和实践总结提出来的。他据此回顾了世界遗产概念的三大源头：其一是对战争导致文化遗产遭到破坏的反思；其二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环境保护运动；其三则是同一时期拯救努比亚文物的国际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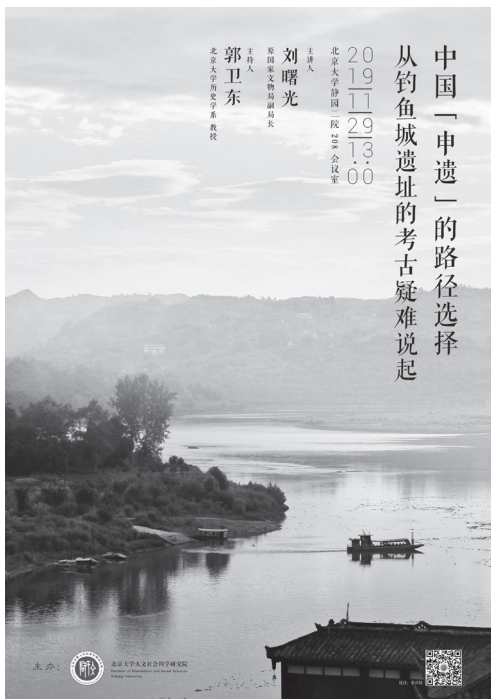
刘曙光教授介绍，二十世纪初已经出现海牙第九公约等有关条文，以及保护、抢救战区文物古迹的相关组织。195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中更明确提出：对任何民族文化的损害亦是对全人类文化遗产的损害。刘曙光教授认为，对比以往将掠夺和破坏文化财产作为战争手段的常态，这一认识突破了国家、民族、种族的局限，站在人类立场上看待重要文化财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思想观念的进步对后来世界遗产的产生具有重要作用。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则开始关注古迹保护和修复，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技术和方法上的准备。

围绕环境保护运动与世界遗产概念的渊源问题，刘曙光教授提到，美国最早建

立环保性质的国家公园，成立信托基金委员会，从保护生态的角度开展工作。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会议《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提出，“为现代人和后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成为一个紧迫的目标”。这一论断对世界遗产的诞生起到催化剂作用。拯救努比亚文物国际行动则以阿斯旺水坝的修建为背景，教科文组织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刘曙光教授认为，该国际行动背后还隐含着苏联和北约两大集团的对立。

回归“世界遗产是什么”的问题，刘曙光教授认为，世界遗产改变了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认识，代表了进步的、文明的、美好的、崇高的理想体系。世界遗产是一套根据现代科学方法建立起来的、与时俱进的有效制度。刘曙光教授列举了这一体系之下的相关法律文件，并强调，加入公约意味着承担相应承诺，缔约国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随后，刘曙光教授简要介绍了世界遗产保护的层级结构以及申报的制度过程。入选世界遗产有三点基于突出普遍价值的必要条件，即遗产地需满足至少一项评价标准、满足完整性和真实性的条件、满足保护和管理的要求。因此，申遗除了前期准备和正式申报的繁复工作，在列入名录之后仍要求进行检测、影响评估、定期报告等。不过，对于濒危遗产则会简化申报程序。

接下来，刘曙光教授介绍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入公约、参与申遗的过程。其中，侯仁之、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等著名学者的联名提案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5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批准议案；



同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公约缔约国。刘曙光教授认为，中国的加入对增强公约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具有重要意义。在介绍中国申遗第一阶段（1986-1995年）所得成果时，刘曙光教授提到，教科文组织曾对中方提出建议，如增加具有体质人类学价值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将泰山与黄山列为混合遗产。这一时期，中国申遗项目以宫殿及反映宗教信仰的纪念物或建筑群为主，多为古代传统文化、艺术、建筑最高水平的代表作。

1996年到2005年是中国申遗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社会的文物保护意识增强，城镇化进程对文物的破坏也引发热议。国家与地方对申遗有着高涨的积极性，申报渐入佳境。遗产类型仍以建筑群为主，

除了重要的历史建筑群、文物古迹，也开始采用“历史城镇”、“系列遗产”等新概念。2006年至今是中国申遗的第三阶段，刘曙光教授将这一时期的主调归纳为“调整与稳步发展”。近现代遗产受到更多关注，突出反映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巨大变化以及重要的历史阶段。刘曙光教授以大运河申遗为例，介绍了围绕其范畴和定义展开的一系列讨论。他归纳了近十年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趋势：积极利用新类型遗产概念，重新认识遗产价值、更新申报策略；关注活态遗产，注重中国文化多样性和社区传统的表达；加强大型组群文化遗产的申报和管理，发挥遗产的区域带动效益。

随后，刘曙光教授展示了2019年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并据此对申遗路径进行分析。他将影响申遗的要素分为国际、国内两类。其中，国际因素包括遗产理论的增进和深化、世界遗产委员会申遗策略的调整、预备名单设置的要求、中国在世界遗产大家庭中的成长。随着新文件的出台，世界遗产格局与相关概念也发生了变化，文化遗产类型不断丰富，申遗之风从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乃至落后国家普及推广。申遗规则、优先方向与领域的改变同样影响了中国申遗的路径。刘曙光教授强调了“大形势”对中国申遗的影响。他以申报大运河、丝绸之路为例，说明了文化景观、文化线路等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另一方面，国内因素则包括对世界遗产的认识和理解、国家战略、地方动力、部门分工与协调等。

关于中国的申遗之路如何往前推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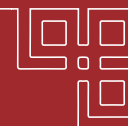
刘曙光教授给出几点建议，认为应当研究新的申遗策略，做好统筹安排，提高申报项目的质量，且始终坚持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他也指出现阶段存在的难点，即如何处理好申遗过程中的历史与文化问题。当下，中国申遗基本从官方的历史观与文化观出发，体现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定位以及多元一体、兼容并包、绵延不绝的文明体系。刘曙光教授认为，应从国家的、民族的、长远的、整体的利益出发，加强世界遗产语境下的史学、考古学、文化化学研究。

最后，刘曙光教授着重分析了重庆钓鱼城案例。钓鱼城体现了独特的历史区位因素，钓鱼城之战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重要的军事奇迹，该地在民国时期抵抗外敌侵略这一维度上具备重要的文化意义。通过现代考古挖掘，一部分遗址位置已被确认。但刘曙光教授指出，钓鱼城申遗涉及“如何界定蒙古和南宋战争”等历史观、民族观方面的问题，申遗之路依旧存在争议。本次讲座最后，刘曙光教授总结，无论钓鱼城是否申遗成功，我们都应该端正心态，回归世界遗产的初心。今后的申遗工作方向，也应从重视数量转向重视质量，使中国真正成为世界遗产的大国和强国。

（撰稿：陈洁樱）



文研回望



“胡语写本与文明传承”学术论坛在文研院举行

2019年11月5日至6日，由文研院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主办的“胡语写本与文明传承”论坛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本次论坛汇集了19位国际中古胡语写本领域的前沿学者，围绕开放语文学、粟特文碑刻文本、楼兰语假说、于阗语与希腊语关联性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国际著名伊朗语专家、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英国科学院院士辛威廉（Sims-Williams），国际知名粟特文专家、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语言学系教授吉田豊，荷兰莱顿大学区域研究所教授司空竺（Jonathan Silk），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斯特凡·鲍姆斯（Stefan Baums），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邦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等学者参会。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段晴担任论坛召集人。

本次论坛聚焦中国新疆地区，以该地区出土的“胡语”写本为中心，集中探讨处在交融状态中的中西文明。中国新疆地区，处于不同文明交汇地带，包括古代的希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都曾经活跃在新疆绿洲，是“一带一路”沿线历史上文明交融互鉴的生动体现。“胡语”书写文化，有其鲜明的特征，记录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生动案例。所谓“胡语”写本，记录了公元后一千年里，生活在新疆丝路南道的各个绿洲居民所使用的印欧语系古代语言。

“胡语”原非书写语言，却先后发展出书写文化。“胡语”何时、如何采纳了非原创文字，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书写文化，也是本论坛的关注点之一。

讲座专场环节，司空竺围绕“原本本缺席的文献”和“开放语文学”展开讲座。

他认为在面对语言不同、叙述有一定差异的文本时有必要建立一个“文本关系网”，可以用电子的方式建立语料库，从而更合理地探索过去的文献，这就是“开放语文学”所需要做的。吉田豊则围绕“九姓回鹘可汗碑粟特语铭文”展开叙述，他对该粟特文碑刻的文本进行了详尽说明，认为除在语言研究方面的意义之外，该碑刻在畏兀儿草原帝国“天可汗”的身份认定问题、摩尼教的传入问题、阿拔斯帝国和畏兀儿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都能提供新的见解。

随后，议程进入楼兰语专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胡兴军全面介绍了楼兰地区的考古发现，包括小河墓地、咸水泉古城等地的发掘情况，并根据考古遗存推测咸水泉古城应为公元前77年前楼兰国都城楼兰城，而斯文·赫定所发现的LA古城，则是楼兰更名为鄯善国后迁都所建的扞泥城。参会学者们围绕德国吐火罗语专家施密特的楼兰语假说展开发言。通过对于施密特所采用的原始文本和翻译本进行的细致分析，学者们认为施密特的楼兰语假说是不令人信服的，他的解读还需要进一步的修订；但同时，施密特的假说也有着纪念性，引导了通向新闻释的工作开展。

在于阗语分论坛上，辛威廉结合文本分析了于阗语中元音u的用法和含义。参会学者们其后以现存的于阗语文本为基础，结合阿拉伯语和梵语资料，澄清了文本细节，并探讨了与于阗有关的史实背景，还以具体单词为例，综合其他文献进行考察，提出了一些可能的解释。通过对文本间关联的探讨，学者们对现有于阗语研究进行了语音学和词源学上的补充，并在考古发

现的基础上指出于阗语与希腊语等其他语言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本次论坛为相关领域学者提供了跨学科的国际交流平台。文研院将继续发挥平台优势，围绕“文明：中华与世界”这一核心议题继续联动相关机构，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将上述议题推展到新的面向。

（本文于2019年11月15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周诗雨）



论坛现场



“故宫与故宫学”系列学术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讲座 在北大举行



全体嘉宾合影

为进一步加强北京大学与故宫博物院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交流，延续北京大学与故宫博物院近百年来良好合作的传统，2019年10月20日，北京大学与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此背景下，文研院与故宫博物院故宫研究院携手，迅速落实双方学术方面的合作机制，推出了“故宫与故宫学”系列学术活动，邀请故宫研究院的知名专家学者来校举办讲座、论坛。

11月29日晚，“故宫与故宫学”系列学术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讲座“故宫文物南迁及其历史意义”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故宫博物院故宫研究院院长、原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担任主讲，文

研院院长邓小南担任主持。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副院长赵国英，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叶静漪出席活动，300余名师生到场聆听。

在启动仪式环节，叶静漪首先致辞。叶静漪对文研院开启的“故宫与故宫学”系列学术活动表示祝贺，并对故宫博物院给予的全力支持表示感谢。她表示，在学校与故宫合作框架下，文研院与故宫研究院通过互派学者举办讲座、组织学术对谈、设立课程等形式，开展全方位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成效显著。北京大学与故宫博物院的能够迅速地生根落地，充分说明了双方在共同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有着深刻的自觉与共鸣，也有着广泛的合作前景。她相信，共同的使命、深厚的渊源

将激励北大人和故宫人携手共进，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文明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王旭东表示，北京大学与故宫博物院的密切关系是不可替代的。历史上，北大与故宫曾是邻居。今天，故宫博物院向北京大学敞开胸怀，希望北大学术研究的团队与成果走进故宫博物院，走进文博界。“故宫与故宫学”系列学术活动的推出，将会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注中国文化遗产事业，进而真正树立起文化自信，将故宫学推向新高度。

郑欣淼以“故宫文物南迁及其历史意义”为主题进行讲座，深入探讨了故宫博物院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故宫文物南迁”的深远意义与影响。与世界各大著名博物馆不同的是，故宫文物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文化载体，是中华民族世代所创造积累的，是民族智慧和创造力的体现，反映了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辉煌历程，因此在整体上也寄附着、反映着国家命脉、民族精神。故宫文物南迁历程艰辛，其历时之久、迁徙地域之广、任务之艰巨均为世界罕见，是人类保护文化遗产的壮举。故宫南迁文物得以完整保存，其艰辛的播迁历程也使故宫文物与国家命运、民族精神紧密联系。在整个决策和实施过程中，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其中不乏北大人的身影。故宫文物在南迁和北返的过程中，与其他文化机构共同开展了文物清点、典籍校抄、公开展览等工作，对西南诸省的文化事业

产生了重大影响。故宫先贤奋力守护故宫文物，积极举办文物展览，严格制定规章制度，不仅保证了故宫文物在战时的安全典藏，而且培育了“视国宝为生命”的典守精神，时至今日，仍然鼓舞着广大故宫人。

讲座结束后，叶静漪代表北京大学及文研院向郑欣淼赠送了讲座海报以作纪念。

10月以来，北京大学文研院与故宫研究院通力合作、共谋发展，推出了多项合作机制，实现双方学术人才和学术资源的流动与开放。11月，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著名秦汉史专家李开元，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陈苏镇先后应邀赴故宫研究院举办讲座，拉开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系列学术讲座”的序幕。未来，北京大学和故宫博物院还将在教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继续保持高度密切的合作。2020年春季学期，文研院还将联合历史学系、艺术学院，邀请故宫资深专家在校开设“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与鉴藏”“明清宫殿建筑与宫廷陈设”精品课程。

（本文于2019年12月2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刘雨桐 王瑞）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莫洛金·维亚切斯拉夫访问北京大学文研院

2019年11月26日—12月9日，应文研院的邀请，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莫洛金·维亚切斯拉夫（Molodin Viacheslav）访问北京大学，并作为特邀访问教授在文研院作三场主题讲座，与来自北京大学校内外学者和学生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交流。

莫洛金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青铜铁器时代考古研究室主任，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人文学院考古学与民族学教研室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考古学。自1973年起，莫洛金任西西伯利亚考古学队队长，曾在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南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以及蒙古、日本、叙利亚、加拿大、古巴等地区进行发掘。在他领导下，俄罗斯考古队在阿尔泰山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发现与研究了重要的巴泽雷克文化遗址。莫洛金在西西伯利亚、南西伯利亚地区发现和研究了多处重要的考古遗址，并建立和完善了该地区考古文化发展序列。他发表学术论文1260余篇，对西伯利亚考古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访问期间，莫洛金作题为“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青铜铁器时代考古研究新成果”“青铜时代的西西伯利亚——区域性趋势与规律”“阿尔泰山地区巴泽雷克文化”三场专题讲座，重点介绍了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



常务副院长梁敬东为维亚切斯拉夫·莫洛金（左）颁发聘书

究所近些年重要的发现和研究成果。

11月29日，莫洛金在文研院作第一场讲座，主要关于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青铜铁器时代考古研究新成果。本次讲座主持人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林梅村教授，评议人是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讲师刘翔博士。莫洛金简单介绍了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及其考古队的田野工作，尤其是公元前70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文化的发现，为我们寻找新疆和内蒙古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他重点介绍了该研究所近年来的主要研究成果，还介绍了该研究所同德国、蒙古国、韩国、美国、哈

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波兰、日本、法国等国家研究机构的国际学术合作以及与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的合作经验及最新出版物。

12月2日，莫洛金作第二场讲座，讲座主题为“青铜时代的西西伯利亚——区域性趋势与规律”。本次讲座由林梅村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所长、考古文博系主任魏坚教授评议。莫洛金介绍了西西伯利亚地区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气候条件，阐述了人类掌握金属制造技术的主要条件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早期金属时代文化的扩展进程以及欧亚大陆和北非地区的青铜时代早中期文化的分布范围，西西伯利亚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的分期等，并重点介绍了西西伯利亚青铜时代主要考古文化的分布范围与特征。目前中国学者对西伯利亚考古的知识仍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莫洛金的精彩演讲将我们带入西伯利亚考古的全新时代。

12月6日，莫洛金作题为“阿尔泰山地区巴泽雷克文化”的第三次讲座。本次讲座主持人是林梅村，评议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锦绣老师。巴泽雷克文化（公元前6—前2世纪）是欧亚大陆早铁器时代最灿烂的文化之一。该文化分布范围包括俄罗斯阿尔泰山地区以及哈萨克斯坦、蒙古国与中国相邻地区。莫洛金重点介绍了巴泽雷克文化不同墓葬及出土遗物，包括服饰、兵器、装饰品、马具、马车等，同时还介绍了近几年通过应用自然科学方法及古代生产技术研究获得的相关研究成果。

莫洛金的专题讲座得到相关领域学者和学生的高度评价。中国学者了解的俄

斯青铜时代考古文化序列是以米努辛斯克盆地为基础的，但是对于更广阔的西西伯利亚地区几乎一无所知。魏坚谈到关于西西伯利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国学者需要格外留意，将中国北方地区、南西伯利亚、西西伯利亚考古学材料综合梳理研究，才能更好地解决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问题。林梅村也格外强调，莫洛金及其团队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对研究中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考古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如莫洛金介绍的塔尔塔斯1号墓地等，延续时间较长，地层丰富，较好地展现了西伯利亚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序列，如乌斯季—塔尔塔斯文化到奥迪诺文化，到克罗托沃文化，再到后克罗托沃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不过，林梅村对莫洛金介绍巴泽雷克古墓出土所谓“印度丝绸服装”深表怀疑，因为印度以棉花为纺织纤维，丝绸是中国的发明，他认为巴泽雷克古墓出土的这件公元前5世纪的丝绸服装很可能来自中国。

（本文于2019年12月12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马丽亚·艾海提）



文研院举办“潘光旦与中国社会学”——纪念潘光旦先生诞辰120周年研讨会暨《潘光旦全集》启动仪式



纪念会现场

2019年12月7日，由文研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商务印书馆联合举办的“北大文研纪念”第七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本期主题为“潘光旦与中国社会学——纪念潘光旦先生诞辰120周年研讨会暨《潘光旦全集》启动仪式”。

在群星璀璨的20世纪中国学术界，潘光旦先生是最富人文关怀、最具士人风骨的学者之一。在社会学、民族学、优生学、教育学等方面，潘光旦先生均留下了丰厚的理论遗产，“中和位育”“自明自强”等理念在中国现代教育领域回响至今。潘光旦的学术领域涉猎广博，为人的厚度亦令后人高山仰止。值此潘光旦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文研院特举办本次纪念研

讨会，在百年后的今天重新研读先生的学术著作，讨论先生的深厚思想。

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主任李霞主持开幕式。社会学系主任张静教授表示，潘光旦先生一生致力于社会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思想遗产尤以民族精神、文化传承、优生教育最为鲜明。在环境的不断变化中，潘光旦先生对时事坚持己见，极为可贵。社会学系马戎教授回忆了为整理出版14卷本的《潘光旦全集》尽心尽力、鞠躬尽瘁的潘乃穆老师。马戎指出，潘光旦先生的一生是“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最好体现。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聚焦于潘光旦先生人格的典范意义。在纪念潘光旦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文章中，费孝通先生写道，推己及人的“己”是一切行为的基础，

看待自己的方式则是最大的学问。渠敬东指出，费孝通先生对“己”的诠释正是理解潘光旦先生“中和位育”思想的关键，即从他人、从自己和他人的关联中，甚至在天地世界中寻得自己。通过这种方式，才可能形成人的厚度，进而为学术带来温度和情感。因此，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无论对学者还是对教育而言，最重要的都是树立人生的典范。前进的基础是传承与追溯，而传承离不开敬畏和亲切，这正是文研纪念这一活动的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赵立玮、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讲师陆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飞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刘亚秋作主题报告。十余位知名学者依次进行了主题报告及评议。校内外百余位听众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本文于2019年12月13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文研院与故宫博物院故宫研究院举办“故宫与故宫学的现状与未来”学术交流座谈会

北京大学与故宫博物院于2019年10月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深入开展文物保护与研究、人才培养等工作。在此背景下，文研院与故宫博物院故宫研究院携手，迅速落实全方位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12月13日上午，北京大学相关学者和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赴故宫建福宫花园敬胜斋，与故宫博物院故宫研究院专家开展了关于“故宫与故宫学的现状与未来”学术交流座谈会。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赵国英、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及双方20多位专家

学者参加。座谈会由故宫博物院研究室副主任王子林主持。

赵国英介绍了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展陈形式、图书出版以及故宫在中外学术交流传播中所做的努力。自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故宫向观众展现皇家建筑陈设原状和宫廷文物文化专题展览，并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促进与各国和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极大丰富了展览内容和观众的文化体验，诠释了世界文明的多元性和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他们同时创办数字展览，实现了文化和科技的融



座谈会现场

合，实现了观众与藏品的亲密互动。故宫博物院的书画、文物、史料等各类出版物，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邓小南表示，故宫不仅是旅游的热点聚焦地，还为文物的保护和宣传作出巨大贡献。故宫博物院自成立起就与北京大学血脉相连，北大学者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故宫的建设，在各个时期都为故宫文物保护工作贡献了力量。从今年9月双方初步达成合作意向，到10月北京大学与故宫正式签署合作协议，今天的座谈是第一次成规模地开展学术交流，她希望双方将来互动更为密切，并取得实质性成果。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故宫学术的现状与未来”展开讨论交流。双方从自身研究领域出发，就历史学、艺术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多个角度提出看法及合作方式，

规划未来可开发的课程，如“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与鉴藏”“明清宫殿建筑与宫廷陈设”等，将学术思想和实物资源结合，通力合作，资源共享，推动发展。

座谈结束后，文研院副院长杨弘博代表北京大学及文研院向故宫博物院故宫研究院赠送纪念品。学者一行参观了“须弥福寿——当扎什伦布寺遇上紫禁城”展览。此展是故宫博物院建院以来首次举办以历代班禅及宫廷佛教艺术为主题的专题展览。学者们大开眼界，近距离看到大量珍贵的汉藏以及喜马拉雅地区古代佛教艺术珍品，感受到了藏传佛教文化艺术的灿烂过往和辉煌成就。

（本文于2019年12月17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关雪）

文研院“文明之间”系列讲座收官 十位学者共同探讨丝绸之路沿线多种文明的交流互鉴

2019年12月19日，“文明之间”系列讲座最后一讲由历史学系荣新江教授主讲，题为“丝绸之路：一个跨文明的交流系统”。本系列讲座历经2019年春秋两个学期，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文博学院、外国语学院和艺术学院等院系的十位学者担任主讲。2019年，文研院设计、筹划并启动了“文明之间：交融与再造”系列讲座，旨在以“丝绸之路沿线的文明”为线索，从不同学科探讨丝路沿线各个古代文明之间的交融。

习近平主席曾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中指出：“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自2013年“一带一路”理念提出以来，学术界对文明在历史与当下的交融互鉴这一议题的关注持续升温。北京大学有着深厚的文明研究传统，学者们在对古代文明所做的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观察中，发现文明元素往往是超越疆界的，是在不同文明间流动和相互借用，成为不同社会间关系的共同产物。

各位学者治学领域不同，观察视角各异，讲座内容所涉区域西起埃及，东至中国西北地区，横跨了欧亚大陆，与历史上“一带一路”的路线大致重合。历史学院颜海英教授以“希腊世界的埃及魔法”为题作了本系列的首场讲座，在讲座中她以魔法

纸草书为例，描述了在亚历山大东征所开启的希腊化时代中东风西渐的历史交融。

众所周知，北纬30°—50°之间有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草原地带。在这条草原地带之上的各大古代文明，不仅对古代以及近世东西方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曾是沟通古代中西方世界的重要桥梁。针对这一地区悠久的文明传统，历史学系罗新教授强调，带着内亚视角解读中国传统文献会带来新的启发；事实上，农牧交错地带两侧的人群在历史上不断地进行着物质文化交流，建立北魏的鲜卑族本是柔然的一支，而柔然在败于突厥人之后西迁，并在六世纪现身欧洲。考古文博学院林梅村教授在讲座中指出，西迁的柔然人将铁马镫带到了西方，对欧洲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外国语学院段晴教授也强调，历史上族群的迁徙带来了文明的融合与交流。被希腊人称之为“斯基泰”的游牧民族，在中国文献中以“塞种”的名字出现，他们在欧亚草原上活动与迁徙，将希腊文化带到东方，尤其在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文明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历史学系副教授晁涛在讲座中追溯了奥斯曼帝国多样性的起源及其表现形式。“多元”本身即暗示了一种整合不同民族政治、文化、宗教因素的交流机制；外国语学院王一丹教授的讲座“从《五族谱》看波斯人对欧亚诸民族的认知”，详细梳理了《五族谱》的内容，并进一步

申述了研究《五族谱》的意义。《五族谱》被多位史学家视为“第一部世界通史”，它体现了当时波斯人开放、包容与多元的历史观。

传统上，揭示不同文明的奥秘、探索多文明交流互动的模式属于广义的历史学科的研究范畴，而多学科的进入对研究这一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艺术学院贾妍老师从艺术史的视角出发，描述了青金石在古代世界的流转过程：地中海世界的青金石来自遥远的帕米尔高原以西的阿富汗，以青金石为质料的装饰品在两河流域流行，并远播埃及世界，对欧洲装饰艺术亦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交流是文明之间沟通交流的另一重要面向，外国语学院教授林丰民的讲座“阿拔斯朝百年翻译运动与阿拉伯文化的繁荣”集中体现了这一点。成立于公元830年的“智慧宫”其实是中古世界欧亚大陆各文明交融的大熔炉，通过翻译运动，阿拔斯朝将希腊、波斯、印度等文明引进了阿拉伯世界，并促成了阿拉伯文化的繁荣；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叶少勇的讲座，则更多地关注印度语言的产生及其东传过程。

荣新江讲道，一种保守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地理位置和地貌特征具有先天的“封闭性”。然而事实上，西北地区群山之间的缝隙是东西文明交流的“孔道”，这条天然的“孔道”即沟通东西文明的“丝绸之路”。荣新江将这条“丝绸之路”理解为一个跨文明的交流系统——伊朗文明、希腊罗马文明、佛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以人群迁徙、商人冒险、信徒传教、帝国扩张与战争等方式沿“丝绸之路”流转、传播、

交融与再造。《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凿空（通）”西域，形象地呈现了在帝国扩张力量的驱动下人群渴望交流，为突破封闭所作出了努力。荣新江最后总结道，一个文明能不能进步，关键在于交流。历史经验表明，跨越文明的边界，非但不能抹杀、削弱某个文明的主体性，反而会而在跨体系的交流中逐渐强化对自身的理解。

以上不同讲座的内容都暗示了东西文明的潜在对话。文明从来不是孤立的发展，而是在复杂的交融、互动与碰撞过程中逐渐再造自身，从而建立起文明独特的文化标识。强大的学者阵容，前沿的研究成果，使该系列讲座自始至终受到高度关注，吸引了校内外广大师生的踊跃参加。

文研院自成立以来，即致力于打破学科壁垒，搭建有效的跨学科互动交流平台。针对“丝绸之路沿线的文明”这一议题，文研院还有着不同形式的学术呈现。文研院曾先后策划举办过“千年敦煌艺术展”“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90周年纪念展”“健陀罗的微笑——巴基斯坦古迹文物巡礼展”和“丝路研究与北大人”等不同主题的学术展览，围绕“丝绸之路”举办过多场论坛及专题讲座。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北京大学发挥自身学科优势，定能在丝路研究领域做出新的成绩，再创辉煌。

（本文于2019年12月24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玉瑞）



文研院举办第七期访学学者总结会

“多年以后，我也会回想起二〇一九年的秋冬：静园二院落木萧萧，继又残雪茵茵。研究室、会议室却总是暖意洋洋。透过窗玻璃折射进来的阳光，被过滤掉与之相伴的寒风，从清晨到正午，由和煦而炙热，始终给人在暖春里晒太阳的错觉。”这段来自社科院近代史所彭春凌研究员的文字，道出了文研院第七期访学学者的共同感受。伴随期末将尽，大家开始忙碌着寄送书籍回所在单位，也检点四个月来的所得。12月27日下午，本期十余位访学学者与文研院院务会、行政团队召开总结会，畅谈了他们在北大的感受。会议由杨弘博副院长主持。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表示，建院以来，文研院怀抱“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理念，以“涵育学术、激活思想”“近者悦、远者来”“清新风气、一流标准”三条原则为标准，希望给学者提供一个简单、纯粹、干净的氛围。在她看来，对话是学术交流的基础，而这批访学学者，无论资深资浅，在文研院都能够敞开心怀开展讨论，使对话走向深入，让学术潜力得以释放，在无形中塑造了学术共同体。她也与大家共勉：“大家从五湖四海将源头活水带到文研院来，也希望大家把在此建立起来的共同的学术理念、学术追求，带到五湖四海去。”

对于处在不同学术阶段的学人来说，文研院意味着什么？有着35年教龄的资深

政治学者、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景跃进教授说：“在绩效考核和指标主义的氛围下，文研院为学者提供了一个心灵慰藉之所，一个精神家园。在二院的四个月，我拥有了想象中一个学者应该过的生活。”著名历史学家李开元教授则视文研院为“失而复得的文化家园”，他在此完成了秦汉史三部曲的第三部《汉兴》的写作，即将交付出版社。而对诸多青年学人而言，文研院是学术生涯的一处驿站，把脚步慢下来，大家可以在此稍作停顿、积蓄力量并重新出发。浙江大学叶晔教授表示，在大学工作以后，为了写论文而读书，往往是一位学者的常态，而因为文研院没有论文发表的要求，在这里可以享受从容阅读这一“古典的奢侈”，同时自由地向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请教。社科院近代史所彭春凌由衷感慨：“快，要更快，还要再快，快快快！这是我们近十年来的切身感受。项目、出版、发表、考核、升等，以年度打分、核算业绩，有追求的学者往往身心俱疲。”而在文研院，她则获得了一段难得的心灵放空、学术休整，甚至可以稍微躺着“晒太阳”的时间，她关于“章太炎与明治汉学”的思考和阅读也得以推进。华中师范大学周月峰教授则认为，做学问与写论文是两种不同的状态，学问应该始终保留其不功利的本来面目。他在驻访期间重读部分西方史学著述，或是重读傅斯年先生著作，都带来新的感受。这里或许不是完成一个既定计划的理

想场所，但是却适合播撒新的种子。

让大家感到难忘的，更是文研院所昭示的可能性，以及在此感受到的一种风格、一种氛围。剑桥大学资深的中国史学者周绍明（Joseph McDermott）教授表示，邀访学者群体内部每周例行的学术讨论，代表了文研院独特的学术文化：每位学者都持有自己的立场与看法，争论往往会非常激烈，然而争论的前提是认真倾听和理解，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学术批评，让彼此都得到尊重。这让作为汉学家的他想起先秦以来，流传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文会的传统，而在文研院的四个月，让他亲身体会到这一传统。印第安纳大学东亚系的肖铁此前曾在美国和欧洲的高等研究院有过类似的访问经历，在他看来，充分的坦诚交流是文研院学术讨论的突出特点。文研院对不同学术流派的包容、同仁之间的相互信任，营造了开诚布公、不具功利性的讨论氛围，使彼此的距离更近，交流的深度和广度让身在其中的学者受益匪浅。文研院在不经意间培养起同期十余位学者之间紧密的集体感，这是习惯了孤独的人文学者最大的温暖。

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在聆听大家的发言后，动情地表示：“大家所分享的驻访感受，让我体会到文研院的追求，大概接近于中国知识传统里讲的‘山林’的世界。在‘山林’的世界里，你可以看风景，重新静一静，重新体会一下自己，重新跟别人在一块相聚，好好体会一下友谊和友情。”一期期的邀访学者，以他们探索的勇敢、相交的真诚，带给我们对学术生活新的领悟，也坚定我们的初心。

年年岁岁，时光流转，似乎每一期的邀访学者，都会留下不同版本的文研院印象，流传许多故事。台湾学者吴雅婷教授说：“二院是很美丽又有温度的地方。静谧却又隐隐流动着生气，那些随着时辰天候波动的光影除了是物理现象，也反映着如此的气质。它也承载着近百年的晴雨风霜，许多人的回忆——过去是北大人的，而后则还要加上世界各地学人的。”无论如何，这是令人难忘的一期，大家经历了石立善教授遽然离世而带来的震惊与悲伤，也将更加珍惜在此结下的学术友谊。道不完离愁别绪，也铭记着“别忘了把种子埋下”的嘱托，大家互道珍重，相期于未来。

（本文于2020年1月2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韩笑）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一行到访文研院

2020年1月9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以下简称IAS）院长罗伯特·迪格拉夫（Robert Dijkgraaf）教授以及首席发展官伊丽莎白·伍德（Elizabeth Wood）女士到访文研院。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接待来访。此次来访，迪格拉夫与渠敬东就双方机构的运行模式、目前的问题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合作方向进入了深入探讨，期待未来能够进一步合作。

迪格拉夫指出，IAS的模式为世界上许多高等研究院提供了灵感，而IAS也十分乐于见到各地高等研究机构所展示出的多元和独特色彩。谈到高研院这种学术模式，双方都认为现代大学对年轻学者施加了很大压力，能让学者从繁杂的行政教学

任务中脱离出来，有时间进行独立思考研究，是非常宝贵和重要的。而IAS和文研院组织的非正式学术活动也给学者们提供了机会了解彼此的学科，往往是不经意间的交谈带给学者许多思考和灵感。渠敬东介绍了文研院的五大议题，并指出优秀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往往带有很深厚的人文底蕴。通过探索社科和人文学科的交叉，学者们能更好地掌握定量和定性研究的平衡，从而获得更广阔视野。

双方就未来合作方向展开讨论。迪格拉夫表示，对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来说，聚集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学者十分重要，希望双方可以建立联系，每年互相推荐邀访人员，提升彼此的学术知名度和影响力。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一行留影

在渠敬东的带领下，迪吉克格拉夫一行参观了文研院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文研院三周年海报展。渠敬东对文研院各类学术活动、邀访学者项目、考察和课程等作了介绍。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1930 年成立于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是世界著名的基础学科研究机构，也是“高等研究院”这一学术平台概念的先驱。研究院平台下分有数学、历史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四个学院。每年高研院从全球招收 250

名访问学者，另外院内有常驻教授 30 名左右。爱因斯坦、冯·诺依曼、奥本海默、杨振宁等学者都曾在该院工作过。迪格拉夫曾任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院长、国际科学院委员会（IAC）联合主席，2012 年出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

（本文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赵相宜）

邀访学者第七期项目结束

2019 年岁末，文研院第七期邀访学者带着对这座精神家园的不舍，对难忘的驻访生涯作出总结。第七期邀访项目自 2019 年 9 月开始，于 12 月末结束，21 位海内外学者加入文研院学者大家庭。其中，国内学者来自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或机构，海外学者则来自德国、俄罗斯、美国、英国、德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他们的研究专业覆盖了文学、历史学、考古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各大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及相关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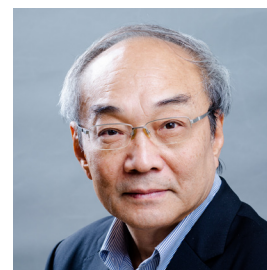
“近者悦，远者来”，邀访学者项目是文研院学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学术共同体建设，文研院先后举办了一系列高端学术讲座和丰富的学术交流活动，学者们在此研究切磋、深度交流、涵育学术、激活思想。安静舒适的工作环境，充满活力与热情的交流平台，让邀访学者盛赞文研院“创造了这么一个学术乌托邦，一个以中文为主要工作语言的世界顶级学术交流平台”，“是一个理想的读书、思考、写作和交流的学术空间。”

特邀访问教授



波特伦·谢弗德（Bertram Schefold），现任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学院高级教授（Senior Professor），是德国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欧洲经济思想史协会荣誉主席。曾参与编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权威。在资本理论、经济思想史、环境经济学等领域有深入研究。访问期间，谢弗德在文研院和北大经济学院分别做了两场主题讲座：“经济学的普适性：现代经济学对古代欧洲资本主义形态的解释力”“《盐铁论》：经济思想史中经典著作”“欧洲如何崛起：经济知识在制度构建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及“《资本论》中‘转型问题’”；同时参加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冀门对话：外来文化传播与中国金融业创新”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成立大会，与来自北大校内外的经济学者、历史学者和北大的同学们进行深入和广泛的交流。

王汎森，现任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院士。主要研究兴趣是明清到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和史学史，近年来将研究触角延伸到所谓中国的“新传统时代”，包括宋代以下理学思想的政治意涵等问题。访问期间，王汎森先后以“性格与历史”和“历史是一种扩充心量之学”为题，作了两场公开讲座。他在静园二院开设了“英美思想文化史名篇选读”班（四讲），与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社科院的青年学者共同阅读和讨论。10 月，他在文研院举办“陈寅恪与近代中国的学术与思想——暨纪念陈寅恪先生逝世 5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作了“陈寅恪的明清之学”的主题发言，主要讨论了陈寅恪先生晚年研究明清的两部著作《柳如是别传》和《论再生缘》使用证据和推理的方式。会后他接受《三联生活周刊》的专访，分享了他对陈寅恪晚年争议最大的一部作品《柳如是别传》的理解。





莫洛金·维亚切斯拉夫 (Molodin Viacheslav)，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青铜铁器时代考古研究室主任，是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人文学院考古学与民族学教研室教授。莫洛金院士领导俄罗斯考古队在阿尔泰山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发现与研究了重要的巴泽雷克文化遗址，对西伯利亚考古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访问期间，莫洛金在文研院作了题为“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青铜铁器时代考古研究新成果”“青铜时代的西西伯利亚——区域性趋势与规律”“阿尔泰山地区巴泽雷克文化”的三场专题讲座，重点介绍了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近些年重要的发现和研究成果。

梁其姿教授来自香港大学，现为李约瑟-毛文奇基金教授、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兼历史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研究方向是明清社会史和近代社会文化史。访问期间，梁其姿教授在文研院作了题为“日常食物的价值——酱油制造与中国历史”的主题讲座，并与高彦颐教授、薛凤教授联合主讲“物质文化史的方法和实践”工作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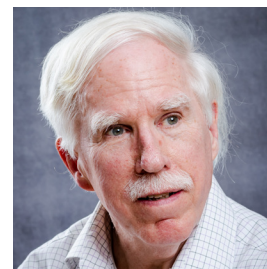


高彦颐教授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历史系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主要研究方向是古代晚期和近代的中国科技与性别/妇女史。联合主持工作坊外，高彦颐教授主讲“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六十期“从景德镇工匠传说看工艺技术传承与创新”，深入讨论景德镇陶瓷生产过程中“物”与“人”、文献记载与口头传说等关系。



邀访学者

周绍明 (Joseph McDermott)，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教授、著名的中国社会经济史、文化史学者，是《剑桥中国史》第五卷第二部分的作者。驻访期间，周绍明就“宋元时代的乡村组织”的学术研究发表了报告，围绕“从地方族谱看传统中国家庭冲突”为题进行分享；发表公开演讲“商业合伙关系——中国经济史为人忽略的一面”。此外，周绍明还接受了文研院“口述史项目”的采访。



李开元，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驻访期间，李开元参与了多项学术活动，其中包括发表“跨文类写作与学术研究”和“荆轲刺秦王：‘史记’中的口述史学”两次学术报告，并主讲了“学术研究中理论概念的抽取与使用”交流会。同时，李开元邀赴故宫研究院举办讲座，拉开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系列学术讲座”的序幕。此外，李开元接受了文研院“口述史项目”的采访，并于驻访期间完成有关秦汉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汉兴》。

景跃进，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研究兴趣为中国政府与政治、基层治理。驻访期间，景跃进发表了题为“政体与国情：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大一统’议题的学术报告；分享了“在没有选举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官员如何回应民众？——来自浙江的故事”；并以“社会科学中的概念问题——以中国政治研究为中心的讨论”为题发表公开讲座，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已有的概念调适实践，以及这些做法所产生的一系列方法论问题。





李放春，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学术副院长，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史、历史社会学，中共革命史。李放春发表了“探究革命之‘道’：在现代性与文明之际”和“谱系学：从尼采到韦伯”两次主题报告，组织了“革命研究的两种路径：政治文化与文明史视野”论坛，积极倡导从文明史的大视野出发重新审视、阐释中国革命现代性。

田雷，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美国宪法历史和理论、中国宪法制度、“一国两制”和香港问题。驻访期间介绍了自己对美国早期宪法史的研究，主线是阐释了“漫长的建国时刻”的概念，并在交流会上围绕改革开放年代的香港问题做报告，题为“‘香港’作为方法：小城何以大事？”



叶晔，浙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宋元明清文学研究、词曲研究、中国文学近世转型研究。叶晔驻访期间完成了《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一书，随后将会在中西书局出版。另外，他以“古典文学文本的整体凝固及其意义”为题作学术报告，完成的同题文章将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上；他还发表了题为“体制内文学的规制与逾越——对由唐至明的生碑记的长时段考察”的演讲。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为性与身体社会学、艾滋病的跨学科研究以及定性研究方法。在驻访期间，黄盈盈主讲了学术报告“跨越学科的‘性’史”，介绍了性研究的三个突出特点：议题的高度道德化、对话的多主体性以及研究的切身性，并以“三个人、四座城、二十年”为题，介绍了她田野调查的经验。



姜南，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室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基于梵汉对勘的汉译佛典语言研究。驻访期间作了题为“如影随形、如响应声——佛经翻译与汉语演变关系例说”和“早期大乘佛典书面流传举证：‘梵志’与‘楼至’”的主题报告，并参加了由外国语学院段晴老师主持的读书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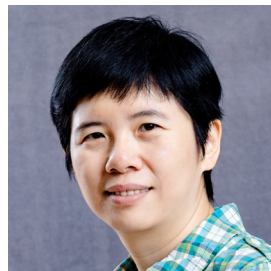
路国权，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先秦考古、田野考古、中国古代青铜器。驻访期间，路国权就主题“反思与重构：春秋史的时空结构和过程”和“分类与类型”进行了学术报告，并举办了五次春秋史读书会，借共同读书和讨论的机会吸收到许多意见和建议，对书稿进行了补充和最终修订。此外，路国权组织七期邀请学者赴二里头夏都遗址考察，应邀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团学读书分享会作报告——《考古分类和分期断代》，还参加了第九届北京高校研究生考古论坛。





彭春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近年来尤为关注近代儒教、国学，东亚地区以及中英日三种语言圈的思想文化交流，章太炎、康有为及周边思想人物的研究等。驻访期间，彭春凌积极参与各类学术活动，发表了学术报告“从宇宙进化到社会进步：近代中日交互语境中的赫伯特·斯宾塞”，并主持了交流会“人兽之辨的越洋递演：从沃德、岸本能武太到章太炎”。

吴雅婷，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宋代社会文化史，尤其关心传统中国的社会构成。在驻访的四个月内，吴雅婷发表了题为“瞻望远方：宋人的旅行知识与新知的化成”的内部学术报告，分享了“宋代类书中的‘旅行’意涵”的交流会，参加了“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国际会议”“议题整合与跨域对话：南宋史研究新的可能性”论坛并发表论文，此外还参加两个宋史研究相关的读书班：“宋代官箴读书课”和“苏轼文集读书会”。



肖铁，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文学和思想史。肖铁在驻访期间于文研院中作了主题报告“因众之名：群众的发现与叙述现代中国的方式”，并做了“卡佛、蓝领写作和现实主义”的分享交流会。驻访期间发表的文章包括：《卡佛致卡佛，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二》（《读书》2019年10期），短篇小说《鼯鼠之王》（《小说月报》2019年9期）。

姚达兑，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兴趣是近代中外文学与翻译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理论。驻访期间主要研修关于近代外国人/传教士如何翻译和研究中国的神怪小说，作了题为“中国神怪小说的近代英译之聊斋英译”和“进化论、世界体系与世界文学”的报告。完成了《世界文学理论》一书的修订，以及部分中国神怪小说外译的写作。



周月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与社会，近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复调演进的历史过程以及五四运动的历史叙述较为关注。周月峰老师在文研院作了“另一场新文化运动”和“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解读”的学术报告，参加“英美思想文化史名篇选读”班，此外还参与策划文研院主办的“傅斯年与北京大学”专题展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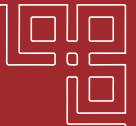
文研院将继续倡导“清新风气、一流标准”，努力汇集国内外资深学者与优秀年轻学者，为知识积累和思想创新提供学术支持。

（本文于2020年1月3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关雪）



文研纪事





文研纪事

02

2019-11

由文研院、商务印书馆联合举办的“菊生学术论坛”第十六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议题整合与跨域对话：南宋史研究新的可能性”。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博物馆，台湾中研院、长庚大学、成功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日本神户女学院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学习院大学等高校的三十余位学者出席。本次会议由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长庚大学原讲座教授黄宽重，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召集。

02-03

2019-11

文研院承办第十六届北京论坛第六场分论坛“早期文明的书写实践：起源、构成与融通”。来自中国、法国、美国、德国、英国、荷兰以及日本的 26 位学者参加论坛，就早期中国，美索不达米亚，亚述和埃及的书写进行了交流和探讨，其中包括如英国学术院院士辛威廉（Nicholas Sims-Williams），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所长克里斯托弗·伍兹（Christopher Woods），美国汉学家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中国文字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黄德宽，荷兰莱顿大学佛教学教授司空竺（Jonathan Silk）等。11 月 2 日晚，文研院在静园二院举办招待会，参加分论坛以及校内相关领域的学者扩展讨论、延伸交流。

04

2019-11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四十八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关于资

05-06

2019-11

本主义的纷争：一个历史学家的观点”。柏林自由大学历史学教授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主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主持。

由文研院、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一百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胡语写本与文明传承”。来自荷兰莱顿大学、日本京科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英国伦敦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北京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内外著名高校和研究所的数十位学者围绕开放语文学、粟特文碑刻文本、楼兰语假说、于阗语与希腊语关联性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文研院第七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九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教授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徽州祠堂”。第七期邀访学者李开元、景跃进、李放春、吴雅婷、黄盈盈、田雷、姜南、肖铁、叶晔、姚达兑、周月峰、路国权，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五十七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作题为“基层传播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的新闻治理经验”的演讲。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主持，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吴靖评议。

07

2019-11

文研院第七期邀访学者交流会（第六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交流会上，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叶晔谈“体制内文学的规制与逾制——对由唐至明的生碑记的长时段考察”，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吴雅婷谈“宋代类书中的‘旅行’意涵”。第七期邀访学者周绍明、李开元、景跃进、黄盈盈、田雷、姜南、肖铁、彭春凌、姚达兑、周月峰、路国权，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科学·文明”系列学术讲座、“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四十九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希腊科学精神的起源”。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吴国盛主讲，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系主任韩启德教授主持。

08

2019-11

马克斯·韦伯基金会中国代表处马勃思（Max J. Fölster）来访文研院，与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商讨邀访学者项目合作事宜。

10

2019-11

“第28届全国消防安全日”，文研院举办消防演习，并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学习相关知识。

“北大文研读书”第十九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传统中国的礼仪实践与社会形构——《礼仪下乡》研读会”。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永华作引言，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应星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陈进国，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赵丙祥，文研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出席并参与讨论。

11

2019-11

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五十八期在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许亮作题为“工厂、家庭和资本的边陲：中国企业在非洲的社会经济学考察”的演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亚光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潘华琼评议。

12

2019-11

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景跃进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政体与国情：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大一统’议题”。第七期邀请学者周绍明、李开元、李放春、吴雅婷、黄盈盈、田雷、姜南、彭春凌、叶晔、姚达兑、周月峰、路国权，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13

2019-11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五十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从日本吴乐‘师子’和唐乐‘苏莫者’看西域乐的东渡和演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葛晓音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玉才主持。

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到访文研院，与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讨论2020年西北考查路线事宜。

14

2019-11

“傅斯年与北大”展览筹备会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周月峰、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和院长助理韩笑确定展品与展览结构。

16

2019-11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应邀参加于中山大学举办的“第五届中国高校高研院联盟会议暨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成立十周年座谈会”，并作“涵育学术 激活思想——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成立三年以来的实践与探索”主题发言。

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受邀参加“大道一百年名人翰墨集萃”，并代表文研院接受主办方赠送的《胡适留学日记》（复制）一套。

18

2019-11

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一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漫长的建国时刻——如何讲述美国早期宪法史？”。第七期邀请学者周绍明、李开元、景跃进、李放春、吴雅婷、黄盈盈、姜南、彭春凌、叶晔、姚达兑、周月峰、路国权，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五十一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社会科学中的概念问题——以中国政治研究为中心的讨论”。文研院邀请学者、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景跃进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湘林主持。

19

2019-11

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五十九期在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樊星作题为“发明巴西：混血身份的构建与危机”的演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辉主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郭洁评议。

20

2019-11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五十二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商业合伙关系——中国经济史为人忽略的一面”。文研院邀请学者、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周绍明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主持。

文研院内部培训会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邀请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吴志攀就漫画艺术作主题分享报告。

文研院举办海报设计工作坊，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为学生助理团队进行设计指导。

“静园雅集”第二十五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习字·学书·作书——以古代书迹、书家为例”。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刘涛主讲，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石主持。

22

2019-11

文研院首位特邀访问教授、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回访文研院，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及全体工作人员热情接待。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前往中华书局，与中华书局党委书记、总经理徐俊，黄文弼先生之孙、著名剧作家黄纪苏，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主任李静，中华书局古籍学术中心副主任兼文学编辑室主任俞国林商议“中瑞联合西北考查”一书撰写事宜。

23

2019-11

“北大文研论坛”第一百零一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划等而治：对中国历代县级政区等级演变的观察”。本次论坛由文研院筹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所的十余位学者出席并参与讨论。

“多文明研究”工作坊第四场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该期工作坊分为两个话题：“奥斯曼主义的起源？——对“Gülhane Hattı Hümayunu”（《玫瑰园敕令》）的翻译和释读”，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管涛主讲；“从灵魂到心理：关于经典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研究”，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飞宇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范晶晶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陈侃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张嘉妹、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贾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王洪喆、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赵悠出席并参与讨论。

25

2019-11

“科学·文明”系列讲座、“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五十三期在第二体育馆报告厅 B101 举行，主题为“中国院士制度及相关问题探讨”。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史系教授王扬宗主讲，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史系教授、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兼职教授张黎主持。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创系主任韩启德教授出席。

26

2019-11

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二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副教授黄盈盈作主题报告，题目为“跨越学科的‘性’史”。第七期邀请学者李开元、景跃进、吴雅婷、李放春、田雷、姜南、肖铁、彭春凌、叶晔、周月峰、路国权，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无名学者讲座”第六十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2 报

27

2019-11

告厅举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孟琢作题为“礼乐传统与先秦人性论——从《乐记》‘人生而静’谈起”的演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吴国武评议。

“静园雅集”第二十六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音乐作为社会镜像”。印度音乐家、作家 T.M. 克里什那（T.M. Krishna）主讲，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赵悠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周欣老师参与讨论。

28

2019-11

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交流会（第七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交流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彭春凌谈“人兽之辨的越洋递演：从沃德、岸本能武太到章太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周月峰谈“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解读”。第七期邀请学者李开元、李放春、吴雅婷、黄盈盈、田雷、姜南、姚达兑、路国权出席并参与讨论。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五十四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王阳明的晚年思想”。文研院学术委员、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院长陈来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主持。

“文明之间”系列讲座、“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五十五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口诵与书写——印度文化载体的流变与东传”。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叶少勇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张嘉妹主持。

29

2019-11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五十六期第一场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青铜铁器时代考古研究新成果”。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维亚切斯拉夫·莫洛金（Viacheslav I. Molodin）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林梅村教授主持，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讲师刘翔评议。

“中国‘申遗’的路径选择——从钓鱼城遗址的考古疑难说起”主题讲座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原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刘曙光教授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郭卫东主持。

文研院与故宫博物院故宫研究院于 10 月底签署战略合作协议。11 月 29 日晚，两院联合举办的“故宫与故宫学”系列学术活动启动仪式暨“北大文研讲座”第

一百五十七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原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主讲,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主持。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副院长赵国英,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叶静漪出席活动,三百余名师生到场聆听。

02

2019-12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五十六期第二场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青铜时代的西西伯利亚——区域性趋势与规律性”。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维亚切斯拉夫·莫洛金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林梅村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魏坚评议。

03

2019-12

军队院校长集训队代表一行 22 人到访文研院观摩工作,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王周谊陪同,文研院院务会成员接待并展开座谈,院长邓小南就办院宗旨、凝聚议题、发展情况做详细介绍。

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三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吴雅婷作主题报告,题目为“瞻望远方:宋人的旅行知识与新知的化成”。第七期邀请学者周绍明、李开元、景跃进、李放春、黄盈盈、姜南、肖铁、彭春凌、叶晔、姚达兑、周月峰、路国权,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并参与讨论。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人文学院艺术、语言与文化研究所主任亚历桑德罗·斯基耶萨罗(Alessandro Schiesaro)教授、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孔子学院副院长王凯伦(Karen Wang)教授到访文研院,与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贾妍讨论未来学术合作事宜。

05

2019-12

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交流会(第八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交流会上,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副教授肖铁谈“卡佛、蓝领写作和现实主义”,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姜南谈“早期大乘佛典书面流传举证:‘梵志’与‘楼至’”。第七期邀请学者周绍明、李开元、李放春、吴雅婷、黄盈盈、田雷、彭春凌、叶晔、姚达兑、周月峰、路国权参与讨论。

06

2019-12

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社科部副部长王周谊、信息管理系主任张久珍、信息管理系

教授王军、图书馆研究馆员聂华到访文研院,与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商讨北大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筹建事宜。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五十六期第三场在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阿尔泰山区巴兹雷克文化”。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维亚切斯拉夫·莫洛金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林梅村主持,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锦绣评议。

“静园雅集”第二十七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将登太行——华北平原与山西高原间的古道考察”。博物馆策展人、古道旅行爱好者王抒主讲,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主持。

“文明之间”系列讲座、“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五十八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最后的斯基泰人——追溯于阗王国社会宗教文化变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段晴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萨尔吉主持。

07

2019-12

由文研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商务印书馆联合举办的“北大文研纪念”第七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潘光旦与中国社会学——纪念潘光旦先生诞辰 120 周年研讨会暨《潘光旦全集》启动仪式”。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商务印书馆的十余位知名学者及百余位听众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值此潘光旦先生诞辰 120 周年之际,重新研读先生的学术著作,讨论先生的深厚思想。

09

2019-12

中央主题教育第二督导组祝江南、江嵩、于凤玲、谢洪波、胡治刚、于成龙一行到文研院进行调研,并参观文研院海报展。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党委组织部部长柴真、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唐金楠等参加调研活动。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及全体工作人员参加调研座谈。

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主任李静、编辑李世文到访文研院,同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商谈老北大校史丛书出版事宜。

10

2019-12

敦和基金会项目官员刘勘到访文研院,与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商讨学术合作事宜。

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四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

研院邀请学者、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路国权作主题报告，题为“反思与重构：春秋史的时空结构和过程”。第七期邀请学者周绍明、李开元、景跃进、李放春、吴雅婷、黄盈盈、田雷、姜南、肖铁、彭春凌、叶晔、周月峰，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10-20
2019-12

“文研院”主办“物质文化史的方法和实践”工作坊，梁其姿、高彦颐、薛凤(Dagmar Schäfer)教授主讲，二十五名校内外师生热情参与。工作坊包括四次课程、四次讨论会、一次实地考察。课程主题涵盖：“‘物’在知识与社会系统里的角色”、“被历史遗忘的人们：用物质文化研究改写妇女生活史”、“物质性与科技史、砚史、药物史”、“中国历史中的食物：豆与酱”等。12月15日，工作坊学员在梁其姿和高彦颐两位老师带领下赴顺义、昌平的作坊与工作坊进行田野考察，参观食物生产流程，听取制作理念。

11
2019-12

“故宫与故宫学”系列讲座、“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五十九场在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古代画仿代者的揭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肖燕翼主讲，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刘晨主持。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前往欧盟大使馆、中国科学院参与马克斯·韦伯基金会国际评估事宜。

12
2019-12

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于晓凤、北京大学新闻网主编陈云超、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校风与文化建设办公室干事郑方圆到访文研院，指导宣传工作并参观海报展，文研院副院长杨弘博热情接待。

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交流会（第九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交流会上，日本就实大学教授李开元谈“荆轲刺秦王：《史记》中的口述史学”。第七期邀请学者周绍明、李放春、吴雅婷、黄盈盈、田雷、姜南、肖铁、彭春凌、叶晔、姚达兑、周月峰、路国权，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六十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从景德镇工匠传说看工艺技术传承与创新”。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历史系教高彦颐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主持。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香港大学李约瑟-毛文奇基金教授梁其姿出席并参与讨论。

13
2019-12

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一行及部分校内相关学者应邀前往故宫，同故宫博物院故宫研究院专家开展“故宫与故宫学的现状与未来”学术交流座谈会，并参观“须弥福寿——当扎什伦布寺遇上紫禁城”展览。

17
2019-12

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哈佛大学教授包弼德(Peter K. Bol)回访文研院，与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共同商讨双方在数字人文领域的合作与发展事宜。

“科学·文明”系列讲座、“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六十一期在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灾害与数字人文”。德国柏林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所长、柏林工业大学科学技术史教授薛凤主讲，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创系主任韩启德教授主持。

19
2019-12

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交流会（第十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交流会上，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景跃进谈“在没有选举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官员如何回应民众？——来自浙江的故事”，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谈“‘香港’作为方法：小城何以大事？”。第七期邀请学者周绍明、李开元、李放春、黄盈盈、肖铁、彭春凌、叶晔、姚达兑、周月峰、路国权，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六十二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日常食物的价值：酱油制造与中国历史”。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香港大学李约瑟-毛文奇基金教授梁其姿主讲，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主持。本次讲座也是文研院首次举办的“物质文化史的方法和实践”工作坊最后一讲。

“文明之间”系列讲座最后一讲、“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六十三期在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丝绸之路：一个跨文明的交流系统”。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玉麒主持。

23
2019-12

“故宫与故宫学”系列讲座、“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六十四期在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光绪帝死因研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朱诚如教授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欧阳哲生主持。

27

2019-12

第七期邀请学者总结会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14 位本期邀请学者、院务会成员、行政团队参加，杨弘博副院长主持。

31

2019-12

文研院全体工作人员分享新年蛋糕，并拍摄文研院全家福。

02

2020-1

“北京大学实体研究机构 2019 年度工作交流会”在中关新园一号楼举办。北京大学校长郝平讲话，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作“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工作报告”主题汇报。

04

2020-1

“未名学者雅聚”活动在静园二院 208 举办。未名学者陈侃理、程凯、程苏东、樊星、韩策、贾妍、李溪、林丽娟、刘晨、刘淳、卢白羽、陆胤、闵雪飞、宁晓萌、孙飞宇、田天、田耕、王娟、王利平、许亮、叶少勇、张春泥、张慧瑜参与聚会。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及行政团队参加并与学者们畅谈学术与生活点滴。

06

2020-1

文研院全体工作人员于静园二院 107 会议室举行年度总结会。

07

2020-1

第五次“北大中国史”编撰项目讨论会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荣新江教授、李伯重教授、朱凤瀚教授、陈苏镇教授、陆扬教授、罗新教授、王奇生教授、韩巍副教授、陈侃理副教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唐晓峰教授，清华大学国学院刘迎胜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包伟民教授、韩树峰教授、邱靖嘉副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胡鸿副教授，三联书店党委委员孙晓林、编辑冯金红、编辑杨乐，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参与会议。

09

2020-1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罗伯特·迪格拉夫（Robert Dijkgraaf）教授、首席发展官伊丽莎白·伍德（Elizabeth Wood）到访，与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商讨两院学术交流合作事宜。

11-19

2020-1

“科学·文明”系列讲座、“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六十五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国际著名科学期刊封神背后的商业化操作”。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江晓原主讲，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大庆主持，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创系主任韩启德教授出席并参与讨论。

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开展访问交流，拜访相关学者，了解高研院的历史、架构及行政设置。

